中日战争时期的

通敌内幕

1937—1945

上册

商务印书馆

中日战争时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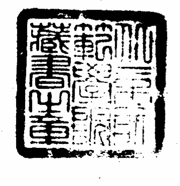
通　敌　内　幕

1937—1945

上　册

〔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
陈体芳　乐刻等译　郑文华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中日战争时期的

通敌内幕

1937－1945

下册

商务印书馆

中日战争时期的

通　敌　内　幕

1937—1945

下　册

〔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
陈体芳　乐刻等译　郑文华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John Hunter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dford

California 1972

内部发行

中日战争时期的

通敌内幕

1937—1945

（上、下册）

〔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

陈体芳　乐刻等译　郑文华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17 1/8 印张　345千字

1978年7月第1版　197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426　定价：1.6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于一九七二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约翰·亨特·博伊尔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九七〇年获得富布赖特奖金的资助，到东京专门研究中日战争史。

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三百多种与中日战争有关的专著、回忆录、论文以及日本外务省、德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和前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有关档案材料；此外，作者还采访了当时参与日本和汪精卫勾结的日本头面人物今井武夫、清水董三、松本重治和汉奸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等人。

这本书主要叙述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关于侵华策略的争论（即所谓“扩张主义派”与“反扩张主义派”之争），叙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并在中国扶植华北、华中、蒙疆、汪精卫等傀儡政权的经过，以及日、汪、蒋在整个战争时期既勾结又斗争的关系。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述汪精卫这个卖国贼的身世、性格、经历以及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和勾结。

这本书史料比较丰富，叙事也还生动。它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汪伪等汉奸集团投敌卖国的罪证，以及蒋介石假抗战、真卖国的丑恶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宣扬了不少反动谬误观点。例如，作者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的最后胜利，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但对石原莞尔这个曾积极参与侵略我国东北各省的军国主义分子则极力进行美化，还把汪精卫与法奸赖伐尔进行类比，胡说他们只不过是由于仇恨某个外国，又怕本国左派力量日益强大，才与敌国进行“合作”的“爱国者”等等，完全是反动逻辑，为卖国辩护。这些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批判。

我们翻译出版时，将原书后面的注释分别放在各章之后，将参考书目仍放在书后，以便读者查阅。本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陈体芳、乐刻两同志担任，汪世清、刘欣等同志也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全书由郑文华同志校订。由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错误一定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序言

一九七一年，巴黎首映了一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纪录影片《忧愁与怜悯》，它使三十年来关于“抵抗”的那些战时传说都开始站不住脚了。这部影片认为，“合作”乃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情，远远不是什么只有少数几个胆小如鼠的维希官员和一小撮不爱祖国的妇女里通纳粹国防军的例外现象。它还认为，要是在一九四〇年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话，那末法国人民就很可能举国一致地投票赞成贝当同德国侵略者达成全面停战的协定。《忧愁与怜悯》这部影片表明：尽管戴高乐的追随者制造了一些神话，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扭转了德国在战争中的命运时，法国同情贝当分子的人们才开始有所转变。《世界报》的一位影评家在评论该影片时写道：“只是从那以后，法国人才开始认识到‘合作’原来是桩大大上当的交易，在这往交易中，他们的德国‘伙伴们’根本不按什么规则办事，而只是一味勒索，‘把你的表交给我，让我来告诉你现在几点了’。”

在这方面，中国人倒并没有被这类问题和疑团搞得如此混乱。不论是在大陆中国或在台湾，肯定都还没有出现过类似《忧愁与怜悯》这样的影片，而且看来大概日后也不会有。一场历史性的革命巨变把这一切都吞没了，而自从战争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都在全神贯注着这场巨变。不过，人们偶尔也能听到这种议论：大家对中国的贝当——汪精卫——搞合作这个一度曾是重要的争论问题，都还记忆犹新；日本占领中国所造成的窘困局面仍然历历在目，怎能事隔一夜就会被人们遗忘呢？最近举行的一次历史学家会议特别使我形成了这个论点。在会议上，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评论一篇有关汪精卫的论文时首先就提到：今天，只要提一提汪精卫的事就足以把他那个本来是平静而又和睦的家庭，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使他们互相之间好几个星期拉长了脸，彼此连话都不讲。

提出有关战时合作这一有争论的问题的是日本人（至少是学术界这个阶层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在探索以下的问题的答案：究竟日本是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的一部分，或许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桥梁，许多国家对于它们自己的身份和自我形象都是很关切的，但是在这方面，很少有几个国家象日本那样被迫进行反省。其结果是，在过去这十来年中，日本的学者和为报刊撰写文章的作家们一直在对以下一些问题进行着反复的评论：中日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以及一度甚嚣尘上

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等。

不单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通过重温中日之间八年战争的历史而得到教益。随着我们美国自己的亚洲战争进入了第八年（反正从东京湾事件开始算起已是第八年了），我们肯定也可以从多年前的那次战争，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古典军事家孙子“持战以久，无国获利”这句名言吸取有益的教训。那些在中日战争中走合作道路的人，满可以把孙子的这一警句作为指导他们行动的座右铭。

我深深地感谢许多协助我为写本书做准备工作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我特别要向《日本翻译家》杂志的主编嘉纳勉表示谢意，因为本书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当我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间在该杂志担任工作时进行的。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挤出了时间在多方面帮助我，我在这里简直无法列举他对我的帮助是多么的大。要是每个写有关日本的书的作者都有嘉纳勉先生这样的朋友，那他就太幸运了。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角田顺博士为我安排了许多次访问，而且他对日本现代史渊博的知识也使我获益匪浅。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

那些接受我访问的先生们，对于本书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我在这里很高兴地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张嘉璈、陈春辉、金雄白、今井武夫、高宗武、李圣五、J·I·陆、松方吉三郎、松本重治、冈田洋次、清水董三（我悲痛地获悉他已于一九七〇年去世）、陶希圣、牛场友彦、和山崎重三郎等。我要感谢何炳贤先生，他不仅接见了我，还主动地为我同上述名单中的许多人进行初次会见作了安排，为我提供了照片，通过信函回答了我大量的问题，并且当我们在香港逗留期间招待了我和我的全家。我怎么也忘怀不了他的殷勤款待。我还要感谢曾仲鸣夫人，她接见了我的妻子，并慷慨地送了我本书所用的许多照片。我想对上述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说句话：当他（她）们读到那些回忆起来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至少有些事情是这样的），我希望本书将不辜负他（她）们对我的信任。

我还要对曾审阅和评论我的论文（它是本书的前身）的教授们表示感谢：托马斯·史密斯、莱曼·范斯莱克和克劳德·巴斯。对许多曾经慷慨地支持和鼓励过我的朋友们来说，我现在才表达谢意既是为时太晚，而且也是很不够的，对他们之中的两个人——肯·巴特勒和约翰·巴尼特——我应该单独表示感谢。对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帮助和协作，我是很感激的。尤其是戴维·曾和阿伦·保罗两位，在使我熟悉该馆的藏书和资料方面特别关心我、帮助我。感谢马场章、会择正治、高姆包扎布·汗金和亨里埃塔·罗等诸位所给予我的各种帮助。我还要感谢富布赖特委员会所给予的资助，使我得以到国外进行研究工作。

如果要把我对我妻子巴巴拉·希普勒·博伊尔的协助部一一列举出来的话，那一定会使承印本书的人负担过重。尽管这样，在结束我对大家的致谢之前我不能不对她的耐心、体谅和信心表示感谢。要是她在以上任何一方面不全力支持我的话，这本书也许根本就写不出来。

约·亨·博伊尔
于加利福尼亚州，奇柯城
1972 年 3 月

第一章 亚洲式的合作

对于西义显、董道宁、高宗武、伊藤芳男、松本重治、犬养健、堀场一雄、石原莞尔等人，西方研究亚洲史的学者们一定会说，这些人所共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的默默无闻。一般标准教科书在概述现代东亚史时，对上面这些人的名字只是一带而过。[1]但是，著名的《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一书的编者角田顺却坚持认为，研究这些人物的活动和信仰对于了解中日战争是“绝对必要的”。角田写道：“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了解这次战争的关键”。[2]在谈到上述的那些日本人物时，角田认为，只有他们几个日本人曾在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几年中提出过全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建设性计划。他把他们比较明确的看法，特别是他们对在大陆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既危险又徒劳的认识，同官方的政策作了对比。他用了一系列贬义的形容词来描述官方的政策：肤浅的、矛盾的、空洞的和盲目的等等。

在这批人物中，堀场和石原是军事战略家。由于他们考虑到和苏联战争的不可避免，所以他们一心一意地想到如何努力使日本的军事建设现代化和合理化，以应付对苏战争的到来。他们对于必须设法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的问题也想得很多，并在冲突发生之后，便主张争取尽快结束冲突，最好是在会议桌上解决问题，使日本的军事力量只受到最低限度的损耗。但是他们的观点逐渐失势，到了一九三九年，他们两个人都被解除了在东京“中央”*制订战略计划的职务。

这批人物的其他人中，既有次官一级的官僚，又有企业家和一个新闻记者。他们自己组成关心及早结束战争的人士的“第三种力量”。这批人物以进行私下的和平努力开始，最后导致了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叛离重庆这件大事；又从汪精卫叛离重庆开始，直到十五个月以后在南京建立了汪所领导的合作政府而告终。随着建立汪政权的过程的展开，我们将会看到，以石原和堀场为一方同以第三种力量集团为另一方之间个人的、以及思想意识上的紧密联系。

石原坚信，日本有一切理由去促进——而不是阻挠——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独立的国家。这个观点对第三种力量集团很有吸引力，

---

* 中央是一个含意不清楚的词汇，指的是由几个东京文武大臣组成的小团体。它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大臣组成，但一般说来，它的成员包括首相、外相、内相、陆相和海相以及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有时也包括一些次一级的官员，如参谋次长和军务局长。

但对石原的陆军同僚们来说则很讨嫌。要是石原还能在中央呆下去的话，他的观点很有可能在形成汪政权的性质方面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使该政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独立政府，而不是一个傀儡政府。可是石原没有能够在中央呆下去，他的想法和第三种力量的想法也都没有占上风。这种结局——即“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的具体体现就是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在中国大陆建立的一大批傀儡政权。本书接受了角田的建议，认为研究这批人物的观点和计划——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研究合作的政治，乃是一种可以说明东亚史中中日战争这一划时代的伟大时期的好方式。

在第二章，我对汪精卫的早期生涯作了概述。不管是接受了共产党或国民党的主张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记得汪精卫这个人，他们都是把汪当作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坏蛋来看待的。因此我一开始就应当声明，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搜集证据来支持多数人认定汪是个卖国贼的论点。我的目的也不是想要站在那些觉得可以从汪的身上找到纯属英雄品质的人的一边。在心理方面，汪精卫和大多数跟他一起同日本搞合作的人，与不搞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同样复杂的。总之，汪的动机同那些批评汪精卫的人一样，既有高尚和爱国的一面，也有可鄙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在第二章，我们考察的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情况，这时上述的某些不同动机已经有所暴露，首先表现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其次表现在中日之间所形成的日益复杂的爱憎关系中。

第三、四章里，在讨论各个傀儡政权之前，我首先试图通过分析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日本军界和政界内部的激烈争论，使对傀儡政权的讨论能在一个视野比较广泛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争论牵涉到日本用什么方法和条件来结束所谓支那事变*的问题。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究竟日本是否应当设法解决支那事变，究竟是通过和国民政府作出安排，还是依靠她自己建立的地方政权来确定她日后在中国大陆的地位的性质。

第一种选择明显地意味着放弃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边区各省费了大劲才取得的某些——如果不是全部的——特权和权力。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自我克制作为走向现实主义地调整关系的一个步骤是有价值的，而中国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后，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正在日益增长。此外，这种做法对那些强调苏联构成危险威胁的纯战略家们也是有吸引力的。如果一旦同苏联这个敌国发生了战争——在他们的战略估计中，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

---

*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内阁命令把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

或至少作为一个友好的中立国，也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这几个月里，我们看到那些主张和解政策的力量受到了决定性的挫折。不管这种政策有多少优点，它都不得不同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华北和满洲建立帝国而得势的那股力量进行较量。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既促使又利用中国的不统一，他们日益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踌躇满志，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北亚“称霸”，都是他们的功劳，而日本的外交家们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于是，战争就为这些军国主义者提供了理想的时机，去建立会分裂中国但却能保证日本在华北的霸权的傀儡政权。在东京争论了几个月后，首相近卫文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宣布日本决定停止和国民政府的一切接触，于是分裂中国的提倡者乃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近卫宣称，日本期望一个新的中国政权将会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日本将同这个政权讨论调整关系的问题。

事实上，鼓吹分裂中国的人士并没有等待官方批准他们的纲领，在开战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开始建立地方傀儡政权了。在内蒙古建立了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政权，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这些政权才又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十二月，华北方面军就在北平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关心这件事。稍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华中派遣军又建立了另一个以华中为基地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此。外，在某些重要城市建立了不属上述任何政府管辖的市政府。

第五章到第七章介绍各种傀儡机构的起源、特点、人选以及它们和日本陆军中支持它们的有关单位的关系。从参加这些政权的中国人的观点出发来细心研究这些政权，也许可以提供关于中国人政治态度的动向的丰富资料。不过，我研究这些成立较早且较次要的傀儡政权的主要原因是：（1）把它们和汪精卫政权——日本傀儡制造者的最后产品——相比较；（2）考查这些地方政权之较先成立对尔后汪政权建立的影响；（3）说明这些政府是怎样去实现日本陆军领导部门中某些重要人物的设想，而这些人物是热衷于有个分裂的、顺从的中国的。

我在第八章考查了近卫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历史性的宣言以后所面临的各种选择之后，在其余的几章里又转过来讨论汪精卫政权。从最初公开暗示要成立傀儡中央政府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的改组国民政府最后成立之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里，用不着去详细叙述这两年多所发生的事情，我只想简要地阐明一下最后几章的主题：中日双方对新政权的目的和性质的态度起了重大变化。中国方面原来设想汪政权会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政府，在华南未被占领的几个省行使政权并逐步扩大。但是，由于日本人方面的误解、估计错误和很多奸诈行为，最后出笼的汪

政权却很不一样。经过汪和日本人之间近两年的谈判之后，这个建立在中国被占领区的汪政府才同日本签订了一项基本条约，把汪政府从属于日本的关系明确地肯定了下来。

在这两年中，日本在这方面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里（甚至在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后），汪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日本政府或甚至日本陆军的全力支持。例如，陆军内部各派系，就象对待其他各种政策那样，对于同汪合作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意见。有的希望和各地方傀儡政权保持现存的联系，或者建立一个以象吴佩孚那样的军阀为首的新政权。还有一些人对与汪打交道是否明智抱有很大的怀疑，感到任何最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必须和蒋介石商谈。的确，甚至在最热心支持汪的日本人中，对于汪应起的作用也没有前后一致和统一的看法：究竟应该把汪本人当作一个终极目标，还是只把他当作通向重庆的“桥梁”呢，关于对汪的态度背后的不肯定和变动等因素，本书的最后几章中当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处理。

在本书中不时可以看到汪精卫的带有阴影的经历。虽然在民国初年的多数年头里，汪广泛地受到尊敬，而且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在三十年代他的实权越来越小，因而从未掌握过中国的命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汪的政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同汪一样都主张和日本修好，他并不反对汪的修好政策。然而，西安事变迫使蒋放弃绥靖政策，而汪却仍然坚持认为，采取修好政策虽属万不得已，但也还是有好处的。汪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前就缺乏军事实力派方面的支持，这时，随着整个中国都热衷于抵抗的精神，他发现他自己越发得不到政界和公众的支持了。于是，许多人就会在这一点上找到了一个答案，说明伟大的爱国者如何会变成傀儡这一矛盾现象。有些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没有更好的候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3]

这种争论——或曰指责——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本书必须予以解决的。用很简单的话来说，问题是：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或者，把这个问题用更加普通的词汇来表达：以傀儡这个词来形容对敌合作者究竟有多大用处呢？对敌合作者包括的类型是如此繁多，从吉斯林卖国贼直到苏加诺：吉斯林的叛逆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以致他的名字象犹大一样，在人们的语言中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但苏加诺却能自由自在地吹嘘他自己同日本人的合作。

就现代国际关系而言，傀儡一词有多大用处呢？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互相交错和互相依存已成为每个国家政策的核心，只有虚构的

国际法才会认为完全的独立是有道理的。就中国的历史来说，这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中国历史的特征是，中国人民在外国人统治下也能生存下去，甚至还能生存得很好。费正清写道："暴君是谁，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发点善心'，能适应这个制度就行了。"[4]历史上没有其他国家象中国这样出现过那么多能够设法同征服者和平相处的显赫人物。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难道中国历史没有提供大量有说服力的事例吗？它们证明，野蛮的征服者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其外来的方式方法，接受中国高尚得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最后变得同中国广大群众一样，把自己原来的特征部丧失掉了。

最后，而且也是最富有特点的，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的背景而言，傀儡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而当时和日本合作往往意味着——或被认为是意味着——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或从布尔什维克化的幽灵中得到解放。就这一点来说，看来合作者具有的污点（或没有污点）同合作者被人利用到什么程度之间关系不大。相反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来，污点（或没有污点）是指某人的合作方式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同"敌人"的合作与民族主义不矛盾——或能使之看起来不矛盾——那末"傀儡"就不但不会蒙受耻辱，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会得到很高的评价。

看来，用介绍的方式来对"傀儡"问题，特别是现代亚洲历史中的这类现象，作某些总的评价还是适宜的。

鉴于菲律宾"菲奸"的情况，可以认为亚洲傀儡所具有的污点有时也是含糊不清的。造成这种含糊不清主要有以下诸原因：菲律宾对美国人的感情是非常矛盾的；以日本的控制（日本答应菲律宾在大东亚共荣圈内独立）采取代美国的控制（美国答应菲律宾在一九四六年可以独立）是否值得的问题。更有甚者，这种含糊不清还同菲奸的表现有关：当有权决定菲律宾对敌合作者的命运的奥斯敏纳随同麦克阿瑟将军在雷厄特登陆的时候，他说，衡量是否忠诚的标准并不仅仅在于当过为日本人服务的官职本身，而在于当官的动机和在职时的行为。[5]

例如，菲律宾的曼纽尔·罗哈斯和日本的合作就是在有所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是战时供应日本陆军的大米采购机构的董事长，但他拒绝接受日本要他当总统的请求；他是一九四三年日本赞助的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以他的显赫地位使共和国的声望有所提高，然而他居然能够设法在宪法的序言中把提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恭维话都删去了，而日本人是希望把它写进去的；最后，当日本要求菲律宾对美宣战时，罗哈斯说服了那些反对派，要他们"别犯公然抗拒日本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他也拒

绝了日本人要建立一支由菲律宾青年组成的军队的请求。[6]当罗哈斯和曾起誓“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忠诚的菲律宾人”的麦克阿瑟见面的时候，将军“热情地拥抱”了他。由于麦克阿瑟的支持，罗哈斯于一九四六年成了战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7]

最能说明菲律宾人对待菲奸持两可态度的例子，恐怕要算当过日本支持的“共和国”总统的何塞·劳雷尔了。在日本占领结束以后，劳雷尔被控有一百多条叛国的罪状，但在受审判以前获得了赦免，之后他又当选为参议员，而且在一九四九年的总统竞选中几乎获得成功。今天，他的照片上简单地题着“劳雷尔总统”几个字，和菲律宾其他总统的照片一起挂在马拉加南的大厅里。[8]

在亚洲的其他国家里，和日本人合作可以说是没有多少污点或甚至完全没有污点，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和日本占领当局所追求的目标配合得很好。对于亚洲人能把一个欧洲殖民国家打败的壮观局面，在心理上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由此懂得［我们的］白种主人和一般白种人并不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亚洲人能够很容易地把他们撵走。”[9]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领袖们被允许同印度尼西亚的、群众保持接触，其程度是荷兰人从来也不肯容许的；例如，他们被允许到乡村旅行，并且可以使用无线电广播。正如后来苏加诺所回忆的：

> 当我请求准许我“去写作和旅行，以便到我无法去的地区去缓和那里的复杂情况”时，他（占领军总司令今村将军）就把飞机交给我使用并让我得以利用报纸。他允许我去召集群众开会。不仅苏加诺的名字，就是苏加诺的面容也为整个群岛所熟悉。我不能不为此而感谢日本人。[10]

日本人自然是决心依靠民族主义者的“帮助来更有效地统治印度尼西亚，使之适应日本的战时经济需要，特别是在动员强迫劳工和组织农民交售大米方面进行协助。”[11]日本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带什么军政府人员，因此只得让印度尼西亚人去填补从前由荷兰人所掌管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正如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家所写的：

> 对于许多人来说，以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荷兰的殖民官员拥有的技能完全是印尼人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做到的，而长期以来总是要让印尼人把荷兰官员当作上级来对待。做到了这一点就产；生了强大的自信心，使他们在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这方面增强了信心。[12]

当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日本人不得不要求印度尼西亚帮助建立一支由本地人组成的辅助军队，以抗击盟军即将进行的一人侵。苏加诺和他的同僚们都乐于照办。结果，当第一批盟军在爪哇登陆，准备帮助荷兰人打回印尼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组织起来了，而且印度尼西亚军队坚决反抗荷兰人重新建立殖民统治。所以，就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而言，当傀儡成了最高尚的爱国美德。

尽管印度爱国者苏巴斯·钱德拉·博斯同日本人搞了合作，他也受到类似的尊重。一九四五年，他在日本人的赞助下组成印度国民军，打算让这支陆军作为日本大举进攻时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到印度去把英国人赶走。由于日本人在缅甸战场的失败才使他的计划受到挫折。他在战争将近结束时，在台湾上空因飞机失事而死去，但今天他仍然被当作是一位民族英雄，甚至还活在他的许多同胞的心里。一九六四年印度发行过印有他的肖像和印度国民军军徽的印度邮票。在战后印度的对敌合作者以叛国罪受审时，甘地和尼赫鲁都证明博斯曾经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13]

在缅甸，合作主义者的行列中也有许多值得尊敬的爱国者，其中包括：巴莫博士、昂山和于一九六二年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奈温。巴莫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支持的一个缅甸政权的首脑。他在写到他和日本人的合作时显然感到自豪。巴莫对组织并领导缅甸独立军的一个日本军官推崇备至，说他在唤起缅甸人抗击英国人方面是个“最生动而且有活力的人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也赞扬这同一位出色的日军军官，说“在同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军打交道时，这个军官撑了缅甸人的腰”。巴莫认为，“缅甸人对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一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概念］”，但他也承认日本人经常是态度傲慢并且对他的同胞进行了粗暴的勒索，不过，他总是责备他的同胞有时候不理解这次战争对他们的利害关系有多么大。[14]缅甸人由于脑子里只想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只“看到日本人为了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从他们那里拿走了不少东西，而没有看到他们也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不少东西”。[15]他激动地写道，他感到是缅甸——以及亚洲所有的独立国家——欠了日本一笔债。正是这笔债使缅甸的对日合作者们觉得合作不仅有理而且还有功呢。

> 谁也抹杀不了日本在给无数殖民地人民带来解放方面所起的作用。日本人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惊人的胜利，实际上标志着一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完蛋的开始。日本人在战时帮助建立了国民军，而这些国民军接着又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树立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意志。日本在

东南亚地区建立了一批独立的国家并承认了自由印度的临时政府，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交战国允许在它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谈论独立呢……在最后总结历史时，这一切将比战争时期的紧张关系、激动心情和背叛行为等等，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16]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历史背景——战时的中国。人们在使用傀儡一词时，选择和回旋的余地是很大的。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认定汪精卫是日本的傀儡；但是基于相同的理由，许多日本的学者和宣传家则同样坚信蒋介石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对他们来说，这个论点是以孙中山关于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次殖民地”这一理论为根据的。宋家和孔家是西方化的代表人物，贸易和工业方面的统计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从上海的外滩一直到北戴河避暑胜地，这些沿海地区都明显地具有西方化的特征，而最后则还有租借法案和大量的财政援助可资“证明”。人们，不一定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也可以把财政援助和帝国主义的控制等同起来看待，从而得出关于蒋介石受偏爱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甚至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军界人士，在西安事变以后的时期里，认为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或苏联的傀儡，或者是它们共同的傀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明确的，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说，中国共产党也只不过是苏联的傀儡而已。拉里有两种不同的提法。有一种人可能争辩说，蒋在内心里基本上是个布尔什维克，但这就必须把他在苏联作了短期逗留的意义加以夸大，把他十来年的讲话内容都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并且还得把他从一九二七年四月搞上海恐怖事件以来所公开说的一切话都撂在一边。较易说明问题的是这样的观点：蒋根据权宜之计和为了生存等原因，接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然后，他就允许共产党插手宣传机关的管理，从而失去了指挥战争的控制能力。按照这种观点，正是共产党人煽动中国人民激起一种主要指向日本的排外主义的浪潮，并且鼓励国民党对日本进行毫无用处的抵抗，而把他们自己的军队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许多日本领导人对此是太了解了，认为蒋只是被共产党所利用了，而共产党一俟国民党和日本的实力消耗得筋疲力竭，就要进而把“中国苏维埃化”了。[17]

如上所述，可见对于傀儡这个词的使用应该谨慎一些，而在亚洲使用这个词时尤其应该如此。在这方面，之所以要谨慎小心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本书所讨论到的“傀儡”中，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是无灵魂的傀儡，完全按照他们主子的要求办事，自己根本一点也没有发言权。由于把人的复杂个性和政治行为过分简单化了，傀儡这个词所表达的形象往往会使人发生误解。

日本的满洲国傀儡，康德皇帝（亨利·溥仪）也许是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地称之为傀儡的对日合作者。但是，由于这位可悲的溥仪的背景和个性，他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他身居深宫，在太监管制下长大，这就按中国专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够落后的,可是这倒是培养傀儡这种角色的绝妙环境。他的自传证明：他是一个满脑子个人虚荣，搞同性恋爱，嗜好毒品，有虐待狂，又患有各种神经恐惧和不由自主症的软弱无能的家伙。[18]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成为具有以下性格的理想人物：个性消极被动，缺乏对任何抱有积极主见来进行统治的人来说都是必需的事业心、志趣和才能；他的虚荣心使他情愿拿实权去换取空洞的头衔和礼仪规格。溥仪追忆说，当关东军司令官通知他，日本政府即将承认他为满洲国的皇帝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必须得搞一套龙袍……而这套龙袍正是我二十二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19]

其他被日本人挑选出来的“傀儡”没有一个象溥仪那样地顺从。首先，他们都是一些一贯追求权力和权威的人，在如何去得到权力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有时，他们为了得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而进行讨价还价；有时，他们进行讨价还价时脑子里也还想到过广泛的国家利益。也许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夹杂着包括所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动机来进行讨价还价的。要精确地指出某人的动机是困难的。不过，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无论如何只有能确立以下的论点才是重要的：即日本人并不是总能任意操纵他们的合作者的。

尽管对日合作者的讨价还价地位肯定是软弱的，但他们的事业决不是毫无希望的。由于日本人自己在所追求的目标和拥有的权威方面存在着分歧，这就成了中国方面在讨价还价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侵华的各个派遣军司令部都极力维护它卵翼下的政权的统治范围和特权，不准其他司令部和东京的陆军最高当局来染指。“傀儡们”发现，在这种形势下采用中国人在历史上“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完全可行的。美国大使馆写的一篇有关王克敏的文章,对于怎样运用这种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手法来进行讨价还价，提供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而王克敏是华北临时政府的首脑，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日本傀儡中最软弱的一个。（在这里“夷”指的是华北方面军的喜多诚一少将和寺内寿一将军以及陆军参谋本部的土肥原贤二将军。）

> 据说，虽然喜多和王克敏的其他日本后台老板厌恶王的顽固，但是把王搞掉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土肥原的胜利。下面的例子可说明日本很难与王相处……寺内将军和喜多好些时候以来一直设法劝说王签订一个把华北所有铁路“移交”给日本政府；以应战争之需

的文件……但王总是拒绝这样做，尽管王对于他们大多数的一般性和具体的建议是必须照办不误的，……据说他经常在这些问题上和日本人争吵，他看到了在这些问题上有可能为中国人保全一些东西。[20]

不过，从长远看来，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法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与其说它富有成效还不如说它是机灵有余。要是认为中国的傀儡们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策略来操纵傀儡制造者，那就错了。不过，中国人还拥有另一种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因素。

中国人很清楚地知道，随着帝国陆军企图把战役胜利转变成为全面胜利，它就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能够依靠自己的人员去治理它所控制的地区，但是对于这项任务它必须投人大量的人力，而单纯为了战争的军事方面，人力就已经是够紧张的了。还有，尽管日本的头面人物宣称帝国陆军在中国是如何受到热情的欢迎,但是陆军本身却比较现实地认识到，不能指望外来的日本人能有效地对中国进行统治，更不能指望日本人能说服中国接受它在“东亚新秩序”中的地位——除非通过能代表中国说话的人的渠道来进行这项说服工作。因此，日本人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用军政府的形式来统治。从战争一开始，帝国陆军就选择了要大力依靠中国合作的道路。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分析中国的对日合作者和日本人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以便看出每一方在坚持主张自己的利益方面是为了什么目的和达到多少成效的程度。难道帝国陆军的纯军事优势和财政优势比我们一再论及的中国的利益——事实上日本是需要中国一起合作的——更加重要吗，总结我们研究的结果，正如莱曼·范斯莱克所建议的，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个“有效合作的限度”。[21]在一定程度内——一般说来这个程度是十分有限的——日本是愿意满足她的合作者的要求的。不过，要是超出了这个限度之外，以及在陆军认为对它的战略需要关系重大的所有问题上，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合作便不再是有成效或有成果的了。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研究日本的合作政策，来断定这些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能揭示一些什么情况：在日本的战时决策过程方面；在同中国作战的目的和要求的变化方面；以及在陆军内部和陆军与文官之间有关战争的不同意见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区分在日本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中哪些部分是不变的，哪些部分是有变化的，并指出在“东亚新秩序”中哪些内容是装模作样的，而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

---

[1] 见费正清、赖肖尔、艾伯特·克雷格合著的《现代东亚的演变》（波士顿，

一九六五年版）。

[2]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目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2页。

[3] 见保罗·莱因巴格的《蒋介石的中国》第208页。

[4] 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7页。

[5] 见克拉罗·雷克托的《菲律宾三年沦陷时期》第94页。

[6] 见何塞·劳雷尔的《何塞·劳雷尔博士战时回忆录》第16页。

[7] 见戴维·伍尔费尔的《菲律宾》第 697页。

[8] 见大卫·斯坦堡的《何塞·劳雷尔："被误解的对敌合作者"》。研究日本占领菲律宾时期的最好的著作是：斯坦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菲律宾的对敌合作》及西奥多·弗兰德的《介于两个帝国之间：一九二九——一九四六年菲律宾所经受的严峻考验》。

[9] 见康贾兰宁格拉特的《印度尼西亚心目中的日本》。

[10] 见《苏加诺自传》第179页。研究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最有价值的记叙性著作是哈里·本达著的《新月与旭日》。本达等编纂的《日本在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文件选辑》也是颇有价值的。

[11] 见乔治·卡欣的《印度尼西亚》。

[12] 同上

[13] 见乔伊斯·雷勃拉的《日本的政策和印度国民军》第46—47页。

[14]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142页。

[15] 同上书，第275页。

[16] 同上书，第185页。

[17]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著作是：田中鼎的文章《国民党与共产党》与大仑公望的文章《东亚的重建和苏联》。

[18] 见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19] 同上，第二卷第295页。

[20] 引自洛克哈特（美国驻北平的大使馆参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二卷第372页。

[21] 当我写作这个命题的提纲阶段时，范斯莱克教授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这点以及其他许多评论，我对此表示感谢。

第二章 汪、蒋和日本的威胁

当有号召力的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时，他（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篇极其动人的传奇，而他的追随者们在努力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则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都集中寄托在他身上。从那以后，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将自己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自己有利。前者神化他，后者尊敬他。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别的人物能象孙中山那样同时受到两个对立阵营的尊敬。辛亥革命后，尊他为国父；一九四九年以后，称他为“革命先驱”。孙之所以具有这种双重的吸引力，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前途抱有极为伟大的理想，但却没有提出一套旨在实现这些理想而使他容易遭到任何一方攻击的明确纲领。对于孙要求实现国家统一、摆脱外国控制、进行社会革命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这样一些理想，是无可争议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留下了一套包括政治短论、宣言、党纲以及他临终前的遗嘱在内的遗著。他的遗嘱内容是那样空泛、含糊，以致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以及几乎每一个中间派都能随心所欲地来解释他的观点。甚至在许多显然属于专业方面的。具体事情上，例如铁路建设，孙也善于构想出一些极其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如此之不切实际，以致在今天，事隔半个多世纪，也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得到大体上的实现。

孙未能为中国指定一个继承人这件事是很关紧要的。在他去世的时候，国民党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一、二十个仍然割据着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军阀的权力夺过来。看来，那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这个党所代表的是，形形色色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集团的要求，他们之中既有热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有意识到大势所趋而改过自新的军阀。要使这个集团强大起来、团结一致并具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那就需要有一个至少同孙中山差不多强有力的人来领导。可是，孙在病危的好几个星期里，却没有向他的焦急的追随者们透露，他选中了谁当他的继承人。

这个职位的几个竞争者中，有两个人名列前茅：胡汉民和汪精卫。他们两人过去都是孙中山二十多年的密友，而且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交也甚笃。两人都曾帮助孙把同盟会建设成为能够指导革命运动的组织，使帝制的主张名声扫地并使清王朝加速崩溃。两人都花了多年的功夫帮助孙发展同盟会的后继组织国民党，使它成为能完成辛亥革命任务的组织。但是，年长资深的胡汉民并没有能参加竞争多久，因为在孙去世后还不到六个月，他就间接受到一个政治暗杀案件的牵连，使他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受到损害。

他不得不辞去党内职务，并受命出使苏联——他实际上是被迫走的。由于胡在国外，汪就比较容易悄悄地爬了上去，成为党和一九二五年七月宣告成立的新政府的首脑。当一九二六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汪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了。他的追随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选人了党的领导机关，并担任重要职务。”我们将会看到，汪力图接替孙在国民党内的权力所作的一番努力也和胡的遭遇一样，是短命的。但在讨论事态的这一变化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汪的早期经历。[1]

汪祖籍浙江，他一八八三年出生于广州，并且一直自称是广东人。他是清廷官员手下一个小官的第十个也是排行最小的孩子，取名为兆铭。尽管少年时期家境拮据，汪还是受到了以学习中国经书为主的传统教育，而且主要是在家里学习的。他父亲就是他的老师。他叔父的丰富藏书则供他自由阅览。年青的兆铭之所以能够在一九〇二年考上秀才，是与这样好的教育条件分不开的。两年后，汪成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而这项改革措施是腐朽的清王朝所采取的，虽然为时过晚但也还算尽力而为。当时的清王朝认为，只要新一代的中国学生能学到西方强盛的秘诀，那末包括帝制在内的那些中国旧制度就统统能够保存下来。对包括年青的汪在内的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日本同样也能为他们提供和欧美差不多完备的教育，但离家则要近得多。一九〇四年，汪获得官费到东京学习法律和政治理论。在那些涌往日本留学、尔后回国成为现代中国领导人的学生中，汪是属于最早的一批。

汪学会了日文，并在一九〇六年毕业于法政大学。但除了这些成就之外，他却辜负了选派他去留学的清廷官员对他的期望。留学生们接触到一个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居然能够在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的战争中打败俄国。这就使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出自己国家的奄奄一息和日本的生气勃勃之间的鲜明对照。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开始在东京和横滨的中国学生社团中蓬勃开展起来，而汪则通过参加新成立的同盟会，在促进这些活动方面起了领导作用。他年仅二十二岁便当上了同盟会的三个重要委员会之一的主席。他发挥了他卓越的演说才能为革命事业服务，并用他已经很不错的辩才投入了当时同反对革命派不断进行的论战，其中包括同保皇党人、温和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这个庞然大物的论战。当革命期刊《民报》于一九〇五年创刊时，第一篇文章就是汪撰写的，而且他还是“以后各期的主要撰稿人”。[2]

许多学者在分析汪的演说和作品时，都对他的表达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论是说话还是写作，不论在大小不同的场合，他毕生都以擅长于抓住听众和读者的心理而称著。就是那些要中伤他的人，也总是先对他的

口才恭维了一番之后才攻击他的。在描写汪时，人们总是一再用“有说服力”、“才气纵横”、“优美的”、“戏剧性的”等一类的形容词。他的辩才使同盟会中比他年长很多的领导人都常常对他表示敬佩，而这在敬老的中国是很少见的现象。甚至比他年长十七岁的孙中山有时也很听这位年青革命家的。一个在汪晚年时才认识他的日本记者追忆他的演说时说道：“当在场的人数不多时，他总是把声调压得很低。他非常讲礼貌，总是用全名称呼人。但在三千人的群众场合，他简直就象一头狂狮！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3]

在孙周围的革命家们恰恰就是需要有这种才能的人。要是说汪的演说和文章在内容方面不如他的对手梁启超那样立论完整、深刻而又站得住脚，那是不足为奇的。汪只是粗略地知道一点西方的政治理论，不管怎么说，他只把理论放在次要的地位：他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

当汪在一九〇五年开始为《民报》写文章的时候，他按照中国的传统，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精卫。（“精卫”是中国神话里的一种鸟，它终生以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为己任。据说汪选用这个名字是表明他推翻清朝的决心；也就是说，他就象精卫鸟不顾填海的困难那样，根本不去考虑这个任务有无可能实现的问题。）[4]次年，即一九〇六年，国内当局注意到汪的革命活动，停发了他的留学津贴，并且悬赏要他的脑袋。在此后几年中，他伴随孙遍游东南亚，组织同盟会的分会，到处演讲，写文章，并呼吁一般比较有钱的华侨团体给予财政支持。这些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汪和孙的广东同乡。清王朝显然正在崩溃——当时已不是会不会崩溃、而是将于何时何地崩溃的问题。对于孙和汪——也可能对于许多华侨——来说，把革命根据地设在本省是至关重要的。有人总把广东人说成是乡土派性味道很浓的，从广东人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表现看来，这种老说法还是不无道理的。汪的一生说明，他同本省人的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中有不少都是广东人。

虽然有象孙和汪这样有干劲和有献身精神的人，但同盟会还是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由于计划不周，经验不足，缺乏武器和弹药以及时运欠佳等等一连串的困难，起义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不少忠贞之士被捕就义，革命组织的士气低落，派系斗争开始抬头；而日本当局的镇压则更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革命运动。一九一〇年，同盟会的时运降到了最低点。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汪开始设法使革命阵营恢复信心，重新振作起来。

在当时秘密出版的《民报》（一九一〇年二月一日的一期）上，汪写了一篇反映那时在日本激进分子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汪鼓吹以暗杀作为点燃推翻清朝的烈火的手段。他决心把他的主张

付诸实施，隐姓匿名，把炸弹和《民报》缝在衣服里，潜回中国，前往北京。他拟定好了方案，图谋暗杀四岁的皇帝的摄政王醇亲王。但是厄运又一次挫败了革命志士的计划。警探在摄政王的座车将要行经的桥下发现了汪所埋藏的炸弹。几天后，汪被逮捕，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但结果汪并未遂其杀身成仁之志，反而因祸得福，而本来谋刺皇族肯定会在严刑拷打之后被杀头的。除了几个走投无路、流亡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分子知道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之外，汪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可是他现在却一下子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民族英雄。

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其原因至今不明。宣统皇帝，谋刺对象（醇亲王）的儿子，后来写道，日本人的干预是政府改变原来决定的重要因素。[5]另一种听起来较符合事实的说法认为，清廷当时深知帝制十分脆弱，看来不过分得罪革命党人还是明智的。另有一种说法称，因为太后爱上了这个美少年，替他说情准予减刑。且不问这一说法是否真有其事，但相信它的人却不少，而且还流传甚广。例如约翰·根宝在二十九年后所写的《亚洲内幕》一书中便引用了这一解释。[6]汪不但有讨人喜欢的人品，还长了一张非常漂亮的脸孔，这一点谁也不否认，而且从他后来的照片中也可看得出来。那些熟悉汪的人在描写他时，很少不提到他这个人皮肤细腻、容貌英俊，虽然年逾半百，却还能保持童颜。根室写道："当我见到汪精卫时，我大吃一惊。他五十三岁了，但看起来只象二十八岁，真是一个出众的美男子。……他简直有点象学生模样。"在那些轻视他的人如硬汉子红军将领朱德看来，他就象旧京剧里的花旦那样，一付娘娘腔。[7]但对那些赞赏他的人和那些只是通过浪漫的传说了解他的人来说，他这个人漂亮得足以使清朝的皇太后都为之倾倒。

汪写的那些以忘我牺牲为题材的诗篇和发言，在使他自己成为不朽的人物方面是起了作用的。这些诗篇和发言肯定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民族的文学和戏剧中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武侠故事：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因谋刺摄政王而被捕并判处死刑的有两个人，汪只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人叫黄复生。他和汪一样，最后也被释放了。虽然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在国民党内也略有名气，但是他参与谋刺之事并没有给他带来象汪所得到那样大的声誉。毫无疑问，这是由于：黄之所以有名，仅仅是凭他略懂化学、会制作炸弹而已，而汪的才学却渊博得多。当他的同胞们后来谈到他感人肺腑的狱中诗和他在法庭上的自白书时，都为之激动不已。[*]汪边指着自己在《民报》上所写的文章边说

---

[*] 汪最著名的狱中诗原文如下：慷慨悲歌过燕市，笑语从容入囹圄。延颈受戮无穷乐，唯此不负少年头。

道："此等文章乃以墨书成，我当化之为热血。"[8]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的起义士兵搞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暴动，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末日的到来。十一月，汪获释出狱后立即投入政治活动。不久他就同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袁世凯举行了一系列的密谈，这是二十八岁的汪当时已位居显要的明证、袁凭借他控制着北洋军而有权势，而北洋军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一支现代化精锐陆军，而且多年来一直是清王朝的主力部队。袁最后只是在表面上权且同意把帝制改为共和。当共和国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时，他当上了第一任内阁总理。

汪拒绝接受那个职位，也谢绝了别人请他担任的另外几个职务，并且退出政治活动。这一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誉。[*]只有少数几个儒家圣人能比那些无意仕途、洁身自好的理想主义者更受人尊敬。但是，汪的动机并非源出儒家哲学，而是由于信守他自己在一九一二年帮助创立的进德会的会章。进德会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运动，它不设办事人员，并且鼓励它的会员不接受政府官职。但是，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进德会还有深刻的改良主义意识。它认识到，政治革命如果不伴随着社会改革，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见解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中是少有的。进德会认为，清朝的腐败与其说是由于其政治体制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败。进德会的会员应努力建立一种适合于新中国的道德，必须抛弃旧中国的三种最坏的习惯（嫖妓、赌博和纳妾）。[9]

汪的婚事是他本人摆脱旧中国习俗的一个明证。一反传统的中国惯例，他自己挑选了他的妻子——陈璧君。陈是海峡殖民地城市槟榔屿的一个富商的女儿。一九〇八年，当汪和孙在马来亚的时候，陈璧君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她一被这个革命家和他的事业所吸引，未经她父亲许可就决定跟随汪到日本去了。她不仅仅只是这个年青革命家的崇拜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同志。当汪于一九一〇年前往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任务时，陈璧君陪伴着他并且协助他行事。从那时起一直到她于一九五九年死于共产党的牢房中为止，她始终如一地热情捍卫汪所拥护的一切主张。人人都说她是一个异常果断的女人，在进行政治论战时毫不退缩，而且敢于坚持非主流的立场。她从事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到了三十年代，她已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了。汪倚之如左右手，正如他后来向一个日本同僚

---

[*] 斯卡拉皮诺和俞合著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第 38 页，引《民立报》的说法。按照詹姆斯·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 59 页）的说法，汪的那种带有儒者"味道的大公无私（和）富贵不能淫"的自制力，使他在一出关于辛亥革命的戏剧中赢得了"圣人"的绰号。

解释的那样："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老战友。因此，我在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作出重要决定的。"[10]

汪和他的妻子于一九一二年结婚后就到法国去旅行，他们在那里呆了五年，这是混乱、尔虞我诈、共和事业走下坡路的五年。当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时期，汪却享了一个时期比较不过问政治的清福。在这个清闲的过渡时期里，他爱好深思的诗人素质显示出来了。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为了适应现代中国的改革需要而成立的进德会的组织者，竟会去参加旨在从唐诗中汲取文学启示的一群诗人所组织的诗社——南社。西方人也许比中国人更能看出这个矛盾的现象来，因为另一个很有诗才的革命家毛泽东，也是取法于古诗体裁的。南社的创始人和社长柳亚子，与毛私交甚密。

一九一七年汪回到中国，再次和孙在一起，并致力于加强国民党的工作。加强国民党事实上就意味着要同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结成联盟，并且依靠唯一对孙表示同情的外国——苏联的援助。苏联、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其说是建立在共同的目标和信仰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他们对共同敌人中国军阀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上。在这个联盟中始终存在着相互猜疑的因素，猜疑其中一方正在利用另外一方。每一方对有损于本身独立性的危险都怀有戒心，但又相信自己能免于受害。不管国民党得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它本身在一九二三年时的软弱状况却需要这个联盟。俄国的步枪、苏联顾问团、象周恩来那样有组织能力和宣传才干的共产党人——这些因素都使新旧国民党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旧国民党是组织松弛，领导不力，本身没有实力基础。而在孙去世前后开始形成的新国民党则逐步变得有纪律、有力量了。

但是，二十年代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使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向加深了。在国民党的党员中，对于和新的共产党盟友合作是否明智的问题，理解程度各有不同。在革命步骤的先后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究竟先进行国家的统一工作，还是先搞社会改革，如果先搞社会改革，又该搞到什么程度，反对帝国主义又该占多少比重？矛头针对哪些国家，除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中国历来容易形成的以对地区或对个人的效忠为基础的宗派主义。虽然汪精卫一派的最高地位是由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但在短短的三个月以后就受到敌对的蒋介石一派的挑战。

夺权斗争并没有拖得很久。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汪到手不久的权力在几小时内就化为乌有了。[11]在这天之前，汪还是党和政府的领袖，并且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代表文官对军事机构进行监督。然而这天的事件却可说明，汪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乃是他的致命伤。结果，校址设

在广州郊外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员成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裁决者。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就是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黎明前，蒋没有和汪商量，就派出了他的分遣队布满全广州城，逮捕共产党派到各个军事单位的党代表，不准苏联顾问离开他们的宿舍，并解除共产党的“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而这个委员会在过去九个月里曾有声有色地领导过广州市抵制外国货的运动。关于蒋搞政变的许多详细情况，至今还笼罩于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政敌们指出，这是蒋对他的革命盟友进行一系列背信弃义的袭击中的第一次，也是他向帝国主义者进行一系列卖国勾当中的第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写到蒋时这样说道：

> 他成了卡尔·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拿破仑时所说过的那么“一个人，他不是晚上作决定、白天行动，而是白天作决定、晚上行动”……总之，取消共产党人的政治待遇、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并把群众运动的巨大而尚未动用的资本储备交给资产阶级去处理的时候已经到来了。[12]

蒋介石在约三十年后回顾这事件时，还在为这次政变辩护，理由是：他“那时怀疑共产党人即将进行一次暴动”。[13]换句话说，按照他的说法，那次政变是一次反政变。他当时怀疑某种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因而他个人的安全也很可能受到了威胁。这一论点受到了许多学究气十足的研究报告的支持。蒋认为当时广州的政治形势是复杂得令人难以相信，他还隐约地暗示，要等到他死后才有可能把广州政变的全部经过搞清楚。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责备汪是触发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但由于汪和共产党人有密切关系，而且汪蒋之间又赤裸裸地在进行夺权斗争，所以，汪是这次政变的既定打击对象之一和主要牺牲品，那是毋容置疑的。随后，蒋迅速地去安慰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的怒气平静下来，因为他们的支持对他急于要换动的北伐能否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汪这时既丢了权，又很恼怒，于是他辞去官职并于不久后开始他生平第二次流亡巴黎的生活。汪领导革命（至少是在名义上领导革命）总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革命的主动权就开始落到蒋的手里了。他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北伐，巩固了他对一政府、党和军队的控制。汪在此后也还经常向蒋挑战，但却从来没有严重威胁过蒋在这两年中发展起来的领导权。

一九二六年初，谁也想不到蒋会如此迅速地危及汪在革命中的地位，当时蒋的名字尚未见诸于《中国年鉴》。和汪一样，蒋曾经到过日本，并在

清朝统治最后十年的期间参加了同盟会。但是，当口若悬河、才气横溢的汪已在提出革命纲领、灌输革命热情的时候，蒋还只是一个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不知名的二等兵。这个孤独、瘦弱的军官候补生在他的同学中不孚众望，更不用说他有什么左右革命事业的才干和个性了。蒋究竟算勤勤恳恳还是平平庸庸，这就要看人家是怎样刻划他的性格了。这个人为了学到最新的炮兵技术和得到逐步提升，颇能忍受既不光彩又单调乏味的兵营生活。至于汪究竟算擅长鼓动还是华而不实，那也要看人家是怎样来估量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了。但事实仍然是：当汪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却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战联队“洗刷军马”呢。[14]

从两人和有威望的孙中山的接近程度而论，汪和蒋之间的差别也很显著。迄至一九二五年孙去世的时候为止，汪已经和这位受人尊敬的革命之父共事二十年了。尽管汪多年在国外，而且在政见上和孙有些不一致，但在他们同胞的心目中，这两个人的名字几乎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孙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曾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15]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承孙的权力的资格。

可是，所有这一切同蒋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权术所由得的兵权比起来就毫无价值了。除非人们假定汪会象甘地一样不计较个人的权位，那他们就不能不承认：汪对自己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十年走下坡路而怨气冲天，同他于一九三八年决定和日本人合作一事有重要关系。我们在以后几章中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去考察那次对敌合作的其他一些原因。

一九二八年末，中国在名义上统一后，建都于南京。此后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进攻中国时为止的十年中，在对付国内共产党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的同时，重建中国社会的任务落到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专政和南京政府的身上。要很深入地分析这十年的历史，那就会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但申述几点看法还是可以的。

首先，一九二八年后，蒋的军事力量受到许多方面的挑战，以致这个委员长——外国报纸都这样称呼他——无力对所有政敌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妥协和联合是南京政府执政十年的特征。此外，蒋也完全明白：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自己是不够格的。正如一位作家所评论的那样，蒋的“天性是内向的……既不是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也不是一个宣传家。他最擅

长的是，策划于密室。他懂得如何操纵政客，但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却不知所措；他知道怎样去压服别人，却不知道怎样去说服别人。”[16]汪的长处恰足以补蒋之短处。蒋的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指出：“蒋总是需要一位有才能的政治同僚，使他和党务保持联系，并替他向中国公众和外部世界详细阐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而汪精卫就具有这种罕有的才干。”[17]

结果，在南京政府执政十年期间，汪有时参加国民政府，有时又退出。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无论是自动流亡在国外或是在国内，汪都拼命反对蒋扩大自己的权力。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搞联合，而当时这两个北方军阀则正在同力图消灭他们的私人军队并接管他们地盘的国民党搏斗。这是孙中山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搞过的那种权宜的联合。但是结果毫无用处。南京同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结成联盟，经过了整个军阀混战时期中的几场最激烈的战役后，汪—冯—阎的联盟被打败了。汪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他的前景似乎不妙，然而就在第二年，在华南又出现了新的机会。

一九三一年向南京发动的挑战是由于逮捕胡汉民这件事引起的，而胡既是孙中山最老、最亲密的朋友，又是孙的广东同乡。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反应是，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弹劾，纷纷辞去南京的职务并前往广州。汪参加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由于有实力的广东军阀张发奎加人了他们的队伍而拥有很大的力量。仅仅在两年前还和张发奎进行过苦战的李宗仁将军，现在却参加了广东反蒋派的行列。李的行径是这个纵横捭阖、千变万化的时期中最典型的事例。稍后，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新的反蒋联盟要求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蒋介石现在腹背受敌：在华北有不少零散的敌人，在南方则面临一个团结一致的敌对联盟。他明智地决定避免采取一年前的那种在军事上是可取的摊牌办法。在一九三一年整个夏季中，广东分裂派和南京之间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停战状态。象往常一样，汪用了好些漂亮词藻来表达大家的心情。他说，“通过建设来达到统一”，必须排除既无益又有破坏性的内战。为此，他宣称愿意和蒋合作。[18]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敌对的各派有一条紧急的理由要加速他们之间的和解。就在那一天，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属于日本所有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遭到了破坏。日本军队借口中国军队企图破坏铁路，开始向中国人称之为东三省的全部地区进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把整个地区从中国分割出来，并于一九三二年初使其变成伪满洲国。日本的行动迫使敌对的派系为了国家的安全把分歧搁置起来。一九三二年一月，汪就任行政院

长。[*]蒋汪之间将近六年不断加剧的不和现在开始弥合了。

以后的四年，直到一九三五年末，这个委员长全力以赴地搞了一系列围剿战役汩的是要消灭“共匪”的根据地，因为他们已经显得比军阀更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了。这就使汪能够在制订非军事性质的纲领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这些纲领都是政府在那几年中才开始着手进行的。汪在他一生的经历中，特别是在关键的一九二七年，总是被当作一个左派——国民党左派的首领。尽管这类名称的含义难以捉摸，但也并不是没有某些实质内容的。诚然，汪从不害怕同军阀将领结成联盟，不过这就象那时共产国际代理人和蒋介石出于权宜之计方决定结成联盟一样。总的说来，汪是由于坚持依靠苏联的援助而获得国民党左派的名声的。结果，他被批评为斯大林的“傀儡”。事实上，汪只不过是坚持了孙的主张而已。孙认为：尽管依靠一个外国的力量来使中国摆脱其他几个外国的控制是个不好的办法。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当斯大林想要操纵革命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而且其目的又是汪所无法忍受的时候，汪就立即切断他和莫斯科的联系。共产国际代表罗伊泄露了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的电报这一有名事件，加速了汪和莫斯科的破裂。由于罗伊不慎，汪获悉斯大林下令执行一项没收土地、消灭“不可靠的将领”和建立一支工农军队的纲领。和罗伊的设想相反，汪断然拒绝接斯大林的旨意办事，反而采取了激烈的反共姿态，而且一直坚持到死。

不论是想要理解孙中山或者理解孙的信徒汪精卫，人们都会发现自己在概念上钻进了死胡同，很难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这种比喻看来一点也不过分。理论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可是往往总同实际没有什么关系似的。不过，如果以阶级斗争，特别是以剥夺富有的地主财产的农民暴力行动作为区分左翼改良派和激进派的标准的话，那末，汪显然是一个改良派，而不是激进派。根据当时任何一条标准来衡量，他和他所挑选的许多同僚同他为权宜之计而结交的盟友相比，都算得上是左派。例如，陈公博大概总可算是汪的心腹、汪的改组派[*]的主要理论家了。他曾经在一九二一年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又在一九二五年积极参加了使英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受到将近一年损害的抵制外货和罢工运动。改组派的成员对于中国有必要采取激烈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也是真关心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放手让农民去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就象其他所有中国人一样（只有个别人例外），他们也

---

[*] 在法律上，行政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但按实权来说，与文官，政府平行的各种军事机构的权力却大得多。最高的军事当局是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一直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 改组派是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简称。

的确并没有意识到蕴藏在农民之中的爆炸性能量究竟能有多么大。

当汪于一九三二年回到政府任职的时候，许多改组派的成员也都担任了重要职务。陈公博任实业部长；经济学家、五四运动的有名人物顾孟余任铁道部长，并着手进行汪所要求的“复兴”工作。由于汪以不贪污闻名，由于改组派许多成员有学者的履历，由于人们普遍感到中国过去为害极大的停滞状态终将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南京政府在一个时期中开始博得舆论界的好评，而且同中国知识界的关系处得也还不错。虽然汪在领导国内复兴计划的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在南京政府的十年期间所负责的另一领域，即对外关系方面。这在三十年代初期，对中国说来，主要是指和日本的关系。

随着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关东军进攻满洲，本来在二十年代已很紧张而且经常处于危机边缘的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历时十四年而且苦难有增无减的阶段。整个中国掀起了反日的怒潮，爱国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为的就是要激起民族的义愤，迫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全面抗战的政策。中国商人联合起来抵制日货——不买、不卖、不运输；对于不这样做的人，斗志昂扬的学生们就会折磨他们。日本商行的中国经理们纷纷辞去他们的职务。成千上万的日本商人、侨民和外交人员，在全中国到处都可见到“日本人不准入内”的标语，听到一片骂声。但是，公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并没有使少帅张学良的军队仓皇撤退的步子放慢。到年底时，关东军的部队已差不多完成了他们全部的战斗任务，以致那些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军官已经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傀儡国的事情上来了。张学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部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使得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并不能归咎于少帅一个人。这位三十三岁的少帅是北京社交界的名人，吸毒成瘾，喜欢和漂亮的妇女（包括电影明星胡蝶和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齐亚诺）鬼混。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把队伍撤到长城以南。蒋说，中国并不想打仗，而是要把这事件交给国际联盟来处理。

这位委员长在照例于每星期一早晨（举行的纪念周上）对中央军校的学生们的一次训话时，这样解释说：如果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名望的话，

> 那事情就很好办——我只要对日宣战就行了。这样一来，全国就会赞扬我，把我捧上天。那末。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我反而被人怀疑为“不抵抗”呢？我并不怕死，但我不能把国家社稷断送掉，也不能孤注一掷地拿国家去拚。我必须想到国家的前途。我不能为我的个人名望而牺牲全中国。[19]

蒋坚信，“国家社稷”之所以有断送之虞，是由于共产主义在作祟。在蒋看来，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一切伦理观念宣战。[20]蒋经常反复地说，不关心来自日本的威胁的并不是他。有一次他对一个愤怒的学生代表团训话说：“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之内，我将把日本人打得跪下来讨饶。要相信我的话，回到你们学校去好好读书吧，”[21]把中国有限的军事资源消耗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是没有好处的，它只能分散南京的力量，让共产党军队得到好处。根据这条理由，蒋衡量了一下轻重缓急，乃认为必须先安内而后攘外。蒋指出：当安内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日本人却恰好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来了，及时解救了”被围困的共产党人。[22]结果，南京不得不抽调一些军队出来，不过主力部队则仍然留了下来，对“共匪”山区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反日敌对行动达到一个新高潮，而汪精卫恰巧在同一天出任行政院长。就在那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上海市郊的闸北，遭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十九路军的抵抗，从而使上海抵制日货运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爆发成为一场公开的战斗。双方互相射击，但使全世界震惊的是；日军竟悍然下令进行空袭以“惩罚”中国军队。当未被击败的守军拒绝投降时，日本军舰就参加了战斗，并且增派更多的军队登陆。难民营遭到袭击，中国人横遭屠杀，外国人受到凌辱，当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五年后发生的事件的前奏而已。

十九路军抗击日本军队达三十四天之久。他们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烧光了的工厂废墟上、以及最后不得不后撤时，还在郊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原先人们对中国士兵的可笑印象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由于世界舆论站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一边，他甚至还成了一个国际英雄。而日本的指挥官们则大吃一惊，他们原来估计用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译者注）的兵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结果却在这场战役中投人了好几个师团。女作家韩素音回忆说：“十九路军……为中国雪了耻。即使在今天，只要当年的激情从心头涌起时，我的喉头还会梗住，我的眼睛还会发酸。”[23]学生团体蜂涌前来支援十九路军，他们奔走于上海附近的各个城镇，“呼口号，发传单，向街头群众作宣传，表演颂扬十九路军英雄事迹的活报剧，唤起人民去抗日。”[24]许多人，其中学生占多数，志愿参加十九路军，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一个外国人这样写道：“脚穿布鞋、头戴软帽、装备低劣的军队居然能在世界上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面前巍然不动，这个国家就有了新生

的因素。……中国可以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以有千千万万为保卫国土壮烈牺牲的英雄儿女而自豪的国家之林。”[25]

然而，南京政府的步调却同整个民族的意向很不合拍。当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纷纷向南京捐献国防费用时，政府却不给蔡将军的部队补充武器和弹药。蔡的抵抗是违背南京政府的命令的，等到他最后被迫撤退到日本最后通牒所坚持的界线以外时，南京就同东京开始磋商起解决这一事件的办法了。根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和平协定”，南京同意在上海周围建立一条长二十公里并禁止中国军队进人的非军事区。南京政府对协定是满意的，因为协定虽然有损中国的主权，但也规定日本不得进一步攻打长江下游地区。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宝贵的时间去进攻共产党人。和日本的协定一达成，蒋立即下令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日本在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又进行了新的和更严重的入侵活动。一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战略要地山海关走廊，也就是那个地处长城东端和渤海湾之间、扼华北平原门户的关口。从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驻扎在华北保护日本权益的所谓天津驻屯军，派出部队在冀察两省进行军事和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关东军也开始在长城以北的热河省采取行动。在冀察两省的行动极其复杂，这是决心要搞华北自治这一活动的开端。在人口稀少而多山的热河所进行的作战完成得既圆满又迅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一个靠在本省广种鸦片大发其财的旧式军阀，他显然不是一块当英雄的材料。”南京命令他进行抵抗，[26]但是既没有派军队又没有派飞机去支援他。于是日本在十天内便占领了全省；省会承德竟陷于一支仅有一百二十八人的日军之手！

愤怒的国民再一次发出了要求抗战的呼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猛烈地攻击这位“鸦片将军，说他敞开大门让日军进人中国”，但是，她的最尖锐的攻击还是对准她的这位委员长妹夫的:“谁应该对这项卖国行径负责呢？是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蒋用他的军队打中国人民，任用卖国将领，又不予以撤职。他既不愿意武装人民也不组织游击队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27]

孙夫人一面抗议，一面呼吁结束“围剿”、联合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战。这主要是呼吁实行民族团结。蒋本人也经常谈到民族团结很有必要。其实他之所以下决心首先打垮最直接威胁中国秩序的共产党人，也正是由于他一心想要实现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把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军事机器的全部力量都不断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由于他对日本入侵所作的反应很软弱，日本自然就只肯按她自己提出的条件来解决一九三三年的冲突。这年五月间在塘沽签订的一个“局部”停战协定就是其

解决办法。停战协定的局部性质一方面说明了南京政府在有关的这几个省没有力量，还说明了它想避免用它自己的名义签署这个丢脸的协定所蒙受的耻辱。北平市及其周围地区实际上仍然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南京只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权。五月，蒋任命他的亲信顾问黄郛为北平政务委员会主席，名义上负责管辖日本企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那几个省。正是黄郛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成为此后四年日本力图使华北自治化的保证书。

这个协定的最重要的条款乃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个地区约有三十到四十英里宽，从长城以南一直延伸到平津走廊。中国军队不许进入这个地区。指定了一支中国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但协定的秘密条款规定该警察部队必须对日本亲善。这个协定还让日本控制山海关，但协定并没有改变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军（即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日本军队可以驻在禁止中国军队进入的某些非军事区。日本在军事上从这个协定所得到的好处，增加了她在政治和经济上压倒华北的地方政府和军阀们的优势。当日树以后几年着手尽量利用这个好处时，中国人就纷纷起来抨击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

这种批评越来越指向汪精卫。当热河和华北危机爆发时，汪正在法国治病。但他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回国，不久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他一直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蒋汪两人对于南京有必要（多么可悲的必要！）同意塘沽协定的条款是意见一致的，对这一点人们是深信不疑的。由于汪为“象征软弱”的塘沽协定辩护，而成为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使他的密友陈公博大为不安。他建议汪提醒批评者：这个协定是蒋介石批准的。但汪拒绝这样说。他认为，他身为行政院长，必须对该协定负全部责任。黄郛于塘沽协定签字两年后死去。汪在致悼词时，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进退两难的局面作了清楚的说明。他承认这个协定当然会使人民感到沮丧，并且使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误解”。但政府曾慎重地考虑过这种危险，其结论是；“空话和虚荣心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虚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如果北方沦陷，“黄河以南各省也将受到威胁。”汪说：“所以，我们决定寻求暂时停止战争的途径。”由于签订了这个协定，中国就能够多争取到一点时间。

> 第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国家统一起来，以便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去抵御外来的势力；第二，消灭赤匪，他们使国内不得安宁，牵制着军队，使之不能调往前线……；第三，努力建设我们的物质基础，加强并扩大抗战的力量。[28]

从他于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参加政府之日起，这位说话明白易懂而又有说服力的汪精卫就一直担负着为软弱的防御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的任务。他很快就创造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简单扼要地说明了他的立场，并平息那些抨击政府不抵抗的人的怒气。“一面建设，一面交涉”不久就同“通过建设达到统一”一起，成为汪的语汇中一直使用的字眼。对汪说来，这个口号决非一种空洞的陈腔滥调。

对于上海和满洲两次战役，他都曾经主张过抗战，并带头提出撤换不抵抗的将领（如少帅）。但是在上述两次战役中，当他明白过来进行抵抗并无好处时（手头上资源有限，而且又要绝对优先顾及围剿），汪就转而主张谈判，以尽量挽救绝望的局面。汪经常向他的同胞们解释，愿意和日本人协商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某个时候承认日本或满洲国对东北四省拥有主权。*他许下诺言说，中国决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成果。他在一九三四年写道：“中国决不放弃一寸领土，无论受到什么威胁，也决不签订玷辱国家体面、有损国家主权、破坏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任何条约。”他说，签订停战协定也并不就意味着投降，但却能为国家赢得时间来组成统一战线（当时这意味着要消灭共产党人而不是要同他们联合）。汪向读者们保证：“国内统一战线一旦组成，不管日本国力多么富、军力多么强，中国都能依靠她地广人多来抗日卫国。”[29]

但是，中国目前必须不去理睬那些空喊宣战和“直捣东京”的人。他问道：“日本是一个海上强国，难道我们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去直捣东京吗？”

> 我们目前的军备和日本相比，有如弓箭之于机枪。如果我们贸然向日本宣战，拳乱之祸就会重演……日本能立即动员二百五十万军队和后备军，并且能够在两天内就把军队经海路运到中国，而我们由于缺乏交通运输条件，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把军队从北方调到南方。[30]

汪坚持说，尽管中国的处境十分危急，却没有必要危言耸听地去大谈屈服和失败。中国太大了，日本可能进攻少数几个地方，但他们“肯定不可能把我们全国都变成战场。我们的军队可能暂时失利，但世界上没有一个觉醒了的国家会永久被征服的。只要我们坚持作自卫的准备，这样一个时候必然会到来：这时侵略者将精疲力尽，列强也将会觉悟到自己对和平事业所负的责任。”[31]

总之，汪主张从现实出发，反对空想，主张忍耐，反对鲁莽从事。象

---

* 日本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年先后侵占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四省，被合并成为伪满洲国。中国人总是避免使用满洲国这一名称。

蒋一样，他也引证历史和神话故事来支持他的论点。委员长常对他的听众介绍《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的故事，以表达他的信心：中国龟一定能在和日本兔的竞赛中获胜。而汪则喜欢引证明末的史实，当时由于“群情汹汹”使朝臣们无法冷静地去制订国策。汪警告说，“其结果是明朝的覆灭，所有的爱国志士也随着明朝的崩溃而牺牲殆尽。”至于那些原来大声疾呼要求作战的人也不得不去“归顺新政权”。对汪来说，这个教训是记忆犹新的。他用带韵律的对偶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论点：“唱高调，教人厌。骄失利，谦免败。深知攻则不利，然亦知守之有余。”[32]

用塘沽协定换来的时间开始产生效果了。将近一九三四年底时，蒋对共产党人不断增加的压力迫使他们放弃在江西的根据地，并开始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往遥处西北、但较安全的延安地区。由于蒋集中精力抓军事，汪就越来越专心致志地设法尽力挽回日趋恶化的华北局势。他的主要谈判对手是日本驻华公使、其后成为外务次官的重光葵。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重光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和解的态度，所以汪才象重光一样，也坚信外交手段可能奏效。机敏的重光原想把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心理转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其办法是：帮助中国取得海关、司法和包括上海、天津以及其他仍有外国租界的大城市的完全自主。虽然这种办法几乎必然意味着日本将不得不放弃她自己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从华北撤军，但重光感到，他的国家将由于采取这种克制的政策而得到很多好处。中国不但不会把日本的力量消耗殆尽，反而由于她的软弱和需要一个强大邻国的帮助，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日本。

这种早期的泛亚概念有可能成为中日谅解的共同基础。重光的政策肯定是为日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试问有哪个国家的外交不是这样呢？当然，有些问题是几乎无法取得和解的。满洲国或许就是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在日本的军政要人中，不管他们对中国持什么样的和解态度，都没有人认为把满洲国还给中国以赢得中国的友谊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办法。但是在中国看来，力争日本在华北实行一项克制的政策，是一个很值得进行外交活动的目标。至于说日本能帮助中国把她百年来同西方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告一结束，则恰恰体现了孙中山心里所想的那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孙曾强调指出：“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汪生前向中国和日本的听众讲话时一直喜欢引用这句名言。[33]

但是，重光的意见并不等于就是帝国陆军的意见。陆军方面继续认为中国是各个军阀统治地区的集合体。中国的软弱和不统一，招致别国的觊觎。日本军界的头头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把国民党看作是未来的象征，或一种能够扭转地方军事割据的分裂倾向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分裂倾向才使中

国在近几年以来老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压力。因此在他们的印象中，蒋介石也是一个军阀，只不过比大多数的军阀强大一点而已，但是在日本最大战略利益所集中的那部分中国领土——华北，他的力量恰巧最为薄弱。一九三一年，日军开进满洲，为的是要建立一个对抗苏联扩张的缓冲地区；现在到了一九三四年，帝国陆军决定：这个缓冲地区本身也还需要一个缓冲地区。结果，重光的合理主张也就被否定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在核心内阁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从而形成了日本官方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国民政府的原则基本上是和日本对华政策相对抗的"。具体到华北的问题，核心内阁决定："日本期望逐渐削弱国民政府在华北的行政权力。"[34]

由于得到了帝国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批准，陆军就着手把十二月七日的决定付诸行动。华北的具体工作是由善于搞政治阴谋著称的三名陆军军官主持的。他们使用了从欺骗到恫吓等各种办法，有计划、有阶段地签订了不少协定。这些协定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名义上都把国民政府的势力从华北大部分地区排除出去。军阶最高而又最著名的是土肥原少将。早在三年前，他曾经负责把郁郁寡欢的溥仪从其隐居之处拉出来，使他重登皇位。

土肥原正以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将军中的佼佼者而崭露头角，同时对自己能够把温驯的中国军阀驾驭自如而有恃无恐。一个和他同时代的日本人这样写道："作为个人，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君子，但是，他从来不吸取过去的教训，而只是重复运用他那一套违反时代的、腐朽的老手法。"[35]到了一九三五年，土肥原集中精力于察哈尔省，这是一个位于北平西北一直延伸到内蒙古草原的一个省份。国民党在察哈尔的势力对日本在邻近的平津走廊的阴谋可以起制约的作用；国民党军队能够而且在事实上正向新近占领热河省的日军进行挑战，因为热河和察哈尔两省的共同边界很长。最后，察哈尔的国民党军队对于关东军想要实现它的又一个帝国主义野心——在察哈尔和绥远这样的边远省份建立一个由内蒙古部落组成的自治联盟——起阻碍作用。一九三五年六月，土肥原和秦德纯将军签订了一项协定。秦是察哈尔省政府的委员，他是奉委员长之命和土肥原来进行协商的。以塘沽协定为蓝本的秦土协定也是一个"地方性的"协定，它使南京政府既可从绥靖政策中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又可把这个协定说成是无啥重要的协定。它把塘沽协定所规定非军事区的界线延伸到察哈尔省，从而使这个省的大部分地区"非军事化"了。它也规定了要把反日的官员撤职、限制汉

---

* 这是三十年代常用的一种安排，以便绕过开起来较不方便的内阁全体会议。它有时称为四相会议。这四相是首相、外相和陆海两相。有时四相会议加上了外相或内相，扩大成为五相会议。

人向察哈尔移民以及解散“反日机关”（即所有的国民党机构）。此外，日本还取得向省政府派出文职“顾问”及军事“顾问”的权利；随着这些顾问们在七月份的到来，内蒙古自治化的计划便开始进行了。[36]

正当秦德纯代表南京同土肥原协商解决察哈尔问题时，委员长的另一个密使正乖乖地在缔订一项涉及河北这样重要的省份而且影响深远的协定。这个倒霉的特使就是何应钦。何是蒋最信任的将军之一，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一直担任军政部长。他的使命注定要使他成为学生示威和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抗议的活靶子。何应钦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所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中国军队要进一步撤出河北，撤销国民党机关，解散在河北的抗日秘密会社，并在全中国取缔抗日活动。

当秘密的何梅协定的条款被公众知道时，南京政府矢口否认已经达成这样的协定，以图逃避批评。但是有关这个协定的事实俱在，明显得无法隐瞒。当二十九军根据协定规定的条款向南撤退时，整个华北笼罩着一种失望和愤怒的气氛。丧失东北四省和地处前沿的察哈尔省已经够丢脸了，但它和这次新危机所带来的屈辱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察哈尔省的人口还不到二百万，并且大部分不是汉族；但河北省的居民却多达二千八百万左右，而且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国家生活的中心地带。河北人民的反应近乎慌成一团，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命运前途莫测、于心不甘，不久就要被抛弃了。北京、天津、燕京和清华等著名大学的学生走向街头（象前一辈人在一九一九年五月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对本国领导人的贪污腐化和胆小如鼠比对日本人的行为更加忿恨。他们的示威不可避免地引起日本人指责那些负责履行何梅协定的中国官员不守信用。日本人要求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以取缔抗日活动。这就使得中国士兵和警察采取更为严酷的措施来对付示威的中国学生。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实况以及对示威学生进行大规模逮捕、酷刑甚至屠杀的消息传开来时，就连国民党的最高机构对政府政策也有了不满情绪。八月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政治会议（中国的最高政治机关）通过一项不信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决议。第二天，汪便提出辞职。

但是，委员长不愿接受党的这个决定。他从“剿匪”前线赶回来，在庐山召开主要领导人会议，并派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去劝汪打消辞意。八月二十二日，蒋向中央政治会议的委员们保证，汪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得到他的“完全支持”。[37]第二天，中央政治会议撤消了不信任案，于是汪也就收回了他的辞呈，蒋对绥靖政策不再受到干扰感到满意，于是又回到前线去完成他对共产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这时，共产党的队伍由于受到国民党炮火的打击以及长征的严峻折磨，人数已锐减到只有几千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的全体领导人齐集在南京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九时三十分开幕仪式结束后，汪和其他的人正在南京大会堂前摆好姿势等待拍照，摄影记者中突然有一个人从摄影机背后拔出手枪，在警卫人员把他击倒之前，朝汪连发了三枪。事后查明，那个“摄影师”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他对汪的绥靖政策深感忿怒。由于蒋介石和汪之间长期不和，再加上晨光通讯社据说是同委员长有“关系”，蒋立即被怀疑与暗杀有关。这件事也象涉及蒋汪激烈倾轧的许多事件一样，至今真相不明。汪自己从来没有谴责过委员长与谋刺有牵连。由于那时两人意见已趋一致，关于蒋会同谋刺有牵连这一点似乎是不大可信的。*

汪被刺后受到重伤。加上旧病并发，他的伤处需要作两次外科手术和长时期的休养。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因为有一颗子弹无法取出，而且正如未能圆满地完成这次手术的外科医生们所预料的那样，它后来引起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终于加速了汪在一九四四年的死亡。

不公正地给汪戴上媚敌外交政策设计师的帽子这一事，对他一生造成的损害要比刺客的枪弹厉害得多。他在被刺不久就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这就说明了国民党继续支持汪所创始的外交政策。而蒋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公开声明中也表示继续支持这一政策。这个声明对日本所用的语调十分克制和温和。然而公众对于软弱的外交政策却是越来越反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生义愤填膺，爆发了一连串有组织、有纪律并取得了空前成功的示威运动。他们提出“为什么不抗日？”这个老问题。事情就是这样，十二月的示威运动标志着这个问题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示威运动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力量，使人们再也不能加以忽视了。就连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那样受尊敬的教育家如果去劝告学生规规矩矩、“听从政府”，也准会被轰下台来的。[38]

委员长不会是一个能被汹汹群情所动摇的人——那怕人们是出自爱国的义愤。他更不会因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而有所感动。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即，学生最能为国效劳的办法是，信任国家领导人并回学校去学习。他更绝对不会赞成那些有可能使他的死敌共产党人喘一口气的要求，因为看来最后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他就给一二 •九运动（这是对那一连串示威抗议活动的总称）戴上了红帽子，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反对蒋的“首先安内”政策的人还继续遭到逮捕。不过，由于学生赢得了政治发言权并使他们的宣传方式日臻完善，全国人民开始知道

---

* 但是，汪夫人不但相信委员长要对暗杀她的丈夫一事负责，而且公开也这样说。（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卷第 175 页）

（在此以前他们还不知道）需要有一个“首先攘外”的政策。这样就使汪精卫的名字越来越和令人厌恶的称呼“汉奸”（卖国贼）联系在一起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被暗杀了。唐是汪同日本人谈判的私下牵线人和多年的老朋友。一九三六年二月，汪乘船前往法国进行长期疗养，看来他此后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前景的确十分黯谈。

与此同时，日本企图建立有利于她的华北自治区的野心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位于北平以东十二英里、一度以大运河终点而闻名的城市通州，发表了一个使占河北省三分之一的东北部地区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宣言。这个新的政权包括二十二个县，这些县原来就是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军事区，而且已经根据何梅协定把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去了。在这个地区内约有五百万人口，有蕴藏量丰富的开滦煤矿，还有满洲国通往平津地区的铁路干线。新政权的建立者在成立宣言中说：他们对南京政府无法在中国消除共产主义感到不满。所以新政权取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把委员会改称为政府)。在以后的二十七个月中，一直到冀东政府被并人另一个更大的傀儡政权之前，它成了帝国陆军搞华北自治运动的急先锋。委员会主席殷汝耕在宣布建立政权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仅仅是华北五省最后合并为一个自治区的第一步。*至于其他类似的计划，帝国陆军各派遣军司令部也都得到了笼统的授权去搞各自的自治运动。就在冀东政权建立前六周，核心内阁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重申了要削弱国民党在华北的影响的决定，而且其措词笼统得足以使陆军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除了使用民国初年的五色国旗外，冀东政权没有多少象个政府那样的排场。它的总部就设在古老的孔庙里。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在外交上承认它，外交事务还是叙由主席殷汝耕来掌管。军务也同样由他掌握。所谓的军务就是指保安队而言。它是一支由当地征募来的、由日本军官来训练的、负责维持治安的庞大的民兵队伍。在整个塘沽协定时期，保安队一直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在新政权刚开始的头几周里，它受命不让一二·九运动蔓延到冀东地区来。当一九三七年七月驻在通州的保安队反正，并杀死市内大约二百五十个日本和朝鲜侨民时，这种指望保安队会效忠的做法的危险性才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冀东除了有着明显的战略重要性之外，后来证明，这个地区之所以有价值还在于它可以对中央政府施加经济压力。[39]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早已在塘沽协定所规定的地区内开始了，这时在冀东当局的包庇下那就更加大大

---

* 其他预定要合并进去的省份是：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

猖獗起来。鸦片和其他麻醉毒品是从满洲国和察哈尔运进这个地区的，而种植罂粟在满洲国和察哈尔都是得到日本当局鼓励的。[40]这种非法贸易都操纵在日本人和高丽“浪人”（流氓）*手里。一九三五年以后，这些人已成了当地新增加的人祸。经由冀东走私外流的白银数量之多，使南京政府稳定币制的措施受到严重破坏。此外，为了不让南京政府得到它极端需要的财政收人，为了加强日本本身萧条的出口市场，当大量未经征税的商品毫无节制地由日本通过冀东不断涌人华北市场时，日本当局却伙同冀东当局故意不闻不问。即使货物通过冀东当局所设的关卡时，所抽的税也远低于中国海关规定的税率。[41]很难弄到可靠的统计数字，但走私规模之大，却可从有关国家向日本提出的强烈抗议中看出一些苗头，因为这些国家给予中国的贷款以及中国付给他们的赔款都是以中国的关税收入来担保的。[42]

冀东的这种做法使殷汝耕获得华北头号汉奸的臭名，而且大大地减少了日本力图说服中国人相信“中日合作”乃出自诚意的可能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冀东政权建立的前几天，奉命向蒋介石和他的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解释日本在华北的意图。有吉明硬说自治运动是基于“人民自发的愿望”，而不是因为日本人要坚持这样做。针对这种说法，张群回答说：“事实很明显，如果日本召回土肥原将军，……自治运动恐怕马上就会结束了。”[43]

至少在当时，土肥原和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其他一些人所赞同的五省自治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使冀东脱离中国固然不至于引起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更为宏大的华北国计划则一时还是行不通的。不过大陆派遣军司令部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比较有节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冀、察两省建立一个政务委员会。在日益高涨的示威和刺杀亲日的官员及记者的浪潮中，中日双方一直为此目的进行了整整两个月（一九三五年动乱的十一、十二两月）的谈判。这一地区的中国军权掌握在宋哲元将军手里。他一方面受到公众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陆军的压力。土肥原将军对宋进行多次访问后，宋得出了蔑视学生容易、蔑视帝国陆军难的结论。因此他于十一月三十日向南京发出电报说：“华北局势日益紧张，目前已无法控制矣。”[44]电文的意思是：宋马上就要向日本屈膝投降，并将仿照冀东政权建立一个分裂主义的政府。南京不愿意让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华北政权，于是决定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到这个地区去。在何、宋和日本人三方面协商之后，

---

* “浪人”本来的意义是指没有主人的武士，即主人死后飘泊无依的武士。在现代，当这个词开始广泛用以指从事走私、贩卖毒品和其他非法活动的流氓兵痞时，它便含有贬意了。

一个妥协性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出笼了。国民党在华北保留了一点面子和地位，代价是南京同意两省在事实上的自治。名义上，南京有权任命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但事实上这项任命必须征得日本人的同意。结果，委员会中包括好几个在管理塘沽协定地区方面一贯积极地同日本人合作的人在内。有些人实际上从臭名昭著的“西原贷款”之日起便和日本人进行合作了。[*]在委员会中还有一种明显的安福系色彩，而安福系这个声名狼藉的亲日派是军阀全盛时期在华北发展起来的。

政务委员会这种机构早有先例。最著名的是已在广州成立了好几年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广东和广西两省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名义上是南京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它的军队在名义上同样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南京只能在西南政务委员会自己任命的领导人可能容忍的范围内在西南两省行使权力。除了名义之外，它实际上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权。西南和冀察这两个政务委员会都是不断使中央政府苦恼的事物。这明显地证明，共产党人并不是国家统一的唯一阻力。两个政务委员会都使南京的财源减少，并且使政府改革财政的努力受到破坏。南方的政权能够而且的确谴责过中央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并使它十分难堪，而北方的政权则是妥协政策的明显的结果。

当一九三六年各方面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指向南京的时候，“首先安内”政策的讽刺意味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只要日本对华北的入侵不被阻止，安内就不可能得到实现。一九三六年，中国慢慢地走向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改变了允许日本在华北毫无阻碍地扩张其势力的“首先安内”政策。这年的十二月，戏剧性的西安事变解决了由蒋介石“先统一后抗战”这一口号所挑起的争论。[45]当蒋坐镇西安发动对共产党的第六次“围剿”时，他被自己的“剿匪”将领绑架了。他当了两个星期的俘虏。当全世界都等着听他的消息的时候，一种值得注意的民族团结精神在中国形成了。延安、西安和南京的领导人都突然认识到：把蒋杀掉将会把国家推入全面内战的深渊，而且只有日本能从因此造成的大混乱中得到好处。甚至莫斯科——它由于罗马—柏林—东京当时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而感到不安——也认识到中国进一步分裂的恶果，因而也来帮助调解把蒋释放出来。一九三六

---

[*] 西原亀三于一九一七年被寺内首相派往北京，就几笔贷款事宜与亲日的段祺瑞政府进行了谈判。作为总额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贷款（其中多数未经接受者说明用途）的报酬，日本取得了在华北的各种特权。〔译者按：《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载叶恭绰写的《西原借款内幕》一文指出：西原借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英、俄、法等帝国主义无力东顾，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谋取在华的铁路权利以及其他特权的阴谋活动。而该项借款又大部分被段用于打内战，从而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分化中国的毒计。〕

年圣诞节前夕，蒋获得自由，西安的插曲也就结束了。虽然委员长没有为此签署什么书面文件，但是他显然默认了停止反共内战以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那些把他抓起来的人提出来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新年已经在“一个不吉利的调子中”开始了。

> 中国突然出人意料之外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似乎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在报纸上也谈论过对华政策要改弦易辙，但却没有指出要朝什么方向去改变。看来日本是最不能够理解中国的新情况的国家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46]

---

[1] 可参阅詹姆士·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林翰望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霍华德·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

[2] 见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政治革新过程中的改革与革命》。

[3] 访问松本重治谈话记录。

[4]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 289 页。一九四四年汪精卫死前不久，曾告诉西园寺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5] 见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第一卷第 34 页。宣统皇帝后来成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康德，而在西方国家倒以亨利·溥仪闻名。

[6] 见约翰·根室的《亚洲内幕》第 263 页。

[7] 同上。另见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 103 页。

[8] 见詹姆士·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 47 页。

[9] 详情可见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及乔治·俞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汪精卫没有成为“丙组”的成员，因作为“丙组”的成员必需戒酒。

[10]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 142 页。

[11] 吴天成的《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动的政变》一文，详细记述了这次事件。

[12] 见哈罗德·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 92—93 页。

[13]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 29 页。

[14] 罗伯特·佩思的《蒋介石传》第 58 页，引蒋的一次讲话。

[15] 杰罗姆·陈的《国民党左派的定义》一文，谈到孙的遗嘱。

[16] 见皮雄·罗的《蒋介石的策略的新估价》一文。

[17] 见董显光的《蒋介石传》第 149 页。

[18]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 13—23 页。

[19]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 157 页。
[20]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 41—42 页。
[21]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 156 页。
[22]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 42 页。
[23]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 179 页。
[24]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 82 页。
[25] 同上书，第 83 页。
[26] 见埃汉德·克拉布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第 172 页。
[27]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 143 页引有此语。
[28] 同上书，第 132 页和第 135 页。译文是意译的。
[29]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 116—117 页。
[30] 同上书，第 116 页。
[31] 同上。
[32] 同上书，第 113—114 页。
[33] 孙中山的这几句话是在一九一七年说的。他说的完整的话如下："如果中国需要找盟邦的话，就不外乎是日本和美国。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着重点是原有的。）见孙中山的《中国与日本：天生之友而非天生之敌》第 113 页。
[3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71—72 页。
[35]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250 页。
[36]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18 页，详述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
[37] 同上书，第 135 页。
[38]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 376 页。
[39]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173 页。
[40] 见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CE 第 393 页。
[41]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 页，有一表说明部分差别性关税率。
[42] 实例可见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 178—180 页。
[4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66 页。
[4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62 页。
[45] 范斯莱克的《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五章，详述了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各方面。
[46] 见约瑟·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 193 页。

第三章 石原将军同扩张主义派之争

研究中日战争史的学者如果想要弄清哪些人是这场战争中的“扩张主义派”、哪些人是“反扩张主义派”，或者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把鹰派同鸽派区分开来，那可是一项事倍功半的工作。如果假定陆海军军官们在扩张主义派阵营里处于支配地位，而内阁的文职成员和官僚们都是反对扩张的，那就会对诸如广田弘毅和近卫文麿公爵这样一些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不恰当的评价。因为，在中国事件的关键阶段，他们作为外相和首相，是站在扩张主义派那一边的。

把陆军参谋本部说成是反扩张主义派，把陆军省说成是扩张主义派，那倒是一个较有实用价值的意见。不过，虽然这种说法在许多场合下是正确的，但也仍旧站不住脚。因为例外情况过多，而且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的人员互调也很频繁。一位研究中日战争史的日本专家认为，如果非搞出一张派系表不可的话，那就有必要作出下述细致的分析：在陆军省内部，军务课是反扩张主义的，军事课是扩张主义的；在陆军参谋本部内部，反扩张主义派支配着战争指导课，扩张主义派则支配着作战课。[1]正如制表人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连这样一张表也需要有保留地加以使用。但对战争初期来说，这张表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芦沟桥事变时以及其后约三年期间，参谋总长一直是闲院宫载仁大将（亲王）。他是在满洲事变时被任命担任该职务的，因为当时陆军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决不能把这个重要职位交给一个派系将领。闲院宫与皇室的亲属关系使他超然于不和与争议之上，并起着挂名首脑的作用。他主持会议，由于他的威严仪表，使有时激烈争吵的参谋会议不至于超出军事礼节范围之外。参谋次长多田骏将军则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多田为了使工作上有统一的意见，全神贯注于设法消除意见有分歧的幕僚之间的争吵，所以他自己的意见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要进一步看清楚中国事变怎样使陆军系统分裂为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这两个阵营，最好考察一下反扩张主义派的主要代表石原莞尔少将的观点和结局，他于战争爆发时担任陆军参谋本部的第一部（即作战部）部长。

由于石原在陆军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他在他的一九一八级中名列第二），他于二十年代中期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光荣地被派往国外学习。在柏林，他是一个勤奋研究欧洲军事史的学生；从他的札记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诸如冯·克劳塞维茨和沙恩霍斯特等人名字之熟悉，不亚于大多数日

本军官之于东乡和大山。[2]一九二八年，石原中佐被派到关东军，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比任何人都更致力于使那支军队成为日本有名的、向大陆扩张的急先锋。石原和板垣征四郎大佐一起承担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使日本能迅速而有效地将她的势力扩展到整个满洲的广阔地区。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力量作了估计，制订了压倒这些军队的作战计划，然后着手说服他们关东军本身的指挥官和东京军事当局相信发动满洲战役是英明的。当一九三一年九月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并没有因下面的事实而踌躇：他们的意见未能得到东京军方无条件的支持，而且也完全和政府的目标相左。他们把满洲当作一个堡垒，既可用之来对付南面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还可用之来对付北面的苏联。[3]此外，他们把满洲看作一个战略供应基地，能补充日本矿产资源之不足。石原和他的关东军同僚深刻了解他们的满洲战略中的循环推理，“以战养战”就是他们用以描述这种战略的名言。[4]

一九三五年，石原调回东京到参谋本部担任重要职务，第二年他就任作战部部长。由于他努力争取，作战部既负责军事计划的工作又承担了经济计划的工作。在石原看来，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典型的帝国陆军军官们总是一味强调纪律、优秀的精神素质以及大和魂等等之无比重要，认为这些是无价之宝，可以补日本在现代化战争装备方面的不足。但石原不同意这一传统意见。石原与他的绝大多数同僚不一样，他并没有轻视统计学家和经济计划工作者的才能。恰恰相反，他那个部的中心工作（尤其是战争指导课）就是编写关于陆军未来需要的预测报告以及关于日本经济实力的状况和弱点何在的调查报告。石原从他僚属努力写的研究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资源远远达不到保证现代战争需要的水平。他进一步得出结论，除非把日本的经济置于总体战的体制上，它就无法适应陆军当前可预见的迫切需要。必须按照轻重缓急来重新调整国民经济，以便适应一支远离日本本土而作战的现代化、机械化、机动性高的陆军的需要。据此。石原的部下起草了一个综合性的五年计划（一九三七——一九四一）。这个计划要求大大提高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飞机、煤、钢铁、电力、大米等方面的生产不足都一一注意到了。[5]

石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哲学家。他的研究导致他主张进行一场类似《圣经·新约·启示录》所预言的那种世界战争（即世界的最终决战）。[6]他对他自己在满洲事变以前的几年中所形成的观点，在之后的二十年中作了多次修正。但在这些观点里，始终贯穿着世界上两个大集团，即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冲突这样一个主题思想。冲突之根源在于东方的精神价值和西方的物质价值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而不单纯是对领土和市场的争夺。一旦这场史诗般的战争决定了

这两种文明孰优孰劣，世界人民就能够在永久和平中团结起来。当石原于二十年代末期第一次阐述他的理论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他感到，由于发展了具有大规模破坏能力的武器，战争将会是短促的；能作环球飞行的飞机也将起重要的作用。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在这最后的一战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而成为西方文明价值的最有力的捍卫者美国将同东方文明的卫道士日本相对抗。石原把满洲也包括到最后一战理论中，因为这个地区本身不仅在军事上很有用，而且在那里进行的扩张是使东亚人民能团结起来的第一步。中国显然是连自己本身也团结不起来的，更不用说来团结全东亚各国人民了；因此日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以使东方各国人民能在未来史诗般的战斗中团结一致。

石原始终认为苏联是西方的一部分。但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她构成威胁的大小随着不同的时期而变化。到三十年代中期，就是在他到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前后，他已经开始把苏联看作是对日本的最直接的威胁了。面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东亚方兴未艾的挑战，较为遥远的最后大战的威胁变成次要的问题了。石原主张，在来自俄国方面的直接威胁缓和以前，应该暂且避免同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张化。换句话说，应该把最后一战尽可能地推迟下去。石原决不是仅仅模糊地预见到与苏联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一九三六年，他估计不出五、六年就要发生对苏战争。当石原将军和他的部属在制订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到的便是必不可免的第二次日俄战争。该计划将在这次战争爆发的前夕执行完毕。石原完全相信，日本军事力量决不是苏联远东军的对手。这个估计被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在张高峰和诺蒙坎的两次较量所证实：日本军队是被装备和后勤支持占优势的苏联军队所击败的。

石原关于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的预言使他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想法。约在满洲事变（一九三一年）时，他认为日本必须通过武力控制中国以建立一个东亚联盟，即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但在芦沟桥事变前夕(一九三七年),他开始抛弃用武力来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强调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该集团的手段。他的逻辑并没有使他主张放弃以武力夺来的满洲国；反之，他建议使日满关系成为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范例以诱使中国参加合作。这就需要日本陆军放松对满洲国的严酷控制。同时日本必须停止在长城以南的中国本部进行军事冒险。

在石原看来，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泥沼中，那将是极为愚蠢的。这样的战争会给她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在后方有一个敌

对的中国的情况下，日本不敢冒同苏联作战的危险。除开这一点考虑之外，石原对中国看法的改变是由于对国民党有了新的、积极的估价，也由于他对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相当重视。在帝国陆军军官中，持有这种看法绝非寻常的。到三十年代中期，石原一反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开始感到国民党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军阀派系，它其实是民族主义潮流的领导者（或许是追随者）。而日本却冒险来顽抗这股潮流。

中国的西安事变以及随后组成的统一战线促使石原更加努力地鼓吹他对中国的看法。一九三七年一月，即西安事变后的第一个月，他和他的幕僚准备了许多备忘录，强调有必要放弃过去在华北和内蒙古所执行的损人利己“谋求特殊权益”的政策。对于陆军中的许多人来说，西安事变是一个可惊的征兆。它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比单单建立国共合作更为复杂的内容，即一个针对日本的中苏联盟将要出现。石原却反对这种分析。他说：“虽然抗日统一战线的起源和发展同第三国［苏联］，特别是同共产党有些关系，但它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种变化。基本上可以指望这种变化会发展成为真正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运动。”[7]随着新中国的创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敌视日本的政策呢，石原说，那就是要由日本自己来决定的事了。他作出结论说，“决定因素”是日本愿意（或拒绝）“抛弃她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从而表明日本的真正诚意。”在同一时期写的另一份备忘录中，石原力主要把华北看作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某种“特殊地带”的那种“观念清除掉”。日本必须停止鼓励华北五省独立，而且必须“明确表示，冀察政权眼下所管辖的地区应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必须置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之下。”[8]

石原的意见和扩张主义派针锋相对。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同他一样，相信对苏战争即将发生。但是他们根据那个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却同石原的截然相反，也就是说，中国的威胁应当以武力来消除，以便日本腾出手来对苏联作战。石原和反扩张主义派把在华的日本人受到日益频繁的袭击和越来越刺耳的抗日呼声看作是一种证据，它证明一个能够建立强大、统一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觉醒，日本应该同中国结成同盟。而扩张主义派则把上述对日本人的袭击和反日浪潮看作是中国“缺乏诚意”的证明，这只能说明日本决不能信任国民党政权，也不能同它合作。东条英机中将的意见充分表明了扩张主义派对中国形势发展的反应。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距芦沟桥事变的发生还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向东京发出一份绝密的紧急电报，力主日本决不能容许国民党政权解散日本以往几年就已在华北建立起来的政权机关和特殊关系。东条说，国民党蔑视日本，同它恢复友好关系的任何尝试只会增加这种蔑视。他作出结论说：“从对俄国

备战的观点看来，我坚信，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容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打击南京政府，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9]

芦沟桥暴力行动的爆发使反扩张主义派大吃一惊，他们的代表人物立即着手进行就地协商以解决事端，防止冲突的扩大化。石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如我们所知，他赞成全国总动员作为进行对苏战争的准备；而在华北的敌对行动恰好使这种必要的危机出现了，从而促使日本转到总体战的体制上来。可是他却对只动员几个师团的兵力也不同意，因他意识到在他自己的下属和陆军省内部的扩张主义派想利用新动员起来的军队去打击中国。战争爆发的那个月，石原曾两度坚持撤销动员令。至于派遣军队到中国本部去，他更是断然反对。据说，他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在外务省一次会议上说过："只要我还活着，决不让一兵一卒派到中国去。"[10]

甚至连石原自己的作战部的人也没有他这样的决心。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就顽固地反对石原阻挠动员，反对他阻挠派遣军队去华北。一九三六年，当武藤还只是关东军的一名参谋时，他就曾不顾石原对华亲善的政策，带头组织了后来遭到惨败的对绥远省的入侵。*石原为了此事立刻赶往满洲去劝阻关东军进攻绥远。而面对石原的是寸步不让的武藤，他提醒石原说，"我们只不过是在做你自己于满洲事变时在满洲所做的同样事情而已。"[11]石原自己在一九三一年曾经违抗上级擅自行动；当他发觉他本人正成为同一类型的违抗上级行动的受害者时，狼狈之余，还体会到这桩事的讽刺意味。在参谋本部支那课和田中新一大住所掌管的陆军省军事课里，扩张主义派的论调甚嚣尘上。当中国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周里猛烈抵抗时，以及一九三七年八月战事波及上海时，他们大谈其闪电战（即日语所谓"速战速决"）的声浪淹没了石原主张慎重的劝告。

例如，在战争初期，支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就一本正经地告诉石原说："我们只要加派军队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12]芦沟桥事变两年后，在和竹田恒德亲王的一次长谈中，石原陈述了他和扩张主义派之间的分歧。他告诉竹田亲王："满洲事件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成见，他们从中得出了战争可以迅速结束的结论。我认为，这表明他们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理解得很肤浅。"石原（通过电话窃听）获悉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正向国外订购大量武器后宣称，他更加深信"中国将倾全力而奋战"。石原告

---

* 一九三六年三月，满洲国军队〔指伪军。——译者注〕进犯军阀将领傅作义的地盘绥远，占领了百灵庙。同年十一月，这支以百灵庙为据点的军队，配备着日本武器并有日本飞机的支援，对绥远东部发动了一次目标更大的人侵。傅作义将军的邻省军阀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把他的军队投人战斗，日本唆使的入侵尝试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被击退。这次人侵及其结果详见唐纳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一书第 230—239 页。

诉这位亲王说：一旦打响了，战争一定会成为旷日持久的；支那课所期望的“速决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支那课的成员却坚持说，只要日本取得华北，中国就会“在经济上破产”。石原接着说：“他们还列举了数字为证呢。”但是他们的主张往往是“以我们在满洲取得轻而易举的成就为依据”的。[13]

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当人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石原认为战争不可能轻易取胜的观点是正确的时候，他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对立就越来越公开化了。扩张主义派既不能取得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的胜利，又不肯承认自己估计错误，他们便要求进行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来结束战争。与之相反，石原则愈来愈坚信中国的抵抗非但没有被粉碎，或许反而变得更为坚强了。他并且提醒他的上司，必需把军事行动和占领区局限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夏都牯岭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国民党人物之外，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议的目的在于加强统一战线并对选拔出来的几千名陆军官员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七月十七日，蒋利用这个讲坛，发表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声明，表明中国决心反抗日本使华北脱离国民党统治的企图。[14]蒋明白表示，中国希望和平，但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的那种和平。他宣称，国民党政府愿意谈判解决仍在华北范围内的冲突，但中国的一寸国士再也不容丧失，容忍国土丧失就是“对我们的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日本逼得中国忍无可忍的话，她除了“不惜牺牲，竭力为民族生存而战”之外，别无他策。牯岭讲话公开发表了，这是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号召他们紧密团结起来，为防止“亡国灭种”而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无论从这个声明的语气和内容说来，它和蒋以前强调必须慎重及和解的讲话极不相同。

这篇演说在东京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外交家石射猪太郎写道：“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篇演说的严重意义。它听来好象只是‘虚张声势’而已。”[15]牯岭讲话后两天，石原在陆相杉山元办公室里力主谨慎从事。他说，战争几乎有变成“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这样，日本就会“象拿破仑在西班牙那样，在中国陷入泥沼。”[16]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石原劝杉山立即把所有在华北的日军撤回满洲国。石原进一步建议，近卫应立即飞南京同蒋亲自

---

*译者按：据上海《大公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份连续报道，庐山那时曾举行两个会，一是由军人、公务员、学生参加的暑期训练班；另一是蒋、汪邀约的各大学校长、部分教授、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谈话会”；报道都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曾派人参加上述任何一个会。“谈话会”的参加者有胡适、左舜生、朱经农等一百多人。蒋于十七日发表谈话，其中有“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及“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等语。

举行直接会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以一大堆绰号（所有绰号都说明他智力迟钝）*而闻名的杉山会理解石原对历史事实所作的恰当比拟。他当然不赞成石原所提出的通过同蒋直接协商来“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案[17]。在陆军和政府中，赞成通过谈判来解决中国问题的那些人，继续想达成一项把国民党排挤出华北的局部解决办法。

石原不顾反对他的政策的意见日益增多，向近卫首相提出了建议。近卫文麿是著名亲华人士近卫笃麿的儿子，他不那么鄙视国民党（当时日本政界人物中间普遍鄙视国民党），因此石原认为他是“唯一”能够顺利地同蒋进行协商的人。七月中旬，石原打电话给近卫的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详细说明他的建议，当天就说服了近卫接受他的方案。近卫虽然有病，照样下令准备飞机，以飞南京。但是这个方案却引起陆军中扩张主义派强烈抗议，也引起文职顾问如西园寺公一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近卫不能指望陆军会接受同蒋达成的协议。西园寺不大相信石原在陆军中的个人影响。他告诉近卫：“多年来，寺内、杉山和梅津等将领一直力图树立他们的‘路线’，他们选中了东条。石原是他们所‘讨厌的人’。他被他们看作是个继子。他象风中残烛，随时都有被吹灭的可能”。[18]

在以后的几个月间，石原的主张遭到越来越厉害的围攻。在九月份，有一个朋友到参谋本部去拜访他时，听到“只有［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以及个别下属赞同石原的意见而感到‘震惊’。所有其他人员都在破坏［他的］计划。”[19]作战课课长武藤大佐带头纠集反对派并极力要求把他从参谋本部调走。[20]后来以“向巴丹的死亡进军”而闻名的本间雅晴将军也大力助长了参谋本部里反对石原的温和政策的力量。作为参谋本部第二部即情报部的部长，本间负责估计敌人的作战能力。他的僚属在军人头脑中大量灌输“对支一击论”。这个观点认为，“只要对中国人［作决定性的］一击”，就可以瓦解他们的抵抗。[21]当杉山陆相向天皇保证“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时，就充分表现出这种对中国力量的轻蔑估计以及对日本军事威力的过份自信。[22]

石原所为之浩叹的战略上的乐观主义也在关东军中集中表现出来。关东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提出了《处理时局纲要》报告。[23]关东军对苏联威胁之关注并不亚于石原，但是它认为：只要中国在日本背后仍然保持着不屈服和敌对态度，日本就不敢同苏联作战。关东军的将领们强调既可以从“加强军事力量”方面、也可以从作战的地理范围方面来扩大军事

---

* 绰号中的两个：一个是“愚图元”（傻瓜元），另一个是“便所的扉”（盥洗室的门）。第二个绰号说明杉山元没有主见，可以从任何一方面来推动他。（见加濑俊一的《密苏里号战舰之行》第 11 页；另见秦郁彦的《中日战争之军事进展》第 48 页）

行动。他们说，“我们不仅要消灭在华北的中国陆军和［中国］其他军事力量，而且还要迅速占领上海……，取得对山东的控制，［并且］进行空战，然后通过这些步骤在短期内达到我们预期目标，并使所有抵抗迅速结束”；“在南京政府停止抵抗并投降以前”，不要进行外交活动去谋求解决办法。关东军感到，日本必须对敌人加以“惩罚”（日本话是“膺惩”），这是当时在陈述政策时反复出现的一个用词和概念。[24]

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底，石原的观点与参谋本部以及各野战军中普遍存在的意见是如此不一致，以致他的政敌得以把他从参谋本部排挤出去。九月二十七日，他被派到关东军去当副参谋长（在东条将军之下）。这次调动等于放逐。石原的呼声从此被压了下去，只有少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听得到，在陆军和政府的高级会议上则几乎无人理会了。

限制大陆上的战争的希望何时破灭，以及在什么阶段日本算是投入了总体战，这一点是很难断言的。詹姆斯·克劳利认为日本投人总体战开始于近卫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近卫宣布了不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决定。[25]查默斯·约翰逊则把“日本政府终止使中国事变局部化的一切尝试”的时间推迟到进行铜山行动（实际上就是一九三八年四月的徐州战役）之时。[26]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迄至一九三八年夏秋的汉口战役为止，仍然有希望把战争局限起来。不论哪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至少回顾起来有一点是够清楚的：那就是石原调离了参谋本部，对于上述任何一个场合所执行的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把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以表明战争的扩大。日本避免公开宣战是有其国际公法上的原因的。但是正如一个前帝国陆军将领所写的那样，在头几个月里，陆军军官中，实际上很少有人感到日本已在事实上卷入了战争。反之，大多数人都深受“认为中国问题总是可以用恫吓的老办法来解决的错觉”之害。[27]每一次新战役都带来了新的胜利，把中国军队驱逐到离国民党的中国的贸易、工业和金融财政所集中的沿海大城市越来越远的地方。可是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敌人按他们所预期或甚至预言向他们投降。陆军为自己军事活动划定范围，并且许诺说，它没有必要再超出这些范围。据近卫的顾问西园寺说，有人在战争开始头几周内，带着“好消息”冲进首相的“智囊团”的一次会议上说：“陆军说它将不再向永定河以南推进了。”西园寺写道：的确，杉山陆相不得不向天皇裕仁保证不跨过永定河。但是这个诺言被撕毁了，“陆军开进了华北”。[28]当前进到黄河时，也有过类似的保证，可是

当日军又渡过黄河时，据说杉山也只好嘟哝说："'天父'要发火啦！"*

迄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华北和内蒙古各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落人了日军手中。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将军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将军的僚属们都采取步骤，在他们所辖地区建立了分裂性的傀儡政权。没有什么阻力迫使帝国陆军放慢沿铁路线深人中国领土的攻势。他们也没有受到在以后几年里使日本大吃其亏的游击队的袭击。虽然中国的抵抗就象一九三二年那样顽强，上海还是落入了日军手里。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成为众目所瞩之处。参谋次长多田骏将军也象石原那样，对于日本逐渐陷入泥沼的趋势感到担心，并于十一月十九日下令日军停止前进。但是战场上的将领都争辩说，攻占南京是绝对必要的；那时担任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提出了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29]结果多田将军的反对意见被否决，攻打南京的命令下达了。当日本军队于十二月初向南京进逼时，他们意外地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日本陆军和公众都一时充满了在年内可以取得胜利的乐观想法。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历史上罕见的奸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当帝国陆军最辉煌的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时，举国一片狂欢气氛。事隔三十多年，不少日本人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遍及全国的提灯游行。东京成千上万的人群从丸内商业区涌向皇宫的各个门口。在那里，"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在环绕皇宫的护城河水面上，千百盏灯笼的倒影在跳动。

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南京的陷落井没有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和意志起预期的那种灾难性的影响。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现在以多田将军为首）再一次在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展战线的问题上进行了交锋。这次，他们的争论集中在是否拿下重要交通枢纽徐州的问题上。扩张主义派又一次一占了上风：日军于一九三八年春占领徐州得手后，立即奉命西向汉口和南向广州疾进。

石原谴责了进行这些战役的愚蠢行动。他在徐州陷落后不久，回到东京作公开演讲。他告诉他的听众说：即将发动的汉口战役也不可能改变形势。"即使汉口被占领了，我看蒋也不见得就会倒台。即使蒋倒了台，我也不相信四亿中国人就会投降。"他继续告诉他的听众说：是政客们犯了错误，他们不懂军事韬略，不知道中国抗战的力量有多大，也没有认识到日本对在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毫无准备。石原责备政治领导人违抗天皇的明确谕旨去搞战争扩大化，他说："政客们高喊，'拿下汉口！'，'拿下广州！'，这无非是想掩盖他们自己的无能而已。对于政客们说来，[这种为战争打气的叫

---

*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 283 页。"天父"是天皇的昵称，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显得无礼。

器］就象是［以最大剂量］注射吗啡或樟脑。结果人民就在这种人为的方式中被煽动了起来。”[30]

“被煽动”的日本人民自然而然希望国家因从事战争而作出的牺牲，至少会以得到胜利作为报酬，同时也希望得到赔偿。那些希望“惩罚”中国的人们怂恿并夸大了公众对胜利和赔偿的要求，同时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隐晦地谈论不能满足人民要求的危险。由于公众相信了蒋仅仅是一个象他们的军政领导人所宣传那样的地方性军阀，他们必然期望迅速取胜并提出苛刻的投降条件。

煽动并利用这种气氛容易，但要驱除它就难了。官方的宣传方针一旦投合了人心，陆军和政府官员要想用足以引起中国人兴趣的温和条件来设法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就日益困难了。石原警告说：“不论我们（在战争中）遭到了多大牺牲，但贪婪无厌总是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宗旨之一。因为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十万人，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攫取中国的某些领土，如果我们以这一点作为辩解的理由，那是卑鄙的。”石原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曾经把一项苛刻的和约加诸于德国，但是日本不应该象欧洲人那样，以掠夺的方式行事。石原的演说中夹杂一些对东西方国家之间所作的令人反感的对比。西方国家是强大的，但缺乏日本的精神资源。石原说，可是日本却不顾道义，在中国土地上谋求保持特殊权益，并且不理解战争是多么挫伤中国人民的自尊心。[31]

石原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向协和会所作的演说中，更加坦率地说出那种他认为是与日本传统格格不人的不道德行为。他对帝国陆军各派遣军在它们控制下的满洲和中国各地区所鼓励和主办的情绪冷淡的祝捷活动感到担心。他告诉他的听众说：“我们日本人的确是有点名堂的。中日两国好比是父母，而满洲就好比是养子。现在父母在打架，父亲说，‘我们占领了南京，该是欢庆的时候了’。于是倾美酒而饮，扬旗提灯而游行。”[32]石原继续说，他从满洲的中国学童脸上看到的“困惑表情”使他特别感到痛苦。他们是被组织去参加游行，庆祝帝国陆军的功勋的。

石原声称，他对战争抱着错综复杂的心情。虽然战争使他感到悲伤，但也使他认识到：“自从满洲事变以来，特别是自从目前这一次事变以来，我们的四亿中国兄弟已经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了”，从而使他“极为高兴”。他说，中国人民已经睁开眼睛，“可是日本人现在却在打瞌睡了”。石原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谈到，他见过一位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并建议他告诉蒋介石把“中国的最高勋章”授给某位日本将军。这位将军曾在唤醒中国人并使他们振作起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那怕是无意的）作用。石原还说，“那位中国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33]谁要是想了解石原是怎样由于对战争

的尖刻批评而被迫提前从陆军退役的话，只要回忆一下诸如此类的议论都是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于官方所谓“圣战”之时而发表的就够了。

石原一再谴责日本领导人没有能力担当引导一个现代化国家渡过危机的任务。他们对危机只有招架之功，而缺乏为避免未来自机所需要的那种远见。石原感到，日本军人中的危险势力正受到纵容，没有一个当权者能控制住这些势力。“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石原写道：但是在别的国家里，“兼备政治和军事才能的伟大领袖在关键时期挺身而出，指导国政”。在他看来，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同拿破仑和阿塔图尔克（即土耳其的基马尔。——译者注）相媲美的人物。为了补救日本不可能产生这样有才干的领袖的缺陷，石原建议以军事科学及其它内容大力训练天皇和皇室成员，使他们能够直接统治国家。[34]

石原对陆军大学*训练日本优秀军官的教育大纲也极为不满。石原说，陆军大学教战术而且教得很好。但是他们训练出来的军官却“没有打长期战争的知识”。他说，例如在当前的战争中，就要把日本的作战能力同中国的抵抗能力相比较。单是这一桩事就够复杂的了。而战略家还得考虑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能用于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还必须考虑到能和这些力量相抗衡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实力。“综合所有这些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日本能用多少军事力量在中国作战。这种才干是必需的，可是我就不相信，在整个陆军参谋本部内，有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如何处理局部战斗而已。”[35]

一个在三十年代中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军官，在他最近所写的评论中，对石原上述的批评发出共鸣：

> 中国的黄埔军官学校有两个专业：军事专业和政治专业。但是我们的军事学校只有一个军事专业。结果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三十年代在中国所发生的重要动向。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所进行的货币改革是国家走向统一的非常重要的步骤。可是当时我们对货币改革却一无所知。西安事变后，我们没有认识到统一战线对中国的重大意义。我们继续认为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并认为她日后仍然会停留于分裂的状态，为群雄所割据。要是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反蒋简直是发疯。[36]

---

* 陆军大学有时译为陆军参谋大学。它为军官团的骨干提供高级的训练。大多数军官的学业仅学到陆军士官学校为止。这种差别的含义在克罗利的《三十年代初期日本陆军中的派系斗争》一文中有所讨论。

石原在谈及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时，嘲笑了那些期望在中国进行速战速决的日本人。他说：“他们犯了大错误，竟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埃塞俄比亚的野蛮人。毫无疑问，只要中国人（即使在遥远的边疆）还保有一寸土地，他们就将继续抵抗我们。”日本要使用“几十个师团”并经过“几十年”才能征服中国。[37]而且正如石原的一个信徒所告诫的那样，在这同时，“我们将使中国长期分裂，［而且］在未来的长时期中，［将使］帝国的力量受到巨大的消耗。”[38]石原和他的追随者经常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论调：只有假定日本希望伙同帝国主义国家一齐来掠夺中国，一个分裂的中国才对日本有好处。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目的是要使中国加入一个能生存下去并能把西方帝国主义者排除于东方之外的东亚联盟的话，那末中国的分裂状态显然是一种不利条件，而不是有利条件。当时大多数日本评论家赞成大仓公望男爵的看法，把蒋介石看作是在西安“再度倒向苏联”的“可耻歹徒”。[39]石原不同意围绕苏联来解释西安事变，也决不会同意把蒋描绘成一个“歹徒”。

一九三八年六月，当日本准备进攻汉口使战争进一步升级时，石原用四句简明的话归纳了他关于中国事变的看法：

> 一、中国有非常坚强而一致的意志来抵抗日本使用武力。
>
> 二、因此，除非现在就解决目前的局势，否则我们就不免要陷入一场持久战。
>
> 三、如果我们不能制订出一项合适的政策来解决冲突，相反地继续盲目追求我们自身的利益的话，我们将永不可能希望远东会得到和平。
>
> 四、我们必须记住，苏联也是我们的近敌。[40]

石原在参谋本部时，人们就对他感到很头痛；他在关东军中，也同样使人们感到如芒在背。不久，他就被调离关东军，并于一九三九年改任守备京都的职务。两年后，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他又被贬入预备役。在整个战争时期，由于他不断对错误的战争政策和国家领导的无能进行攻击，因而差一点被关进牢房，他实际上是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度过战争时期的。

石原是佛教法华宗的虔诚信徒。这个佛教宗派是由日莲在七个世纪以前所创立的。石原把日莲看作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自己同日莲一样，也是一个饱学之士、一个律己极严的军人。他遵照严格的规律而生活，并公开表示蔑视不遵守纪律的人们。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你钦佩他，但是你会感到同他在一起并不舒服。”[41]就象义愤填膺的日莲，于蒙古人入侵前夕，在日本到处大声疾呼，向全国警告民族危机的到临那

样，石原也向所有愿意倾听他意见的人大谈特谈他对日后民族灾难的预见。他们两人都不是以善于撮合与随和而著称。他们的作风决不是谨小慎微的。他们两人都不怕和当权派发生冲突，反而象是可以从这类冲突中汲取某种力量。他们两人都拥有一群敬佩他们的正直和灼见的崇拜者，但是他们两人都是敌多于友。他们的敌人把他们看成是秉性怪僻、危言耸听的人，并且看不起他们那种非日本式的个人主义，看不起他们那种蔑视协调、蔑视其他文雅的待人接物手段的态度。这两位日本的“耶利米”（古希伯来预言家。——译者注）都由于直言不讳而遭到放逐。日莲遭到人身的放逐，被流放到佐渡岛去；石原则遭到职业上的放逐，仅仅五十开外，使蒙受了战时退役的耻辱。他们两人最后都隐居于日本北部崎岖山地的隐者陋室中，在他们的追随者的陪伴下度过晚年。他们都死干六十一岁。据说石原临终时对这桩巧合的事感到高兴。他埋葬在一座俯瞰日本海的山上，同他的先驱者遥遥相对。

我这样离开本题扯到石原将军的思想和时代，目的在于表明这样的事实，因为甚至在参谋本部的最高层也有日本人认为同中国作战是一个大错误。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前曾力图加以防止，在战争爆发之后，则极力谋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日本怎样由于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怎样由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决定停止一切谋求结束同国民党政府的战争的努力，而更深地陷入了大陆战争的泥潭。但在以后的几章里，我们还将回顾这位孤独的人物，因为在那些支持汪精卫对日合作运动、希望打破一月十六日决定所造成的僵局的日本人中，有许多人都曾受到石原思想的强烈影响。

---

[1]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257 页。本章所论述的各单位间关系的组织示意图表见该书第 200 页及第 347—352 页。

[2] 石原的札记及文章收录在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中。

[3]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 42—43 页。

[4] 见上书第 43 页。

[5]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65—78 页收录了石原及其僚属编写的经济调查报告。此书的第二卷全部是日本战争年代经济统计研究。

[6] 启示录式的战争，石原有时又称为“歼灭性战争”，在关宏治的《满洲危机的序幕》第 366—367 页有所讨论。仁科五郎的《满洲国的建立者石原莞尔和浅原健三》一书对石原作了有价值的分析研究。石原写的原始材料或直接与石原有关的资料，收集在《现代史资料》第八卷第 665—778 页，第九卷第 722—774 页，及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中。也可

见我的著作《通往中日合作之路：汪精卫叛变的背景》一文。
[7] 见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第 202 页。内引有石原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写的文件。
[8] 见上书第 198 页。
[9]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 321 页，其中引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
[10] 见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 273 页。
[11]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120 页引今村均将军的回忆录。（今村均，1886—1968，在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历任要职。一九三一年八月起，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曾参与制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九一八"事变就发生在他担任作战课长期间。一九三六年三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九三八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一九四一年六月，任驻广东军司令官。同年十二月调任驻爪哇军司令官。一九四二年任驻拉布尔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美、澳、荷共议把他判处徒刑。——译者注）另田中隆吉的《日本军方的派系斗争史》第 82 页也谈到这一事件的讽刺性转变。
[12]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中引有战史馆收在的未发表的文件。
[13] 石原和竹田亲王（他当时在陆军进行一项历史研究工作）的谈话记录全文，收录在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第 433—452 页中。
[14] 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姐妹》第 241—244 页有蒋在牯岭讲话的英译文。牯岭会议又常称为庐山会议（因牯岭位于庐山之中）。
[15] 石射猪太郎的《意见书》第 323 页称此为"故作镇静"，原意说"一个被逮捕的人在押送时还哼着小调"，假装满不在乎。这几个字我译成英文时意思是"虚张声势"。
[16]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卷序言第 26—27 页。
[17] 见须田定一的《从事中日问题研究的一生》（载《世界》杂志第 207 期第 266—267 页）。另据防卫厅编的《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 452—453 页载，据说杉山将军在听到要近卫飞赴中国的计划时"皱起眉头"。据石原称，本间雅晴将军和笠原幸雄将军也反对这一计划。
[18]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 272 页。西园寺把石原描绘成为"讨厌的人"，照原文读是"眼中钉"。
[19] 见《今村均将军回忆录》第二卷第 284 页。
[20]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 117—118 页。武藤的同僚佐藤德隆将军说，武藤自认为迫使石原调职应归功于己。另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 365 页。
[21] 见臼井胜美的《资料解说》第 27 页。
[22]见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第 100 页。
[23] 《处理时局纲要》原文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340—341 页。
[24] 同一个星期，陆军参谋本部起草了《处理北主事件纲要》，其中"惩罚"的精神显著地不见了。这个纲要的原件录于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

导史》第一卷第 98—101 页。

[25]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 376 页。

[26]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 37 页。

[27]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97 页。

[28]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 282—283 页，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422 页。

[29]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 33 页所引战史馆的资料。

[30] 见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 249—251 页。

[31] 同上书，第 252 页。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书，第 430 页，引用了石原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的手稿。

[35] 同上书，第 461 页。

[36] 山崎重三郎访问记录。

[37]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引了战史馆收藏的石原未发表的手稿，可能写于一九三七年末或一九三八年初。8

[38] 引自河边虎四郎将军的《对支中央政府政策》（收录于《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49—50 页。

[39] 见大仑公望的《东亚的重建和苏联》一文，（载《现代日本》杂志一九主九年第八期第 132 页）

[40]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目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418—426 页。

[41] 松方吉三郎访问记录。

第四章 一桩事变发展成一场战争：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近卫首相召集他的核心内阁（即外相、陆相及海相）举行会议，一整套全面的侵华战争政策乃宣告出笼。这种会议往往被用来作为政府对参谋本部起草的各种政策作出承诺的手段。十月一日批准上奏天皇的这项政策也不例外。《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把十月一日会议的各项决定都写了进去，而《纲要》本身又是以石原将军手下的战争指导课的参谋人员起草的一份文件为蓝本的。[1]为了扫除在过去四年间恶化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它倡议撤消冀东政权及冀察政权，废除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放弃日本已经在冀东建立了的“特别贸易”关系。它主张只有当华北“在南京政府主权管辖下”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时，华北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华北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是在那几年间许多官方的对华政策声明中经常出现的陈词滥调之一，而且总是与要求把国民政府从华北地区排除出去的那些声明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次战争指导课却用了准确反映石原意图的措词，在自己起草的文件中明确写上：让南京政府的势力留在华北乃是“实现中、日、满提携协调”的最好办法。

在八月八日到九月底这段时期内，当战争指导课草拟的文件在参谋本部及有关省的官员中传阅以征求意见并获得必需的批准签章时，强硬派官员总是想方设法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加到里面去。不过，十月一日的决定表明，在事关重大的华北问题上，政府决定听从八月计划的建议，取消造成中日磨擦的协定和伪政权。这个决定似乎表明，石原和外务省发言人大田一郎的劝告已被作为国策接受了下来，在制订十月一日《纲要》期间，大田一郎曾经提出警告说：要是企图扶植独立于南京政府的政权，或者支持象吴佩孚那样的反动“守旧派”以大力破坏国民党的统治，“日本准会后悔一千年”。[2]

然而，强硬派的意见在十月一日的文件中仍然有所表达。在调整中日外交关系一节中，《纲要》相当笼统地提到中国必须“消除所有妨碍中日经济合作的阻力”，并“和日本合作以防止共产主义”。虽然《纲要》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同中国进行有成果的外交谈判的基础，不过，从对文件内容所作的各种“说明”和“解释”可以清楚看出，核心内阁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它的主张，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路线的条件，从而使此后几个月中的谈判

取得成功的前景大为黯淡了。官方对《纲要》的说明宣称，由于注意到“人民希望取得更大的胜利果实”，日本政府已不再满足于在先前较宽大的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了。说得恰当一点，日本将不得不考虑她在战争中的生命损失和费用开支，要求给予“物质”赔偿。说明中特别要求赔偿日本的“直接损失”。此外，日本还要求在华北取得许多经济特权，其中包括中日合营重要铁路、轮船公司、航空公司以及开发华北地下矿藏的特权。正如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近卫后来把这些企图取得赔偿和特权的要求统统都说成是由于“人民”希望自己在战时所遭受的痛苦能得到补偿。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3]近卫内阁及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这些条件和他们在华北的野心完全相吻合，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积极着手组织国策公司以开发华北经济潜力的做法上看得出来。

国策公司

石原调离中央，使参谋本部对开发华北经济的可能性“突然大大地”关心起来了。它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发表的《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为以后的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而这些政策是要把中国沦陷区的所有重要工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置于日本控制之下。[4]在以后几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日本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国策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现在且先简要地叙述一下日本对华战时经济政策的由来。

在考虑开发华北经济所涉及的问题时，参谋本部的结论是，必须筹集大量私人资本，以便为它所设想的大规模计划提供资金。于是，它建议创立一个巨大的控股公司，负责处理华北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国开发公司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公司，它是南满铁路公司为管理它在华北的业务于一九三五年创办的。参谋本部建议把中国开发公司从南满铁路公司分出来，改组为控股公司，并通过它把日本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人才输送到华北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前京都西本愿寺的住持大谷尊由离开他的僧职，去当近卫内阁的拓务相。他起草了一个补充参谋本部《试行计划》的全面计划。[5]该计划主张建立一个在日本“最高指导机关”帮助下工作的华北政府，把日本顾问派到拟议中的华北政府所属各个“自治”省去，并在华北和华中都建立巨大的国策公司来指导经济开发。大谷设想甚至把历来制订经济发展方案都不予考虑的华南地区也包括了进去，并主张由台湾拓殖公司来监督华南地区的开发。一九三八年，大谷被任命为他所提议在华北创办的公司的总裁。

军方的《试行计划》于十二月九日经四相会议批准。用大臣们的话来说，那就是“必须建立旨在发展华北、上海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的‘国策机关’，以便应付在中国进行的持久战”。[6]具体要搞的开发重点是：运输、交通和金属采矿工业。这样，日本的私人资本要在开发中国经济中大显身手的野心和国家的战略需要就圆满地结合在一起了。参谋本部主张实行这样一个攫取经济特权的纲领，表明它的政策已有明显的变化。不管它是否有意这样做，这都标志着它已向建立傀儡政权方面迈进了一步，因为只有傀儡政权才能为推行这种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由于日本决心要使中国经济对进行战争作出贡献，这种政权具有十足的奴仆性质乃是必然的结果。主张攫取种种经济特权是因为它们对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所非有不可的，可是攫取这些特权则恰恰必然会使战争拖延下去。这个道理似乎并没有使大臣们在十二月九日感到有什么不安，这真是咄咄怪事。

大谷计划提出了八天之后，政府的企划院就发表了题为《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明确政策声明。[7]这个新近成立的企划院只不过是“一个由陆军计划人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其任务是就动员人力和物力的问题向首相提出建议。[8]例如，企划院的秘书佐藤健隆中佐就同时在陆军省军务课里有兼职，而且是一个“倡议撤销承认蒋政权的急先锋”。[9]军方对企划院的控制以及该院染指华北事务等事实表明，外务省在决定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时已有可靠的记述说明外务省对事态的这种发展感到不安。可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有外务省，而陆军省和海军省则都赞成这样做，所以外务省也只能加以默认。”[10]

企划院的政策规定要成立一个国策公司，它后来被命名为“北支经济开发公司”，其任务是“开发、管理和调节（在华北的）有关运输（包括港口和公路）、交通、矿业、制盐和盐的利用等重要工业”。这个公司不仅要控制日本创办的工业，而且还要控制原来已有的企业。至于公司在经营方面产生的一切问题则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或地方治安维持会协商解决。

搞华北经济开发公司只是他们采用的许多办法之一，其目的在于：把西方对华北进行经济渗透的规模缩小，创立一个包括日本、满洲国和华北的日元集团，以及削弱国民政府。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另一行动是分裂中国海关，而长期以来海关一直是南京政府国际信用地位的主要支柱。[11]到了一九三七年，海关虽然仍由英籍总税务司掌管，其工作人员虽然也仍由各种国籍的人来担任，但它已经被纳入了南京政府总的财政体系中，中国的沉重外债是用它的收入来摊提偿还的。到芦沟桥事变前夕，它的有效的行政管理，加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增长，使中国在国外的信用地位空前提高，

这种信用对中国是极端需要的，因为中国所需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要仰赖国外供应。日军占领了诸如天津和上海等港口，使关税收入受到威胁，这就造成了一些棘手的国际问题，使西方和日本的外交官们不断发生争吵。

在天津，日本人对当地的海关税务司施加压力，要求把税款存在日本银行里，只准保留一小部分税款去支付某些国际债务和各种费用。海关税务司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屈服于这个压力，三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国关税收人开始直接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上海的海关当局也受到同样的压力。在正常情况下，上海关的收入占全中国关税收人的一半。不过这一次，英国外交官员在同意日本的要求之前，提出要日方对偿还债务及其他事项所需费用作出保证。结果终于在一九三八年春作出了体现双方妥协的复杂安排：日本答应英国不马上夺取海关行政管理权，而英国则答应日本不把绝大部分的关税收入给南京政府作为回报。这是一项仅对一方有利的

妥协，英国得到的是形式上的好处，而日本则得到实利，但是（由于英国人未能说服美国共同顶住日本的压力而处于无法进行讨价还价的软弱地位，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也是必不可免的。

同时，在华北，新的华北傀儡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任命了一位海关监督，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位海关监督立即把较高的一九三四年税率降低了，以便吸引外国船只到华北去。在新税率下受惠的是日本，因为规定享有较低税率的几种商品中就有茶、丝和纸等产品，而这些都是日本极度萧条的经济亟需推销的输出品。受到损失的是南京政府，它不仅失去了华北各港口的税收收人，而且还失去了由于新的低税率吸引到北方去的这部分贸易的税收。对于北平政府的非法歧视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向日本提出了强硬抗议的照会，但是东京就是拒绝对华北政权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

在芦沟桥事变后的两年里，日本通过国策公司、税率管理、金融和货币策略（这将在下一章加以考察），已经在经济上卡住了中国——尤其是华北——的脖子。等到一九三九年日本同她的主要合作者汪精卫谈判一项协议时，除了日本已经在华北取得的那些既得经济权益外，也就没有什么其他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了。

虽然日本露骨地在中国抢占经济地盘，她也还继续在外交上不断地去探索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在一九三七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想断绝外交关系。八月初，当华北的战火还没有波及上海地区之前，日本大使川越茂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试图为正式的谈判打下基础。东京还指令船津辰一郎参加会谈，此人在华从事过

商业和外交活动并和高颇有私谊。八月九日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上，高警告日本人说，南京的气氛极端反对与日本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他告诉日本人，“稍微软弱一点”就会被认为是卖国。[12]同时西园寺公一也从蒋的小勇于宋子文那里听到大体上相同的意见，他当时是作为近卫的私人使者被派往中国去试探中国人的想法的*。宋说：

> 中国和日本的军人各自对本身都有错误的理解，日本军人对中国陆军仍然抱着他们的老看法。他们认为只要狠狠打击我们一下，我们就会投降，并且还会百依百顺。中国陆军从满洲事变以来就在努力学习。它是经过德国人训练出来的，而且我们已经花了不少钱来使它现代化。中国陆军知道自己是比以前强大了，它坚信这一次决不会再吃败仗。所以说，日本陆军低估了中国陆军，而中国陆军则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就是危险之所在。[13]

中日双方的军队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夸大了敌人的弱点，所以双方都很难克制自己不采取鲁莽的行动。不久事实就证明，宋的这种忧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个叫大山勋的日本海军大尉在上海郊区被杀，据说他是在企图单枪匹马地去袭击重要的虹桥机场时被打死的。总的说来，日本的地方军事当局作出了谨慎的反应，他们表示了道歉，并且取消了晚上的巡逻，以免使紧张局势一触即发。[14]然而，当八月十四日中国飞机袭击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军舰时，宋的预感的正确性就得到了证实。双方都谈论到“忍无可忍的”时间已太长了，因而有必要采取较强硬的办法来对付另一方。战火一旦扩大起来，外交工作就会越来越难进行了，在这以后的两个月里，外交谈判陷入了僵局。

在日本，首先努力谋求打破外交僵局的是参谋本部，当时温和派的石原还在那里工作。九月九日，在石原和多田的坚持催促下，杉山陆相在天皇面前保证陆军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并且“总要想点办法”利用外交渠道去解决战争。当天皇问陆相能否约束得住较低级的军官时，杉山回答说他将对此负责。大约在此同时，参谋本部决定绕过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将军去试探一下德国人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事

---

* 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一书中，有一段引人入胜地叙述了他和宋的会谈，见该书第269—277页。西园寺前往上海去见宋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很快就被中国宪兵逮捕，说他是日本人。经过解释后他还是被释放了。他说他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华侨，只会说英语，而且他说话时可能还带有牛津口音，因为他曾在那里受过教育。西园寺写道，他走过一条长达一两个街区的走廊，还要迂回地通过“十多道门，每个门口都有两个荷枪的警卫把守着，然后才能在宋的豪华巨宅里见到宋。”

实上，德国有两条极为重要的理由希望能在中国维持和平和稳定，即：维护德国在中国日益扩大的贸易；把日本的矛头转向苏联。中国作为接受德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的国家，日本作为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伙伴，因此两国都有理由把德国看作是诚实的中间人。但是德国外交部向日本明确表示，它不想在任何中日谈判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且至少在目前，德国甚至不打算积极调解这次纷争。不过，如果日本需要的话，她可以充当"传信人"。

日本同意了。十一月三日，德国驻南京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就开始执行"传信人"的任务了。这一天，狄克逊把广田外相交给他的停战条款通知柏林。狄克逊报告德国外交部说，他认为广田是真诚希望根据这些条款实现和平的。他还认为，广田的下述说明也是出于诚意的：如果中国拒绝考虑这些条款，日本将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中国被完全打败为止，到那时候，日本将"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15]柏林很快就指示陶德曼把这些条款转达给蒋介石，柏林感到"这些条款似乎是可以作为开始协商的基础而加以接受的"。这位大使在十一月五日转达给委员长的条款是和十月一日《纲要》的内容一致的，只是没有把强硬路线的"解释"（如要求赔款）包括在内。这项最新的日本建议，就象十月一日《纲要》一样，缺乏明确的具体内容：内蒙古要实行自治，但其疆界却未加规定；华北将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但是要从满洲边界直到平津一线以南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它的反日政策，并开始和日本共同反共等等。十一月五日的条款常常被说成是宽大的，因为它们既没有提到赔款和在华北的自治政权，也没有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16]

日本政府已经从许多不同消息来源充分地了解到，任何其他分歧点都有进行协商的余地，惟独诱使国民党政府承认满洲国这一点是办不到的。至多只能希望它对其事实上的存在加以默认。在战争的头一个月，当西园寺对宋子文提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时，宋曾说过，只要日本提出任何这样的要求就会"使战火蔓延开来"。宋说，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党政权保全面子，那么最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在西园寺说到日本可能同意只要在满洲国问题上保持缄默之后，来回答说，他将向委员长请示一下。两天以后，宋答复说，蒋不反对这种默示的、事实上的承认。[17]

当陶德曼于十一月五日把日本的一揽子建议交给蒋时，委员长作出了迅速的、否定的反应。他告诉陶德曼，由于若干理由，他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任何一个中国政府要是同意了这样的要求，它就一定会被"公众舆论的浪潮所冲垮"。他说，只有在日本人准备恢复战前原状的情况下，他才

能开始同他们谈判。他接着说，目前也没有必要去理睬日本的任何建议。因为西方国家即将在布鲁塞尔开会，考虑他们根据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条款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中国应当等一等，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对日本帝国采取某些强硬的惩戒行动，例如经济制裁。[18]有关各国从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在比利时首都开了三个星期的会。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写的那样，他们“忙碌了半天却是一事无成”。[19]美国采取了孤立主义，而英、法和苏联则全神贯注于希特勒的威胁；总之，没有一个同情中国的国家愿意采取可能制止日本或者使日本放宽和平条件的行动。正如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这次会议举行前几天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首先就不应该召集这次会议，因为它只能起证明“各大国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作用，这样反而会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强自己的信心。[20]

正当中国对国际支持所抱的希望在布鲁塞尔遭到破灭的时候，从国内战场传来的消息又加剧了普遍的失望情绪。十一月四日，就是蒋拒绝陶德曼转交的建议的前一天，柳州平助中将的第十军奉命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次登陆没有受到抵抗。第十军部队朝西、北两个方向前进，攻破了上海的防线，到十一月底已推进到离南京不到六十英里的地点。德国继续对中国施加“善意的压力”并要中国对日本十一月五日的建议作出反应。在和中国高级官员的私下交谈中，陶德曼表示他自己深信“解决纷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陶德曼直率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曾经有过各种有利机会来商谈和平，但是那时她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因而拒绝进行和平谈判，终于在凡尔赛被迫接受强加于她的一切条款。”[21]

由于战场形势日益恶化，蒋于十二月二日在处于半撤退状态的首都南京，召集他的高级将领讨论日本的和平建议。绝大多数的与会者第一次才听到大约在一个月前提出的这些条件。汪精卫后来公布了这次会议的经过情况，力图为他自己同日本搞和平活动进行辩护。[22]据他说，在外交部次长徐谟简要地向到会将领报告了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情况以及十一月五日的条件之后，他们问徐谟，日本人是否还坚持要求过诸如限制中国军备之类的其他条件。徐回答说没有。这时蒋便征求唐生智将军的意见。唐是南京卫戍司令，曾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他当时没有表态。委员长接着问白崇禧，他是国民党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以主张大力抗日而闻名的。白崇禧回答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的话，那为什么还非打仗不可呢？”徐次长再次明确告诉与会者，陶德曼没有传达任何其他条件。委员长继续一一征求他的将领们的意见。徐永昌和顾祝同两位将军认为，日本的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而当蒋再次问唐生智的时候，唐表示同意其他人的意见。最后，委员长总结大家的意见，认为日本的条件既没有威胁要灭亡中国，

也没有否认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权。他作出结论说：所以德国的调解是不应当加以拒绝的。

于是，蒋于十二月二日傍晚会见了陶德曼，表示愿意和日本开始对话。由于陶德曼的保证，蒋希望一旦中国和日本都同意开始谈判，希特勒就会要求交战双方实行停战。过了一天，狄克逊大使从东京打电报向德国外交部报告说，日本参谋本部对于战费的增加和战线的扩大极为担心，迫切希望战争得到和平解决。[23]他的报告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参谋本部的高级官员如多田将军和河边将军都感到，如果在南京陷落以前谈判都还没有开始，那就会大大助长强硬路线派的势力。参谋本部的一位军官回忆说，在南京陷落前的那些日子里，认为“日本应当不承认蒋政权的论调甚嚣尘上”。[24]十二月一日，河边将军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反映了参谋本部内反扩张主义派的担忧：

> 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会拚死地同日本作困兽之斗。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摧毁了它，结果都会使中国长期分裂……，即使在长远的将来它也还会是一个消耗帝国力量的无底洞。何况，这还会引起英美对整个远东的觊觎。[25]

然而就在同一天，帝国大本营发表了一份《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这个草案清楚地显示出强硬派占据上风已到了什么程度。它修改了陶德曼不到一个月前向蒋转达的条件，使其内容更加苛刻。现在，除了原先的要求之外，帝国大本营还要求蒋“正式承认满洲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和“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

更加苛刻的是，《建议草案》第四节中增加了一些“担保条款”，要求中国保证认真执行和平条约中的一切义务。在日本．对此感到满意之前，中国必须同意把日军已进人的所有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只有在“地方秩序恢复”后，日本才会从这些地区撤回她的军队。此外，“在华北的重要地区和上海周围”，中国必须接受一项比较永久性的安排：让日本驻扎军队并“控制必要的交通设备”。另一种形式的担保是，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的一些特别经济特权。这个文件并未具体规定有哪些特权，但指出，它们与

---

* 《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全文内容可参阅《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5l—52 页。帝国大本营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一个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最高作战委员会。虽然据说设立这个机构的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便利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配合，但是据原因男爵说，其真正目的是要控制不听话的大陆各日军派遣军司令部。它们在胜利之余，得意忘形，决心要推翻南京政府，并扶植类似满洲国的伪政权。（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 64 页）

关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等有关。最后，中国必须让日本控制那些为了行使和管理此类特权“所需要的机构”。

在整个十一月份，一直是日本人在提出和平建议，而中国人则认为和谈的问题应该慢慢来。与此同时，日本在军事上的地位不断获得改善，以致帝国大本营和日本政府的不少官员都想把十一月初的“宽大”条件加一点码。所以，等到蒋介石终于在十二月二日通知陶德曼准备就十一月所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时，东京的反应是冷冰冰的。当狄克逊于十二月七日把蒋同意谈判的消息转达给外务省时（这时南京战役正在进行），他大吃了一惊，因为广田外相对于日本是否还有可能以一个多月以前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表示怀疑。广田说，过去一个月军事形势已有变化，因此“公众舆论”恐怕不会再满足于先前的条件了，而且“各野战军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了”。[26]广田拒绝把日本的新条件提交给狄克逊，因为所谓最新的条件（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帝国大本营所草拟的那些条件）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在以后两周里，为了制订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召开了一系列内阁会议、核心内阁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此期间，南京陷落，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在北平成立了。

这时，（日本）政府内部也有重大的变动。“歼灭战”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预备役）海军大将末次信政——参加了近卫内阁并担任内相，从而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取得发言权。末次于十二月十四日（南京陷落的次日）首次参加联席会议时就说：“除非把和平条件订得十分强硬，否则我们的人民就会不满，前方士兵同样也会不满。”†末次大将采取暗示军队和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因而可能采取激烈行动的做法，是当时很时兴的一种方式，就是说，问题没有得到争论就通过是不允许的。近卫立刻站起来驳斥末次发言中的这种含意，结果末次被迫承认近卫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的那种幽灵不再作怪，日本领导人中却无可否认地滋长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叫中国丢尽脸才能使政府要求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达成一项清楚说明蒋介石已

---

*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是在一个月前才建立起来的制度。它是政府最高一级文武官员集合在一起开会的方式。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都派有代表参加。

†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 187 页。“公众舆论”的论点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原田男爵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所记的日记中，就有一则关于人民的“希望”的事例。一个著名的实业家警告原田说：鉴于日本在战时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我们不是全力以赴地从（中国）获得赔偿的话，那恐怕就将出现非常不安的局面。”（同上书，第 154—155 页）。河边将军也注意到了“公众的强硬态度”。其实，在他看来，“人民的态度最为强硬，其次才是政府，而陆军参谋本部所持的态度是全国最软弱的。”（见《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 529 页）

经被打败了的和平协议。这就是近卫和他的整个内阁在十二月初，甚至在南京陷落以前就已有的念头。现在，中国已在南京吃了败仗，他们就越发感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了。十二月十四日，即举行联席会议的当天，近卫公开声明.“国民政府已经不成其为一个政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随着国民政府的垮台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权，那么日本就只有考虑采取与之共存共荣的具体措施，别无他法。”[27]

末次海军大将交给近卫一份报告，概括了内阁中许多人的想法。他在那份报告里攻击陆军中主张和平并对中国作让步的人;“老是得由我们这一方来提出和平条件的情况已经是够不象话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还要进一步）表示准备作出让步的话……，那末中国显然就更要利用我们的温和态度了。”这份报告继续说：“现在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政权已陷人了真正的困境，但是我们远不能作出蒋的权力已经完蛋的结论。如果我们稍微放松了作战，蒋政权显然就会恢复元气。不过，只要我们再推它一下，它就会倒台。要是我们极力主张和平……，中国人只会看不起我们，而且会重振他们的士气。”[28]

一个清楚的倾向正在露头。十二月初以后，在参谋本部本身，只有为数不多而且处境孤立的人，还认为以较温和的办法结束战争是可取的。近卫显然也同意多数人的看法，认为持温和态度是“危险”的。他向一个同僚解释道，“对于一个不断取得胜利的国家说来，采取一种极其类似战败国所持的态度并有意识地显示我们宽大无边是不妥当的。”他感到，任何示弱的表现都会被其他国家解释为日本有“处境不稳”的迹象。这就会对日本的工商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尤其会引起“日元暴跌和政府债券的贬值”。[29]

十二月二十二日，广田外相终于把德国大使召到外务省来，将日本政府对蒋介石十二月三日信件的答复交给他。正如广田已经在十二月十日所暗示的那样，日本人现在要求蒋接受比十一月转达给他的条款更为苛刻的新条款。[30]根据未次海军大将的建议，日本故意使新建议的内容含糊不清。其要点如下：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这个要求在先前提出的条款中是没有的；必须同意在华北和内蒙古建立一个（范围未定的）非军事区；必须偿付“适当的赔款”，这是又一项新要求；并且必须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以实现日华满三国的共荣。狄克逊要求对此点加以澄清，但广田只说，他所设想的华北“特殊政治机构”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不一定是隶属于蒋介石政府之下的”。[31]

狄克逊对条款措词之含糊、内容之苛刻感到十分不安。在此后几天里，他又多次要求广田作详细说明。他说，如果不加以说明，那就很难设想中

国人会接受这些条款。同时他很不高兴地向柏林发出电报说，他确信日本领导人并不期望对方接受新的条款。狄克逊说，确实日本人希望对方对此加以一一拒绝，以便他们有借口来继续进行其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广田不但没有说明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条款，反而把这些条款变成一项最后通牒：中国必须在年底左右表示准备接受“所有这些”条款，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32]不仅和平条款的内容含糊，甚至连威胁的措词也很不明确。

据河边虎四郎大佐说，多田将军曾一再推迟进攻南京的决定。他曾经争辩说，占领敌人的“京城”非但不能象松井将军和其他人所保证的那样会加速蒋的投降，反而会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33]然而有人向多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批准这次进攻。等到他自己的作战课课长河边大佐也倒向了那些敦促他改变主意的人们时，他终于让步了，并在十二月一日下令向南京进军。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一点可以算是胜利的东西。他在发布进军令时加列了一个条件：攻占南京一事不得“妨碍将来同南京政府达成和议”。[34]

但是，迹象日益证明，文职和军方的领导人都决心要摧毁国民政府而不想和它打交道，多田将军和他手下反对这种政策的参谋人员也变得越来越坚决了。这个反对力量的中心是作战部以堀场一雄中佐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堀场后来成为本书所涉及史实的最重要的编年记录者之一。他同他的上司河边一样，也是石原莞尔的门生。堀场是一个研究苏联及其经济计划的专家，在驻苏联和驻波兰的武官处工作多年。他回到日本后，和石原一起制订了发展日本和满洲工业的五年计划。[35]

政府决定把对中国的要求加以升级一事受到堀场所在单位的极力反对。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扩张主义派）激怒了我。们，我们下定决心要顶住他们，我们要自告奋勇把我们的国家从险境中拯救出来。”[36]堀场坚信：是近卫在极力推行同国民党政府决裂的强硬政策，以便把这一整套坚决的政策提交新的一届国会，这一点使他特别感到忿怒。总之，他深信，近卫宁可危及国家的命运，而不愿作出政治上较难推行的决定。堀场和他的顶头上司河边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河边却懦怯地向上级屈服了。他说：“上级已经作了决定，现在除了服从命令，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堀场发现河边“在严酷的环境中缺乏反抗和斗争的勇气”。[37]他说：这也是意想得到的事。

堀场把河边的意见传达给了战争指导课的几个同事听，他发现他们仍然有决心要干到底。他们决定要堀场去见陆军次官梅津将军，设法使他感

到极其有必要回到原来提出的和平建议，因为那个建议已被蒋介石作为协商的基础而接受了下来。高岛少佐也同样要去见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堀场的使命毫无结果，但是多田将军则颇受感动，这可能是由于他的下属进行了强烈的呼吁，也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信念。他决定去作最后一次惊人的努力，以防止这次外交尝试遭到破坏。他将此事禀奏天皇裁决。

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

上一次利用御前会议来决定国策还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多日显然认为，如果迫使内阁和军方到天皇面前讨论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的话，他们就非得提出一项较为宽大的对华政策不可。其实天皇对和平协商的进展是很关心的，看来多田可能知道这一点。多田希望一项比较有克制的政策会获得天皇的批准，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国策。正如近卫说的，"（多田）希望能够制止最近由松井和寺内等人提出的极端强硬的意见，用'已经御前会议决定'这样一句话去封住他们的嘴。"[38]

海军省和外务省都不想召开这样的会议。近卫显然也不想这样做，这可以从他对多田的评价判断出来："多田是一个莫明其妙的人。我有时都在奇怪，他怎么竟会走得那么远。"[39]不过，近卫希望避免召开御前会议的动机并不单单是为了推行他自己对支那事变的主张。作为高贵的藤原家族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后裔（在日本历史的初期，日本的天皇*和皇后就是从藤原家族选出来的），近卫一直力图不去惊动天皇，免得他费心去调解派别争论的问题。在举行关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御前会议以前，天皇几乎始终没有积极地参加过决策。†不过，要是天皇偶尔皱一下眉头，或者向内阁提出一个为难的问题，那就会引起巨大的惶恐并促使内阁重新考虑那些看来已使天皇感到不快的问题。

在参谋本部的坚决要求下，近卫同意召开御前会议。但他首先想出一个办法，保证会议的召开不至于有损天皇至高无上的尊严，他说服宫廷官员向天皇奏明，会上将要提出的政策早已由政府确定下来了，因此他也就不必再查问了。[40]近卫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要保持天皇的尊严，而且还要保证参谋本部的政策得不到天皇的批准。相反地，天皇的缄默可以被所有与会者看做是赞同政府的政策。近卫的手腕以及他能够这样地操纵御前会

---

* 原文如此。——译者注。

† 大卫·伯盖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纽约，一九七一年）一书是在本书付型后出版的，因此我无法对他书中的主要新论点加以评价。这些论点是以这样的副标题加以概括的："裕仁天皇如何将日本引向对西方作战"。

议颇能说明：军人虽有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显然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有用。近卫成功地操纵决策过程这一点，把他自己（在战后回忆录中所说）的话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他说，他曾经努力阻止强硬派将领们把日本投进战争的深渊，可是劳而无功。克罗利写道："近卫把对华战争的责任推到军国主义集团身上的做法，把与他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们都弄糊涂了。他这样做也未免太妄自菲薄了，譬如说，他置自己灵巧的政治领导于何地？"[41]

一月十一日下午两点钟，日本的十一位最高级文武官员聚集在皇宫的东厅，围着两张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天皇坐在桌首的高坛上。坐得最靠近天皇的是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两位亲王。陆军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和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将军坐在末席，离天皇最远。广田外相宣读了《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奏请天皇批准，而这项政策是在当天早晨才由内阁通过的。[42]接着闲院宫大将就概括地提出了参谋本部被磨去了棱角的保留意见，最后表示赞同内阁的决定。日本人遇事一向力求取得一致意见的这一倾向占了上风，也就顾不上所争论的问题究竟有多么紧要了。在其一他与会者发表了类似的温和保留意见后，五十五分钟的会议便告结束。天皇一句话没说便退席了。由此产生的《根本方针》，不仅肯定了扩张主义派所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而且还要对中国发出另一道最后通碟。上述苛刻的要求包括赔款以及建立"一个在华北享有广泛权力的……新政治机构"。

两天以后，核心内阁在一月十三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把最后通牒的时限定为七十二小时。如果国民党政权在这个限期内不接受《根本方针》的条件，日本就要"消灭"它或者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中去。这个在日本帮助下组成的新政府将是这样的一个政府："日本可以与之协商以调整彼此的关系，并将和它合作以实现中国的新生。"事实上，内阁已经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确立了这项政策，而且比一月十一日的文件更为明确地宣称：新近成立的临时政府"成为新生的中国的中心力量之前，将予以扩大和加强"。[43]

一月十五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根本方针》的内容虽然严厉，但同三周以前委托狄克逊转达给中国的四个含糊的条件相比，至少它的条款还较明确。然而广田外相并没有按照御前会议的指示转达这些条款，随着最后通谋的限期即将届满，他对中

国外交部长要他作补充说明的请求置若罔闻。没有什么比广田故意保持缄默更能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和蒋破裂了。其实，在一月十六日以前，广田连以七十二小时为限期的最后通牒都没有让狄克逊知道，可是到了一月十六日限期已经届满。*在一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整天争论很激烈的联席会议上，多田就长期战争意味着有灾难性的后果提出了警告，并且再次要求澄清所提条件的内容以及延长最后通碟的期限。但是海相米内光政的话使他怒而不语，米内声称："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那末不是参谋本部辞职，便是政府辞职。"[44]大家心里都明白，米内究竟是在要求哪一方辞职。

从闲院宫和近卫的交谈中，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不肯一让步的态度。亲王问广田，如果在"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策宣布后，蒋说他想要和平，那怎么办，广田一下子无言以对，近卫便接着回答说："绝对不（和蒋）打交道。"[45]

一月十五日的联席会议对多田来说，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唯一支持他的是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杉山陆相把中国没有答复日本的要求这一点看成是有意拖延时间，因而站在政府一边要求同蒋破裂。正如堀场所评论的那样，"这次会议说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之间存在着矛盾，其程度并不下于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之间的矛盾。"[46]

在下午近傍晚的休会时间里，疲惫不堪的多田回到参谋本部，把政府坚决要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情况告知他的下属：近卫、杉山、广田和其他人都对中国人"无诚意"表示不耐烦，都说再谈判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日本应该鲜明地采取坚定的立场。在陆军参谋本部里，有一个集团（以堀场中佐为核心）告诫多田不要屈服于那些意见。他们极力劝说多田，如果一切其他办法都失败了，就行使参谋本部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帷幄上奏）。这样可以使天皇知道军方领导人对于政府的计划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感到，如果天皇充分理解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所包含的灾难性后果，他就不会饶过这项预定于次日宣布的严厉政策。他们打了电话给皇宫的侍从武官长，问他是否可以把体弱的闲院宫大将安排在近卫首相之前去谒见天皇。对方回答说：天皇的日程表上还有几分钟空隙时间，刚刚够在首相之前把闲院宫大将去谒见天皇。

但同时另一帮人却告诫多田说，要是继续反对政府的意旨并极力要求天皇干预的话，那就只能导致政府垮台。最后，多田同意了这些人的意见、他不愿意在战时向敌人暴露日本领导人之间存在深刻裂痕，决定不行使参

---

* 但是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参赞于一月十二日接到外务省官员的通知说，如果到一月十五日还没有接到中国的答复，日本就要"保留她的行动自由"。（见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第 141 页）

谋本部“帷幄上奏”的特权。这就再一次表明，这种被人们大事渲染但却很少行使的特权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因此多田在傍晚就回到联席会议的会场去宣布，陆军参谋本部勉强接受了政府停止同中国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第二天中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就发表了。广田立即通知德国大使，日本政府感谢德国的斡旋，但是现在已无此必要了。[47]

近卫在一月十六日声明中所选用的词汇，反映了他是有意违背五天前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使用的语言。御前会议的决议中本来有这样一句说明：如果中国拒绝日本的条件，“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那事变的伙伴”。[48]在近卫于十六日所作的公开声明中，这句话变得更为强硬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49]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更动，无论在语调和内容上都更加好战。[50]而且，甚至连近卫的朋友也对使用“对手”这个词提出意见，因为它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对立面，但在军事上使用它时则往往带有敌意和侮辱性的味道。据近卫的顾问犬养健说：这个令人反感的字是由外务省起草文件的官员加进去的；由于近卫使用了这个粗暴、不准确和非法律性质的词，这个起草人曾“备受责难”。近卫的传记作者也认为，这次演说很可能是由外务省正式起草的；但近卫本人却坚持说，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他才把话说得那么强硬，而派遣军则受到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那些对日合作者的压力。[51]

不管措词作了耸人听闻的转变的原因何在，反正在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文件中竟会使用一个如此随随便便的词，这就立即会使人产生猜疑。日本是不是要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呢，格鲁大使在一月十七日早晨和广田晤谈后，向华盛顿报告说，“这个声明并不算是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具体行动，它只不过意味着停止和汉口打交道而已，其理由是，在汉口的政府已不再代表中国了。外相说，日本政府要等待事态的发展，不会立即承认任

---

* 根据有关这一事件的另一说法，闲院官亲王的确行使过参谋本部的特权。我不便透露对我讲过这些话的人的名字，不过此人所了解的情况却是非常可靠的。据他说，别人为闲院宫大将准备了他对天皇的奏词的提纲，并且用大字（以便于年迈的亲王阅读）为他写了好几页备忘录，但是闲院宫在上奏天皇时不知怎么搞的，漏读了两三页备忘录。参谋本部这个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意见使天皇听不懂，所以未受重视。接着天皇便接见近卫首相，同意了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决定。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就我所知）它还不曾见于书报：第一，出于对闲院宫亲王的尊敬；第二，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参谋本部就此事行使觐见天皇的权利是没有什么宪法上的根据的。

† 堀场说：一月十五日的会议休会过两次。在第一次（中午）休会时，多田告诉堀场，他决心不让参谋本部同意“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但是等到第二次休会时，陆军省的中岛铁藏中将已经说服多田作让步并接受政府的决定。堀场写道：“他们强调说，多田如果不赞同，那就意味着政府的垮台，这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0页）

何其他政权。不论实际上将承认哪一个政府，华北的政权都将构成该政府的基本力量”。[52]

在一月十八日发布的官方消息中，政府对这个措词作了说明。政府的“补充声明”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含义比不承认那个政府更为强硬”。[53]广田在回答国会的质询时，更进一步宣称，这个声明“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54]于是，谋求和平的正式外交活动就到此为止了。在过去未经宣战的六个月中，一直留在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终于被召回国。日本也着手去进行建立一个使她能够“与之更加充分地合作”的政府。

历史学家秦郁彦在谈到日本领导人未能制订一项解决支那事变的有效政策时写道，这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明显地把日本的苦处都概括出来了”。[55]主张实行温和的对华政策、谋求和平解决办法的任务竟只由这样少的一些人担当起来，他们基本上都集中在参谋本部；而其他领导公众的广大官员竟会对在大陆进行长期战争所包含的灾难性后果如此漠不关心，对日军在中国激起的全民抗战怒潮如此茫然无知。回想起来，这一切似乎都是难以置信的。

参谋本部中属于反扩张主义派的少数人发现，他们一方面要应付军人中那些认为中国不堪“一击”的傲慢自大、盲目乐观分子，另一方面又要应付近卫内阁。正如历史学家田井胜美所说的，这个内阁“从全面战争爆发后（即自从八月间战争扩大到上海以后），便一直在侈谈军事上的成就以及从中可以取得多少利益的问题”。[56]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内阁就已对以下各个发展阶段作出了规划：即，调解终将失败；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根据内阁的决定将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建立起各个傀儡政权；内阁将以“‘随着战线的扩大，人民希望从战争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为理由，决定从中国攫取重要特权”。[57]

近卫在几个月之后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感到后悔，因为不久就可看出，石原—堀场关于战争要拖下去并成为消耗国家资源的无底洞这一预言即将成为事实。据说，近卫还没有过半年就说：那次演说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三八年还没有结束，近卫就采取了废除一月十六日声明的步骤，并且设法寻找通往重庆的桥梁。可是外交桥梁已经被

---

* 在镜田泽一郎的《松籁政谈》第 270 页上涉及宇垣的部分，记载了宇垣曾把这句话告诉镰田。关于近卫自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示不满的其他证据，可参看吉田东雄的《两国之间的桥梁》第 202—205 页。书中论及近卫打算派吉田带一封对声明表示遗憾的信去见蒋；也可参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文件第 2104 号，第 1 页。在这里面，近卫写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声明丝毫没有取得有利的结果，这一事实用不着任何人向我指出，我心里就十分明白了，我自己承认，那完全是一个错误。”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摧毁了。正如近卫后来发现的那样，事实证明，将桥梁毁掉要比架桥容易得多。

尽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不过它同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之间事态发展的趋势还是完全不矛盾的。我们要是只顾批评几个用得不妥的字眼，而忽略了比这个重大得多的政策问题，那就错了，因为正是这些政策才引导人们去使用那些字眼的。贻害近卫和他的国家的并不是错用了几个字，而是日本举国上下犯了视而不见的致命错误。日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石原将军主张中明智之处：即，同日本作战的敌人极为坚强，远非以前的腐败军阀所能比拟。石原曾警告说，中国已经觉醒了，她是决不会投降的，日本非但不因这一惊人的警告而有所觉悟，反而继续沉醉于认为这个敌人乃是一个软弱而孤立的军阀政权的梦幻之中，满以为只消迅速地对它加以致命的一击，它就一定会垮台。

---

[1]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答辩文件》第 2507 号有《纲要》的英译本。我的译文稍偏于意译，是根据日本外务省绝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 370—372 页收录的日文本译的。

[2]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114—115 页）引有日本外务省本公布的档案。大田当时是外务省东亚局中国课课长。

[3] 同上书，第 119 页。

[4] 《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见于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120 页。

[5] 大谷的计划写进一份呈交广田外相的备忘录内，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120 页引有这个计划。

[6] 同上书，第 120 页。

[7] 上书第 120—121 页摘录了《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要点。这个文件在十二月十六日发表。

[8] 见耶尔·马克森的《谁控制着日本的对外政策》第 124 页。

[9]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116 页。

[10] 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 119 页收录了原田本人与企划院次官青木一男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电话记录。

[11] 用英语记述这个主题的较好的作品，有尼古拉斯·克利福德、多萝西·布格、亚瑟·N·杨等人的著作。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116 页。

[13]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 274 页。

[14]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 342—345 页。

[15] 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 778—779 页。关于陶德曼谈话的比

较详细的讨论，可见于欧内斯特·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詹姆士·刘的《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停》和F·C·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53—70页。我用了琼斯从德国档案中引用的大多数引文。

[16] 该条款的本文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5—126页。在十一月五日的条款中，虽然未提到华北的自治政权，但也表明了日本“希望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必需是对日本友好的人士”。

[17]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75—276页。

[18] 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80—781页。

[19] 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16页。

[20] 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的1页引了格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的未发表的日记。

[21]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27期第 62页）。

[22] 同上文，第60—67页。

[23] 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策》第一卷第790页。

[24]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15页。

[25] 引自河边将军的《对支那中央政府政策》（载《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9—50页）。

[26] 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99页。

[27]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9页引《国际拾遗》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第三版。

[28]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4—105页。这份文件是角田顺在近卫文件中发现的，虽未署名，但角田从其内容判断，肯定其作者是末次将军。（访问角田记录）。

[29]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10页。

[30] 该条款载《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6页。F·C·琼斯的《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5页从德文译本引的该条款，内容稍有出人。

[31]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7页。

[32] 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802—803页。

[33] 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437页）。

[34] 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8页引外务省档案。

[35] 关于堀场一雄的这点介绍是从稻场正夫与原四郎为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写的序言（第一卷第 3—7 页）中摘录的。
[36] 同上书，第 117 页。
[37] 同上书，第 116—118 页。
[38]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 203 页。
[39] 同上。
[40]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3090 号。
[41]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 393 页。
[42] 《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在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123 页中提到。
[43] 同上书，第 136 页。也见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 302 页。
[44]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468 页。
[45] 同上。
[46] 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130 页。
[47] 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 69 页。
[48] "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那事变的伙伴"一语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123 页。
[49]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一月十六日声明收录于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 386 页。《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刊登了英译本。
[50]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40 页)。
[51] 见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41 页。又见矢部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469 页。矢部同意关于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的说法，但不同意关于陆军军官是代表傀儡王克敏的见解。他写道，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理论根据"而已，他们早就横下一条心，日本必定要同蒋破裂。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措词问题，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 228 页。
[5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 438 页。
[53] 见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 387 页。
[54]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二卷第 183 页。
[55]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 41 页。
[56] 见臼井胜美的《资料解说》(《现代史资料》第九卷序言第 29 页)。
[57] 同上。

第五章 在华北的合作

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逃离重庆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中间经过了将近十六个月。

拖得这么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也是汪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最恼火的问题之一）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外几个由日本扶植的政府和半政府性的组织。随着这些地方性和地区性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他们取得了经过审慎考虑并加以扩大了的领土和财政管辖权，各个政府之间还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和其他合作机构，以便就它们有共同利益的事宜进行联系并采取联合行动，而且这类机构对他们拥有的新权力也是抓得很紧很紧的。随着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西撤而建立起来的。新官僚机构不止一个，而是有半打之多。从地方小吏直到部长一级的大官都在开始巩固他们自己的王国。傀儡政府与沿海大城市的工业界和金融界之间打开了新的渠道，以便于后者进行由来已久的贿赂行动，借以换取官厅的优待。其他渠道也开辟了（而且显然是扩大了），让新政权把从管理上海的赌场直到热河的罂粟种植田这样一些地下社会的政府传统职能接管过来。此外，每个政权和它在大陆的日本驻屯军中的后台之间也开辟了一些渠道。

从各傀儡政权的角度看来，不论这些联系是组织上的或者是个人之间的，都同它们本身的生死存亡攸关。没有帝国陆军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它们根本就建立不起来，也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不过这些傀儡政权对日本军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不仅能够维持某些地方的秩序，从而使日本能抽出一些驻军去完成别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向日本提供了她所需要的驯服伙伴，使东京的计划官员和大陆日军各派遣军司令部十分重视的经济规划得以实现。最后，这些傀儡政权是日本的国策即以“王道”为基础建立一些机构的大好时机的具体体现。光靠这些机构就足以对付国民党及其有害的三民主义，使中国免遭赤化，并为融洽地——但又是驯服地——与日本结盟提供思想基础。

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〇年间，为了解散所有这些新的官僚机构及堵塞其联系渠道，汪精卫使尽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浑身解数并利用他在国内享有的声望，来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铺平道路。经过了举行一连串“旨在调整局面”而且几乎没完没了的会议之后，各个政权才作出了让步。但是，汪政权最后也不得不为代表那些他所看不起的傀儡政权的许多讨厌的陌生政治伙伴留出一定的席位和地盘。日本的各军政机关也经过了好几个

月的勾心斗角之后才解决了它们之间的分歧，而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利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致不能不引起外交人员和新闻观察家的注意。一位老资格的《纽约时报》记者同在华日本军人交游甚广，他在一九三九年曾报道了一则有人阴谋要暗杀汪精卫的消息。经过追查消息来源后，发现一个参加竞争的傀儡政权的日籍最高顾问与此事有牵连。[1]大陆各日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是“很糟糕的”，尽管东京不断训斥它们，但它们却仍然是我行我素。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批自治政权，而且决心要把这些政权紧紧地拴在他们各自的司令部之下。在大陆的各司令部又享有广泛的独立自主权，这就使得上述的一切更加容易做到。直到一九三九年十月建立了一个有权管辖所有大陆日军的总司令部后，大陆各日军部队才在实质上受到了一些约束。与此同时，他们也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扶植和豢养一些傀儡政权。在我们转入讨论稍后成立的汪政府之前，必须对这些傀儡政权作相当详细的专门研究。

早在芦沟桥事变的次日，帝国陆军就曾宣称它有意让南京政府来管理华北。它在七月八日的政策声明中说：陆军“将等待”华北“当地居民自发地建立起政权机关来”。[2]可是，这时战线扩展到整个华北，中国军队又从许多城市和省份撤走，各地的行政机关也就解体了。为了填补政治真空，特别是为了建立能够帮助维持公共秩序的地方军事管制机构，帝国陆军在占领华北时就扶植起来了一批地方治安维持会。头一个维持会未经大吹大擂就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在北平成立，八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一个。

负责控制这些维持会的是华北派遣军的各特务部。*这些机关名义上附属于各日军司令部，负责管理民政事务和军队的其他政治活动，但日军指挥官们却极少过问它们的活动。中国人怀疑它们干涉中国内政，而它们实际上也干涉了，所以它们在中国人中的名声很臭。随着战线扩及华北全境，特务部建立了好几十个治安维持会。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后，各特务部统归命中注定要成为华北头号“傀儡操纵人”的喜多诚一少将指挥。据说喜多将军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曾向新闻界评论过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他的政治哲学在这次评论中概括得淋漓尽致。据《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他曾说过，由于中国人民“讨厌繁琐的规章制度”，所以将来在实际上也不会搞什么政府规章。喜多认为；“中国人很古怪”，他们既不需要君主形式的政府也不需要共和形式的政府。他的结论是：“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3]

---

* 特务部偶尔也被称为特务机关。虽然日本的资料有时对这两个名称加以区别，但我在本书中还是把这些机构一律称之为特务部。

虽然治安维持会一开始就明显地具有临时性质，但是在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十二月这近半年的期间，它们在华北还算是最近似政府的组织了。它们比后来的任何傀儡政府都更加彻底地受日本占领当局的控制。它们心甘情愿地按照日本人所制订的有深远影响的纲领办事。例如，它们迫不及待地改革了教育制度，以便采用经日本人批准、用以灌输尊孔和反对国民党的思想为主的教科书。[4]日本人给了维持会以巨额贷款作为对日合作的奖赏，而且还让治安维持会——至少是天津的那个维持会——染指过去专供中国中央政府使用的重要财源。[5]

维持会的头目们都是一些在华北政界和军界混迹几十年的典型的老官僚；许多人远在清朝就当过官。北平治安维持会主席是江朝宗将军。从当时《时代》杂志所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完全是西方人印象中的一个道貌岸然的清朝高级官员的化身。[6]早在二十多年前由于不明智地支持了军阀张勋的复辟企图失败以后，他便退出宦途了。这些头目中有不少人在配合日本攫夺大陆方面有过多年的经验，从亲日的安福系的全盛时期一直到多年后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都参加过。他们这些人不辜众望，大多数人的粉墨登场都有其不明不白而且肮脏透顶的背景。难怪报界纷纷推测说，日本人只不过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人，一旦找到了较合适的人选，就会把他们踢开的。

治安维持会成立得如此之快，而且又具有如此明显的过渡性质，以致日本国内的决策机关连讨论都没有怎么讨论过它们的问题。相反，日本决策机关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是否赞成把这许多维持会合并成为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机构这一问题上。

委派喜多将军主管华北所有特务部的工作、负责“掌管并指导各中国机构的有关政务事宜”的命令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发表的。[7]但是该命令并没有说明上述各个机构指的是哪些机构。不过，两天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给了喜多一项指令。这项与其说是明确还不如说是空洞的指令倒提供了一条线索：各个中国机构（大概指的就是那些治安维持会）到时候“就会象母亲足月分娩一样，产生出一个未来的华北政府来”。[8]这项指令大约是在察哈尔战役前后发出的，当时石原莞尔正在东京大力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华北战役中的一个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将军于九月十九日写了一封决不会使石原感到高兴的信。板垣在信中扬言：不管石原怎样反对，“只要一旦我们拿下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我们就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府。”[9]

正如板垣信中所指出的，建立华北新政权的主动权显然操在大陆各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手中。喜多将军在十月间向陆军省的军事课报告了他对

华北局势的看法；从喜多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在向上级请示或征求意见，他只不过是让东京知道一下华北派遣军可能在政治方面搞点名堂出来。“我们希望在华北建立一个既对日本和满洲国有利又可用以防共的地区。我们并没有领土野心，不过如果这种局势再拖延下去，那就很难说我们会错过机会去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或比满洲国更满洲国的东西。”[10]喜多解释说:“我们并不扦算建立一个象冀察政务委员会那种委员会式的政权机构。”他心目中想到的是，一个在政治实权和地理范围上都要大得多的政权。先成立各省的省政府，然后，“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中华民国联省政府’——我们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当使用这个名称。”喜多说，尚待解决的是人选的问题。喜多写道：某位可胜任新政府首脑的“强有力的人选”尚持“谨慎态度”，“不过，要是我们请他出来上任，他或许肯干的。”[11]

到了十月底，成立一个华北新政权的计划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喜多在十月二十八日签署的《关于建立华北政府的研究》的文件中主张：华北政权不应只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而应成为一个“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他借用了宋朝儒家朱熹的语言解释说：一个纯属地方性或者区域性的政权在“大义名分”上（即名称与职责之间）有不足之处，因而也就无法吸引头一流的中国人士出来同日本合作。而且，搞一个区域性的政权“在思想上讲是一种倒退，对付不了南京政府的统一策略。”[12]

陆军省于十月三十日对喜多的看法表示支持。军务课建议“扩大并加强在华北的政权，以期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中央政府。”军务课预见到：随着华北秩序的恢复、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全中国都会复苏起来。它的计划要求，向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这一目标逐步前进：首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和察哈尔建立起“自主的”省级政权，然后把这几个省组成一个联合体，最后再建立一个把随后在华中和华南组成的类似联合体都联系在一起的机构。[13]陆军参谋本部的有影响的支那课也赞成建立华北新政权的计划，而且在十一月十八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组成一个亲日反共的“名符其实的中国中央政府。”[14]

陆军的其他单位也支持华北派遣军的华北方案，但唯有一项重要的保留条件：其他几个日本派遣军司令部都坚决反对使拟议中的北平政权成为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关东军，因为它已经在内蒙古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府，决不希望看到它的主要由汉族居住的广大地盘被同它竞争的政权或日军派遣军司令部接管过去。何况关东军长期以来一贯力主中国应在政治上保持分裂状态。该军的将领认为：侈谈给中国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央政府”的论调未免太激进了。关东军的东条将军的一份研究报告的要点指出：“我们不应该急急忙忙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

以免不必要地得罪各种地方政权”；他建议成立一个松散的、“仅仅具有政府基本象征”的联省政府。[15]

华中派遣军正想建立它自己的傀儡政权，因此也反对“一开始”就决定把华北“当作政治中心”。[16]其他日军派遣军司令部的反对意见虽不足以阻拦华北派遣军推行它在北平建立政府的计划，但是它们的意见无疑影响了日本政府作出不在外交上承认该政府并对其权力范围加以限制的决定。

考虑到日本决定在十二月初进攻南京，喜多将军迅速采取行动，使他的华北政权能够赶在华中派遣军在“解放了的南京”建立政权之前就行使职权。不过由于当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来担任这个新政权的头目，他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并把选择国家元首的事推迟一下。几个月以来，报上一直在传喜多想劝曹锟出来担任这个职位的消息，而这些谣传是颇有根据的。曹是直系军阀，曾在一九二三年被受贿的国会选为中国总统，后来又被赶下台。要是喜多能够劝说曹出山，把他原来未当满的总统任期当满，那末这个傀儡政权至少就会有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当头头，好赖总算有点名气。但是，曹对同日本合作要价太高。吴佩孚也差不多。尤其是日本老牌大陆阴谋家土肥原将军对吴下的功夫恐怕只多不少。

所以，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居仁堂（原来是盖给袁世凯当官邸的地方）举行就职典礼时，它的各部的总长和高级官员名单之中竟有一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值得一提的人物在内。最高级的官员，行政院院长*王克敏是上海的银行家，他在临时政府成立的一星期前还在香港同喜多的代表就新政权的职权范围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呢。王不愿意放弃他优裕的隐退生活来换取在国民党政府同日本政府的谈判中充当小卒子的角色。因此他要求日本保证将同国民党决裂，而且今后只同新政府打交道，并取得了这项保证。[17]

王克敏是被挑选为临时政府成员中最典型的人物。早在清朝他就开始了他的官僚生涯。民国初年他转而经营中法工业银行，之后又重返政界，并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间，在好几届短命的北洋军阀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同他在临时政府中的许多同僚一样，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的十年到十五年之间的军阀全盛时代达到了顶峰的。除了理财的才干之外，王以拥有妖艳的小老婆而闻名。

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多年心腹陶希圣（当王在北京当官的时候，陶还在那里念书）回忆说：当年听京戏时，许多观众的注意力（至少是大学生们的注意力）常常不集中在舞台上，而是集中在包厢里的王的小老婆的容貌

* 原文为 Executive Yüan，按当时伪组织的名称为“行政委员会”。此处应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译者注

和满身的珠光宝气上。[18]

王在二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中押宝押输了，因而在那以后的年代无法在国民党政府里当上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王克敏是委员之一。其实，包括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和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在内的许多头面人物都当过该委员会的委员而有同日本人打交道的实际经验。作为激烈反国民党的日本代言人来说，所有这些人都算是上乘人选，而这种反国民党的姿态则是临时政府的标志。直到一九四〇年临时政府正式结束时为止，这些人都一直担任该政府的领导人，之后直到一九四五年，所有这些人都还是日本仍在华北执行政策的工具。王克敏是在华的外国报刊的揶揄对象。它们都以报道诸如他捐款慰劳日本士兵以及被他自己家庭成员公开责备而出丑之类的事来取乐。[19]

临时政府并没有把自己装扮成是受民众委托或由选举产生的，它甚至连日后有无实行选举、代议制度或其他民众监督的方法的可能性都没有暗示过。它进行统治的根据仅仅是一纸由它自己任命的委员会所草拟的所谓"宪法"。在政府结构上，它同国民党把权力分属行政、立法、司法和监察等四个院*的做法很相似，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名列第五的考试院的权力则交给了教育部掌管。在该政府成立后不久，监察院也被撤销了。

在实践上，临时政府也很象国民党政权：由于人员的相互兼职以及行政院拥有的权力很大，临时政府各部门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分工。例如，行政院决定一切立法，只是事后把它的决定提交立法院†（而立法院的委员竟是由行政院任命的！）去批准一下而已。日本顾问们让临时政府享有的一切权力，显然都集中在行政院。行政院之下设五个部，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五个部中竟没有一个主管军事、外交的部。事实上该政权也没有在取得国际承认问题上作出认真的努力，就连日本自己也从未表示过要承认它。一九三八年临时政府任命过几个驻日"代表"，但他们只不过是"表示亲善的使者"而已。这个政权从来也没有同任何国家签订过什么条约或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协定。有必要进行谈判时，则同日本顾问们谈，而同华北派遣军司令官谈就算是最高一级的谈判了。

根据核心内阁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规定，临时政府的管辖区包括河北、山东和山西等三个省的全部以及第四个省察哈尔的一部分。[20]日本占领河南后，河南省也要置于新政权的管辖之下。但是正当华北派遣军从南面进攻山西省长城以南的。地区时，关东军则从北面侵入山西，并且已经先下

---

* 按当时伪政权的组织是："行政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三个部门。——译者注

† 可能是指所谓的"议政委员会"。——译者注

手为它的内蒙古傀儡政权夺得了整个晋北地区。这个地区以大同为中心，包括把内蒙古地区和北平连接起来的主要交通线平绥铁路。

此外，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来一贯自行其是地搞自治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虽已公开宣布取消自治并归属北平政权，但仍以唐山为中心盘踞一方。直至该自治政府的高级官员于一九三八年在新政权中获得重要职位之后，它才逐步撤销。[21]临时政府管辖区之所以很小的最主要原因是：它只能在日本陆军控制下的地方行使权力，也就是说，它的管辖区域主要限于几个大城市和几条铁路线。所以冀东道（临时政府恢复了清朝“道”一级政权的名称）的道尹在一九三九年初报告说，他只能控制所属二十二个县中的七个。[22]这个新的国家远非日本陆军梦寐以求的那个华北国。

临时政府成立的宣言是由汤尔和宣读的。汤是留学日本的医生，内定为教育部总长。这个宣言有两个方面很突出：首先是内容清楚地显示了新政府对国民党极端蔑视，其次是文体证明其作者为十足的儒生。该宣言*强调说：“国民党窃据政柄”，以致“灾害洊臻”；该党“欺罔民众……税敛苛毒……倒行逆施，不顾社稷之将覆，犹且不早悔悟。”至于说到同日本的战争，那首先是国民党对日本采取敌对态度，国民党“夫既自知流朽，何以轻动干戈，业已备战十年，何以脆弱至此”，所以就“百战百败”了。又说“（国民）党人方且标榜清廉……实则挚金外国，化名存储，已成公开秘密。日倡礼义廉耻，而魑魅魍魉白昼横行，盘踞要津，荡无法纪”。由于国民党政府“犹复不负责任遁逃，不能收拾”，所以就“丧其国都”了。[23]

文告还在另外两个问题上做文章。第一个论点是中日同种：战争之真正可悲乃在于“同种相噬”。第二个是反共：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其结果是“拾共产党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意见。

从此以后，临时政府一再反复宣讲它十二月十四日文告所表明的这些论点。它把这些论点和“王道”哲学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为大搞控制社会的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儒家哲学中的王道是衡量国君的统治是否贤明的一个崇高标准。它认为；要是一个国君由于受礼教的陶冶，能够本着仁义道德来进行统治，那他就是一个模范的贤君。君主通过树立完美德行的典范来证明他是受命于天的，从而使他的臣民必须忠诚并确保社会的协调。但在一九三八年，王道却被临时政府用来作为一种解毒良方，以对付现代中国（实际或假定）流行的许多毒素。总之，王克敏和他的同伙所谓的王道强调：国民应恭顺地把统治者在道德方面的教诲铭记在心，并以王道作为

* 以下引号中的“宣言”词句是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晨报》刊登的该伪临时政府成立的“宣言”。——译者注

武器防止受西方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感染，因为这些“主义”都是以国民会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原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前提的。

最重要的是打算用王道来反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约瑟夫·利文森在谈到日本在满洲国搞“清朝复辟”时写道：“之所以提出‘王道’显然是为了反对‘三民主义’……日本人和满洲国分子都硬说三民主义是西方的思想。”[24]在华北“提出”王道显然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这就使某些人责难日本企图使华北“满洲化”的论点得到了证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临时政府是怎样复活了清朝的政治体制（例如，恢复“道”），并且任用了好些清朝的遗老；但是，强调王道这一点却是它企图复辟清朝的最明显的证据。*

“王道”不仅仅只是中国和日本少数几个守旧派想要实现的东西。在华北全境灌输“王道”思想很快就成了临时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这项大规模的工作主要由教育部和新民会这两个机构负责。新民会是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没几天就成立了的。它基本上是喜多将军构想出来的一个组织，因为他对临时政府那些既老朽又不受尊敬的头目们是否能够掀起一场（特别是在青年中）热烈拥护王道的运动深感怀疑。喜多也主张采用新的名称，并建议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了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喜多将军认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有吸引力，所以主张使用它，可是这个词却是采自最能体现儒家学说的《大学》一书。[25]

新民会是一个有多种政治目的的组织，主要用以垄断政治思想，动员民众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政府，并从总的方面传播日本的宣传和日本文化。它是以满洲国的协和会为蓝本的。它并不是一个松弛地联系着几百万个会员的群众组织，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通过历史悠久的儒家保甲制度和类似奥威尔复合体的分支机构，来保证严格的纪律和秩序得到实现。†

---

* 要是把康德皇帝（亨利·溥仪）从满洲国新京的皇宫迁回北平（或者不如称之为北京，因为这个城市后来再度成为中国的首都），那么复辟清朝的活动就可以说达到顶点了。按照乔治·泰勒的说法，一九三八年这类语言在北平四起。这是由于下列消息而引起的：建筑新京的新皇宫工程已经停止，而修复北平紫禁城的工程却已开始了。（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 27 页）

† 据美国资料的估计，一九四五年华北的总人口是一亿多一点。估计新民会会员总数为五十五万人（一九四三年）。但只有五万是“有完全资格的会员”，那就是说，这些人人会时间较长，并且受过特殊训练。所有政府官员、所有学校的校长和宣传机关的头头都必须是新民会会员。（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编的《华北沦陷区的傀儡政府机构》第 12 页）

设立了新民会中央训练所来培训从事会务工作的骨干。又设立了主要培训政府工作人员的新民学院。这个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先到日本游历了一番之后，再回国担任各种官职（主要在教育部）；毫无疑问，有许多毕业生被分配到各个新民模范学校去工作。童子军改名为新民少年团。还建立了防治疾病的新民医院。在娱乐方面，人们可以收听国家办的新民合唱团在新民广播电台里演唱的新民歌，或者可以到政府经营的许多新民茶馆去喝茶。这个政权的机关报《新民报》则是正确的理论和时事评论的唯一来源。

新民会承担的任务是如此包罗万象，它的分会和职员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几乎可以代替临时政府成为华北的统治机构了。一位颇有学识的观察家对这个组织的无孔不入的性质作了如下的叙述：

> 几乎没有一项政府的活动没有新民会的份儿；在北方的每一个省、每一个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每一个县都设有新民会的分会。为了庆祝纪念日、庆祝大城市被日军攻陷、反共周等等而举行一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统统由新民会主办。它向各级学校发布命令，强迫他们参加此类庆祝会；它训练城乡的青少年，组织尊孔、崇敬祖先、谴责国民党等等的集会。它掌管一个完整的实验县；组织合作社，照管灾区救济工作，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种子，指导收割和农具的使用，向乡村提供医疗服务，教所有的人学日语，送学生去日本留学，自办一所学校，编写教科书，草拟并分发各种宣传品，自办一家广播电台，派出流动电影放映车，鼓励戏剧演出，进行新闻检查，举行考试，召开家长会议，开设免费的茶馆，进行不可胜数的调查，普查户口，提倡中国艺术，控制劳工，管理公众的娱乐活动。它甚至还进口猪来做饲养试验。它举办巡回图书馆，对学生作文发给奖品。它大事吹嘘模范村。它的种种活动简直是没完没了的，它的活动能量也是无穷无尽的。从天津到太原府，从济南到保定，旅行者到处都可以看到以阴阳为标志的新民会会旗。[26]

如上所述，新民会的御用哲学新民主义是用来抵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西方思想的残渣”——的影响的。[27]新民主义强调儒家的德行，强调重礼、敬上、孝顺和好学。虽然这些新的“主义”从未被系统地（更不用说合乎逻辑地）加以发挥过，但它们却都有一个可以说是共同的命题，即：只有日本‘能够使中国得救，并实现土肥原将军所谓的“东方文化的复兴”。[28]

缪斌是新民会的主要理论家和第一任会长。他原是国民党的革命家，一向对日本极为崇拜，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对这个组织起了影响。缪早就认为，中日两国之所以对现代世界作出的反应大不相同，其原因乃在于日本有武士道精神。缪还认为武士道精神渊源于儒家传统，只有学习日本的尚武精神，中国才能象日本那样生气勃勃而不再是死气沉沉。[29]这个新哲学思想还把佛教视作中日两国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并给以同等的尊崇，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它的折衷主义手法。例如，一方面准备在山东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同时又准备在山西开办一所教授佛学的大学。[30]

要是说“复兴东方文化”的奢望并未能象预期的那样使华北的广大居民改而信奉儒教的话，那末新民会的巨大努力至少可能已经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在效忠什么的问题上搞得稀里糊涂了，而新民会所提倡的朝拜孔庙和学习《大学》等事，按设想本来可能对一些人（主要是年岁较大的人们）是会有一些意义的；至于对广大的学生来说，那就很难设想他们对于以下这类事情会有多大的劲头；具有明显宣传性质的作文竞赛和演讲竞赛（《为什么我们要打倒蒋介石政府》，《中日如何亲善》，等等）；（“按照北平教育局的命令”）首先强调学习日本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大量采用日本批准的教科书并把日语作为必修课；课程中包括例如《易经》这样玄奥的教材，或者用伦理学（“修身”）来代替公民课。公民课由于强调了对国家的责任和中国民族主义而遭到怀疑，因为民族主义只会妨碍中国人投身于中日合作，而中日合作正是一九三八年在华北纷纷成立的各种“教科书改编委员会”的最终目的。[31]

曾在华北派遣军服役的山崎重三郎中佐指出过新民会存在的一些缺点。他把新民会说成是一项“旨在建设新华北的思想运动”。他写道，新民会虽以满洲国的协和会为蓝本，但它却“没有抓住华北人民的心理，而他们的文化程度远比满洲国人民为高。”他坦白地承认，新民会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官僚化了，而且它的日本味道也太浓了。”他说，结果新民会“变成了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面对着共产党的宣传攻势，他们简直束手无策。”[32]

华北政权的奴仆性质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第一个方面是，日本顾问广泛地控制着一切政府事务。在这方面，王克敏至少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平常总是批评王的外国报刊也不得不承认，王“坚决反对把满洲国的制度照搬到华北来，（同时）也强烈反对把大批低级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个部、局”。[33]一九三八年六月，有消息说，“王的主张被采纳了”。几个月之前曾经“充斥于各部门”的一大批小顾问“都被调走了，只实行在较

高级的部门中派驻少数特别有资格的顾问的原则。”[34]

一九三八年四月，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同王克敏达成了一项关于向临时政府派日本顾问的协议。它规定建立一个由日本提供“合作性质的援助”的制度。据这个协议附件的第四条说，这是指“日本顾问和同级的临时政府的官员“事先”就一切政务事宜“进行无保留的磋商”。[35] 尽管寺内—王“关于顾问的协议”明确地要求双方在任命顾问之前要进行磋商，然而有个顾问却说，“只要司令官决定某某去当顾问，那就可以了。顾问的各种职责也有明文规定，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搞什么外交协议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在结束对顾问体制所作的坦率估价时，他把顾问比喻为“附家老”*——那是指日本封建时代年青贵族的高级顾问，他们以比他们所应服侍的主子更为有权势而见称。[36]

不管顾问体制的用意多么善良，不管顾问们的行为多么客气（姑且假定占领军能够有这种难得的作风），也无法使人欢迎。据一位日籍观察家说，在他所接触过的大多数中国人中，他们最感不满的便是日本强加给新的行政机关的那些顾问。他承认“许多人是完全不称职的……而且对中国人民连最起码的了解都没有。”他举了一个做官的中国友人为例。那个中国官吏的顶头上司是一个日本人，而这个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或经济竟一无所知”，然而更糟糕的是，“连芝麻大点的事情也得同这位顾问商量。中国官吏在点头之前必须同别人商量。时间就是这样被白白浪费了，而最后是一事无成。”[37]

既然中国官吏对日本顾问有反感，而帝国陆军军官又瞧不起中国官吏，把这二者加在一起是决不会产生和睦合作的精神的。山崎中佐以不屑一提的口气追述了临时政府搜罗来的那些行政人员的质素：“他们不是旧时代的遗老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权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们是一批靠不住的贪官污吏，只是为了领薪水才来上班的。人民对他们抱有恶感和反抗情绪。最后，人民把这些恶感和情绪都化为对日、本军政官员和日本侨民的仇恨。”[38]

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我们已经考察过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关于海关和关税的方面。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北平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另一个最能说明日本炮制华北伪政权目的何在的经济措施。用一个作家的话来说，

* 日本德川时代，封建诸侯的总管家。——译者注

这一行动是“对中国货币发起的一场强大的正面攻击。”[39]这家在日本顾问指导下的银行，是为许多重要目的服务的，但它的总目标则是要把华北的金融活动同中国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从而破坏国民党政府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一直在谋求的财政统一与完整。正如一家东京出版的商业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所说的那样：“华北象满洲国一样，将成为金（日）元集团的一部分，并将成为把帝国经济紧紧地捆起来的货币链条的一个环节。”[40]

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间，日本政府曾经不顾外务省的劝告，拒绝支持英国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和统一财政制度的做法。现在，既然临时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于是许多日本人乃感到，日本完全有力量摧毁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经济制度，从而加速其投降。他们希望，通过发行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并禁止法币（南京政府国币的名称）的使用，联合准备银行能够使华北的居民不再效忠于国民党政权。国民党的中国对即将成立联合准备银行的公告所作的反应似乎也表明日本的金融战略有可能奏效；因为资金逃离中国的数量和对外国货币的投机买卖立即“剧增”。

然而，事实证明联合准备银行只不过是一项效果平庸的武器而已。当这个银行刚建立的时候，临时政府宣布，法币只能再流通一年，即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为止，在此以后就只准使用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联券）了。新货币刚一发行，临时政府和日本陆军都得到了好处，因为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临时政府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可以弥补一下它无法从游击队所控制的内地搞到税收；日本陆军则可以通过对兑换率的操纵筹集它自己所必需的开支，并促进它的经济开发计划，但作为一项旨在破坏国民党财政稳定的政治武器来说，联券的发行却是个大失败。由于联券的发行准备金有名无实，随着每月印刷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货币总流通量越来越大，其价值也就不断下跌。尽管对私藏国民党货币的人严加惩罚，格雷贤的法则却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较有信用的国民政府合法货币仍被继续使用，而且在兑换中往往还能得到贴水。在华北某些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法律禁止持有联券，违者处死。结果，华北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发现，他们只有用法币才能从内地买到农副产品。

一位作家指出：“凡是在日本人势力达不到的地方，人人都拒绝使用联券。”[41]甚至在日军势力“所能及”的地方，人们也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令人憎恨的货币。例如，在华的日本商人也不愿接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券，因为他们不能用它来偿付中国的债权人。在中国营业的外国银行宣布，只有横滨正金银行采取接受这种纸币以抵付其他货币的政策，他们才这样做。可是日本的银行家都坚决拒绝这样做。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的《财政与商业》月刊说，“横滨正金银行的全部资财可能会因兑付北平所印出来

的钞票而告罄。”[42]由于天津外国租界当局拒绝合作，日本对联合准备银行所抱的希望又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为止，即日本所扶植的联合准备银行成立的九个月后，他们事实上仍继续以法币作为记帐单位。由于日本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其结果是，法币到了一年以后非但没有完全被联券所取代，反而在大约两个月后，即一九三九年五月，它与联券兑换的贴水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之多。[43]由于日本军队在华北使用军用券购买当地商品和劳务，这就使已经够混乱的货币流通情况更加恶化了。到了一九三九年，日本银行发行的日元纸币和朝鲜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特别纸币也都在华北流通，这就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

结果证明：对中国货币“进行改革”远比预期的要复杂而困难。早先几年，让满洲人停止使用军阀张学良时代流通的既贬值又不稳定的“奉票”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由于其他的问题很多，事实证明还不可能把在满洲国取得的成功经验照搬到华北来。公众的信任是日本在这十年中的头几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在后几年中她显然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正如一位财政分析家所写的那样：“在战争十八个月后，尽管中国丧失了大部分重要城市，但她却能使外汇汇率维持在空前稳定的水平上。要求一个国家的人民抛弃一种既贬值又混乱的货币，代之以一种更稳定的交换手段，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可是，要是强迫他们接受一种既。不能兑换又毫不值钱的纸币去替代另一种比较健全和稳定的货币，那倒是一件极端困难的工作。”[44]

战争爆发以后，鸦片在日本占领区的财政收入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种贸易的秘密性质，人们很难得出精确的数字，但是许多观察家所提出的证据都表明，自一九三七年初以后，秘密的鸦片贸易额急剧增加了。美国财政部派驻上海的专员就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的人中之一。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海关署长报告中国的麻醉品贸易情况。一九三七年四月，他报告说，在察哈尔北部的“日本当局”用“当地县长的名义”向农民发出通知，鼓励他们去种植这种“有毒的植物”，并公布奖励办法（例如，种了最低限量的可以免除土地税，种了五亩的可免服兵役）。[45]这些鸦片连同那些在内蒙古其他地方和满洲国所生产的鸦片，都由受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官员保护的”日本人和朝鲜浪人走私运进华北，而这些官员则从利润中提成作为报酬。[46]

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名不符实的禁烟局，倒是为毒品运进华北提供了方便。事实上，这个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禁止麻醉品的贸易，而是通过颁发许可证的制度，把这项贸易置于当局的控制之下。美国财政部专员关于此

事的报告，均为战后在东京的审讯中被日本军官及中国傀儡政府的官员所证实。[47]在这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梅思平的长篇供词。梅是汪精卫政府的最重要成员之一，任内政部长。梅否认了他所谓在中国“流行的那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日本关于麻醉品的政策目的在于造成有毒瘾的人，“使中国人体质衰弱而且穷困”。他说，特务部发现毒品贸易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用来补充供它进行“多方面工作”的“非常有限的经费”之不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梅供称，为了进行间谍活动，也把毒品赠予或售给“无耻之徒或甚至贪污的官员”。*

梅把鸦片贸易和其他毒品（如吗啡和可卡因）的贸易加以区别。他认为，后者大部分是由地方低级官员自己搞的，而前者则是极有组织的，并且是内蒙古傀儡政府的主要财源。他还说，日本政府把鸦片贸易所得的收入汇到东京作为“秘密辅助资金”之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梅说，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才开始执行真正禁止鸦片的政策。这是针对中国民众突然爆发的愤懑和学生示威而采取的步骤。（东条政府为应付此次危机而派往中国的经济顾问表示愿意帮助汪政权查禁鸦片贸易，但也提醒汪政权不要忘记，从“鸦片贸易所得的利润是［设在内蒙古的］蒙疆自治政府主要财源”。）[48]

国策公司

在经济开发，即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的管理等领域内，临时政府被迫当傀儡的形象最为突出，而且日本的帝国主义意图也最为露骨。“经济合作”的口号远远掩盖不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军务局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制订的计划，列出了控制华北经济的指导性纲领的要点。[49]它规定在青岛市设立特别市政府，由一个中国人当市长，一个（由特务部挑选的）日本“最高顾问”协助工作，还设一个市参议会，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半组成。计划组织中日合营公司经营地方的盐、酒、糖和烟草工业。将考虑在税收上优待这些企业并授予专卖权。还要在山东省设立其他合营的企业以经营煤矿和铁矿以及与之有关的工业。全省所有主要铁路将由一个企业独家经营。

---

*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 CE 第 460 号第 3 页。鸦片馆受到佩有政府机关证章的临时政府官员的保护，有些官员官阶之高，把《新民报》的编者都激怒了。这家报纸厌恶地揭露道：鸦片馆的掌柜们“甚至公开宣扬这一事实，并这样说过，‘如果当官的都觉得咱们的小店是值得光顾的，你们为啥们不这样认为呢?’”（见《在华北的鸦片贸易利润》，纽约《亚细亚》杂志一九四〇年第四十期第 551 页）

随着日本占领了整个华北，必须为陆军所指望的合营政策制订出更为全面的方案这一点变得愈来愈明显了。据说，王克敏对日本人坚持全面和不受约束地控制华北经济特别感到忧虑。一个观察家写道：“王最初是一个银行家兼经济学家，之后很久才成为政客的。他明确地反对日本人完全垄断所有工业和经济计划。他虽然准备同意在重工业方面让日本人占有稍多于一半的份额，但却坚持把其余经济部门分摊给中国资本家和……中国政府。”[50]

为了使王放心，寺内将军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他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建立一个中日经济委员会（日华经济协议会）。两国各任命五个委员，委员会负责制订华北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计划。王克敏自任主席；副主席是平尾八三郎。平尾是著名的日本实业家，曾任内阁阁员。据臼井胜美说，王以为此后经济事务将交北平的中日经济委员会来考虑解决，而不是按东京下达的单方面决定行事，所以他才同意订立这个协议的。[51]

要是王果真这样认为的话，他的幻想不久就破灭了。一开始委员会的权力就几乎被阉割掉了。事实上，王与寺内签订上述协定的次日，即三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签署同寺内达成的一项“谅解”，该“谅解”规定“华北最高经济顾问将根据军事需要控制交通、运输和空运”。为日本单独控制这些企业而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临时政府无权要求取得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因为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属国民政府所有；既然临时政府还没有被承认为是国民政府的主权继承者，它也就不能够成为国民政府所有权的继承者。[52]这样一来，这些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就从委员会的权限之内划了出去，并于最后划归日本陆军和日本企业联合经营。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华北占领区有关资源开发的所有工业（铁、煤、电力等等）实际上都在中国开发公司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只有这家公司拥有准许经营这些企业的权力。中国开发公司创办于一九三五年，原为南满铁路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并于一九三八年被置于华北派遣军的牢牢控制之下。由于需要吸收大量资本和技术援助，这就使该公司出面邀请日本各大企业参与它的经济开发计划。结果，日本工业界就在中国接管了重要的企业管理权。三井、三菱和大仓进入了煤炭工业；东京电灯、日本电力和大同电力进人了电力领域；日本制铁所和大仓兴业会社等等进入了钢铁工业。日本工业家甚至渗入了生产重要消费品的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如东洋纺织公司和钟渊纺织公司就接管了许多中国的纺织厂。[53]

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军事需要的不断增长，经济上也就更需要有更多的配合和集中计划管理，于是把中国开发公司改组为北支开发公司。这个新公司是根据一九三八年四月公布的一项法令批准成立的，同年十一月正

式开张，拥有资本三亿五千万日元。[54]大谷尊由（前拓务大臣，在不到一年前曾主持制定成立这家大控股公司的计划）成为它的第一任总裁。他立即着手建立许多子公司并发行更多的债券。至于中国人所拥有的企业（例如铁矿），中国老板们除了把他们的设备和财产去换取该公司的股票之外别无他法。到了一九三九年，诸如华北交通公司和华北电力公司等国策公司的营业范围乃遍及整个占领区。

不过，其中有不少公司与其说是在事实上起作用，还不如说仅在理论上起作用。为了修建铁路和港口等野心勃勃的计划筹措所需资本而作的努力，在日本国内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中国国内则更是毫无结果。日本军事当局和日本财界之间的利害冲突使他们在大陆上的冒险事业显得不那么吸引人。日本当时极端缺乏资金，军方拿不出什么办法来鼓励投资。军方对于使投资所冒的风险同利润大小成比例这一点的关心，远远赶不上它对用降低生产和利润的方法来使自己的计划获得资金一事的关心。可以用于投资的中国资本本来就少得可怜，这时更不愿意对国策公司的计划进行投资。泰勒评论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把中国工业、矿业和商业财产都给没收的做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向中国资产阶级表明中日经济合作有好处。"[55]

所以，为了实现急功近利的目标，往往放弃了从长远看来可能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和帝国主义国家本身都同样有利的经济发展计划。例如，究竟日本人对已在一九三八年初考虑的"土地改革"计划是怎样想的，恐怕只有天知道。考虑到将去执行该计划的那些实业部官僚和新民会官员所持的社会观，这个土地改革的前途充其量也只能是很渺茫的。无论如何，随着战争继续拖下去，对于诸如模范村（除非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修筑道路、修补河堤以及农贷和救济等等的强调之越来越少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三八年末，尽管中日经济委员会继续坚持说这类长远的目标还是很重要，但它也坦率地宣称，眼前需要关心的是"提高棉花和小麦的产量"。[56]

就单从日本本身的利益来看，也很难估计出：日本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开发华北，究竟有几分原因是直接由于日本人无能所造成的，又有几分原因是由于游击队的抵抗所造成的。游击队在华北到处活动，他们从活动地点甚至可以看到北平的城墙。不过，毕竟不能因为日本没有建成她为华北计划的巨大铁路网而责怪她，因为白天铺上的路轨晚上便被撬掉了。不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美国新闻委员会在一九三九年所发表的文章看来还是对中国沦陷区糟糕的经济状况作了公正的描述："生产、贸易和消费……都远远低于战前水平。一般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了，大部分中国人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随着战争继续下去，日本人既无法把他们在经济上所

造成的损害弥补起来，也无法促进任何大规模的新的经济发展。”*

正如新闻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总的说来，中国居民都在经济上吃了苦头。泰勒认为，对一般人来说，最大的损害是由一些“小规模的掠夺者和谋利者”造成的。“在本财政年度（一九三九年）从神户搭船到大陆去谋求发迹的”二十二万日本人之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57]傀儡政府和日本陆军都管不了这些人，也不愿意去管他们。他们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在提醒被占领城市中的中国人别忘记：中国人是一个被征服了的民族。根据日本人的估计，迄至一九四四年，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的人数是一九三七年的十倍。[58]新民会的一个被激怒的官员写了一份关于在大陆的某些日本人的劫掠行径的报告。他虽然承认有必要对某些重要的工业实行军事管制，但是他也用了最强烈的词句，遗憾地指出“恣意掠夺（中国）人民的私人企业并企图将这些私人企业置于日本工业控制之下的做法”。†他指出，被没收或被迫实行中日合营的企业竟包括当铺、肥皂厂、油漆商店和面粉厂等等在内。

山崎中佐估计，在华北的日本侨民约达四十万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属于‘冒险家类型’的”。山崎遗憾地指出，这些冒险家们不理解日本宣布过的“圣战”的意义，他谴责他们编起了种族对立，并使那些天天同他们有接触的中国人激起了反日情绪。他作出结论说：“结果，‘新建设’的理想往往被这些毫无头脑的日本人所歪曲和破坏了。”[59]

华北日本人在经济上专横的做法，不仅违反了日本对经济合作许下的诺言，而且终于损害了自己。一九三九年，外相野村古三郎抱怨说，那些本来应该成为“北支经济开发核心”的国策公司，“全都缺乏机器设备，以致计划都完成不了”。[60]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日本“尽一切力量去吸引外国资本”到那个地区去。有讽刺意味的是，陆军恰恰就是想方设法用经济帝国主义的政策来防止依赖外国。根据日本人的估计，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之间，美国对中国沦陷区的输出，的

---

* 见美国新闻委员会出版物第五号《中国开发（无限）公司：对日本经济合作的第一手研究》第 28 页。美国新闻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成立，负责人是美国传教士埃德温·马克斯。它为美国新闻界编写并散发日本占领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报告。它的成员包括在华居住的美商、传教士和新闻记者。

†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614 页。人们认为，满洲国青年组织和新民会的一位活动家小山定友是这篇报告的执笔人。臼并把小山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小山在一九三八年对中国沦陷区的一次视察旅行后写成的）概述如下：“那些原来在中国毫无地位和声誉、而且又毫无商业经验的（日本人），突然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并且正在牟取巨大的、不应得的利润，仅仅因为他们是日本人而已。”臼井写道，小山不论走到那里都能看到这种“不光彩的”情景。（见臼井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载《朝日杂志》社编：《昭和时代历史片断》第 286 一 287 页）

的确确增长了将近四倍。[61]这样一来，日本就日益依赖西方国家（在欧洲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依赖美国）帮助她去实现她的开发计划。而后来在一九四一年野村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华盛顿所进行的谈判中，正是这些开发计划成了最无法克服的障碍之一。

最后，让我再说几句话，以结束这一段关于日本力图“复兴东方文化”的讨论。

首先，统治华北同统治中国其他地区所用的方式和所建立的机构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后来几乎无法使其调和起来以建立汪精卫所领导的全国性政府。只提一下王克敏政权和汪精卫政府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够了。后者非但不攻击孙中山，而且宣称只有它才是忠于孙的理想的。它攻击国民党没有实现“三民主义”，而且自称是“正统国民党”。

当汪精卫政府成立不久后于一九四〇年访问北平时，《新民报》发表了一篇“宣言”以示欢迎。在谈到汪献身于“三民主义”时，这篇“宣言”说：“当我们一想到它时，就不禁为之战慄。”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祸患无一不是孙中山的主义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蒋介石政权的组成、联俄联共、屈服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以及抗日，所有这些都根源于‘三民主义’。”[62]

用“新民主义”来代替“三民主义”这一点表明，日本人认为华北是个很稳妥的地方，可以（或者至少是企图）在那里搞起一种极端开历史倒车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清末以来，华北在政治上毕竟从未稳定过。总的说来，响应孙的民族主义思想并支持共和国的是南方；而在北方，民族主义才刚刚开始出现。国民党没有多少机会把它的思想意识和组织形式传播到这个地区，因为它在某些省份受到日本人的排斥，或者至少受到严厉的限制，而在另外一些省份则又被象阎锡山这类事实上独立的军阀所排斥。

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是最强烈反对“王道”计划的阶层了，但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他们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许多学校被炸毁了、关闭了、进行了改组或者迁移到外地去了，有的学校即使是还能办下去，其规模也大不如前。一九三五年与一九三六年间以一些学校为中心的激进抗日运动，在一九三八年简直就不复存在了。此外，由于共产党“有意识地把在北平的人力抽出去充实其他地方的领导力量”，“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精华”离开了大城市，到共产党在山西的根据地去了。[63]

在当时存在政治真空的条件下，日本人认为：他们广泛的政治“改革”最多也只会落得一个人们漠不关心的结果。陆军相信，它花了五个有用的年头在满洲国学会了如何跟人们漠不关心的态度作斗争，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能在长城以南的地方取得成功。一个傀儡官员写道：“无论发生

什么情况，南京决非我（华北）人心之所向。总之，不论在精神上或在行动上，北方总是比较接近新京（满洲国的首都），而不是接近南京。”[64]

满洲国的经验可没有一条能说明：外来的共产主义哲学竟会那么坚决地同中国的传统“方式”进行斗争。华北政权的许多军事和民政顾问都是先前在满洲国任过职之后调过来的，他们把前几年形成的一套关于行政管理的观点和政治哲学都带过来了。山崎大佐对此又作了恰当的评论：

> 那些在建设满洲国有过某些成功经验的人员负起了建设华北的责任。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简单、知识领域狭隘，所以在指导地方行政人员方面犯了不少错误，发布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命令。结果，他们往往不得不朝令夕改。他们犯错误的最大原因是：负责的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没有予以足够的、认真的注意。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不只是专门对付日本军队，因而赢得了人心。相反，我们却只把中国共产党看做土匪，把镇压他们的事看得比对人民做工作更为重要。[65]

日本之所以把这种类型的政权强加给华北的另一个原因是：华北地区在她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优先地位。华中和华南的重要性似乎远远及不上华北，所以，许多日本人打算同意在黄河以南建立一个比较有独立性的政权。但华北必须在事实上成为日本帝国的真正组成部分，如果在名义上并非如此的话。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决定了这项政策，因为它最贴近满洲国，也最容易受到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人的袭击，或者同时受到二者的袭击。如果说光有这种考虑还不够的活，那末单是这个地区的经济重要性也足以促使日本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的。

最后，中国最大而且最令人头痛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集中在华北，这从本质上对决定日本人在那里作出反应也起了作用。在华北进行的“扫荡”比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所进行的“扫荡”更能说明他们单纯依赖军事手段。共产党的八路军不让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试行更加狡滑的扫荡办法，那怕日本果真准备并且愿意试一试的话。日本在华北采取极端黩武的态度，以她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间所实施的大规模毁灭政策（即三光政策）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敌方不能利用某个地方和居民，便把这个地方及居民统统毁掉、杀掉。在伪政权体系中，也采取过类似政策，它对中国民族利益所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日本企图强加给华北的任何其他措施所造成的损害。

[1] 见哈利特·阿本德的《一九二六——一九四一年我在中国侨居生活》第313页。这位顾问是原田熊吉少将，在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他和他的助手楠本实隆大佐的活动，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第2203号第1页和第7页谈到。他们俩人对建立一个与临时政府竞争性的政权——设在南京的维新政府，颇有帮助。在大陆的各日军司令部之间的竞争，可参阅约翰·戈特的《日本为亚洲而战》第61页、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95—98页、以及阿尔文·库克斯的《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一文（载《军务杂志》一九六八年第32期，第60页）。我还通过访问前陆军军官山崎重三郎而得知这些内幕。山崎强调指出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之间的“恶感”。

[2]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16页。

[3]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207页。

[4] 见C·Y·W·孟的《日本在华北的机构——治安维持会》（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第125页）。

[5]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0页。

[6] 见《时代》杂志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第17页。

[7]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1页。

[8] 同上

[9]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27页。

[10] 喜多将军和根本博将军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给田中新一将军的报告见防卫厅防卫研究署编的《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14页。

[11] 同上书，第513—514页。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1页。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关东军司令部的《支那复兴建设方策大纲》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234—236页。

[16]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文件第2203号第1页。

[17] 见梨本祐平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第六章。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69页。梨本是临时政府的经济顾问，他的著作是关于该政权的最好的第一手资料。

[18] 访问陶希圣谈话记录。

[19] 实例请看《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第300页及十一月十九日第370页。

[20]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6页。

[21]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115页。

[22] 见乔治·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 33 页。
[23] 见青木德三的《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背景》第三卷第 213—2I5 页。
[24] 见约瑟夫•利文森的《信奉儒家的中国及其在现代的命运：帝政衰败的问题》第 133 页。
[25]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 60—61 页。
[26]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 71 页。
[27] 同上书，第 210 页记述新民会的“标语……向（一些想用作新年装饰的）户主赠送”。
[28] 见土肥原贤二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中央公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第六一四期第 n 页)。
[29] 弗雷德里克•莫特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华所扶植的政府》第 190 页，谈到缪斌的《武德论》。
[30] 见希拉里•康罗伊的《日本在华的战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第 372 页。
[31]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 93 页、第 224—225 页。另见 T·A·比森的《日本在中国》第 311—313 页。
[32]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 50 页)。
[33]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 114 页。
[34] 同上刊，第 340 页。
[35] 见臼井胜美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一文（载《昭和时代历史片断》,《朝日杂志》社编，第 286 页。王克敏—寺内协议的全文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微型胶卷《日本外务省档案》，第三五六卷，编号：SI．6．1．l—7 号；第 153 页及续编。
[36]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134 页。上述顾问是前内务省次官汤泽三千男。
[37] 见美国新闻委员会的第八号出版物《在中国舞台上的日本傀儡》第 29 页。
[38]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 50 页)。
[39] 见 W·Y·林的《中日货币战》(载《美亚杂志》一九三九年第三期第 30—36 页)。
[40] 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 65 页引自东京的《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41] 见根室·斯坦因的《经济札记》(载《美亚杂志》一九三九年第三期第 236 页)。
[42] 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 67 页。
[43] 见斯坦因的《经济札记》第 236 页。
[44] 见 W·Y·林的《中日货币战》第 35 页。
[45]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 CE 第 393 号。另见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专员一

九三七年四月七日的报告。

[46]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 CE 第 399 号。另见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专员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的报告。

[47] 事例见：特务机关的官员原田熊吉的供词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 CE 第 423 号；汪精卫政权的内阁成员梅思平在法庭上的誓词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 CE 第 460 号。

[48]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 CE 第 460 号第 5 页。蒙疆政权将在本书第七章讨论。

[49]《处理山东及青岛地区纲要草案》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132—133 页。”

[50]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 339 页。

[51]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134 页。

[52]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 134 页。

[5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134 页。

[54] 见《东京公报》第十八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 2 页。

[55]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 148 页。

[56] 同上书，第 155 页。

[57] 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 149 页引自《日本纪事报》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

[58] 见查默斯 • 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 44 页。

[59]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 52 页）。

[60]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188 页。

[61]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序言第 32 页。

[62] 见《东方事务》第十三期（一九四〇年）第 245 页。

[63] 见约翰 •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 179 页。

[64] 见《东方事务》第十二期（一九三九年）第 306 页。

[65] 见山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第一一三期第 52 页）。

第六章 华中

芦沟桥事变前几年，日本在中国进行的扩张主要在黄河以北地区。帝国军队从山东半岛、重要的平津走廊和内蒙古边境等地区，扩展日本及其卫星国满洲国的战略边境。从陆军的观点看来，有必要占领内蒙古边境地带作为满洲国和苏联及其附庸国外蒙古之间的缓冲地带，并使华北成为自治区，以此作为想搞复国的国民党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不消说，日本人并不打算把这些"缓冲地带"搞成中立的无人区。在军事上，它们将给关东军提供用兵和演习的场所；在经济上，它们的资源可以与满洲国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

于是，帝国陆军（更确切地说，是关东军和根据辛丑条约议定书所准许的铁路沿线驻军）恰恰主要在黄河以北地区挑起了一系列的事件和战斗，最后，把制定对华政策的大方向的权力从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手里夺了过来。日本军官们正是在这个地区里获得了制造地方和地区自治运动的经验，获得了对付那些地方军阀的经验，并在有可能时操纵和利用他们。

但是，在黄河以南地区，中日关系的格局却很不一样。日本人认为，这个地区距离满洲国和日本在北亚的假想敌人苏联比较远，因此，从战略上看它是次要的。同时，鉴于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的沿海大城市拥有金融和商业的势力范围，日本不得不避免象在华北那样把恣意侵袭中国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当成家常便饭。日本在华中的目的，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经济的，而且这个目的最好是通过一般称之为"币原外交"的那套怀柔手段来达到。

外相币原喜重郎对中国的态度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格局。他象关东军的将领们一样有力地维护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权利"。[1]但是，他对于处理日本在华中和华南的利益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甚至当一九二七年内战处于高潮，日本在那些地区的权利被忽视的时候，币原还是主张克制和忍耐；认为从闹事地点撤走日本侨民总比动用武力要好一些。币原和他的继任者田中义一男爵都同样想通过避免使用干涉的手段，来博得将要在华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好感。一九二八年，日本终于进行了干涉，但还是在北方——青岛和济南。三年后，日本在满洲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时，她也只是决心想要得到长城以北地区。只是在中国人用抵制日货这一非常有效的措施来反击日本侵略满洲以后，战争才深入中国腹地。一九三二年二月和三月，上海周围进行了一场激烈

的战斗，但也只限于在那一个地区，而且日本很快地请求西方国家帮助实现早日停止敌对行动。[2]可是，在满洲则既未要求调停，也不能容忍调停。由于一九三三年国际联盟拒绝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日本终于退出了国际联盟。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关东军践踏了热河（一九三三年）和察哈尔东部（一九三五年），并将这些地区并入了满洲国；怂恿和支持想搞分裂的蒙古王公们建立以察北为基地的政府，要求对察哈尔、绥远和宁夏等省享有主权（一九三六一年）；并且在同年提供装备、派遣军官，对绥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冒险。总之，它所挑起和支持的自治运动，目的在于使河北及察哈尔同中国其它地区隔离开来。

在北方这样做的同时，日本力图在国际条约和已有一百年历史的租界制度的体系范围内，改善它在华中的地位。典型的例子是，它谋求在上海工部局（它管理着公共租界）占有更多的席位，设法取消到中国内地旅行或从事商业活动的种种限制。一九三六年末，华中的几个城市发生了一系列反日事件，造成了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日本宁可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通过军事行动去获得赔偿。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这段时间里，既未使用帝国军队也未使用武力相威胁，这构成了华中地区日中关系的主要特点。芦沟桥事变以后，战争从华北扩大到中国其它地区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上海地区日本军事当局的谨慎态度肯定地说明了日本希望冲突仅限于在华北。上海公共租界日本“防区”的巡逻小分队只是略比一支警察力量稍强一点的部队。直到八月十三日，芦沟桥事变五个多星期以后，才提出了增援军队的要求，而且这时候还遭到了东京的强烈反对。[3]日本在上海地区的兵力是如此之弱，以致一位西方战地观察员认为，在增援部队开始到达后的一个星期，他们仍然处于“全面被歼灭的危险之中”。[4]

研究日本在中国采取不同做法的经验中，值得重视的是，日本没有能够在华中主要沿海地区找到象华北地区那样的、可资利用的政治分裂局面。相反地，华中地区是国民党最早确立了领导权的地方，日本在这个地区必须同国民党主要金融及军事实力较量。日本考虑到这个事实以及西方各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和势力的现实情况，乃不得不谨慎从事。因此，日本军方虽然在华北的问题上不大愿意同国民党的领导人讨价还价。但是在有关华中的问题上却是乐于同他们打交道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正当陶德曼的调停陷入僵局的时候，华中地区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却开始在香港同宋子文进行私下的和平谈判。松井认为，赢得国民党财界的合作来解决华中地区的日中分歧是很必要的。然而，这次好不容易才开始进行的谈

判，实际上就被一月十六日近卫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中断了。[5]

中国的维新政府

考虑到了上述地区性的差别等背景，我们对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在南京建立的傀儡政权同华北的临时政府很不一样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南京政权的建立，比建立华北临时政府所投人的力量要小一些，它的目标也比较有限。陆军方面的某些人士对于建立一个自治的“华北国”颇为热衷，可是他们在华中和华南却没有类似的野心。芦沟桥事变后，也没有建立“华中国”或是“华南国”的设想去煽起在那些地区执行任务的帝国陆军的野心。

为维新政府建立一个相当于新民会的组织算是唯一象征性措施了。那就是仿效新民会建立的无足轻重的大民会，“充其量只不过是陆军的一个宣传工具而已”。它不象华北的新民会那样热衷于反复灌输“王道”思想。如果说它要使用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的话，那就是三民主义了——当然也总是一再强词夺理地把孙中山说成是反对共产主义和亲日的。尽管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改组工作，也并未能使这个组织获得生命力。不象新民会那样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五年，大民会到一九四〇年很快就解散了。[6]

关于建立维新政府的档案材料非常少，不过根据全部记载看来，对于是否建立另一个伪政权的问题，在日本倒是没有什么争论的。由于日本要对分裂的中国承担义务，而且在中国大陆的几个派遣军司令部之间又闹矛盾，建立一个华中政权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讨论的问题只是集中在两点上：维新政府同临时政府是什么关系；日本军方在维新政府中享有多大权力。至少在纸面上同意了维新政府的地位显然应低于华北的政权，于是，临时政府乃继续摆出老大的架势，要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维新政府则必须面对被合并的前途。关于第二点，日本海军由于在华中地区有诸如控制和封锁长江等特殊问题，因而坚决要求派出顾问到维新政府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这样，海军向该新政府索取和得到的权势远比从华北政权那里得到的多得多。

关于建立维新政府的具体细节问题，特别是涉及罗致人员的问题都归华中方面军处理，或者更确切地说，都归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后的华中派遣军处理。这件麻烦的任务交给了以臼田完造大佐为首的一个政治专家小组。“臼田机关”。臼田没有能够说服名列前茅的候选人唐绍仪出来主持维

新政府。唐是民国初年热衷于搞泛亚洲主义的老政客，当时已退休了。由于这位大佐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新政权的成立典礼不得不一再延期。据说，沮丧的臼田向东京他的上级说明延期的尴尬情况时是“泪水汪汪”的。[7]上海亲国民党的报刊、在报道延期消息时是兴高采烈的，并对人选问题和必须解决该新政权与临时政府之间及与上海傀儡政权*之间的权限问题的各种原因，作了准确的推测。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终于在南京举行了成立典礼。会场悬挂着很多旧民国时代的五色旗，有大批的陆海军军官出席。可是，因为日本军队继续征用着南京最重要的公共建筑物，政府成立了好几个月之后，还不得不在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地区的新亚旅馆办公。

最后选定来主持政权的人，其人品和主持北方政权的人差不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民国头二十年在军阀混战中参加了失利一方的老官僚，后来，有的不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有的则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无所谓的职务。根据一项调查，他们之中多数人都七十来岁了，五十岁以下的根本没有。[8]很多人都曾参加过亲日的安福系。

臼田机关能够搜罗来参加新政权的最知名的人士中有梁鸿志、温宗尧、陈锦涛和陈箓。行政院院长是梁鸿志。他是当时最高的官员，因为临时政府虽设有国家元首（主席）一职，但还虚位以待。梁鸿志过去与安福系及其头子段祺瑞将军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北伐以后就退休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如果说他在国内还有点名气的话，那只是以他的诗和散文而知名的。[9]

司法院院长温宗尧，同维新政府的许多成员一样，曾做过清朝的官，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他担任过几次与外交有关的职务，从二十年代初期起就退休了。陈锦涛也曾积极致力于建立民国。孙中山对他是器重的，因为他得过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财政金融方面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才

---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成立的上海政府对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没有管辖权，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仍由上海工部局管理。这个政府有很多名字，可是一般都称它为“大道市政府”。最初日本陆军安排了一个从台湾带来的、来历不明的苏锡文当市长。帝国军队对他护卫森严，市民简直见都见不到他。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公共租界警察局对苏锡文和他的下属的揭发，使他们在公众中硕果仅存的那一点点信誉都丧失殆尽了。据约翰·比·鲍威尔反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载：他们“原是一伙劣等的诈骗犯和匪徒，多数人以前都在警察局里有案可查”。一九三八年十月，傅莜庵接替了苏锡文的职务。傅莜庵曾任招商局经理。正如鲍威尔所说，他在蒋介石有名的北伐战争中“选错了马”，因而被迫逃往大连，受日本人的庇护。十二年以后，他不顾那些声言要挖他的祖坟的公开恫吓，回到上海当大道市政府的市长。在任的两年中，他在市内来往所乘坐的汽车都有防弹设备。他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日深夜或十一日凌晨显然是被他的男仆砍死的，该男仆事后潜逃了。

干。一九一二年一月他被任命为财政部总长；一九二〇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时，再次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一九二七年，南京当局怀疑他与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有勾结而把他逮捕，释放出狱后，转向学术研究。他被梁鸿志说服而重返政治舞台，并接受了维新政府财政部长的职务。他担任该职务直到一九三九年他死时为止。[10]

梁政权的外交部长陈箓，是参加维新政府的唯一有声望的外交官。他担任过清朝和民国几届政府的重要的驻外使节。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八年，他任驻巴黎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员时，曾多次首当其冲地受到中国学生示威（至少有一次几乎丧生）的冲击。学生们把他看做是腐败的、媚外的北洋政府的代言人。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组成以后，一位权威的传记作家说，他的"惹人注目的外交生涯算是到头了"。他在维新政府任职不到一年，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被一伙国民党的刺客杀掉了。[11]

日本人发现补充干练的较低级官员也同样很困难。维新政府对它自己的人员是否忠诚，一点也没有把握。用保罗·莱因巴格的话来说，"这些不忠诚的士气低落的家伙，往往是如此之腐败，以致日本军政界必不可缺少的政府机构都不能放心地使用他们。"[12]在罗致人材方面有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作为官僚们合作者的日本顾问的名声极坏。当一个美国外交官问到一个维新政府的官员担负什么官方职责时，他回答说："哦，不不不，日本人负责一切。"[13]

维新政府由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个院组成。*行政院下设七个部。设外交部一事是很令人奇怪的，因为维新政府从未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外国所承认，而且显然也从未在设法取得外交承认方面作出过认真的努力。大家都记得，临时政府就未设外交部。东京当局为了澄清这一点，指出临时政府最后将掌理外交事务，而维新政府则在两个政府合并以前，在外交方面行使"代理权"。[14]

同样，在更为迫切的税款征收和分配的问题上，东京当局企图努力保持这种错觉：即华北政权是上级机关并将"掌管"税收方面的职责，它现在只是授予南京政权以"代理权"。这种安排同样也是打算延续到两个政权合并时为止，到了那时，也就没有必要由"地方"来征收和分配税款了。然而，事实上两个政权从未进行大规模的合并，连日本所建议的有限的合并也未做到，其原因就是在税收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两个政权在财政上都陷人了极端严重的困境，因为英国及其他国家一直在管理关税的征收，不让它们染指。联想到国民党政府的税收在过去几

---

* 按伪维新政权设两院八部，即伪行政院、伪立法院，伪财政部、伪司法部、伪内政部、伪外交部、伪绥靖部、伪铁道部、伪实业部、伪教育部。——译者注

年中一直依靠关税提供百分之五十三的情况，就可估量出这两个傀儡政权在财政上蒙受多大的损失了。[15]因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将军对新闻记者说，即将成立的政权“必须从关税方面开辟财政来源。”[16]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日本为了实现松井的要求，代表傀儡政权与英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同时，日本也有她自己的利益需要照管。战争初期，海关督办英国人弗雷德里克·威·梅莎爵士采取步骤冻结支付辛丑条约所规定给日本的赔款和中国欠日本的其他债款；而这些款项对于日本是极其必需的，因为一九三八年她的战争开支增加了。等到日本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屈服时，就把与她自己关系最密切的问题解决了——把被停付的债务款项解了冻。一九三八年五月，在上海海关监督命令下，中国海关乃将税款解交横滨正金银行。这位监督对国民政府解释说，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不可抗拒的逼迫”。其实日本并不准备为她的傀儡政府再对英国施加压力，而英国是如果没有压力就绝不肯让步的。[17]结果，傀儡政权仍旧不得染指唯一能减轻他们的财政困境的关税收人。

最后的结果是，两个傀儡政权只得依靠日本悭吝地支付的经费，依靠非法收人、滥发钞票和压榨人民过日子。日本的财政支持充其量也不过是断断续续的，而且是通过特务部和各种特务机关的秘密户头来支付的。可以说这对傀儡政府将来的财政独立是毫无帮助的。这种津贴的办法，即直接为了战争目的而提供款项的做法，为贪污和受贿大开方便之门。

维新政府的非法收人主要是指在上海的敲诈勒索，这就是说，日本和维新政府都认为同几乎是独立王国的上海匪帮相勾结是合算的。这帮匪徒控制着上海财源广进的地下社会，也控制着这个城市大部分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至于滥发钞票方面，日本在华中多少总比在华北要稍微谨慎一点。例如，日本就没有以强迫人们使用维新政府货币的做法来破坏国民政府的法币。事实上，维新政府在成立了一年多之后才发行它自己的货币，甚至这时也没有采取认真的措施来禁止法币流通。华北可不是这样做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为了把华北地区纳入日元集团，对中国的整个财政金融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

日本在华中对财政“改造”采取半心半意的措施主要是由于它对这个地区的要求比较低的缘故。至少在当时，日本暂时安于华中留在日元集团之外的现状。这也许是由于日本从在华北采取了较激烈的做法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钞票不受欢迎，甚至连横滨正金银行也拒绝接受。尽管日本政府和临时政府的管制机构进行镇压，法币仍得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尊重，而且还得到兑换的贴水，这对日本来说是极为难堪

的，因为日本一直宣称发行法币的当局只不过是濒于崩溃的地方政权而已。

要是说日本并没有试图勉强把华中纳入日元集团，她却通过在华中地区滥发各种无贵金属或外汇储备的纸币的做法使维新政府的财政困难更加严重。这些货币通常规定了对日本有利但却很不现实的兑换比价，而军方则用它们去采购储备物资和补给品，并用它们去补偿那些倒霉的被没收了产业的工商业主。当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在争取他的同胞们支持时，他向他们呼吁的要点之一，就是他要做过去维新政府没有能够做到的事，促使日本恰如其分地补偿中国业主被没收的财产，或是设法发还中国业主的财产。

华中开发公司

从日本的观点看来，成立维新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日本控制华中的工业、运输和交通事业的计划得以实现。

维新政府承认这些计划，比容忍上面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比较个别的征用和没收的事件，更加暴露了这个政权的傀儡本质。那个所谓华中“中日经济提携”的庞大计划，包括了由特务部的代表和梁鸿志签订的大量协定，而这些协定是有关华中开发公司和它的十来个子公司的业务的。[18]

华中公司和它在华北的对等公司一样，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命令成立的。但日本仅仅投资一亿日元（对华北公司则投资了三亿五千万日元），这就反映了日本对这个新企业的要求比较有限。按照日本官方宣布该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搞复兴和重建工作”。[19]这同在华北是强调开发和加工自然资源——察哈尔和山西的铁矿、山西和山东的煤矿以及塘沽附近和沿渤海湾的盐田——恰好形成对比。华中虽有许多类似的资源，但比较起来数量则少得多，因而日本人才决定强调复兴该地区的工业并取得对交通运输设施的控制。

然而分配给华中公司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至少这个公司必须负责治好战后的创伤这一点就够繁重的了。仅仅恢复铁路交通这一项工程就很浩大：几十座铁路桥梁和几百英里的轨道被炸毁或者不能行驶了，经过了长江下游的战役，全部铁路车辆只有百分之七是完好的。[20]

华中开发公司（象华北公司一样）只是一个控股公司，并按照此控股办法组织和资助各子公司。从它在一九三八年创设的各子公司的名称来看，就可以证明日本在这一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的范围了。它们是：上海内河航运公司、华中供电和自来水公司、华中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华中铁路公司、

华中矿业公司，等等。这些子公司被认为是“中日联合经营并在中国注册的有限公司”。这些子公司的资本来源于三个方面：华中开发公司（实际上就是日本政府），日本的实业公司和维新政府。不管怎样，日本的资本投资保证了她对这些子公司的控制。维新政府必须进行合作，以便为这些子公司顺利经营奠定法律基础，并保证以日本人为经理的各公司都配备中国人来担任副经理作为助手。最重要的是，要求维新政府特许各该子公司在垄断的基础上进行营业，并在纳税方面给予特权，实际上就等于完全豁免了这些子公司缴纳财产税和所得税的义务。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签订的协议的规定，日方“合股人”对影响公司业务的全部重要决定拥有绝对控制权。在与傀儡政权达成的协议中，经常是用“事先磋商”这类条款来实现这种控制的。其结果是，维新政府虽然在纸面上对这些新企业拥有相当大的监督权，可是事实上它只有在同日本当局“磋商”后才能行使这项权力。另外，根据十二月十五日的协议，当“军事上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时，日本当局有权先采取行动（对各“联营”公司提出要求），只是在事后才通知维新政府。[21]

华中开发公司即使只能说明日本和维新政府之间的关系，仅仅这个原因对本书的研究也就很重要了，何况还有其它几个很有意义的原因呢。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研究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其后的事态发展，确切地说，是因为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开始为他的政权进行谈判时，他发现早先的傀儡政权所干的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一笔勾销的，最后只好同意承认所有的协议，把它们当作“既成事实……并根据发展的情况将逐步予以调整。”[22]其实这是一项不明智的让步。这一让步使汪精卫承担了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要把日本人从梁鸿志和王克敏那里获得的特权“逐步”夺回来。

第二，对华中开发公司（和其他有关控制中国经济的计划）的分析，可以揭露近卫首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宣布的“东亚新秩序”的本质。这个公司是“新秩序”的具体表现。通过对它的研究，人们能够从近卫政策中的抽象观念看到具体的现实情况，从而了解所谓“互助”和“紧密的经济提携”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三，华中开发公司以及“新秩序”下的类似计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计划说明了以日本的控制来结束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的企图的铁证。西方外交官们由于看到了华中开发公司的业务活动情况，看到了不向西方国家开放长江以进行商业运输以及傀儡政府在外汇和征税方面采取有歧视性质的措施等情况，开始察觉到日本所宣称的无意在中国排斥“第三国的经济活动”是没有诚意的。他们的怀疑由于“新秩序”的宣布而加深了。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向英国大使罗伯特·克

雷吉递交的备忘录则更充分地证实了这种怀疑。有田外相在备忘录中宣称：在“新秩序”下，日本大概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她认为对防务、经济或战略目的十分重要的领域。但有田又补充说，在这些方面仍然欢迎外资，但却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打算排斥要来进行竞争的企业。[23]

日本在中国扶植的各个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证明了日本企图利用它们作为“反对第三国权益的特殊工具。”[24]为此，西方国家认为日本人对傀儡政权的支持同明目张胆地并吞中国领土没有什么区别。的确，外务省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出了类似的指责。一九三八年六月，他曾奉劝宇垣一成外相说，他的“感觉是，日本人以宣称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的手法来掩盖日本实际上是在打一场征服性战争的真相。”[25]西方国家对于使她们有百年历史的利益和特权受到歧视的“东亚新秩序”是不愿接受的，因为“新秩序”的确是以日本独占为基础的，这就为通向珍珠港事件铺平了道路。

联合委员会

显然，东京的某些当局对于大陆上几个派遣军司令部所造成分裂中国的局面颇为恼火。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从一九三七年末最初考虑在华中建立另一个政权时，就曾力图向东京保证：不打算使计划要成立的政权同临时政府唱对台戏，并对维新政府“给予引导，从而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顺利地与华北政权合并”。[26]

参加新政权的人员都理解新政权是过渡性的，而且梁鸿志在就职典礼上也向公众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宣称：“维新政府基于江苏、浙江等省的现实状况而建立，因而它是暂时性的，它的成立完全无意与临时政府唱对台戏。”[27]梁鸿志接着保证说，一俟横贯东西的陇海路和纵贯南北的津浦路恢复通车，就实现两个政权的联合。

日本的五大臣也许已经预见到日后几年中游击队将要进行破坏铁路的活动，对于定出恢复通车的这类期限表示颇不耐烦。一九三八年七月，五大臣召开会议并决议应当把各傀儡政权“尽可能早地引向合并，成为一个政权”。他们说，一旦这项任务完成了，新政权“必然会作为一个新的事实上的政府得到国内外的承认”。同时，五大臣坚持新政府应当建立在“分治合作原则”的基础上。[*]这样一来五大臣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他们一

[*] “分治合作”是许多日本政策声明中所用的一个简明的短语，用以描述理想的中国政治制度。可惜这个短语没有简明地译成英语。它由四个汉字组成，字面上的意思是“几

方面需要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性的政府”，从而可以博得西方国家的尊重，因为西方各国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在是否对国民党政府承担义务方面还未下决心；[28]可是在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这种想法：即一个分裂的中国对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目标最为有利。但是，负责联系傀儡政权的特务部官员却没有那种矛盾，他们不把国际外交方面的重要性放在眼里，全力支持他们在各傀儡政府中的代理人。同样，在大陆的各派遣军司令官及其参谋人员也没有类似的疑虑，他们只以伪政权对于战争的贡献大小来衡量它们的价值。其结果是，这些“在前台的”官员对五大臣要求合并傀儡政权于一体的问题不断地加以阻挠。

五大臣七月会议后不久，作出了汪精卫上台以前的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有意义的统一傀儡政权的努力。这项工作完全由日本来指导，首先归五大臣指导。他们在七月十五日决定“引导”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去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九月九日至十日，两个政权的代表顺从地在大连这个中立地带的大和旅馆会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解决了一些日本人准予他们解决的细节问题。[29]联合委员会于九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它的目的非常有限，其成就更加可怜，完全按照炮制该委员会的帝国陆军军官的意图办事。观察家们注意到，成立典礼上帝国陆军军官的人数多于联合委员会的成员；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恰如其分地象征着委员会的性质。[30]

如果说联合委员会拥有任何实权的话，那也只是在华北：指定了北平为委员会的正式会址；王克敏任主席；华北政权的代表占多数。委员会并不拥有立法和行政的职能。本来赋予它作为一个筹备委员会以逐步建立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的任务从未实现过，甚至也没有尝试这样做过。它的每月例会除了愤怒谴责国民党政府容共之外，可以说啥也没做。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进行的实现“真正的国民政府”的唯—一次真正的努力，又完全与联合委员会无关。这次的努力把最大的希 121 望寄托在前军阀吴佩孚的身上，而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以后则日益集中在汪精卫身上，可是他们两人在联合委员会的代表中都不孚众望。

不过，在一九四〇年三月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前，联合委员会一直在中国的日占区起到近乎全国性政府的作用。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它那可悲的失败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国家的统一方面它之所以没有能力

个独立的政府共同工作”。日本人的设想是：把一个中国分成几个自治的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只是在一个松散的、不集中的全国性的体系中进行合作。“分治合作”的概念显然完全同国民党的目标大相径庭。

* 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北平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该会的参加者有；伪临时政府的汉奸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伪维新政府的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陈群。——译者注

采取超出象征性的步骤，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傀儡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在如何操纵只具有有限目标的地方政权，以及在设法达到这些目的所运用的技巧等方面都是行家。而且他们都有理由担心统一的倾向可能危害他们的地位和目标。一九三九年，当汪精卫上台时，他就面临着克服国家统一的阻力的任务，而操纵这种阻力的人们正在开始为从政治上分裂的中国得到的好处夸夸其谈地辩护。

那些主张分裂是合理的论点可以归结为一点：中国最好由一个联省的政府来管理，因为那样一种制度最能照顾到全国各地发展的显然不平衡。各省在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上都处于不同的阶段。广州、汉口、上海、北平和沈阳等经济中心仍应继续起支配各该地区的政治单位的作用，但应参加统一的联省政府。伪《新民报》在这个题目上大做其文章：

> 至于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合并的问题，两府的政治家们对此已谈论多时，不过合并的条件则非常不利。首先，两府在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诸方面彼此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考虑在内，这三个政府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每一个政府都有它自己的具体政治情况，要奉行自己的方针。在这三个政府中；蒙古政府是最早有它自己的货币和一个独立国的国家制度的；因为这一地区原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非常简单，通过日本的权威，用一个新的制度来代替它是很容易办到的。第二，由于临时政府成立较早，并且进行了相当认真的研究；因而成就比较显著，诸如在一九三九年春建立了联合准备银行以及主要是在北支开发公司主持下对发展经济方面进行了重新组织的工作。至于维新政府，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长江三角洲上，有高度且畸形发展的大都市——上海，而且长江流域的外国势力的影响又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新的经济制度还不存在，改革币制也还未开始。维新政府注定非慢慢发展不可，甚至会比日军占领汉口后可能建立的政府的发展还要慢些。所以，尽管各个政府的目标相同，方向一致，但是它们实际上各自都有独特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把这些区域置于一个政府之下是不可能的。[31]

汪精卫对于改变这种观点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于改变日本人所支持的这种观点是无能为力的。这就使得他所声称的、同日本人合作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中国主权的主张大为减色。事实上，同日本人进行合作，汪精卫已被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阴谋所利用了。在我们再讲到这个重要观点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地研究一下日本在内

蒙古的傀儡政权。

---

[1] 见入江明的《热衷于帝国主义：一九二一——一九三一年在远东谋求建立新秩序》第 111 页。
[2]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 143 页。
[3]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 344 页。
[4] 见埃德加·斯诺的《为亚洲而战》第 49 页。
[5]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 65—67 页。
[6] 关于大民会活动的详尽的描述，见上书第 70—74 页。
[7] 据田尻爱义（驻香港总领事）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给东京外务省的报告，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136 页。
[8]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第 119 页。
[9]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 197 页。另见霍华德·布尔曼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 351—353 页。
[10]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 170—172 页。
[11] 同上书，第 213 页。
[12] 见保罗·莱因巴格的《蒋介石的中国》第 196 页。
[13]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 311 页。
[14] 见《东方事务》第九卷（一九三八年）第 276 页。
[15] 见 Y·C·王的《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年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 457 页。
[16] 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 89 页。
[17] 见上书，第 86—96 页。
[18] 《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刊登了几个这类协定全文的英译本。译文是根据高宗武和陶希圣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叛离汪精卫时揭出的文本译的。
[19] 见《东京公报》第十八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 2 页。
[20]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135 页。
[21]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第 186 页。
[22]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326 页。使汪精卫感到懊丧的是，在一九四〇年三月汪政权建立之前几个月间，经济协定大量增加，名目繁多。另在《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255 页载有汪精卫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就此对日本当局的抱怨。
[23] 见英国外交部的《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英国外交政策文献》第二集第八卷第 323 页。
[24] 见弗兰兹·迈克尔的《傀儡政府的重要性》（载《太平洋事务》一九三九年第十二期第 408 页）。

[25] 见臼井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一文（载《朝日杂志》社编的《昭和时代历史片段》第一卷第 285—293 页）。
[26]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127 页。
[27]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 130 页。
[28]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65 页。
[29] 日本人控制大连会议的议程和实质性问题，从海军特务机关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给他们的东京上级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得到证实。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165 页。
[30] 见《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 295 页。
[31] 见乔治·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 179 页。另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华北先驱》杂志第 402 页对南京维新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所发布的“通告”作的评论。

第七章 内蒙古

且不去说联合委员会还有其它各种缺陷，就是单从形式上来讲，它也不能自称代表中国全部沦陷区，因为关东军根本不让其内蒙古傀儡政权的代表参加这一新机构。这一点对委员会所造成的损害比乍看起来的还要大，因为内蒙古政权统治着以汉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而且其中还包括一些几乎全是汉人居住的地区——例如晋北。关东军的做法显然与五大臣的意旨背道而驰，他们曾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明确宣称：这个委员会应有内蒙古政权的代表参加。[1]

虽然内蒙古傀儡政权统治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但我们并不准备对此加以详细论述，因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中国傀儡政权，而是一个日本卵翼下的、由非汉族人领导的蒙古自治运动。尽管如此，由于它与纯属汉人的对敌合作政府之间有些外在的联系，所以在这里略为考察一下它的突出特点还是适当的。[2]

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年代中，汉人开始大规模侵占长城以外的土地，而这个地区一向是北边纯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和南边务农的汉族之间的毗连地带。当蒙古族还很强盛的时期，他们根本不准汉族移民到这个地区来。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蒙古各部落都很衰弱而且四分五裂。随着铁路贯通蒙古牧区，使这个地区与华北的城市有了商业往来，这就加速了汉族向这个地区移民。只要有可能，汉族人就采用巧取豪夺的办法，把土地从蒙古部落酋长和王公的手里夺过来。在其余的地方，汉族人则利用新式武器的优势打败了那些企图抵抗的人。无论属于前面哪种情况，其结果都使长城外的广大地区汉化了。一九二八年，在一度为蒙古族的疆域新建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等四个省，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标志。

虽然某些蒙古王公和酋长对用官衔和俸禄来补偿他们失去的土地（以及民族尊严）是满意的，可是另外一些人却利用蒙古人的不满情绪，煽起了一股不小的民族抵抗运动。等到关东军决定用几个蒙古的盟来对付中国以便进一步保护它的满洲帝国时，这个运动便同关东军的计划紧密配合起来了。因此，一九三二年以后，关东军便迫使它的满洲仆从采取旨在赢得蒙古人支持的行动。满洲政权把它的西部地区和原来热河省的一部分划出来，建立了兴安“蒙古族省”*，在这个新建立的省里，制定了包括保证蒙

---

* 即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建的“兴安省”。——译者注

古族牧地不受侵犯等广泛的政策。一九三四年，当溥仪登上满洲国皇帝宝座时，他提到了蒙古人在效忠于满洲皇帝的传统封建方式下重新获得民族统一的可能性。虽然蒙古族的领袖从未对同满洲国（和日本）结成联盟感到多大兴趣，因为这种联盟肯定附有不愉快的条件，但他们却能以此威胁南京政府，迫使他们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的年青王爷德王*算是蒙古自治运动最了不起的领袖了。[3]

德王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代子孙，是一个半汉化的蒙古人。他在青年时受教育于汉族和蒙古族学者。尽管他熟悉儒家经书而且是一个有造诣的汉字书法家，但他却总是穿着蒙古式的长袍，并且继续虔诚地信奉喇嘛教。象大多数内蒙古王公一样，德王对清朝皇室竭尽忠诚。作为一个青年人。他还对旨在使清朝末代皇帝复位的帝制运动甚表同情。

一九三四年，德王居然利用日本人提出了与满洲国结成自治联盟的建议为手段，迫使南京政府承认所谓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同年四月，该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并由德王担任秘书长。不过，该委员会的号召力一开头就被汉人腰斩了，因为这些汉人中有许多在行将划归该委员会管辖的地区都有既得利益。例如，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察哈尔省当局就破坏了禁止汉人继续蚕食蒙古领地的协议，在查布察新建了一个叫做化德的县†。欧文·拉铁摩尔就把力图阻挠蒙古实行有效的自治一事归咎于“阎锡山的晋绥利益集团”。拉铁摩尔指的是阎锡山所扶植的几个自治委员会。每一个蒙盟都设有一个自治委员会，由代表他的“利益”的人在名义上掌权。用拉铁摩尔的话来说，把这些傀儡蒙古王公“当作蒙古民族主义的象征，简直是一种讽刺，这等于在辱骂德王并不诚心谋求自治。”当南京政府于一九三五年认可了阎锡山的傀儡政策而抛弃德王时，德王转而求助于日本人。拉钦摩尔说，与其说德王“倒向”了日本，还不如说是把他“五花大绑送给了日本人的”。[4]

到了一九三五年十月，土肥原贤二少将（当时任关东军所辖沈阳特务机关长）已经使德王确信蒙古自治运动和关东军的战略需要之间并不存在

---

* 德王即原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在日寇指使下，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会议”，成立伪“内律古自治政府”，任“秘书长”，七七事变后，成立用蒙古军政府，任“总裁”、“蒙古军总司今”、“军政府主席”；抗日胜利后，投靠蒋介石。——译者注

† 把蒙古查布察旗改名为化德县是汉人精心策划的嘲笑蒙古人自治愿望之举。因为化德这两个字除了“化之以德”的一般意义以外，也有“同化德王”的含意。德王识破了这个阴谋，等到后来他在那里建立军政府时，他就把化德二字颠倒过来，成为德化（即“以德化之”）作为回敬。（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 38 页）

矛盾。[*]及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建立一个由日本扶植的蒙古政府的计划已在顺利进行中。虽然蒙古人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间得到了日本小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是他们对汉族所占地区的袭击成效不大，还不足以证明日本对一个蒙古政府的扶植是有道理的。然而随着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战争的爆发，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关东军在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和蒙古分遣队的协助下，打败了绥远军阀傅作义的地方部队。有的日本军队从满洲国的基地向南推进，有的则从平津地区驻地向西推进，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华北和内蒙古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平绥铁路。九月十七日，他们沿铁路线越过长城到达丰镇，并且恰好在一个月之后到达了铁路终点——包头。到十月底，日本已经可以宣称，除了西部宁夏地区以外，至少在名义上已控制了整个内蒙古。[5]

随军的特务机关官员马上就把傀儡政权建立了起来。察南自治政府于九月四日建立于张家口，算是头一个傀儡政权。它立即成立了一个察南银行，发行和满洲国货币挂钩的钞票。不久，又于十月十五日在重要的交通和煤矿中心大同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应该指出，晋北和察南在地理上紧密相连，都属于桑干河流域。这两个政权都集中在五台山以北、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一块面积虽小却富于矿藏的地带里。由于这个地区居民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据日本人估计，在察南地区的蒙古人不到三百，而在晋北地区则仅有“二十来人”），[6]所以这两个政权的头目都由汉人担任。

然而汉人的“统治”为时不长，因为在关东军主持下，于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蒙古王公大会，并于十月二十九日把这两个政权并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新的联合政府以年高德劭的云王[†]为主席；当他于一九三八年死去时，他的职位由副主席德王继任。联合政府的首都设于呼和浩特，它是一个骆驼商队云集、满是灰尘的城市，是蒙古阿丹汗于十六世纪兴建的。[‡]关东军显然急于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联合政府不会被加人进来的两个汉人政权所控制，而是将由联合政府的第三种力量来控制，而这个联合政府本身也不过只是蒙古各盟的一个松散的联盟而已。当然在实际上，“顾问协议”确保了日本人对联合政府及其组成单位的控制。每个政权的组织法都明确规定关东军派出的最高顾问在实际上享有独断权力。[7]

---

[*] 据河边将军说（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 407 页），德兰于一九三五年去新京（即长春——译者），并且表示他“完全效忠”于满洲国政府。河边认为（但不敢肯定），德王收到了一笔“巨款”是使他决定同日本人合作的重要因素。

[†] 即原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译著注

[‡] 人们常用它的汉名归绥。它现在是于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由于诸如内蒙古政府设在何处这类表面特征的缘故，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日本正象中国反日报刊一直在指责的那样，让一个主要由汉人居住的地区落入她的蒙古盟友之手。但在事实上，关东军却是竭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的。例如，关东军为了应付汉人的压力，修改了原来的计划，不许蒙古军队进驻张家口。它的说法是，汉人之所以害怕压迫和掠夺是合乎道理的。同样，该军也表示赞同其他地区的汉人宁愿要日本人来统治，而不要蒙古人来占领。就操纵内蒙古政权的日本人允许蒙古人享有一定种族特权的问题看来，那基本上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每一件具体和重要的事情（例如经济政策）都是由日本人支配的。据臼井说，那些宁愿同日本合作的汉人的确仍然构成一股“在经济上压迫蒙古人的势力”。[8]

由于本书主要是研究有关中日合作问题的，我们就不再进一步探讨蒙古要求自治和日蒙合作的问题了。不过，日本人如何处理察南和晋北的问题倒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考察的，因为它是留给汪精卫处理的大问题之一。

晋察这两个汉人居住省份的地方政权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对它们的控制无论如何要比来自呼和浩特的控制要紧得多。同把华北和华中分割开来的做法相比较，应该说：把这些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纯属汉人的地区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是把“分治合作”搞得更加极端的例子。如上所述，关东军曾竭尽全力阻挠内蒙古政权参加联合委员会，尽管这种参加只意味着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分治合作”中的“合作”成分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中是完全不”存在的。看来，关东军把这个地区留作它的特殊禁区，其动机完全是经济方面的。

关东军决定在晋北和察南扎根的做法可能是由于其将领们采纳了南满铁路公司（更具体地说，满铁的一个职员金井章次）的建议。南满铁路公司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它的名字所表示的那个范围。它在满洲拥有那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致外来的人几乎搞不清政府和公司的职权是怎样来划分和交接的。这条铁路也是一条大动脉，日本通过它，把人力和财力输进她在大陆上的帝国。这家公司一贯密切注意改善和扩大它的业务，差不多从一九〇六年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它就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到了三十年代，关东军的军官们对这家公司的专家和研究人员的技术性建议已是言听计从了。[9]就在满洲事变前几年，有个叫金井章次的专家开始提出了一个多民族的、自治的“满洲国”的设想。据说，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并立下汗马功劳的土肥原将军“就被人认为是受了金井的影响的”。[10]

金井是个医生（一九三〇年时任满铁医务处处长）、细菌学家、经济学家。此人多才多艺，而且据说还对“种族心理学最感兴趣”。[11]芦沟桥事变后，关东军把他找到总部，并告诉他不久即将派他去当“强大而且有前途

的”内蒙古新政权的顾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当关东军的本多旅团开进张家口”会时，随军而来的除一个新任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外，还有这个细菌学家兼经济学家金井。（大概就是这个金井，以“种族心理学家”的身份，策划阻止了蒙古军队参加占领张家口的。）当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金井成了它的最高顾问。[12]

金井认为，晋北和察南地区在经济上和地理上都同它们南边的中国地方不同，在经济上讲，内蒙古才是它们更自然的伙伴，实际上，平绥铁路已经把它们同内蒙古连结起来了，后来他又坚持认为，他是在研究了晋北的地方经济和物资流通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研究表明，商品运输量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晋北中心大同，作东西走向流通的，在大同和太原以及大同和晋南之间作南北走向流通的运输量则还不到百分之二十。[13]在五台山脉北沿的雁门关周围，崇山峻岭实际上形成了在晋南与晋北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应该指出，这个地理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那里的共产党根据地是最难以攻破的中国抗日据点之一，虽然大同和太原两地都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被占领，可是即使在白天，日本也始终无法控制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线。

察南和晋北地区盛产煤铁，它们向日本人提供了两项很有价值的战利品。其中最值得开采的是大同煤矿，估计其蕴藏量约为一百二十亿吨。该矿交满铁经营，迄至一九三八年底，雇用了大约四千名矿工来开采。[14]大同煤的价格政策是日本残酷掠夺中国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大同煤在平津地区售价每吨一千日元，而在横滨，同样的一吨煤则仅值四十日元。一位前帝国陆军军官引用这些数字时评论道:“大同地区的大多数中国居民认为，这种价格简直就是日本军队的掠夺行径。”他补充说，它给“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的共产党人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宣传材料”。[15]

察南的龙烟铁矿和冶炼厂是另一项重要的战利品。这两个企业都交给满铁的子公司抚顺煤矿去经营。可是这些厂矿都从未被充分利用。战争使日本经济紧张得始终无法去有效地利用她所赢得的战利品，这真是一桩很有讽刺意味的事。她无法提供资金来更新龙烟炼铁厂的设备。这个厂是一九一九年建成的，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铁价下跌而从未开工。她也筹不到资金来提高这一地区原有铁路的可怜的运输能力。中国共产党人对交通运输线的袭击也使该地区无法成为对日本经济有利的地区。有人认为日本的扩张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就晋北和察南的经验看来，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关东军把晋北和察南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

的。它的竞争对手华北方面军以及东京的陆军省都批评过它的做法。正如新近进行的一项历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一九三二年，“关东军是在无视政府和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反对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满洲的全面政治改组的。”[16]晋北和察南的政治改组也是在关东军照样违抗命令、东京当局照样迁就不管的情况下完成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约在晋北察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周，关东军起草了一项通过设在张家口的一个大特务机关来控制察南地区的计划。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将军把这计划送请陆军省批准，但立即被陆军次官梅津断然驳回。东条不肯罢休，他申辩说，如果关东军要在满洲国的边缘建立一个“安全地带”的话，那么这个措施就是必要的。[17]

不过陆军省也没有让步，它于九月四日发表了该省的计划，划定了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各自的管辖界线。陆军省建议把关东军的辖区限于外长城以北，而把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晋北和察南部分交给了华北方面军管辖。[18]这两支军队实际上都开进了上述有争议的地区；可是关东军却违抗陆军省的命令，并且终于占了上风。

十月一日，关东军发出一份冗长的文件，表明关东军的将领们打算自由行动，并要在有争议的地区造成既成事实再报政府。这个文件明确地全面提出设立蒙疆联盟的计划*。这个政权将由关东军来指导，其辖区则将向南延伸到内长城。尽管梅津将军不断抗议，指出该计划将“在我们与整个中国的关系上产生许多问题”[19]，关东军还是照样将该计划付诸实行。

近卫内阁对关东军的骄横跋扈也表示关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宣布：关东军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控制不能看作是永久性的，“到了适当的时候”，必须把察南和晋北交还给华北。[20]

关东军对内阁的这一态度非常恼火。在内阁举行会议的那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写信给陆军省说，他听到了有关内阁打算采取什么立场的谣言。他声称，把晋北和察南视作华北的一部分就等于“无视现实，会使人们对日本帝国陆军丧失信心；而且还会从根本上使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的全部计划付诸东流。”[21]过了两天，梅津陆军次官对此作了回答，他用了十分明确的语言来表示他是支持内阁的，并且表示强烈反对把晋北和察南

---

* 日本人对包括晋北、察南和内蒙古在内的地区使用蒙疆这一名称，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指蒙古的边界地区。中国人很少使用这一名称，就连傀儡政权中的中国人也很少使用它。他们对于该名称意味着把山西和察哈尔的一部分地区算作蒙古的一部分这一点都一致表示不满。这一名称是容易引起混乱的，因为“蒙疆”的“疆”和“新疆”的“疆”是同一个汉字。所以许多中国人就把蒙疆这个陌生的词解释为指“蒙古和新疆”，并且给日本加上了另一条扩张主义的罪状，其实日本从来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他警告植田说，关东军的野心包含着“将来同华北政权（临时政府）从而同整个中国……发生麻烦的种子。”[22]

关东军不理睬内阁的决定和梅津的警告。它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作出决议之前的行动表明，它并没有被内阁的决议弄得措手不及。早在一个月前，它已经扶植了一个所谓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按照关东军的指示，这个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属三个政权的代表组成的新机构将具有“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的资格”。[23]看来这个机构主要是负责有关运输、交通、财政和一般经济事务的。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关东军就和它地领导人缔结了一项秘密协议。协议清楚地说明了关东军的意图。条款之一就规定，不管将来关于这一地区有任何正式协议,“有关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职能将不会有任何变更。”[24]

联合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大部分操在日本顾问手中。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植田将军接到一封由蒙古三个自治政府头目所写的联名信，恳求关东军“领导”他们的工作。[25]他们特别请求植田推荐日本人和满洲国人当顾问，而委员会则将予以正式任命。委员会还打算指定日本的和满洲国的机构来“管理”它辖区内的“重要工业和运输设施”。委员会的首席行政官是委员长。德王是被提名担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个人。有一项“谅解”规定，当这个职位出缺时，由日本最高顾问行使其职权。一九三九年四月，德王因不满日本人的政策而辞职，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就接管了委员长的职务。

一九三七年，关东军就是通过这种政治花招谋求在张家口实现它五年前早已在沈阳实现了的故事。在上述两地，它都设法利用其“未经改造”的党派政客和资本家们，使它所控制的地区不让日本政府染指，而且都成功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蒙疆几乎一直是驻大陆的关东军司令部的禁脔。

可是关东军却失去了它在内蒙古的主要合作者德王的支持。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德王通过蒋介石的情报首脑戴笠将军，同蒋挂上了钩。虽然德王表示愿意逃往重庆，可是蒋却勉励他留在内蒙古同日本人维持表面上的合作。据说德兰从蒋那里得到秘密指示，要他做到“不亢不卑”。[26]国一九三九年末，一个访问内蒙古的日本人同德王会晤后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德王继承了几分成吉思汗的精神。”这位访问者还认为，“任何迫使他俯首贴耳的企图都是行不通的。[27]

---

[1]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5页。

[2] 有关这个时期日本人在内蒙古活动的较详尽的论著，可见栗原健的《日本的满蒙政策面面观》一书。关于内蒙古傀儡政权的文件载于《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7—184页。

[3] 霍华德·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6—10页收录了德王的生平记述。我并取材于原德王行政助理高姆包扎布·汗金（约翰·高·汗金）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
[4] 见欧文·拉铁摩尔的《对边疆史的研究》第437—438页。
[5]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74—278页，记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军事方面的活动。
[6]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22页。
[7]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2页）。
[8] 同上书，第143页。
[9] 见约翰·杨的《一九〇七——一九四五年南满铁路公司的研究活动》第3—11页。
[10]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76页。
[11] 见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密勒氏评论报》第258页。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9—140页。
[13] 上书第141页提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五月一日金井在《每日新闻》（信浓版）上写的一系列文章。
[14] 见约翰·阿勒斯的《一个日本制造的"成吉思汗"》（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302—303页）。
[15]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第一一三期）第54页。
[16]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178页。
[17]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页。
[18] 同上书，第141页。臼井在谈到这一计划时，认为该计划的起草人是关东军的将领们（见《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0页），而《现代史资料》的作者们则"认为"该计划的作者是陆军省人士。似乎关东军不可能插手这项计划。
[19]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74页。
[20]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4页。
[21] 同上。
[22]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174页。
[2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3页。
[24]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页。
[25] 同上书，第168—169页。和这封信类似的还有亨利·溥仪致本庄繁（一九三二年关东军司令官）请求派顾问及其他帮助的信件（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

第 123—138 页）

[26] 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 39 页。

[27] 见伊藤金次郎的《德王近况及新蒙古》（载《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六二七期第 206 页）。

第八章 解决中国问题的种种方案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日本负责解决中国问题的官员们，在许多涉及中国的政策声明、工作文件、讲话以及会议中，最经常强调的莫过于需要“统一”这个词了。代表形形色色的观点的人都反复地谈到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和统一行动的必要性。“统一”这个字眼被用得如此之频繁，其意义如此之含糊不清，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不过是官僚们为了回避问题实质而乐于使用的空洞词调之一。总之，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紧张气氛中，对于不关痛痒的和模棱两可的用词，有一种天然的爱好。以上这些因素对于强调统一的对华政策的迫切性可能都有些影响。然而，那样的强调还是完全合适地，因为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发生了不统一的状况，使得顺利结束战争的尝试——不管是通过谈判或是军事行动——受到了威胁。根据宫内大臣的秘书长松平安政侯爵透露，在一九三八年年中，天皇自己也为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明确而苦恼。松平摘引了天皇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次谈话：“前些日子近卫来见我时说，‘我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然而，今天陆军参谋总长却对我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都要进攻汉口。’一派说要结束战争，另一派甚至说还要进攻汉口。真遗憾，他们之间竟丝毫没有共同语言！”[1]

多田将军的建议于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中被推翻，五天以后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两桩事迫使那些持比较稳健观点的人在一段长时期内显然处于守势。他们站在多数意见的对立面。而多数意见深信日本有能力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对于给中国以决定性的“惩罚”之前就可以实现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甚表怀疑，对于当时（一九三八年初）天皇批准进行一场歼灭战则兴高采烈。仅仅在几年以前，那些自封为惩罚者的人们，曾经在满洲事变中对中国成功地使用了军事力量，这伙人在一九三八年对于那些主张少用武力手段的人则显得颇不耐烦。一个批判这伙人的批评者曾写道：“他们错误地鼓吹使用武力而不管后果如何，那只是一种幻想——以为他们从前用恐吓政策奏过效，今后如法炮制一番就能解决中国问题。”这个批评者还认为，把战争称之为“事变”，就说明了军国主义者对能否根本解决毫无把握，而只是一味盲目乐观，认为每发动一个新战役就能把中国的抵抗意志加以粉碎。[2]

如果说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在整个一九三八年仍占上风的话，他们还是未能恣意地扩大战争。一月中旬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又举行了二次决定其后对华军事战略的御前会议。由于两个月前，南京派遣军的纪律糟到了极点，在陆军参谋本部坚持下，决定在中国战场来一段“休整时期”。参谋本部认为，在开始新的战役以前，需要研究一下在中国的整个军事状况，建立补给基地，尤其重要的是，整顿大陆部队的纪律。参谋本部明确了政府当前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政权之后，就着手制订适合于持久战的战略计划，因为参谋本部感到肯定得打一场持久战。一月底，它起草了一个“进行持久战的克制政策”，设想分为三个阶段。[3]第一阶段——到一九三八年底——在中国继续进行一段战争休整，与此同时，日本则设法充实国家资源。在大陆，除了对日本已建立的傀儡政权加以扶持之外，别的事暂且不做。要到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包括汉口在内的中国城市。只要参谋本部的动员计划能得到实施，到一九四一年第三阶段开始时，日本将拥有一万架飞机和九十个陆军师团，能够同时对中国和苏联两面作战。

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墨迹未干，就遭到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制定的“进行持久战的积极政策”的挑战，这项积极政策反对拖长战争间歇时间，因为那样将使他们的部队士气不振。华北和华中派遣军都渴望继续进行战争，以便加强他们各自的战略地位。华北派遣军急于沿津浦路向南推进到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徐州，最后和华中派遣军会师。华中派遣军也对让它留在处于易受攻击地位的长江南岸的命令表示不满，要求渡江到北岸。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该派遣军违反命令，开始对长江北岸进行小规模作战。[4]在大陆的各个总部都不得不进一步推行“积极政策”，因为他们都对各自的傀儡们私下许了愿，只要没有把国民党中央政府消灭掉，那些傀儡当然总感到不安。[5]海军的某些单位对参谋本部停滞不前的政策也表示不满意，向陆军施加很大压力，要陆军沿长江向上游推进，占领象安庆那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因为它的空军基地对于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是必需的。[6]总之，海军同样也要求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多田将军和河边大佐支持克制政策，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尽管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导致日本和国民党之间最终和解的道路则决不能完全关死。的确，在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后不到一个月，多田将军和他的战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就开始同蒋介石的一位正式代表进行了谨慎的试探性谈判。多田和其他反扩张主义者对于搞合作政府并不热心，更没有把日本在东亚的命运与王克敏连在一起的想法。可是，得到广田外交大臣和其他内阁阁员支持的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却

决心用尽快消灭国民政府的力量来证实“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是明智的。近卫当时。对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还没有得出清醒的结论，那是他在几个月之后才觉悟到的。所以他没有反对“积极政策”，而这一政策很快地就得到了杉山陆军大臣和梅津陆军次官的赞同。

多田将军再次用参谋本部的名义反对扩大战争。经过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御前会议的一场激烈辩论以后，看来“克制政策”获得了胜利。*在天皇面前，多田取得了“维持现状，不再前进”的谅解。[7]

在二月十六日的会议上，天皇对于多田的胜利很可能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天皇一般在御前会议上很少开口，但这次他却询问杉山陆军大臣：听说陆军正在日益加紧对苏联作战的战备工作，海军也提出了扩军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吗，杉山对这问题一时手足无措，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同政府研究研究。[8]然而，同往常差不多，打仗的主动权总是操在战场指挥官方面而不在中央。用河边大佐自己的话来说，那时他被人们当成是石原“失败主义”派的“残渣余孽”。他接受了一项不可能有成功希望的任务：向大陆各派遣军司令官解释“克制政策”。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他在一次去大陆视察的过程中，“对他表示不满的意见多如雪片”。[9]多田将军不得不在三月一日河边回到东京后，把这位不孚众望的河边撤换掉。他的继任者稻田政纯中佐，害怕中国事变有“转变成为另一次西伯利亚远征”的危险——成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那次代价极大的惨败的重演。那次事件曾使全国对陆军的信心一蹶不振，长达十年之久。[10]为了避免这样一场灾难，新作战课课长立即不再提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改而支持一项新的“积极政策”。实际上，这项新政策只是把克制政策的第一阶段去掉了而已。于是，这就为陆军大规模进攻徐州开了绿灯。

三月十四日，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从山东向南推进。八天以后，尽管东京还未正式批准徐州战役，可是一个日本官员就已向驻北平的外国记者透露，战役目标是夺取徐州。四月七日，这个灾难性的战役终于得到了正式批准：帝国大本营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津浦路，向南一直推进到徐州郊区，在这里，与沿该铁路线向北推进的华中派遣军取得联系。[11]钳形作战方案需要动用关东军的后备军；而关东军在这以前一直都还没有动用过，以备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之用。稻田后来承认，从那时起，“关东军就只靠虚张声势与俄国人对峙了”。[12]陆军中那些一直极力主张限制同中国冲突的范围的人士（先是说限制在永定河，然后说限制在黄河，最后又说限制

---

* 这次会议是一次罕见的帝国大本营御前会议，那是天皇与陆海军举行的一次会议，政府的全部文职阁员都被排除在外。

在南京的城门口），这次可失败得最惨，因为徐州战役标志着力图把战争局部化的努力告一结束。诚然，四月七日，帝国大本营也曾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西至开封的陇海路全线——一项大大地超过了该军能力的任务。查默斯·约翰逊写道：“其结果是，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共产党人乘虚而入、游击战、日本人进行惩罚性的讨伐——这些情况都完全有利于延安日后长远的成就。”[13]

日本人不久就认识到他们把战线拉得太长了。要占领徐州，就必须先清除台儿庄的敌军。台儿庄在徐州东北三十五英里，是津浦路南侧的一条支线的终点站。起初日军进展迅速，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可是到了三月底，显然中国人打算在台儿庄以及徐州外围几个筑有坚固工事的市镇一带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保卫战。帝国陆军突然发现它面临的敌军比它原来所设想的要多得多。据东京报道，中国人已经在一条二千英里左右长的战线上部署了一百九十个师。台儿庄并不是很有名的地方，但中国陆军大学的战术家们却很熟悉这个地方，他们早就把这个小镇周围的地区当作演习场地了。中国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在台儿庄附近投人了战斗，而日本步兵却得不到机械化部队的支援，开始遭到惨重伤亡。在战争中，中国人第一次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了重要城镇。随着由防御转人了反攻，中国人在战争中也第一次有了乐观主义甚至是振奋的情绪，不再认为日本人是无法战胜的了。当朋友们告诉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说，他们现在认为中国有可能赢得战争时，他表示同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14]

台儿庄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八天。双方都数次声称占领了该镇，可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小镇经过最初几个昼夜剧烈的白刃战、轰炸和炮击，已成为一堆硝烟弥漫的废墟。《朝日新闻》的一个记者于四月七日报道：“我越走近这个小镇，我看到躺在四处的尸体越多，简直是横尸遍野。”流经附近的大运河，据说“已被鲜血染红了”。[15]日本军队在这场战斗打响以后的第十七天把中国军队赶出了台儿庄，可是很少几个日本人还把它当作是一次胜利的战斗。以精锐著称的板垣师团丢了脸，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第二军司令官濑谷少将，由于玷污了军队的传统，被迫转入预备役。中国的将军们，尤其是“虎将”李宗仁则成了英雄。后来，日本的参谋人员在估计中国人赢得这次“巨大的胜利”和它对中国士气的影响时，说了很有分量的话：现在中国人“开始大言不惭地讲到歼灭日本军队了”。[16]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却没有抓住他们军队士气旺盛的时机，继续展开进攻。史迪威将军对中国领导人竟然“头脑中连进攻的概念都没有”而感到十分困惑。据说，国民政府的首席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

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对于台儿庄战役后蒋介石有意坐失良机“怒不可遏”。他抱怨说，“我告诉委员长挥师前进、扩大战果，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干。不久日本人就有八到十个师团进逼徐州，那么，一切都晚了。”[17]果然，五月十五日，台儿庄陷落不到一个月，日本军队终于把徐州包围了，四天以后，他们占领了这个城市。几百年来，徐州的得失是衡量每个王朝是否稳定的标准。徐州一旦陷落，王朝也就维持不了很久了。

灾难性的徐州战役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后果。一方面，扩张主义者没有从中国人猛烈抵抗中接受任何教训，立即要求进攻汉口。帝国大本营在命令进攻徐州时，实际上已经同意有必要把战争推进到汉口和广州了。六月十五日御前会议批准了这一计划。空军马上开始了轰炸，企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在另一方面，台儿庄的消息对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一些人来说，却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近卫终于同意了石原的意见：摧毁国民党政府是个错误的目标。从来不是以意志坚定出名的近卫，现在开始想方设法从他自己在四个月以前才宣布的政策中后退，并谋求起用对待蒋介石政权态度比较和解的领导人来负责战略问题了。他在宫廷、军界（主要是陆军参谋本部）和商业界的知名人士中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拥护。那些商业界人士对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脱节和不稳定甚为不安。许多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对于与各轴心国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明显趋势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到，日本的经济前途取决于同英、美的关系是否融洽。

可能天皇本人对于近卫改变主意也有影响。一九三八年春，天皇身边的人用诸如“消瘦”、“憔悴”和“垂头丧气”等词汇来形容他*。在原田日记中，有很多记载说明：天皇对于军事顾问和大臣们所报告的情况，他们对战争的估计，以及近卫首相能否坚定地掌握住政府并设法结束战争等，都表示了深刻的怀疑。[18]不论人们对于近卫在中国战争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会怎么评论，对于近卫来说，关心天皇的健康乃是超过一切的。近卫首相是贵族出身。他的祖父七十五年前曾任年幼的明治天皇的首相。不能设想，近卫会对天皇漠不关心，而天皇正是由于战争的扩大而感到苦恼的。

近卫也得到了聚集在他身边的一批有影响的顾问们的鼓励，其中有些人是内阁参议——近卫一九三七年十月为了绕过他的官方内阁而设置的一

---

* 尽管天皇“非常的消瘦”，可是宫内侍从长和其他人等都不愿意他到他的海滨别墅去疗养以恢复健康，免得他被人指责为给士兵们树立了一个不英雄的榜样。（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 247 页）天皇的顾问们也不同意他到他的豪华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去工作，理由是；在国家处于厉行节约和作出牺牲的年代里，追求那样舒适的生活是不负责任的。（见伦纳德·莫斯利的《日本天皇裕仁》第 181—184 页）

种职位，以避免事事通过内阁的麻烦。宇垣一成将军是最先担任该职务之一，由于他宣称“毫无牵挂”，乐于为解决中国问题效劳，而博得了近卫的信任。[19]近卫的另一顾问是尾崎秀实*，他后来因为受苏联间谍理查德·索尔格案件的牵连而声名狼藉。尾崎担任内阁谘议，一个比内阁参议官方色彩更少的职位。然而，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他一直在近卫非正式内阁中担任职务，并且无疑地向首相提供了他对中国事务的卓越的知识，传达了他认为侵略中国的政策必然严重地损害了日本的最大利益的深刻信念。按照尾崎的观点，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日本只有同那种鼓舞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的民族主义的真正利益站在一边才有可能结束战争。[20]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这段时间里，近卫也听取了昭和研究会†和早餐会的意见。一九三六年，近卫正考虑接受首相职位时，他的朋友后藤龙之助创办了昭和研究会。后藤的目的是搞个“智囊团”，网罗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一些问题，向近卫献策。早餐会是一九三七年底近卫出任首相以后成立的。这是一个由昭和研究会核心成员中精选出来的人物组成的非正式的讨论小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这批教育家、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每月在内阁办公室、首相官邸或西园寺公爵（他的孙子西园寺公一是该会的著名成员）的官邸，聚会两三次并共进早餐。虽然首相不经常出席这些聚会；可是他的秘书牛场友彦和彦道三则经常向他汇报讨论情况。一九三八年年中，早餐会的几个会员，特别是松本重治和犬养健，已经开始从事解决战争问题的活动，并就通过与汪精卫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与酝酿。这一点是很有重要意义的。近卫对那些谋求结束日益加剧的冲突的人们的活动和建议，显然至少都是同情和注意听的。

虽然近卫周围的这些团体，代表着不同的观点，提出过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武力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他

---

* 尾崎秀实（1901—1944），日本评论家，研究中国问题，历任日本《朝日新闻》驻华特派员、近卫文麿的顾问等。后因索尔格间谍案，被判死刑。著有《现代支那批判》、《现代支那论》等。——译者注

† 昭和研究会是近卫控制下的一个智囊团，从事于研究和制订国策，曾提出有关日本内政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方案，供近卫内阁采纳。该会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一九四〇年十月解散。参加者有法西斯战犯贺屋兴宣、青田一男、吉田茂等人。该会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译者注

‡ 夸大这些团体成员的反战情绪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由于胆子都很小和总是日对侵华战争提出极其有限的反对意见，而受到了战后作家的严厉批评。尽管昭和研究会的会员们对于大日本主义和帝国军队在中国表现的民族优越感很不满意，但他们还是赞同把东亚从西方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一目的的。一九三八年三木清所写的一篇文章，最能说明他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了。三木清是昭和研究会会员，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文章中指责日本对中国使用武力，而靠使用武力显然是不能永远占领中国的；可是他又坚持认为日本“并不一定想把日

们对于中国形形色色的、显然无力的傀儡政权，也差不多都同样表示厌恶。

随着一九三八年的过去，大家都日益清楚地看到，没有哪一个主要的傀儡政权能够号召必要的群众来效忠于一个对日本友好的新生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把那怕只是勉强算重要的人物从国民党方面争取过来。地方军阀不仅没有用他们的军队去支持任何一个傀儡政权，反而集中大量兵力进行抵抗，这使日本战略家们大为惊奇。到了一九三八年，没有人敢自信地断言冲突结束了。日本被迫采取非常的措施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一九三八年三月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法"，规定"战时的立法权全部授予内阁掌管"，标志着议会政府的崩溃。[21]这就很容易成为走向军事独裁的第一步，而近卫和很多随着打一场全面战争这个大流走的人都十分厌恶这种发展趋势。尽管如此，四月份起各级学校都强迫实行军训，又朝那个方向前进了一步。军事供应上的需要，对一个资源异常贫乏的国家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而且这个负担愈来愈沉重。原棉和棉布在国内市场上脱销，铁"稀少得象黄金一样"，农林省的化学家在"研究用老鼠皮制革作为皮革的代用品"。一个《纽约时报》记者报道："现在已很难买到一个炒菜铁锅，恐怕一个月后就不可能买到了。"[22]战时原料缺乏的情况是如此之严重，以致许多工业，包括重要的水泥和造船工业只能半开工，而且情况日益严重。[23]一份最近的研究论文表明：早在一九三八年，工时的延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和营养不良就开始严重损害着一般劳动人民的健康了。[24]一九三七年末，内务省通知各工厂主，一个劳动日的"最高限度是十二小时"，但也指出，"如果确有需要"，可以加班两小时。尽管那样，也还有人批评这个规定同战时经济不适应。休息时间和吃饭时间都被取消了，"每天干十四小时激活是很普通的"。[25]对少数神经过敏的人来说，银座（东京的闹市。——译者注）禁止使用霓虹灯也是战争带来的一项可喜成果——小说家永井荷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不开明的军政府的一项开明的法令。"[26]但是，

本的观点强加于中国"。他写道："这一点，从日本领导人通常认为儒家学说是华北文化工作的指导原则就可以看出来了"，而"儒家学说可以看作是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共同纽带"。（见三木清的《支那事务及日本的想法》，载《现代日本》一九三八年第六期第 608 页）。三木在帮助近卫形成东亚新秩序的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征召参加了陆军写作队（一个由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单位）。在菲律宾经过短暂的服役后，他决定不能继续使用他的笔杆子去主持战争了。有一段时间，他在东京的苏菲亚大学避难。一九四五年三月，因为供给一个越狱的左翼朋友以衣食，违犯了"维护和平法"而入狱。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当局释放全部政治犯的前八天，三木死于狱中。关于昭和研究会和三木的生平，见皮奥维萨纳的《代表痛苦一代的思想家三十清》；斯波尔丁的《一九三二——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新官僚》和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第 114—122 页。

对大多数人来说，禁止使用霓虹灯是厉行节约的象征，在情况好转之前，前景只会越来越糟。

在徐州战役时期开始的重新估价过程，最后并没有导致战争的逐步降级或使日本对华政策得到统一。可是，它的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引出了一连串高水平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建议，使内阁改组了，使陆军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人事大变动，使已宣布的国家政策来一个大转弯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新机构来掌管有关对华事务，等等。最后，还导致了批准几个为通向和平开辟新途径的“工作计划”。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内阁的改组，而这次改组把陆军省和外务省都交给了新的领导。

紧接着倒霉的徐州战役，近卫差不多就接近于要辞职了。他身体显然不健康，这或许与他渴望离职有关。不过，当时还很难断定，近卫究竟是由于健康的关系．而躺倒不干，还是单纯为了逃避那费力不讨好的责任——处理几乎无法处理的国家危机。*在同军方不断发生的冲突中，近卫并没有占上风，而为了保持对国家事务的控制，这种冲突是必不可免的。他并不欣赏政治论战，但他自认为超然于论战之外。他首先是一个贵族，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早餐会里的一个同事说，“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贵族。”[27]在日本，没有比近卫的门第更高贵的了。几世纪来，藤原家族和它的最显贵的支系——近卫家族——都在统治着日本，甚至当它的权势衰落以后，也还继续从这个家族中选出日本皇后和其他重要的宫廷人物。近卫很容易同天皇接近，而且能够颇为正确地使用天皇的语言。从少年时代起，近卫就开始使用矫揉造作的古老词汇了，而正是这种词汇使得天皇讲的话无法为大多数日本人所理解。大人从小就教近卫用皇室的方式称呼他的双亲为“御父”和“御母”，而不用习惯的称呼父亲和母亲。[28]

近卫具有的贵族性格和品德，使他成为一个被大家注意并极为重视的政治家。可是那种传统的软弱性，则又使他成为一个优柔寡断的蹩脚领导者。他将近六英尺高，使多数日本人相形见绌。他的才华很高，但对中国却是惊人地无知。据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讲，他同他的文学俱乐部白禅社里的知识分子和唯美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集体，而且“喜欢邀请学者们尽可能经常地给他讲课”。[29]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翻译了几部

---

* 鲁斯的出版物对近卫的多疑、失眠、孱弱和偏见很感兴趣。《生活》杂志称他为“天生的多疑症患者”。（见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号，第 111 页）。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时代》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并根据不具体的证据推算出来：“从二十五岁起，他每天有半天消磨在床上。”《时代》杂志说，“实际上，他的卧室是他的指挥部，他不仅在危机时刻躲到卧室里去，而且在那里读书、开会、看电影、听无线电、吃饭和睡觉，而且还在那里担心睡不着觉。”（见该刊第 32 页）对此人更客观的评价，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 281—283 页和斯托里的《藤原家族的末代子孙近卫文磨》。

奥斯卡·王尔德（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文学家，著有《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剧本。——译者注）的著作。一九一四年，他翻译了王尔德的《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书。这本书好象是引起了这位年轻公爵内心的共鸣。他衷心地同意王尔德关于劳动并不是人生目的的论点，而过有教养而又风雅的舒适生活和悠闲度日才是人生的目的。（几个世纪以来，以优雅、懒散、肤浅地涉猎艺术和卖弄风骚而著称的日本贵族，的确是王尔德典型理想的体现。）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根据他同近卫相识四年的体会，断言近卫是"迟钝的"。"近卫的表情说明，他既没有活力又不果断，倒是带有一种哲学家的疑虑……他的眼睛最能说明他的特征，它显示着智慧和政治敏感，但又带着懒散的神情。"[30]一九三八年夏，《亚洲内幕》的作者约翰·根室在拜访了近卫之后也作了类似的描写："他看来缺乏干劲——也许他烦恼死了。"他举出了近卫不守时刻和极端厌烦早上（上午十一点以前）的约会的特点，并且补充道："他的朋友说他简直是个典型的懒汉。"[31]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近卫的形象，是一个身体虚弱、态度客气、难以捉摸、很有教养、深于世故、忧郁沉默的人。对他的秘书来说，他好象是"一个孤独的人"，"几乎是哈姆雷特式的人"（哈姆雷特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悲剧的主角，以孤独、忧郁著称。——译者注），他"打心眼里从来不完全信任任何人"。牛场重复了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对近卫的评价后，回忆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缺乏领导能力。最后，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军队"从来不说，'不行！你们必须这样做'"。[*]

在争论"全国总动员法"的过程中，近卫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这位心神错乱的近卫乃借口身体不好，躲到他在东京郊区荻洼的别墅去休养了。徐州战役的发动只是增加了他的沮丧和失望，至少早在三月十七日，他就已在私下里谈到辞职了。[32]三月二十九日，他觐见天皇请求批准他辞职。近卫说，要让"我这样有名望但无实权的空想家来无限期地负责这个局面，那是极端困难的"。他建议，如果任命一个"有实权的人"来负责，将会更合适一些。[33]两天以后，近卫在和原田熊雄男爵的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最后促使他辞职的原因。杉山陆军大臣突然飞到华北，除了曾告知海军大臣要作此行以外，他既没有告诉近卫，也没有通知任何内阁

---

[*] 根据一九七〇年五月访问牛场的记录。西园寺评论（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1页）道："作为个人来讲，近卫有很多优点。他有敏锐的直觉感和比较精确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他不为小事操心。在当时的政治家中间，没有人在这些方面胜得过他。可是近卫却不具备一种很重要的品格，那就是他没有一股子力量，……没有把一件事做到底的魄力……日本的行动路线早已由军方决定。军方的政策就是国家的唯一的政策。首相、天皇等人的意志，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

成员说明这次使命的目的何在。近卫告诉原田说，“陆军所有的活动，都是这样干的”。近卫说，例如，军部甚至坚持要速选军人负责华北和华中地区各国策公司。这才真是个讽刺，因为成立这些公司的重要理由之一，恰恰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不让军队插手经济政策的制定。近卫悲伤地对原田说，“我感到我简直就象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34]

事实证明，近卫本来就坚持不够，这次又未能坚持，因为天皇和他的顾问及朋友们都劝他打消辞意，重新组阁。[35]从五月开始验六月底，重新组阁的问题集中在广田外交大臣和杉山陆军大臣两人身上。近卫的目的是要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或者至少使之温和一些，而他认为广田是这项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用外交官加濑的话来说，杉山“脾气很好，但毫无头脑，昏庸老朽”。恰恰是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很关键的十六个月里，在名义上担任了陆军大臣。[36]在这一段时期内，陆军的统治权究竟属于谁是很难搞清楚的，不过，显然不在杉山手中。近卫把他看作是“扩张主义者的机器人”。*此外，如前所述，近卫对于杉山不愿在内阁中与他和别的文官阁员讨论重要的军事问题非常恼火。杉山在这方面近乎偏执狂的一次最出色的表演，发生在战争初期。当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次内阁会议上提出，陆军在到达永定河后就不要再向华北推进了的时候，陆军大臣怒吼道：“在这样的地方说这种话，这是什么意思？”把那位倒霉的海军大将吓得顺从地说：“我想你是对的。”[37]

其实，近卫好几个月来一直都在物色取代陆军大臣的人选。可是在战时，轻率地采取这个步骤是不行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进行战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见。况且，杉山又不肯给近卫一点便宜，悄悄地辞职了事；相反，他对近卫能够给他施加的全部压力，包括在皇宫内要他下台的间接表示在内，抵抗了好几个星期。[38]

选择继任人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陆军中各个派系都力图使各自中意的人选上台。反扩张主义者支持石原将军，如果石原不行，就支持多田将军。近卫认为“统制派”的官员应对挑起战争负责，所以渴望从其对立

---

* 根据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回忆录，杉山被他的陆军部下摆布到什么程度是很清楚的。风见写道，“尽管听起来是可笑的，但成立临时政府的报告对近卫和我来说，都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报纸的报道才知道这件事的。”早些时候，近卫曾问过杉山关于这一行动的谣传是否属实，而杉山则一贯“用不置可否的方式来作答，让我们总是无法弄清真相”。风见说，最初，阁员们都对他们事先一无所知而表示十分气愤，并且打算拿陆军大臣出气。然而不久以后就弄清楚了，他和文职的内阁阁员一样事先也不知道，他也不过是“被迫同意既成的事实”。（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 59 页及第 89 一 90 页）

面“皇道派”方面推选一个人来代替杉山。*例如。对于近卫来说，柳川平助中将是个“非常中意的”人选，可是这位将军在过去几个月同计划作战的最高军事机关毫无联系。[39]扩张主义者提出的人选中，有当时任陆军次官的梅津将军，可是近卫和梅津的关系不好，而且认为梅津是扩张主义派的“幕后操纵着”。[40]

最后选中了板垣征四郎中将。板垣象石原那样，开始是满洲事件的强烈支持者，但后来就转而主张战争局部化，并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板垣看来并不是哪个派别或集团最中意的人选，事实上，正是由于板垣不带着派系色彩近卫才对他感兴趣的，因为近卫改组内阁的目的就在于加强文官对领导战争的政治控制权。在这一点上，格鲁大使对这次任命的分析大概是正确的：板垣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他“既在陆军的年青军官中享有威信……又认为陆军应当不干预政治。”[41]

可是，为了促成这项任命，近卫不得不接受关东军的东条担任陆军次官作为妥协，次官这一职位也几乎是和大臣同样重要的。后来，近卫把这段期间内没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归咎于他的新任陆军次官。近卫声称，“我本来对板垣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杉山和梅津却要求让东条任陆军次官，这给我埋下了‘祸根’，真使我大失所望。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东条和梅津就象是‘一个人’似的。”[42]

免去广田外交大臣的职务倒不太复杂。近卫用不着被迫接受什么不愉快的交易，就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宇垣一成。宇垣是陆军预备役的一位将军，是第一个非职业外交官担任外交大臣职务的人。在这次任命

---

* “皇道派”是一个松散的集团，大体上由年青的野战部队军官，甚至是连级军官组成的。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企图把日本引向极端国粹主义的方向。他们毫无组织纪律的活动，包括暗杀和搞政变，震惊了比较保守的、主要是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对手“统制派”。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派”组织的一次全面的兵变失败后，“统制派”胜利了。由于詹姆士·克劳利对这问题作了重新的估价，以皇道派—统制派两派斗争来解释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些事态的作用已经减少了。然而，两派的抗争对于近卫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他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写的回忆录中，谴责“统制派”要对日本侵华和南进到东南亚从而引起珍珠港事件负责。〔译者按：“统制派”是三十年代日本陆军内部的一个派系，参加者多为陆军省、参谋本部和中央官厅内的一批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同政界、财界的军国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为加速日本法西斯化而策划过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关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组织的兵变，是指日本现代史上的“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政变事件，以建立法西斯军人政府，加紧扩大侵华战争。在“皇道派”法西斯军官率领下，约一千四百名士兵曾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首相官邸，杀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二月二十九日暴乱平息后，继冈田内阁的广日内阁更为反动，标志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前半年，宇垣就已经是内阁的参议了。近卫充分了解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并确信宇垣能够协助他改变一月十六日的政策，因为宇垣在国民党上层有大批的朋友。但是，近卫之所以考虑任命宇垣，实际上并不是以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如何来决定的，因为宇垣的观点肯定是近卫所能接受的。首相的一个疑虑是，担心宇垣是否有魄力足以把长期以来陆军对他的不悦压下去，从而把他的想法付诸实现。宇垣知道得很清楚，他自己在政党、财政金融界和整个公众中都颇享众望，但在军界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因此他并未仓促地接受这项任命。

一年前，甚至在宇垣已经接受了天皇的组阁命令后，陆军中的一个坚决的集团还横加阻挠，以致宇垣不得出任首相。他的对头们对他在一九二五年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大幅度地缩减陆军的实力这件事耿耿于怀，从不罢休而且对他以和各个政党联系较多而著称表示不满。有些人认为，一九三一年三月推翻政府的阴谋活动，是他告了密，因而对他怀有敌意。[43]一九三八年，那些鼓吹与轴心国加紧联系的人，担心任命宇垣会相反地导致加强与英国的联系，这种担心由于他很快就采取主动与英国人进行友好谈话以及英国人热烈欢迎他的任命而得到了证实。英国大使写道，“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位将军，显然他把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看做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44]

宇垣意识到他的地位不稳固，于是他提出杉山必须辞职作为他入阁的先决条件。而且，在近卫决定提名板垣为杉山。的继任人时，他可能起了作用。[45]

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很快地理解为什么近卫挑选他当外交大臣，并且使我们知道近卫重新估价对华”政策是朝哪个方向转变的。宇垣反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认为它恣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出任外交大臣以前不久，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日本人总是说，我们希望‘中国是中国人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把这当作一个标准，那么，无论中国人希望任命哪个人担任什么职务，我们都应当感到满意。”[46]

宇垣明确地告诉近卫；只有就撤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讲话取得了谅解，他才领导外务省。那时（一九三八年五月），近卫已和宇垣意见一致，所以没有抵制宇垣的要求，并且答复说，他希望宇垣能够设法体面地撤销那个“考虑不周的”声明。*此外，宇垣还要近卫接受以下三项总的

---

* 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516 页载：从近卫和原田的一次议论中，可以看出近卫对撤销声明比宇垣更为主动。原因引述近卫六月三日说的话：他要宇垣来一个外交上的大转变，“因为广田和我过于着重搞垮蒋介石”。（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

原则作为他入阁的条件，即：迅速巩固和加强内阁，迅速决定一项对华的和平政策，迅速统一对华外交政策。[47]

用历史学家臼井的话说，近卫准备接受宇垣提出的所有条件，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说宇垣的任命“好象是希望之门已经打开”；很多人都肯定感到，对于解决中国问题会将有新的设想，战争拖长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小得多了。八月，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村山平助在《改造》月刊中写道：“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寄托在宇垣身上。如果在‘危急’局面下出山的宇垣没有‘成就’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得救了。”[48]

石射猪太郎的《意见书》

为宇垣撤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提供合理论据的人是石射猪太郎。他是外务省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亚洲局的局长。一九三八年六月，石射为他的新上级准备了一份很细致的长篇《意见书》，其中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各种途径。[49]石射象石原将军一样，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必须顺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风向来扬帆，他的“意见书”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有很多理由说明它不是一份普通的文件。与外务省绝大多数呆板的、公文式的文件不一样，它既是生动的、有见解的、几乎是动了感情的呼吁，又讲出了心里话和头脑里的想法。它用了很多辛辣的比喻；例如，说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就象一条章鱼把它自己的触角都吃掉似的，因为日元集团的扩大，正在使中国的购买力枯竭，并且造成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50]但最突出的是，《意见书》的洞察力和坦率程度都是惊人的；它为一种当时很不盛行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直率的辩护，而这种观点则表达了走在时代前面的少数意见。

石射一开始就提醒宇垣，尽管从狭义的理解，“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意思是指不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可是从声明所用的语言来看，“人们觉得还是有一些灵活余地的”，因为声明用的是通俗的、大众化的文体，而不是正式公文文体。由于近卫和广田拚命强调，“即使国民党领导人建议举行和平谈判”，日本也永远不会同他们谈判和平问题，才把这个声明搞得没有灵活的余地了。[51]不幸的是，那些“公众舆论中肤浅的见识”竟如此称赞这种强硬的论调，以致现在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地反对它了。石射转而用相扑摔跤的比喻来说明他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不满。象摔跤者用闪电般的动作把对手摔倒到圈子以外一样，这个突如其来的政策

局》第七卷第5页）

意想不到地把和平的希望都化为乌有了。但是，日本政府通过这次戏剧性的动作又干了些什么呢？“只是限制了自己对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抉择的可能性。我们拥有的唯一政策就是推进。”总之，“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只不过是同一个笨拙的相扑者在某个闭塞落后的市镇里的三流摔跤表演中作出的华而不实的姿态一样。[52]

石射认为：日本如果希望尽快结束“事变”，只有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他认为，汉口战役结束后再进一步扩大战线的方针，显然是误人歧途，因而不应予以考虑。第一个方案是，争取胜利结束汉口战役，然后沿着陇海路和长江下游建立一条前沿交通线，并且沿着相互衔接的铁路线和航道占领全部通向北方的地区。石射说，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好象不错，可是它有几个缺点。如果采用了它，国民党就会收复一些领土，从而提高它在中国人中间的声望和威信。那就会使占领区的人民“动乱”，从而占领军就更加难于维持治安了。国民党政府会“更加热中于搞它拿手的游击战术”。[53]同时，在没有占领的地区，国民党政权将加强它的军队，进行一场反对日本的消耗战。最后，日本将不得不去摧毁这些武装力量，那就意味着在新的战线上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敌对行动。石射警告说：即使这些预言中的最坏情况没有发生，仅仅防护沿长江到汉口六百英里的占领区和维护几千英里铁路网的交通线，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简言之，石射感到这个计划“无法解决局势问题”，而且会“继续成为我们保卫别的地区的障碍”（大概是指对苏联）。[54]因此，根据他的判断，这个方案没有什么价值。

石射提出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作为第二个供选择的方案，这个政府将要把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联合起来。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设想过这项办法了，在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时，就已经准备采取措施设法吸收唐绍仪和吴佩孚*作新政府的头头。据支持这两个人的说法，唐在华南很有威信，而且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声望，这点将是有用的；吴和华西、华北都有联系，这点将使得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合作者。这种说法鼓吹新的中央政府不用特别费力气，就会获得声誉。非占领区和占领区的地方军阀都会看到这个风向，赶快在新政府的屋檐下找一个栖身之处。其结果是，国民党就会被抛弃。石射用了最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个方案，因为当时这个方案正受到文官和军方的有力支持，而且正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

石射认为，第二种方案过高地估计了唐和吴的声誉，他们只不过是“政治僵尸”和“遗老”。他说，让他们复活是十分可笑的。中国人将把他们看

---

*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一九三七年前后至一九三八年秋，企图罗致吴佩孚出山，充当傀儡的经过，可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第 215—225 页载陶菁写的《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一文。——译者注

作是“不知自己死之将至的老头子”。[*]石射声称，唐在他的同胞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声望，而且人们仍然记得，唐下台后任挂名职务时搞得很糟糕，以致曾被他家乡的那个县的老百姓驱逐出境。石射说，考虑同那样一个泥足英雄合作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可是吴佩孚则甚至还更糟。吴狂妄地说什么他的东山再起将会解决中日问题，这只能被认为是患了陶醉于过去的声誉的一种病症。那些支持吴的人争辩说，全中国的军阀，尤其是四川军阀将与吴佩孚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反蒋联盟。石射写道，吴的确与某些军阀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是有不少人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化；可是指望他们当时就会起来反对国民党，那就“错误地估计了时机”，[55]只有当国民党奄奄一息的时候，军阀们才会采取行动来反对它，而国民党现在离奄奄一息还远得很哩。事实上，国民政府正在密切注视这些军阀，特别是四川的军阀，何况这些军阀都是一些投机分子。光靠对吴的忠诚还不足以促使他们起来反对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此外，那些还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军阀则因互相猜忌和争夺而四分五裂，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他们会同吴汇合，组成一个名符其实的联合战线。基于这些理由，石射劝告外交大臣暂缓考虑这两种方案。

石射一带而过地提到第三种供选择方案，那就是把目前。已经建立的那些合作政权同国民党政府合并。石射说，首先。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都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而与国民党政府是势不两立的。此外，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同它一开始就讥讽为伪政权的政府搞联合，实际上就等于是投降。石射断言，“不管你说中国人多么会搞妥协，可在这个问题上则是毫无希望的。”[56]

石射认为，第四个是唯一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与国民政府恢复谈判。石射马上回答了那些一再反对同一个与共产党人搞联合的政府达成和解的意见。他争辩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统一战线的现实情况，我们就会看出，中国共产党只是被允许参加抗日阵线而已。”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打交道的惨痛经验，使国民党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是把统一战线当作一种手段，使他们被削弱了的实力得以重新壮大，因此，国民政府最不能容忍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种种活动。据说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人已经加入国民党，这并不表明共产党人马上就要“吞并”国民党，它实际上表明，主动权仍在国民党手中。[57]

石射热烈赞扬国民党解决了它和西南军阀集团的分歧，结束了福建省的独立运动和把共产党的军队赶出了江西省。除了军事成就之外，它在教

---

[*] 据《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 326 页载，石射的尖刻的原话是：“老头子竟象年青人一样泡在冷水里，结果是病倒了。”这里的翻译也许没有把这个味道译出来。

育、财政金融和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值得称赞的进展。石射说,“恰好与我们对中国的看法相反,国民党政府一直在进行革新的统治。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曙光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正是因为这样,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不断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甚得人心。”[58]

石射写道,“不可否认”,蒋介石是肩负中国“民族复兴”的人物。中国人只对他一个人表示信赖。“他的形象比国民党和政府中任何别人都显得更加出众。”[59]设法推翻蒋政权或坚持让他下野,同“征服象张学良那样的地方军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推翻国民党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尝试一下都会是得不偿失的。远东的稳定和中日合作,是日本反复提到的理想。就算把国民党摘掉了,继任的政权也肯定会是软弱的,也无法统治整个中国,其结果是中国将变成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国家。在接踵而来的混乱和骚动的局面下,只有一个无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武装得最好的集团可以从中得利,那就是共产党。其结局将是,中国会成为一个破产的国家,而日本则担任着一个破产国家的管理人。帝国军队将不得不去镇压大批流浪农村的散兵游勇。对它所占领的地区得搞个庞大的救济方案。还得进行大量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最重要的是,日本还必须把共产党军队镇压下去,而共产党军队则很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享有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又从何谈起呢?那样一种局面将使日本关于努力促使远东稳定的主张成为笑柄。

石射断定,日本只有一个选择: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同中国谈判一项体面的、宽大的和平。至少就目前看来,中国和国民党是一回事,而蒋介石则是国民党的“轴心”。如果象东京许多人所提出的最低要求那样,尽力把蒋赶下台,让他隐退,不管是事实上的隐退或是名义上的隐退,那都只会有损于日本的事业。中国人会把蒋的下台看成是日本对中国的惩罚。而且,主张强硬路线的分子决不会让“中国人最尊敬的”蒋介石辞职。他们反而会促使他们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抵抗。“我们必须做的是,挽救并设法利用蒋。”[60]

石射说,很长时期以来,日本人一直鄙视蒋,把他看做死敌,一个“把日本当作工具来统一国家的”可恨的敌人。但是事实却是,他在一九三五年底当行政院长后,任命了象张群那样的亲日派参加内阁,以表示他对友好地调整中日关系甚为关切。石射提醒宇垣,那时这个委员长也曾派出密使向宇垣表示衷心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一九三六年,这个委员长曾对日本驻华武官说:“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就不会有别的机会了。”[61]日本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宣称中国已经忍无可忍,这是日本将会永远感到后悔的事。更加遗憾的是,他们把蒋在牯岭的“抗

战到底”的誓言看做是“胡说八道”，而没有意识到他已决心实现这个誓言。[62]

石射要求宇垣注意，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人士，无论在精神和文字上都一贯违反天皇的旨意。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天皇在议会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我的士兵们之所以不顾种种困难，而忠实地奋斗”的唯一原因，“[就是] 为了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并建立和平”。此外，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政府发言人在天皇御前表示过，“消除所有过去的摩擦，并在宽宏大量的精神和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日关系”的决心。天皇的大臣们曾宣称，两国之间的“融洽无间”是日本谋求解决中日问题的最终目的。可是，从那时以来，这些大臣们十分失职。他们没有让人民知道这些原则，“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发表了一些与一月十一日御前会议决定相反的声明。”[63]

由于这些当局人士无视御前会议决定的精神，所以政府和人民都在这样说：“在大陆上出现这么个绝好机会，那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着的啊！”“即使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殖民地”；“应当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去处理敌人的财产“；或者“既然我们已经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至少应当取得对华北和华中的控制权”；等等。这一切可以经常听到的说法，无情地拆穿了日本自称她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的虚伪性。石射写道，“我们要征服中国——那就是日本的心情。”这样一来，日本远远没有遵照天皇的命令，在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宽大的和平，而是日益倾向于采取以下这类态度：“你能拿走多少就拿多少”，“抢在别人前头，尽量地捞一把”和“让我们把中国瓜分掉吧！”石射问道，御前会议的决定和上述这些掠夺成性的情绪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日本怎么能希望实现中日合作和东亚和平呢？[64]

石射告诫宇垣说。只要日本采取这样的态度，即中国是有罪的，因而应当接受严厉的条件，那么中国人就不大可能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他预言，“即使中国会屈服的话，那也会使今后一百年发生麻烦。”反之，如果一个强大的日本对她的软弱的邻国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那决不会有人就此看不起她。相反，全世界都会称赞她的“武士道”风度。中国长期以来对日本的仇恨从此就顿时消逝，而且还会使中国人心里树立起一种信任感。石射附和石原一直呼吁的主张，认为日本必须向中国人提出“俾斯麦式的和平”，就象俾斯麦在普奥战争结束时向奥地利人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平条件一样。[65]石射说，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认识到，和谈的“最大障碍”是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的存在。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就会产生以前冀察政权所造成的那种对抗情绪。石射建议说，因此，日本应当规定一个期限，

让国民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整这两个政权的地位。*

石射还说，日本能否完成这件任务，尤其是能否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声明，“完全是一个我们政府当局是否有勇气这样做的问题”。那就是说，面对着可能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响，政府当局是否能证明自己的力量强大得足以根本转变国家的政策，甚至冒着有“生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66]石射断言，如果它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那么这个风险就值得去冒，因为日本现在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来调整两国的关系和开创和睦的新纪元”。[67]

新外交大臣研究了石射的《意见书》以后，在封面批上了：“它大体上符合我个人的意见”。[68]九月，他邀请了一批记者到叶山的别墅，除了讲一些情况外，还向他们讲了普奥战争的历史。宇垣在重复了石射对俾斯麦的敬仰和他自己对取消进攻汉口的主张时，颂扬了俾斯麦这位普鲁士领导人和他的总参谋长冯·莫尔特克“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的光辉经验”。普鲁士人在几周内就打败了奥地利军队，之后他们决定不攻陷维也纳，而情愿“在城堡的防御地带停止进军，同意建立一项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宇垣指出，在普奥之间和中日之间有着重要的类似之处。俾斯麦和冯·莫尔特克之所以宽宏大量地对待奥地利人，是因为他们预见到要对法国进行战争，因此希望奥地利不要参加到敌人那一边去。[69]目前的情况，今天的苏联就是当年的法国。

内阁改组于一九三八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完成。新内阁仍然由代表宫廷、军部和财政金融界的各种人物联合组成。不过，近卫还是设法把那些愿意献身于新的解决战争途径的人，尽可能地组成了最强大的联合，并且成功地把那些与不妥协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人们排除在内阁之外，而不妥协政策是一月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所制定的。他还获得了天皇的批准。以五大臣会议作为全国最高决策机构，从而增强他自己的实力。这样一来，曾经由二等的陆、海军军官随意摆布的联席会议，就正式地由近卫自己指定的官员组成的一个切实可行得多的会议所替代。这些官员是：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大藏大臣。看来为结束对华战争找到一条崭新途径的布置已经就绪。

宇垣的任命预示着谋求和平的新时代的到来。最富有戏剧性的证明是，

---

*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 334 页。不过满洲国则是另一回事。石射告诉宇垣，“根据来自意大利这一途径的消息，中国准备承认满洲国这一点大体是明确的”，这也许是“由于收复失地已无望”。（同上书）战争最初几个月里，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和驻日大使馆都积极从事于调停的努力。

宇垣和他的私人朋友、曾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张群互通了电报。张群致电宇垣，祝贺他就任新职，说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使他“为东亚而欢欣鼓舞”。[70]这种做法在战时来看，是极其不平常的。接着，他希望宇垣在重开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作用，并建议汪精卫可以作为中国方面的和谈代表。

这位日本外交大臣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并且还得到了象石射那样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及时地向张表明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宇垣回答说，他认为由汪精卫代表中国进行和谈不合适，因为尽管汪很有资格当代表，但“你们的同胞会认为他是个亲日派的首脑……因而可能指责他出卖国家。”[71]宇垣想起了战争开始后不久，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在新加坡发表过一些和解性的意见，所以他建议由孔来当代表比较理想。大家都知道他和蒋的关系非常亲密，是能够代表蒋讲话的。此外，他本人不象汪和张群那样由于有亲日的污名而不具备代表资格。孔显然同意这项安排，因此他派了他的私人秘书乔辅三去香港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会面。六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双方都寄予很大希望的这次谈判，一直谈到九月一日。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有个时候日本已经准备好一艘军舰把孔送到长崎或台湾的某处和宇垣会见。可是，尽管成功的希望极大，谈判最后在几个问题上以失败告终。

谈判之初，孔要求日本把条件都开列出来，宇垣回答说，“尽管政府改组了，新内阁和外交大臣是一致的；虽然我接替了广田，日本对外政策仍然不变。”[72]据中村后来回忆，来自东京的指示使他特别难办，指示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没有改变。他于一九五六年写道，“根据那种指示，我简直就没法去开始谈判。”这位总领事飞回国内同宇垣商谈。宇垣对他说，“日本最后是要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旗号的，可是现在我们不能那样做。”当时与宇垣有密切接触的石射，是能对此作出有权威性评论的人。他后来写道，宇垣之所以采取强硬立场，只是想把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初步讨价还价的策略，随着谈判的进展，他是准备作出让步的。[73]

然而，宇垣自己的日记却说明，在他当外交大臣的几个月里，他的感情起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当与孔的谈判正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宇垣于六月二十八日在日记中显得非常同情蒋和蒋所面临的问题。他写道，“中国被列强捆住手脚一百多年了”，其结果是，“无论中国人怎样努力奋斗，他们也无法向前迈进。”可是，近年来，中国对于她所蒙受的灾难作出了反应，民族团结的“强大潮流”已达到席卷全国的程度。宇垣写道：“蒋介石是走在前头领导这一潮流的人”，但是日本人“应该特别注意以下这个事实，即使我们把蒋介石推翻了，这一潮流还将一如既往，继续向前。”[74]七月十五日，

宇垣写下了他的信念：除非日本帮助促进和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反对它，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和获得持久和平才有可能。[75]然而，短短的两个月后，宇垣在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前夕，却感到“必须增加我们的压力以粉碎蒋政权和他的一伙人。”[76]

不管宇垣个人的观点如何，七月八日五大臣会议所决定的日本政府的正式观点是，日本人“接受中国当时中央政府的投降”，是以蒋的辞职为条件的。近卫政府已经同意有必要修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以便在处理有关国民党政府投降的问题上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石射认为，打算完全推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同蒋本人谈判，那是要有勇气的，可是五大臣却缺乏石射所谓的必要的“勇气”。七月八日，他们正式要求“蒋介石下野”。[77]

宇垣在向中村解释这仅仅是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时，强调指出，不管怎么说，蒋把他的国家管理得很糟糕，使中国人遭受了极端的苦难，因此要他退出政治舞台是“理所当然的”。[*]中村表示不同意：中国人民并不认为蒋要对打败仗负责，因此，要求他辞职会“引起麻烦”。[78]

宇垣在同孔的间接谈判中，对于蒋的下台，采取了稍微有点不同的方针。他把下台问题同孔提出的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一个是赔款问题。孔要求日本放宽要求，因为中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简直付不起战争赔款。孔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承认满洲国问题。孔说：两国对那里事实上存在的局面都是尊重的，而且中国实际上已经默认了满洲国；满洲国问题在中国国内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此时日本应承认这一点。鉴于这种情况，孔问日本是否可以同意取消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的要求。[79]

宇垣对孔的答复如下：如果孔要求日本人适当地考虑中国国内的问题，那么也应该能意识到蒋介石同样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国内问题。“日本人把蒋介石看作敌人，并且说过不同他打交道。但他们对中国人民不抱恶意。可是鉴于蒋领导这个国家，造成了当前的局势，因而大多数日本人都憎恨他。”宇垣说，因此，如果中国想要在满洲国和赔款问题上得到让步，就应很好地处理蒋的问题，同意他下台，以“缓和日本人的情绪”。宇垣最后说，他的辞职“对你们国家比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在日本为取消赔款和“默认”满洲国问题制造一种适宜的气氛。[80]这些巧妙的论据并

---

[*] 据格鲁大使报道，宇垣向英国大使克雷吉表示，“蒋介石本人并不是强烈反日的，可是他必须对在学校中和其他地方加强抗日宣传负责，除非他来个转变，日本政府就不能和他打交道。克雷吉把这个转变解释为‘直至委员长与共产党决裂’。”（见格鲁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向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 263 页）

没有能够说服孔，他甚至从未暗示过蒋有下台的微小的可能性。孔告诉宇垣，如果辞职对于缓和日本人的情绪是必要的话，那么他本人辞职也许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孔当时刚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这一姿态也没有能使东京感到满意。

虽然蒋的辞职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可是华北问题也是一个主要障碍。孔祥熙讲了一堂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课来回答宇垣关于把华北划为“特殊地带”的要求。孔说，中国人民一贯把长城以外的地区看成是“未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并不特别关怀。因此，中国愿意默认满洲国的存在，也同意日本在内蒙古驻军并建立一个特殊地带。他坚持说，日本必须理解，长城以内的地区则完全是属另一回事。如果她试图“解放”华北并在那里无限期地驻军，可以肯定中国人会“坚持日本最后企图吞并整个中国的看法”。[81]

宇垣回答说，认为日本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是很可笑的。如果她准备这样做，她为什么只在华北划出一个地带呢？难道南京和上海不是已经落人日本的手中了吗？宇垣解释说，在华北的特殊地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中日联防反共。内蒙古是防御的第一线，华北是第二线。宇垣表示，“我们正在做的一切都是我本人和段祺瑞政府签订的协定的继续。”宇垣讲这话时，大概没有察觉到，段棋瑞在军阀极盛时期称霸华北，而国民党政权宣称要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称霸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意味着一个分裂的中国和出卖领土和主权去换取日本的靠不住的军事援助并从中贪污。[82]如果宇垣真以为那样谈一下日本在华北的意图就会使孔安心的话，那就说明甚至在象宇垣这样的温和派的心目中也没有怎么意识到中国的情况正在变化。

及至八月，关于中国人不同意宇垣建议的反应，纷纷传到东京，这不仅来自中村总领事处，而且也来自各种各样中间人那里。接近委员长和张群的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会见了一个和宇垣有接触的日本同行。通过他们的会见，宇垣才知道，只要日本继续施加要分裂中国的压力，中国人就决心抗日到底。这个记者强调，日本迟早必须承认两件事：中国打算在政治上达到统一；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一支政治力量，因而，也是日本必须最终与之打交道的政府。[83]

宇垣通过与孔谈判解决中日问题的努力持续了整个八月份，但是因为孔在蒋的辞职问题上没有作出让步，在香港的谈判于九月初就陷于停顿、拖拉的状况。宇垣在夏季以前抱有的积极性到这时就消磨殆尽了。汉口战役已经开始；五大臣决定坚持蒋介石必须辞职；土肥原将军经东京批准，

正在劝说吴佩孚出任中国的一个新政权的首脑；影佐祯昭大佐*正在为最终导致成立汪精卫政权进行初步接触。从对宇垣的威望来讲，最糟糕的事情是，陆军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最后定名为“兴亚院”†）以便剥夺外务省在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一切控制权力。本来宇垣对于转变对华政策的热情已经在减退，事态的这些发展使他的热情更进一步低落了。外交大臣对于有些行动竟一无所知，对于另一些行动则无法加以控制。例如，正当他与孔会谈时，有人就在向汪精卫的追随者进行初步的试探。正是那个新的有关中国的机构篡夺了外交大臣的权力这件事，才最后迫使宇垣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辞去了他的职务。

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外交大臣在内，都认为需要有某种协调机构来决定对华政策。[84]宇垣赞成在首相领导下成立一个机构，但其权限只限于管理中国占领区，至于全面的对华政策则仍应由五大臣来制定。根据他的意见，那样一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联系沟通与中国有关的各省（部）的情况，并主要指导在中国占领区的各国策公司的业务。

可是陆军的想法却很不一样。它想要搞一个有广泛权力的机构，涉及到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对整个中国都有管辖权。多少有点不协调的是，陆军还要它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大陆的地方行政事务方面保有相当大的“就地处置”的权力。九月二十七日，宇垣通知五大臣会议，既然他已经承担了解决中国事变的责任，他就不能同意建立一个有关中国的机构，除非外务省仍拥有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权利。由于陆、海军大臣的反对，会议陷人了僵局。两天以后，宇垣向近卫提出辞职。他说，既然没有运用外交手段的余地，他就无法行使外交大臣的职责。他的辞职获准，两天后，近卫于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一个满足陆军全部要求的“中国局”。正如几天以后《朝日新闻》所评论的那样，外务省已经“威信扫地”。[85]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务省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发言权愈来愈小，以致四年以后，外交大臣东乡茂德被告知，外务省在对华方面的职责仅限于正式接待使节和签订条约这类的“纯外交”事务。[86]

十二月，这个局改名“兴亚院”。首相虽是该院的总裁. 可是它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现役的陆、海军军官。他们当中有总务长官柳川平助中将和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少将，而铃木也许是该院最重要的成员。一九三九年初，

---

* 影佐祯昭（1893—1948），曾任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一九三九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门负责对汪精卫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任汪伪政府的军事顾问。——译者注

† “兴亚院”是直属日本内阁的一个殖民侵略机构。近卫内阁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设置。在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寇为了集中统一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扶植伪政权等罪恶活动，决定建立这个机构。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副总裁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兼任。——译者注

日本政府宣布在张家口、北平、上海和厦门成立四个“兴亚院”的“联络机构”。所有这些联络机构都在陆、海军将领的控制之下，例如，临时政府的主要后台喜多将军就被指定来领导驻北平的机构。

关于建立“兴亚院”的帝国法令，授予“兴亚院”全权“管理有关中国事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而且，政府公开发表的声明指出，敌对行动的终止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变”已经结束。换句话说，政府预见到有必要使“兴亚院”继续起作用，“直到中国的重建和发展计划，以及日本、满洲国、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合作得到实现时为止”。[87]可是，在军方控制下的“兴亚院”，在达到加强领导对华政策和纲领的目的方面，只实现了一部分。虽然外务省在中国已经日益不起作用，但驻华各派遣军司令部和陆军与海军的各个集团，仍继续推行独立的对华工作方针。在这些独立的“工作计划”中进行得最有希望的一项，要算一九三八年年中争取退隐军阀吴佩孚出山当新的合作政府头头的工作了。

一九三八年的整个夏季，当宇垣正在设法与孔蒋达成谅解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报刊都在纷纷猜测，日本计划劝诱军阀时代三个上年纪的退隐军人单独或合伙出来领导新的合作政府。这些推测一般说来还是正确的。虽然早在一九三七年底就已进行过一些试探，去了解这些人是否愿意加人亲日政府，但直到一九三八年年中，才很好地组织了对他们的劝诱工作。那时，以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长、岩黑秀夫大佐为首的小组终于认识到，如果帝国陆军要达到它在中国的目的，王克敏和梁鸿志都不足以胜任首脑。尤其是如果打算要把几个傀儡政权联合成为某种全国性的政府的话，那就必须有在声誉和领导才干方面都更胜一筹的人物。[88]所以，岩黑和他的小组建议成立一个各军种混合组成的工作小组，来探索搜罗有名望的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出山的可能性。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五大臣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并授权这个新的小组，根据五大臣当时正在草拟的政策，“制订出对华的重要策略”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89]这个新的小组由五大臣直接领导并正式命名为“在支特别委员会”。它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以“竹机关”为其代号的机构，通常又称之为“土肥原机关”，因为它是由典型的政治将军土肥原贤二控制的。

土肥原将军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来讲，他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年早些时候他的部队在兰封遭到了惨败。但是，他三十年代初期在满洲国的政治经验却使得他非常适宜于承担当前这项任务。[90]为了象征各军种之间的合作，津田静枝海军中将被派到“土肥原机关”作为海军的代表。其他成员有，大关道定大佐、和智高次少将和坡斋利八郎少将。对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讲，板斋这个人是非常生疏的。东京中央的成员把板

斋看作是所有“老中国通”中“最大的中国问题权威”。同华北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和一些其他坚持“分治合作”主义的人不同，他赞成有一个强盛的、统一的中国。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和石射猪太郎一样开明。板斋和土肥原一样，都坚持谋求与吴佩孚那样的下野政客合作。[91]

土肥原设想的计划有两个部分。[92]第一部分要求设法诱骗当时正在协助保卫汉口的所谓广西军脱离蒋阵营。这个任务交给了和智将军，但很快地就失败了。土肥原大胆地进行工作计划的第二部分；网罗中国的三个重要人物当新政府的头头。三个争取对象中，两个很快地就被淘汰了。第一个是当过段祺瑞政府陆军总长的下野军官靳云鹏。靳最后于一九一九年曾担任过内阁总理，一九二一年下台后，由从政转而经商，后来于一九三一年出家当了和尚。土肥原劝使靳放弃他的圣洁的隐居生活但没有成功。那就剩下唐绍仪和吴佩孚了。根据土肥原曾不断加以修改的计划，打算让七十八岁的唐绍仪在拟议中的政府当文职的头头，而吴则掌管武职，包括组织一支亲日的军队。

唐和吴都是清朝和军阀时代的老政客，好些年来一直过着退休的生活。唐住在上海，吴住在北平。西方研究亚洲史的人们对吴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在这里详细介绍他的历史背景了。[93]可是在西方却很少有人知道唐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简要地讲讲他的背景和观点也许会有些用处。[94]

一八七三年，唐作为第一批派赴美国留学的学生之一出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回国任袁世凯的秘书，由于和袁有交往而成了有名的人物。清朝时，他曾多次担任外交职务——包括西藏事务特派员，最后当了民国首届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任职不久，就因被指责在财政管理方面失当而陷入困境，他的内阁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倒台。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三四年退出政界时为止，他在不同的政权里，一个接一个地担任过部长级或副部长级的职务。唐和大多数被日本网罗到傀儡政权中去的人不一样，他在任公职的最后几年里得到了国民党的欢心，并且到了一九三八年仍然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保持着紧密而且友好的接触。

因为唐有泛亚主义情绪，所以土肥原和他的同僚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唐非常尊崇日本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力量，因为它“迫使那些所谓的大国与她握手言欢”。[95]按照他的观点，中国人和印度人要是想实现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愿望，非得依靠一个强大的中日同盟不可。只有当中国的爱国者认识到不信任日本的力量和动机则贻害本国利益的时候，这个同盟才能形成。

他在一九一六年写道：中国的反日情绪是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团结的外界势力煽动起来的。……我们对于那些说日本是亚洲的威胁的论调已经听烦了。……我们没有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正在兴起的日本。我们只希望中国印度同等富强，希望日本坚守亚洲大陆以反对欧洲侵略者。到那时候，那些实际上是由外界力量引起却嫁祸于日本的国际纷争，在亚洲将不复存在。[96]

在这些观点发表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者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大有人在。可是，在日本侵略了十年以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对他们邻国的泛亚主义深表怀疑，而唐在一九三八年仍坚持这些观点，这至少是土肥原对唐深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日本外务省“唐工作计划”纪要，唐只是因为怕“日本人可能将来要同蒋政权和解，或者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府，”[97]才不愿与日本合作的。基于这些原因，唐曾坚决地拒绝参加维新政府。不过，等到土肥原一亲自出马，唐不愿干的想法就开始烟消云散了。土肥原显然曾劝他起草一个“和平通电”，然后加以发表，作为建立唐、吴政府的第一步。可是，正当电报草稿送交吴佩孚征求意见时，唐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被残暴地暗杀了。由于被认为同日本人友好的人士被暗杀的数字不断上升，土肥原曾经特别关心过唐绍仪的安全，提出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派保镖，可是唐拒绝了。根据日本的资料，在唐筹备他女儿的婚礼时，几个国民党法西斯蓝衣社分子进入了上海法租界的唐公馆，当他欠身欢迎这些“客人”时，一个蓝衣社分子用一把小斧砍中了他的头部。国民政府（它手下的人大概对这次谋杀应该负责）发表了讣告，嘉奖了唐的一生功勋卓著，并拨出了一笔巨款作为治丧费。[98]

唐既然没有希望了，土肥原就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于说服吴佩孚，要他放弃佛学的研究、写诗、养花和其他高雅的消遣，而这些消遣对一位由军人转为学者的退休生活来讲是很适宜的。土肥原的“吴工作计划”的这些活动虽然一直延续到吴死去时为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但其高潮则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期间。土肥原为了劝说这个不愿干的退隐军阀出山合作，诱使吴的一个老同事张燕卿同临时政府脱离了关系。因为临时政府和它的后台华北派遣军一样，对“土肥原机关”的目标是十分敌视的。[99]张在日本人帮助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和平救国”协会。这些只是在纸上存在的组织的领导人，纷纷向吴致电，请他再次出山，与日本合作、从而使国家安定并摆脱他非常痛恨的共产主义。在执行“吴工作计划”过程中，曾多次和吴会面的今井武夫写道，“他真是一个固执的家伙。他总是攻击共产主义，看来他认为共产主义大概就是共

产共妻……他对于时代的变化毫无概念。他仍然沾沾自喜，以为他的名声从军阀黄金时代以来一点都没有起过变化，而且象一只老虎似的在那儿蹲着，随时准备返回政治舞台。”[100]

象他这样的一个人，不去仔细审查审查要求他出马领导的和平救国协会究竟是个真组织还是假组织，那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在这位大帅的老窝开封，搞了一个“敦促吴佩孚”出山的总部，发表了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采取类似措施的声明，为他们的大帅东山再起尽快地制造合法根据。吴没有觉察到，对他的所谓支持大多出自土肥原之手，遂于十一月三十日召集记者，宣布他正在组织一个“治安委员会”，作为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第一步。十二月初，日本报刊报道，日本已经任命吴为“陇海铁路地区绥靖公署主任”。该报道说，为了使吴能够放手去同游击队作战，并且为了使他想要建立的亲日政府赢得人们的支持，日本将从华北撤出大部分部队。[101]

尽管当时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但现在则可以明显地看出，“吴从来也没有近乎接受土肥原的任务。他虽没有断然拒绝这位日本将军，但他坚持土肥原作出不可能同意的让步。比如说，他要求在组织和领导他的新政权的军队方面应给予他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且至少在名义上让他作为统治整个中国的统一政府的领导人。这些要求不仅是帝国陆军和“兴亚院”所不能接受的，就连那时的傀儡政府也是反对的。[102]对于吴派人物发表声明免除蒋介石和国民党战败的罪责，临时政府是特别关注的。华北政权相当害怕吴在他拟议中的政府中会给国民党以席位，这就必然会结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临时政府带来灾难。正如今井所说的，“吴那怕只要作出最微小的动作，就立刻会引起北平临时政府领导人的焦急不安”。[103]东京当局命令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和“土肥原机关”合作，可是，当两个傀儡政权的头头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会面时，都要求吴的活动应限制在汉口（吴的另一个老巢）和中国西南地区。[104]

虽然“吴工作计划”在一九三九年这一整年中都在持续进行，可是它仍然不能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吴在傀儡政治中已不再是一个主要因素，及至年底，他就死了。[*]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死去的军阀赞扬备至，追赠了军衔，拨给了巨额治丧费，赠给了大批挽联悼词。他拒绝担任傀儡政权的头头的伟大忠诚受到了颂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临时政

---

[*] 吴显然死于牙脓肿引起的并发症。由一组德国和日本医生进行的紧急手术没有能够救活他，反而使日本人被指控为用毒药谋杀了这位病人。今井对这类事情了解很多而且也很坦率。他说，调查的结果是，日本人对吴的死亡并没有插手（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 151 页）

府对此也很重视，在悼念吴的活动中也很大方，拨给的治丧费竟比重庆的还多两倍。[105]

---

[1]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 8 页。
[2]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97 页。
[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42—43 页）；另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142—147 页。
[4]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 134—135 页。
[5]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152 页。
[6] 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 453 页）。另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 248 页。
[7]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153 页。
[8]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 248 页
[9] 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 445 页。
[10]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 44 页。
[11]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153 页。
[12] 见阿尔文・库克斯的《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载《军务》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十二期第 6 页）。另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289—290 页。上列史书的记述表明那时还未大量动用后备力量。
[13]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力量》第 37 页。
[14] 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 186 页。
[15]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 265—266 页。
[16] 这样说的日本人是下山中将和桥本群中将，见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 36 页。
[17] 见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 186—187 页。
[18] 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 248 页，叙述天皇对杉山陆相不满；第七卷第 32 页，叙述天皇的侍从长“从不向天皇呈奏他应该呈奏的事宜，而，天皇也没有要他下达圣谕”；第七卷第 5l—52 页，叙述流传的天皇对板垣陆相的训斥，因为陆军“经常使用狡黠的手段……并且不服从中央的命令”；第七卷第 97—98 页，叙述陆军参谋本部处事柔优寡断。
[19] 见宇垣一成的《宇垣日记》第 300 页。
[20] 关于尾崎对中国的观点以及他和“近卫集团”的联系 在查默斯・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和 G・R・斯托里与 F・W・迪金合著的《理查德・索尔格案件》两书中，得到很概括的叙述。关于尾崎的多种文件，《现代史资料》的特辑已汇编在一齐，《现代史资料》的前三卷是专门记述索尔格事件的。
[21] 见柳贺千年的《自佩里时代以来的日本》第 534 页。

[22] 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第 133 页，引了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第 27 页刊载的材料。库克斯并列了一份要求天皇节约的物品清单；其中，天皇被迫用国产的酒来代替泊来品，用国产的香烟或雪茄来代接外国烟，天皇的赐礼和名片改用银质的（而不是习惯用的金质的）。见上书，引自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朝日新闻》第 11 页。
[23] 见都留茂人的《日本经济论文集》第 194 页。
[24] 同上书，第 214—216 页。
[25] 同上书，第 215 页。
[26] 见爱德华 • 西登斯蒂卡：《作家永井荷风的生乎及其所处时代：一八七九——一九五九年》第 154 页。
[27]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记录。
[28] 见鹤见俊助的《大政翼赞运动的策划者》（载《转向》第 57 页）。
[29] 访问牛场友彦的谈话记录。
[30] 见罗伯特 • 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后面》第 60 页。
[31] 见根室的《亚洲内幕》第 68 页。
[32]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 265 页。
[33] 同上书，第 270 页。
[34] 同上书，第 270—271 页。
[35]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496 页。
[36] 见加濑俊一的《密苏里号军舰之行》第 111 页。另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 59 页。
[37]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422 页。
[38] 同上书，第 502 页。
[39] 同上书，第 502—503 页。
[40] 同上书，第 509 页。
[41] 见约瑟 • 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 248 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42] 见重光葵的《外交回忆录》第 134—135 页。阿尔文 • 库克斯的《虎年》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
[43] 见 G • R • 斯托里的《加倍受国者：对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第 60—63 页。
[44] 见罗伯特 • 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背后》第 61 页。
[45]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 330—332 页。
[46]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146 页）。臼井在此书中引了宇垣的一则日记，但我在角田顺编的《宇垣一成日记》新版本中没有找到。臼井引的那则日记和角田编的版本中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五月五日的两则日记很吻合（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 1235—1236 页）。令人奇怪的是宇垣在较早时自编的一卷本，也略去这一则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他对中国看法的日记（见宇垣

一成的《宇垣日记一》）例如，角田版本中，收录了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十八日这两天的日记，而这两民在宇垣自编的版本中却没有。这两篇日记叙述宇垣反复考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只是“同床异梦”（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 313—314 页）。
[47]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 313—314 页。
[48] 见杉山平助的《宇垣新外相》第 115 页。
[49] 这份重要文件的本文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 315—337 页，其全称是《当前事变对策方案》。
[50] 同上书，第 319 页。
[51] 同上书，第 316 页。
[52] 同上书，第 315 页，第 327 页。
[53] 同上书，第 324—325 页。
[54] 同上书，第 325 页。
[55] 同上书，第 326 页。
[56] 同上。
[57] 同上书，第 327 页。
[58] 同上书，第 328 页。
[59] 同上。
[60] 同上书，第 328 页，第 333—334 页。
[61] 据上书第 329 页，这位武官是矶谷廉介将军。石射与宇垣谈到，据可靠稍息，在宇垣任朝鲜总督期间（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曾数度与蒋的来使密谈，这些密使都传达了委员长“衷心希望”有较好的中日关系。石射劝告宇垣说：“从这一点看，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他（蒋）内心的意愿。”
[62] 同上。
[63] 同上书，第 331—332 页。
[64] 同上书，组 332 页。
[65] 同上书，第 333 页。
[66] 同上书，第 330 页。
[67] 同上书，第 332 页。
[68] 同上书，第 315 页。
[69] 库克斯的《虎年》引述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的《朝日新闻》第一版刊载的《叶山怪谈》。
[70]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 326—327 页。
[71] 同上书，第 327 页。
[72] 同上书，第 329 页。
[73] 见中村丰一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载《昭和秘史》第 262 页）。
[74]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 316 页。
[75] 同上书，第 318 页。

[76] 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 1262 页（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这则日记在宇垣日记的早期版本中是没有收录之一）。
[77]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64 页。
[78] 见中村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第 262—263 页。
[79]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 329—330 页。
[80] 同上书，第 332 页。
[81] 同上书，第 330 页。
[82] 同上书，第 331 页。
[83]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第 77—78 页。
[84] 本书有关兴亚院的论述是根据马场章的。设置兴亚院的一些问题》（载《外务省调查月报》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第 46—83 页）。
[85] 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的《朝日新闻》。
[86]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第 35757 页。
[87] 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第三卷第 433 页引用了“新闻报道中的政府声明”。
[8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 75—77 页。
[89]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八卷第 266 页。
[90] 有关土肥原在满洲国的政治活动的详细述评，可参阅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 67 页，第 75—76 页。
[91] 今井武夫访问记录。
[92]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 146—151 页。
[93] 关于吴佩孚的详细背景材料，可见保罗·理查德·索特的《吴佩孚：对一个中国军阀的专题研究》和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 444—450 页。
[94] 关于唐绍仪生平的资料，主要取材于一九三八十月八日的《密勒氏评论》第 174—175 页；《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 335—336 页；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 232—236 页。
[95] 见《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 336—337 页。
[96] 同上。
[97]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2203 号第 6 页。
[9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 79—80 页。
[99] 张燕卿是新民会的副会长。关于张燕卿拥吴的活动详情，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 149—151 页。
[100] 同上书，第 148—149 页。
[101]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 312 页，二月十一日第 330 页；H·H·巴杰的《吴佩孚元帅》详细记述了亲历其境的观察家写的吴“接受”了“治安首脑”任务时混乱环境的第一手材料。
[102]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 1005-22 号。这是一篇三页的摘要

（詹姆士·T·C·刘签署的），概述日本驻北平大使馆馆员林出贤次郎写的关于吴佩孚和土肥原机关的手抄报告。吴与土肥原之间联系困难可能是他们达不成协议的部分原因。虽然土肥原几乎不断地与吴保持接触，但他本人却一直不能会见吴，因为吴在三十年代末经常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于是一切联系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面。见冈野增次郎的《吴佩孚》第1149页。

[10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9页。

[104]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1005-22号第1页。

[105]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100页。

第九章 低调俱乐部

在战争开头的十八个月里，南京和汉口充满了抗战到底的气氛，很少有几个中国人愿意公开表示支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和解的态度。人们极不愿意公开谈论赞成和平、谈判、或任何可能被解释（或曲解）为意味着松懈抗战意志的问题。可是就有那么一个集团正开始私底下谨慎地对官方抗战到底的口号表示怀疑。这就是那个自成一派的低调俱乐部，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为了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风气”[1]的不满。他们以聚餐形式在该俱乐部的一个领导成员周佛海家里碰头。其余知名的成员有高宗武和胡适。

这些人对中国的狂热气氛感到不安，并且觉得：那些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们只要高喊抗战的口号就可以捞取权力。他们认为，中国对长期抗战没有准备，因此同日本的外交渠道应当保持畅通外，还要尽量开辟新的。胡适因在一九三八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而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关系。他认为，“同近卫内阁进行谈判是可能的，而且不应错过这个机会。”[2]胡适期望从根本上调整中日关系，以求实现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使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对共产党人的恐惧，老是担心共产党正在利用统一战线和抗战作为扩大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手段。

低调俱乐部的另一个有名气的成员是经济史学家、前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抗战爆发后，作为汪精卫的老朋友和改组派成员之一的陶希圣就前往南京，就任他在政府中担任各要职中的第一个职务，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和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担任领导这两个机构的汪精卫的顾问。因此，他同汪几乎每天都有接触。

汪的任务之一是处理各种和平建议，这些建议有的直接来自日本方面，有的间接来自通过包括德、英、意各国大使在内的外交途径。他和陶希圣在讨论每一项建议的优缺点之后再把意见转给委员长。据陶说，委员长那时正把全部精力放在指导抗战军务上。当时，有人曾建议汪甩掉委员长，亲自主持谈判，但是陶坚持说，汪总是拒绝考虑这种意见。陶后来举了一桩事情为例：一九三八年春天，当老牌政客唐绍仪（日本人曾经要拉他出任维新政府的首脑）的长女给汪带来了日本方面的类似建议时，汪就断然加以拒绝，并打发唐的女儿空手回香港。此外，陶还说，汪把所有这类建议都告诉了委员长。据说，汪曾经对陶讲过：“不管在战争中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要同蒋合作到底。”[3]

陶深信，尽管共产党人参加抗战，但是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要“制服”国民党。可是，由于国民政府对合作政策承担了义务，所以蒋不得不容忍共产党人要从他手中夺走领导权的企图，不过陶却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国民党党内和党外动员并保持一支反共的力量。为此，他帮助组织了“艺文研究会”。这个在名称上具有欺骗性的组织并无官方资格，但是用陶的话来说，它“实际上”却是政府的“一个小小的部门”。研究会用它从“非官方渠道”得来的经费，“资助学者从华北来到汉口同中国共产党作斗争。”[4]

这个研究会的创办人之一兼会长是周佛海。他是唱“低调”的人们的首要发言人。就是通过他在低调运动中与陶希圣的合作关系，他才同汪精卫熟悉起来，才在筹建汪政府的谈判中充当主要角色，并且终于在那个政府中得到了第二、三把交椅的地位。

和参加汪精卫政权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周也曾经在日本受过大学教育。[5]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这使他受到了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河上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使他日后进入了日本早期左翼运动的前列。可能由于河上的影响，周才于一九二一年去上海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是这个幼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在名单中被列为中国留日学生的代表。周不久回到日本，又用了三年时间去完成学业。后来有些人把他在战时与日本的合作归因于他年轻时同日本人才交往。对于这一点，周反驳说，他在日本的整整七年期间从来没有结交过一个日本朋友；而且（他在一九三九年宣称）除了偶尔有些朋友带着他们的日本妻子来访以外，“在过去十六年中，他也没有接待过任何日本人”。[6]

周于一九二四年回中国，这一次是到广州，当对国民党在那里已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府。他在那里脱离了共产党，开始在黄埔军校任教。他的学术研究也象他的政治关系一样，来了一个大转变。他对克鲁泡特金的兴趣让位于对孙文学说的研究。这些研究引起了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注意，终于使周获得了“国民党内最博学的理论家”的声誉。[7]

由于周同蒋的交情，他在国民党中提升得很快。在他还不到三十岁时，蒋就任命他为南京中央军校的总政治指导员。一九三一年，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受派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周逐渐靠拢由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所操纵的 CC 系。他也开始参加复兴社（它那带有贬义的别名蓝衣社更为出名）的活动。复兴社是由一批“黄埔狂热分子所建立的”半秘密组织，因为“他们感到国民党的文官机构太软弱、太官僚气、而且太腐败，不能贯彻孙中山精神”。[8]周在政治训育方面有特殊才干，到芦沟桥事变时，他已担任国民党宣传部次长。此

外，他还是委员长的亲信侍从。

在所有同汪一起叛离的人中，周显然是最接近蒋的人了。他在一九三九年追述说，“（叛离重庆一事）最使我难过的莫过于旧谊了。首先，十几年来，我是通过与蒋委员长的关系才爬上政治阶梯的。”[9]犬养健是在汪政府成立前的一段长时间的谈判中才逐渐熟悉周的。他说，他始终没有真正相信周确已和蒋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俩以往的关系太密切了。许多日本人的头脑里总是在琢磨：周的真正作用恐怕就在于保持蒋汪之间联系渠道的畅通，以备日后两人言归于好之用。犬养说，当只有他和周两人在一起时，周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委员长过去写给他的私人信件给犬养看，并且唉声叹气地怀念故乡不已，但是犬养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了自己对周的怀疑。[10]

关于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经过，主要得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高宗武谈起。在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的那个冬天，发起这一运动的人就是他，而在两年后，破坏这一运动的人也是他。起先是悄悄地、遮遮掩掩地干，双方都在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并只作谨慎的、不肯定的承诺。但是这个事情突然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的第一周里以闪电般的速度告吹了，因为高宗武耸人听闻地脱离了和平运动，并且向香港报界发表了一批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和平运动已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单方面的工具。*

芦沟桥事变时，高年仅三十岁。[11]他出生于中国，但在日本受教育，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一位对他很熟悉的日本同事回忆说：“他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12]高身材瘦小，患慢性肺结核病，一生中有好几次长期住医院。高留学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他关于中日外交问题的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其中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过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的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13]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人们于是把汪精卫和他周围的人都贬为妥协派，并造成

---

* 在高宗武发表他的回忆录以前，或者在台湾政权同意让外人自由阅览其历史档案（在我们这一辈子里，看来是不大可能得到这种许可的）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里发生过哪些事情的详情是无法知道的。据高讲，他本人对这些事情的记述在他死前是不会发表的。同时，“为了不被人曲解”，他还要对自己的私事和回忆严加保密。自从一九四〇年一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来，高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和平运动的东西，除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和我的一次谈话以外，他对于同感兴趣的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所有邀请都一概谢绝。

了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暗杀和汪精卫本人被刺的那种气氛。就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迫使往下野放洋，据说是去欧洲养伤。发生了这些事件之后，汪的最亲密追随着中还留在政府里的就寥寥无几了。高宗武这时已经成为汪的支持者和密友，他也是留了下来的几个人之一，而且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当时他还不满三十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

在芦沟桥事变和上海战事爆发之间关键的五个星期里，使华北事变不致波及全中国似乎还有一线希望，但此时高宗武和低调俱乐部都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正象高对他的日本新人所说的，谁要是稍微主张一下和解，就会被人骂为汉奸。[14]在那个期间，蒋政府大部分时间都在江西省群山之中的夏都牯岭办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云集牯岭，研究中国对于在华北发生的事件应作出何种反应，讨论东京当局正式要求国民党政权不得插手解决华北危机的问题应作出何种对策。很多人以为蒋会继续奉劝人们同敌人打交道要有耐心。正如新闻记者埃米莉•哈恩所写的那样：“多数最高级官员都在窃窃私议，认为蒋介石的反应又会是老一套，只有少数几个例外。”[15]一年多以前，他都还一直竭尽所能设法推迟同日本的最后摊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曾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宣称：“不到和平无望，决不放弃和平。不到无法避免牺牲的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16]如所周知，从蒋的观点来看，一九三七年已经到那个最后关头了。同中国各领导人一起开了十天会之后，他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关于局部解决华北事变的建议，并且声明对于任何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将坚决抵抗，从而结束了种种猜测。

但是低调俱乐部并不认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都已经破灭了。不管怎样，它不相信中国经受得起一场对日的全面战争。汪精卫在牯岭主张温和持重，他告诫不要采取轻率的行动，并要求再用五年的时间来建设国家、准备应战。在私下讨论中，汪精卫向国民党官员们透露了一篇“很长的文件”，这文件显然使一九三五年达成的何梅协定和其他一些协定的真相大白。这篇神秘的文件的确切内容现在无从知道，但是胡适感到它极为重要，并建议予以公布，以利于通过谈判达成和平。[17]枯岭会议结束后不久，胡适和“南京政府智囊团的几个成员”在高宗武家里共进午餐。这些智囊人物感到为时“已晚”，必须迅速纠正“过去的错误”。据胡适讲，他们谈话的整个基调是，应当“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并应把这项任务交给高宗武去办。[18]他急忙向委员长推荐高宗武，说高是一个“有学问且勇于负责的人”。蒋说，他知道高宗武，并准备召见他。[19]蒋介石果然于七月

三十一日会见了汪精卫和高宗武，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会上，高提出了一个“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计划要点。根据某一消息来源说，汪“立即表示同意”。[20]至于蒋呢，他既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没有拒绝高宗武的大胆建议。[21]这种默许的手法，是委员长日后在处理高负责的和平运动时所反复使用的手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无论哪个聪明的年轻外交官使用什么外交妙计奏了效，委员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功劳据为己有；要是失败了呢，他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把责任推卸掉。在西安事变和牯岭会议以后，委员长再也不能公开唱“低调”了。但是，在私底下，这种阳一套阴一套的做法还是有其明显的好处的。

高赶忙向多年来栽培他的吴震修汇报他与蒋汪会谈的情况。吴比高年长约二十岁，吴的一个熟人称他为“浙江财团驻南京政府的全权大使”。[22]事实上，吴也是南京银行公会的理事长和南京商界的重要人物。多年以前，吴在东京军事测绘学院学习时，是蒋介石的朋友黄郛（曾于一九二八年一度任外交部长）的同学。吴曾通过黄和其他一些国民党领导人的关系，使包括高在内的几个得意门生得到提拔。吴是个孜孜不倦地为中日和解奔走的幕后人物，他对一九三七年夏天日趋恶化的危机极为担心。

吴和高是在七月三十一日（就是高同蒋见面的那一天）碰头的。吴的一位日本实业界同僚兼朋友西义显也应邀在场。两年前，西义显担任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后，就同吴搞熟了。这两个住在南京江苏路上的邻居彼此之间有了很深的交情，而且他们发现彼此对改善中日关系有着共同的兴趣。西义显是南满铁路公司总裁松冈洋右的门生。他向松冈提出了关于自己搞的和平工作的报告，从而获准“自由动用满铁的巨大资财”以支付和平运动所需的经费。[23]西义显在会见吴和高之后不久，就前往大连请求松冈支持高的计划。但是此行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还在途中，上海就爆发了战事。这时，吴和西义显的关系也确实变得紧张起来，而在十二月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就更加紧张了。但到了一九三八年初，他们又恢复了商谈。

在此期间，高在南京失守后不久就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并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前往香港。根据“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陶希圣的指示，他的真正使命是去同愿意为和平运动效劳的个人和官员取得秘密联系。这个任务需要经常往返于香港和上海之间。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六月之间，高还三番四次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情况。周希望高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重新打开通往东京的渠道，这条渠道已经被倒霉的陶德曼商谈和“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破坏了。[24]

几乎所有与高的使命有关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说高所

搜集并且寄回给周的情报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里，而是继续转到委员长那里去了。人们都说，高的香港之行是经过蒋批准的。[25]蒋原来可能对高逾越“命令”的行为有些担心，在蒋的亲信侍从周佛海表示愿意承担这一使命的全部责任之后，或许蒋的担心也就冰释了。蒋肯定知道高此番远出决不单是搜集情报而已，不过蒋觉得高最终还是忠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也许这一点足以使蒋不去考虑由于高积极介入和平活动而连累自己的风险。高也许能找到有影响的、愿意就蒋所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人。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蒋就能加以利用。委员长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用谈判取得和平的价值，因为这能使他摆脱他与共产党结成的不愉快的同盟。[26]

一九三七年末，高的病疾结核病复发，为了养病，高被迫暂停一切活动，因此他只得找一位他所信得过的下级，原亚洲司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来帮他的忙。董道宁生在浙江，童年时代一直住在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据和平运动中的一个日本同僚讲，他的日语“讲得比日本人还好”，是一个典型的“日华人”。[27]董与日本人的交游很广。在南京沦陷前后，高把他派往上海，让他“在幕后推动”陶德曼的调停工作。他的确曾绕过了调停者，直接去和日本大使川越茂商谈。在上海期间，董的努力得到了吴震修和浙江金融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28]在过去的十年中，浙江省的银行家和国民党之间互利的关系有所发展，银行家们捐献资金支持国民党，国民党则以政府的种种优待来酬谢他们。可是当战争迫使国民党节节向内地后退时，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了。正如费正清估计汉口战役以后的形势时指出的：“四川的地主和军阀取代了上海的银行家。”[29]

其实银行界在好几个问题上都对战争不满。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对华商银行的一切汇票增征了约百分之十的战时附加税。政府擅自征取的这项法外“提成”使得华商银行，特别是那些在香港也有业务的银行，处于很难同其他银行竞争的地位。“其结果是造成了外国资本财运亨通，而中国资本反而必须同自己的政府进行斗争的这一怪现象。”[30]受委屈的银行界显然感到，在战时要改善自己的处境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和平运动上。

董道宁还得到了他的老朋友西义显的鼓励。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发表前一两天，董道宁到上海汇中饭店西义显下榻处去拜访了他。使董感到吃惊的是，当他把自己未能通过外交途径找到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的失意情况告诉西义显后，这位日本朋友竟建议，如果董肯去东京的话，也许还能在陆军参谋本部里找到某些愿意倾听他的建议的人。西义显最后提醒董，既然董已经同敌方川越大使都谈判过，

因而成了“过河卒子”，那么到东京去跑一趟的“性质也差不多，而且效果还会更好”。西义显甚至提出他自己要先董而去东京，以便为董介绍合适的人物作一些安排。[31]

西义显在参谋本部里的主要熟人是陆军大佐影佐祯昭。影佐不同于被西义显在满洲工作时所看不起的那些“政治军人”，他是一个“杰出”人物、是一个远比一般日本军官强得多的人。西义显承认，他最初对影佐的印象并不是这样的。一九三五年，他们第一次会面时，他对影佐的印象并不深刻，影佐当时是驻南京的副武官，持有一般军官的“典型强硬路线观点”。[32]影佐自己也承认，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对中国问题持很不开明的观点的“粗卤军人”。但他说，芦沟桥事变后不久，随着调到参谋本部去工作后，他就开始改变看法了。[33]显然，影佐是根据石原莞尔将军的命令，于一九三七年八月被任命为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的，石原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对影佳起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不久，参谋本部成立了战略课，其明确目的就是谋求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影佐那时已提升为陆军大佐并被任命为这个课的课长。西义显是于影佐调到参谋本部工作后，碰巧在船上遇到影佐的。当他们共叙旧谊时，西义显对影佐非常尊重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及其谋求和平解决支那事变的决心印象颇深。他说，影佐感到，日本的“第一道防线应该是支持中国民族主义”。[34]当西义显鼓励董道宁到东京去探索和平有无可能时，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影佐大佐身上，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西义显于会见董道宁后不到五天，就返回日本和影佐商量董来东京之事。影佐马上就同意了。二月十五日查在西义显的一个助手伊藤芳男的陪同下抵达日本。关于董在日本逗留近三星期的细节，我们不大清楚。我们仅知道，他除了和影佐大佐商谈外，还和参谋本部石原派的其他一些军官进行了讨论，这些人包括多田参谋次长和支那课课长、当时的陆军中佐今井武夫。[35]从此以后，今井也将要象影佐那样深深地卷入和平运动之中去。

影佐对于董道宁敢于承担这样一项“危险”的战时使命表示赞赏，并且对他说，要想确定谁该对支那事变负责就“如同给死去的孩子计算年龄一样没有意义。”他们两人同意一起合作，以寻求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董在临走前请影佐（自愿地）写封信给他带回中国去。据影佐的回忆录说，董显然是想把这封信带给蒋介石去看的。但考虑到既有“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存在，而且以一个小小的课长直接给委员长写信恐怕也不太合适，于是才决定还是由影佐写信给他以前的两个“熟人”，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前任外交部长张群。[36]影佐在信里（也许是在几封信里，记录里没有讲清楚）表示，他对于一月十六日的声明发表以来的事态发展很感痛心，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极力反对这个声明的，他还在信里赞扬董道宁的这次

使命，把它同南宋外交家王伦曾在历史上作过的努力相媲美。*

影佐写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它使"东亚的最后结局更加令人绝望"。董道宁的这番使命表示了中国人民的诚意，日本人对此深为感激。影佐宣称：虽然我们希望董的这项工作会继续下去，但是根本解决中日问题决不能依靠"有条件的交易"，而只有依靠"彼此赤诚相见"。"有条件的交易"（亦即正式外交谈判）最后将会毫无结果，因为中国一定会坚持恢复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的原状，而日本则再也不会接受这一点。因此中国必须完全信任日本，而有武士道传统的日本也决不至于不以诚相待。影佐最后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条件就会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

对于日本军人通常采取官僚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国内外问题的态度，影佐是很蔑视的，这与他非常重视个人荣誉和忠诚是很相称的，凡是了解他的人都能举出感人的事例来证实他具有这种品质。有一个同影佐很熟识的新闻记者松方吉三郎说："在和平运动中，不管事情进行得顺利与否，影佐总是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们。"[37]后来影佐终于成了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汪对他为人坦率是很倚重的，参加和平运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一致证实，汪对日本人明目张胆的不诚实感到心灰意懒，往往都想不再同日本合作了，只是由于他信任影佐，才同日本合作到底的。但是，就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影佐渐渐和陆军的权力中心疏远了，而且越来越无法说服他的同僚们同意他的观点，即：同汪精卫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加以鼓励的做法，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汪和影佐两人基本上都对此无能为力，这一点是一条贯穿这段历史的主线，而且是最终导致汪记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霍华德·布尔曼把汪精卫刻划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依靠"个人的才华"去弥补自己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不足。[38]松方吉三郎则把影佐描绘成一个可爱而又有魅力的人物，在他身上具有军人的许多忠贞和正直的美德。这一点也为布尔曼对汪精卫的描述作了一些补充。

三月五日，董带着影佐的信，"兴高彩烈地"离开了东京，他确信可以依靠参谋本部的几个重要人员去设法放宽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中的条件。即使他带回中国的保证只是参谋本部少数几个军官个人许

---

* 据西义显说，影佐所提关于王伦的那个很少有人知道的例子，既使收信人莫明其妙，又使他们大为感叹。不管是何应钦还是张群，都不见得知道这个在历史上并不知名的人物在七百多年前也曾执行过类似这样的一项和平使命。委员长不见得知道，西义显接着说，就是'博学多才的汪精卫"也不一定知道。对于他的本国人（影佐）能如此精通中国典故，他显然感到很自豪。（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17 页）

下的空洞诺言，那也还能够使在香港的那一小帮日本人和中国人不至于失望，而他在继续前往汉口之前，是要向他们报告此行经过的。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和董碰头的有西义显和高宗武，在场的还有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讯社华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

松本重治同和平运动中的许多人一样，也是一个中国通。一九二三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又在几所美国和欧洲的大学里读过书，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九三三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先是代表联合新闻社，后来又代表同盟社工作。他的一个美国熟人觉得他甚至"长得象个中国人……而且挺象汪精卫。松本重治对这些话是很爱听的，因为他认识汪精卫，而且对汪很钦佩。"[39]松本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曾遇到过一位以前在九州帝国大学教过高宗武的教授，这次偶然的会见使他结交上了高并且同高成了终身朋友。[40]由于高有"勇气"，敢于在芦沟桥事变后承担起与日本谈判这项不得人心的工作，这使松本大为钦佩。松本回忆说："每当他来上海与日本使馆人员会谈时，总要到我们在施高塔路的家里来吃早饭，喝味噌汁（一种日本的黄酱汤）。"[41]这时松本总要把自己有关日本政治发展趋势的广博见识说给他听，而这些见识是来自他同左右日本政治趋势的首脑人物的私人交谊，其中包括常常保持超然态度的近卫首相。松本同近卫的关系实际上是如此密切，以致人们普遍把他当作是首相的私人驻华大使。*近卫所了解到有关和平运动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与松本的通信和谈话得来的。

松本也认识影佐大佐。他们在上海有一个时期还是邻居。松本说："我们两人发现我们的妻子有些亲戚关系，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谈到许多事情。影佐总是那么虚心接受我对陆海军的批评，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他往往拿出笔记本说：'你还有什么新指示吗？'他非常诚恳，因此我很喜欢他并且尊重他。后来当他调到陆军参谋本部任支那课课长时，借重他办一些事情是很方便的。"[42]

据自一九三八年春起就几乎与高宗武一直保持联系的今井武夫讲，高宗武偕同董道宁从香港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情况。周佛海对董道宁此次出使的小小成就很感鼓舞。高宗武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如果不是直接

---

* 近卫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是把松本引荐给近卫首相的人。据牛场说，"近卫同松本很合得来。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能够向近卫直接进言，而松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牛场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次会见中告诉我，首相"非常想"让松本担任驻美大使。可是当首相向他提出这一想法时，他却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感到在那个时候接受这一职务就会是对他的上司和朋友、同盟社社长岩水裕吉的一种不忠的行为，因为岩永才逝世不久。一九四〇年松本升任同盟社的总编辑。在战后的年代里，他因先后担任过日本国际大厦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而在东京的国际人士中很出名。

汇报，就是间接通过了周佛海。[43]蒋介石对高的汇报的答复是；批准高回到香港去。四月十六日，高回到了香港。

西义显以他惯用的细腻笔法描述了他同高宗武会面的情况。西义显对高宗武的脸色表情如何、喝了多少杯酒以及其他类似的细节都没有放过。人们不禁要问，他是不是要读者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相信他所叙述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靠得住的呢？（我们以后将会看到，高宗武就对西义显的报道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总而言之，事情是十六日上午发生在浅水湾饭店十号房间里（更确切地讲，是在十号房间的阳台上）。高宗武、西义显、董道宁三人谈了一会儿后，高表示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向西义显传达并且突然要求董离开这个房间。然后高就说，委员长已经看过了影佐大佐写给张群和何应钦的信。委员长对这封信“很感激”，并口头指示高向日本政府和影佐转达他的谢意。委员长要让影佐知道：“作为一个军人”，影佐的真诚和勇气“深深地感动”了他。此外，还让高请影佐“放心，因为我（指蒋）是永远也不会公布这些信件的”。[44]高说：委员长曾告诉他，董道宁从东京带回的信息是他多年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所遇到的最为诚恳的态度。

委员长曾亲自向高宗武口授停火的条件，这是他对这条新开辟的谈判途径感兴趣的明证。他没有详细地逐一说出这些条件，只是笼统地提到，日本必须承认中国在长城以南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至于满洲国和内蒙古，这些都是可以留待“日后”谈判的问题。委员长曾经明白表示他认识到引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日本关心她自身的安全，所以他愿意就这些地区进行谈判。[45]由此可见，蒋介石愿意承认：日本有迫切必要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由她所控制的反苏战略据点——只要这个据点不扩展到长城以南就行了。*

---

*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36 页。但高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坚称，虽然西义显热心参预谋求中日和平的工作，但是他的记载却“很不准确”。高坚持说：所谓他同西义显有过几次长谈的说法纯属虚构。至于影佐写的那些信件，高说：“信倒确实是有的，但是没有转交给收信人。”根据会见过张群（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台湾任委员长的总统府秘书长）的陆大维向我提供的资料看来，张也否认曾经接到过影佐的信。我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是相信西义显的记载呢，还是相信高、张二人矢口否认的说法？这三个人之所以这样说，可能都有他们各自利己的目的。西义显可能是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影佐所参预的崇高事业辩护而虚构了一些事实，他还想让人们知道，不仅声誉扫地的汪精卫；就是蒋介石本人也对此很感兴趣，以便借此来夸大此事的重要性。至于张群，则由于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和平运动最终导致了汪精卫背叛重庆，而且国民党的领导人一直坚决谴责这一事件是叛国行为，所以他矢口否认他自己和蒋介石同和平运动有任何纠葛乃是不足为怪的。最后，我们还可以这样看：高宗武也是为了保全蒋介石的名誉才这样说的。西义显写道：他不能肯定究竟这些指示是（用高所说的那样）由委员长亲自口授的，还是由高起草然后得到委员长批准的，

这时，西义显和松本都劝高宗武本人到东京去，可是高却表示犹豫并声辩说：这样跑一趟就会逾越蒋授权的范围。在高的要求下，西义显同意承担这项使命，并在高向他作汇报三天后于四月十九日离开香港。西义显在东京受到的接待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他本来希望影佐会同意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可是影佐却拒绝这样做。[46]西义显在东京的熟人解释说；目前东京的政治气氛实在令人捉摸不透。西义显在日本逗留的期间，徐州战役正在进行。事实证明，这一情况对于象影佐和多田那样一些人说来，算是一次惨败了，因为他们一直希望使冲突局部化并且最后和蒋达成和解。在局势明朗化得足以弄清楚反扩张派的主张蒙受挫败的程度以前，进一步探索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的工作就排不上日程。有人告诉西义显，谣传近卫首相正打算按照更为有利于反扩张主义派的方针来改组内阁。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末对于推动和平运动就会有一种好得多的气氛。就这样，西义显仅仅带着参谋本部几位成员继续关心和平运动的保证，于五月中旬回到了香港。这些保证使和平运动还能进行下去，因为当时战线正在迅速扩展，酝酿已久的汉口战役业已开始，这似乎表明，参谋本部内的温和分子正在失势，他们使战争保持在平静得足以使谈判之门能够重开的水平上的努力受到挫折。如果那时日军高级指挥部连勉强支持的表示也没有的话，那末和平运动差不多肯定是会垮掉的。

西义显的东京之行标志着和平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据他说：当高回去向蒋介石汇报蒋在四月份通过高转交的和平建议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时，蒋气急败坏，乃决定除了全面抗战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他命令高在香港的活动仅限于搜集军事情报。[47]据西义显的记载说；所以，委员长明确地不准高宗武作东京之行。

尽管如此，要求高宗武去作这样一次旅行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包括有势力的中国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内的浙江财团及银行家，极力鼓励高去东京，而且还可能提出过要资助他成行。*不

或者高根本没有征求委员长的意见和批准就擅自杜撰的。这就使关于高传达了委员长指示这一已经够暧昧的说法变得更加令人弄不清楚了。（同上书，第 137 页）西义显没有说明他为什么会有上述那些疑问。我猜想他是用这种写法来提醒读者注意：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并没有无懈可击的文件作证明，也没有委员长的签名盖章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最后，要是影佐果真收到过回信的话，照想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很可能要提到这件事，可是他对此却只字未提，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漫谈》版本中是这样。（参看我在《参考资料说明》中对这篇作品的讨论）

*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387—388 页。虽然犬养强调高宗武与银行界的关系（例如，他指出高总是利用中国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作为和平运动的日方参与者发来密码电报的收电地址），不过他也谨慎地指出：高并不只是以他们代理人的身份行事。他说：恰恰相反，诱使有影响的中国人参加和平运动乃是高的“大的才能”之一。（见同

过，最终说服高去作这次未经批准的旅行的则很可能是松本重治。松本记得自己“约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在上海法租界高宗武没有生火的“秘密住所”里会见了高。[48]（如果这个日期是准确的话，这次会见应在西义显毫无成果的东京之行之前。）他们“边打哆嗦边谈”了两小时。松本极力向高说明，日本迟早将会被迫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而同蒋介石打交道，不管蒋介石是“在汉口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同时他告诫高对日本不要不耐心，因为很可能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日本才会同蒋打交道。他问道：“那么，汪精卫现在抱什么态度呢？”

高宗武回答说，汪曾经就与日本开始直接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同蒋讨论过大约十次，但是蒋每次都不同意汪的想法。高说，汪深信，“除非重开和谈，中国人民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将永无尽期，双方的敌对行动也会遥无止境。”此外，高还坚信，为了制止中国共产党人的壮大，同日本人合作是很有必要的。

松本根据他平时和近卫、多田、影佐这些人来往密切，感到很自信地对高说，他认为，只要蒋介石肯辞职，东京就会考虑“从大陆分期撤走日本军队”。松本告诉高：日本可以同意蒋“暂时下野”，但是真要同日本实现和平，那么蒋就非辞职不可。高宗武表示同意。因为蒋以前就曾经暂时下野过，所以这次也还有可能再干一次。高也知道，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反蒋分子”，他特别指出了阎锡山、龙云和张发奎等人。松本敦促高估计一下暂时撇开蒋介石的可能性有多大，并且说，如果高愿意到日本去一趟，他答应“力争”在东京“解决一些问题”。

据西义显说，高宗武根本用不着别人这样劝他。他知道蒋介石有命令要他别和日本人谈判，所以他是不能自由行事的。虽然他对蒋忠心耿耿，但是他那种必须为促成中日和平做些事情的责任感则要强烈得多。高显然相信——或极力使自己相信——蒋的怒气会平息下去，而且从长远看来，达成和平对委员长本人还是有好处的。[49]当高同周佛海讨论拟议中的东京之行时，他发现周无条件支持他，而且甚至还表示愿意对高此行承担全部责任。[50]

在国民党的档案对外开放以前，总有人会继续对此加以猜测，认为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高宗武的东京之行和汪后来的叛逃至少是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甚至还可能是在蒋的直接命令下进行的。然而，在确有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还得相信那些与和平运动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或追忆，而他们都一致认为高去东京是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的。[51]

书，第 56 页）

松本写信给影佐，以便为高的东京之行铺平道路。就在预定动身的那一天，高跑到松本在上海住的饭店里去告诉松本：他对这次旅行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现在不想去了。他说他关心松本提出要蒋介石暂时下野的含义和影响。高要得到不使蒋丢脸的保证。松本记得，高是这样说的："委员长应得到很好的待遇。"松本向高保证，他会尽最大努力去说服日本官方作出这方面的保证。高还要求松本在自己逗留东京期间也要在东京。当松本答应可以这样做时，高才同意进行这次旅行。松本和高都戴有官方颁发的记者证章，乘一辆挂着同盟社旗子的汽车，通过日军封锁线去搭乘等候着的"日本皇后"号轮船。[52]松本在送高安全离去的几天后也接着去了东京。高于七月初抵达日本，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

高在东京期间，松本给他介绍了汪记和平运动初期的另一有名成员犬养健。他的父亲犬养毅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在满洲事变时担任首相，并以中国革命之友闻名。在犬养毅去世前不久，他以缅怀往事的心情追述了孙中山曾经怎样在他家里作客，孙和其他中国革命家怎样把他的住宅作为秘密开会的场所，并且怎样"和我共享我的衣食，乃至我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53]孙中山在自传里也直爽地感谢了犬养毅和其他一些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 i 孙写道："我们的日本朋友所作出的极其宝贵的贡献，有待正式的中国革命史将其更为详尽地加以记载。"[54]一九三二年，某些过激分子由于对犬养毅首相在满洲危机中采取了同中国和解的姿态表示愤怒，而把他暗杀了。年轻的犬养健立誓要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虽然犬养健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并且一度当过国会议员和递信交通省参事官，他是由于他父亲的名望和他本人与近卫的密切关系才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重要人物的。犬养健和松本一样，成了近卫的智囊团成员之一。作为一个努力研究中国事务的学者，他在近卫官邸中有一间办公室，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他的战后回忆录《扬子江仍在奔流》一书是关于汪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和董道宁先前赴日之行一样，高在日本所进行的会谈也没有留下正式记录。因此我们只好依赖当时参加者的记忆了。幸而很多人都写了回忆录，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记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互有出入，即：究竟在讨论中怎么会提到汪精卫的名字的。

影佐在事情发生五年后写的文章中追述说，是高宗武在他们两次会谈中的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两次会谈都是在高所住的位于东京西面群山之中的箱根旅馆举行的。*据影佐的这个记载说：高讲过，如果日本不同蒋

---

* 高宗武去东京时，恰好遇上苏联秘密警察的一个高级军官柳什科夫将军叛变的事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由于担心他们两人可能会彼此碰上，就让高先后还住过好几家私营

介石谈判，那么就必须另找他人，而汪精卫乃是“明显的人选”。但是他认为，只要汪还留在政府里，他就不可能把他的观点公开讲出来。因此，除了在政府范围之外发动一个和平运动迫使蒋倾听和平倡议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影佐说，他个人表示同意高的看法，而且回去向多田参谋次长作了汇报并“征得了他的同意”。影佐的回忆录同时指出，他对日本行将卷入的计划表示了疑虑，因为这个计划会使日本承担起“不在政治上、经济上、当然也不在军事上进行任何侵略……等重大义务”。[55]他显然没有把握说日本会履行这种义务。

今井和犬养都表示：汪的名字是在更加拐弯抹角的方式下被提出来的。据他们讲，高来东京的直接目的是，弄清“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否仍旧在妨碍着中日的接近。按犬养的说法（这是以高对他讲的话为根据的），今井向高讲明，尽管参谋本部里有许多人不同意“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这是一国的国策，毫无办法可想——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一位首相的声明不能如此轻易地就给取消了”)。接着今井第一次具体建议以汪代蒋，“作为［为时一两个月的］过渡时期里的暂时措施”。据犬养说，影佐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并补充说：“一旦和平运动走上正轨，只要汪精卫提议，我们就会转过来同蒋介石进行正式的谈判。”[56]

在所有这三个人的记述中，以今井所写的看起来最为真实。当今井参加高宗武、板垣和多田的谈话时，他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高“可能已经放弃了通过蒋达成一项解决中日事变的办法的念头；当然，他并没有坚决主张这一点，而是急切地等待日方提出这个问题来。”[57]由于高具有无可争议的谈判技巧，他作这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是十分得体的。

当犬养问及蒋介石在高的这次使命中起什么作用时，高回答说，蒋以为他还在上海或香港搜集情报呢。高坦率地告诉犬养：“他不知道我来东京。我想，如果他听到此事，一定会大吃一惊。”[58]犬养问道，要是汪果真取代了蒋出来同日本谈判，那又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会不会有使“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的危险，高承认确实有这种危险存在，因此必须极力注意防止这种发展趋势。尽管这些人在他们的记述中都有为自己说话的成分，这

旅馆。实际上，对高的访日却安排得着实很令人莫明其妙。一方面，犬养健描述了精心布置的安全措施，提到了私下进行的会议以及建筑物设有秘密出口处。总的说来，无非是表明；高宗武到日本这件事是严加保密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声有色地描写了为高安排得满满的社交日程表，其中包括有许多日本显要们参加的大型社交聚会、在夜总会里举行的招待会以及高官俱乐部舞池中的一些滑稽表演，等等。看来，之所以进行这些活动，与其说是遮人耳目，倒还不如说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见《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77 一 79 页）今井说（见《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9 页)，尽管采取了这些安全措施，高至少有一次还是“偶然碰上了柳什科夫将军”。

一点是不应该忽视的，但是他们却都煞费苦心地在写和平运动参加者担心会再度引起蒋汪之间原来长期的不和，从而使这个运动演变成为一场内战。高使犬养确信："周佛海曾经说过，他一定坚决设法防止这种趋势。"[59]

高在东京期间，犬养和他见过好几次面。他们俩在高下榻的旅馆里，后来在高临走前夕又在横滨一个夜总会里，边喝酒边讨论高的此番使命以及和平运动的前景。从大养对那些谈话的回忆可以看出，虽然高是擅自作主来到东京的，但是高总觉得自己是代表委员长，而不是代表汪说话的。他告诉犬养说："我知道蒋的真正想法。只要日本在书面上同意……把她所有的军队撤到长城以北，蒋肯定不会对日本说：'你非得明天就把全部军队撤走'。"高说，从长城以南撤军的细节和进程可以留待"一个秘密议定书之类的东西来加以规定"。[60]他请求犬养设法使日本有关当局谅解这几点。

大养禁不住问高宗武，他为什么答应为和平运动打先锋，为什么要把可能对自己产生可怕后果的东京之行这一使命揽过来。高回答说，他不同意蒋介石周围那些人的看法：他们把打日本作为中国当务之急，而同共产党人的对抗则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说。他告诉犬养说，他也完全意识到，共产党人可以利用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类动人的口号去抓住中国同胞们的心理，特别是年青人的心理。他还对犬养说，对他本人来说，他准备为了同日本达成和平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时。假如那样做意味着当上了汉奸，那也没啥！"[61]高对燃起战火的芦沟桥事变有他独特的分析，它明显地表示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强烈仇恨与不信任。他告诉犬养，对于七月七日晚间宛平县城附近所响起的神秘枪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中国驻军都没有责任。那是一伙共产党人干的，他们"是从一个隐蔽的地点开枪的"。多年后，在我写这本书时，高仍旧坚持这个论点，而且还坚持他在一九三八年同犬养商谈时所表示的狂热的反共立场。[62]

高离开东京时就确信：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日本根本不会同意和蒋开始和谈。但是，他同时也确信，日本同副总裁汪精卫谈判的可能性倒是极大的。*尚待确定的只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始谈判这一问题而已。虽然高在东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是松本说话的口吻），可是他回到中国时却并没有带回任何保证，说明日本肯作出汪所需要的让步，以便使汪能够领导一个生气勃勃的和平运动。高在东京期间拜访过的领导人中还有西园寺公一。西园寺为了中日和解事业作过不懈的努力。高告诉西园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把事情交给那些政府负责人去办的话，那末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说来，局势都将会是毫无希望的。"[63]因此，两国真正关心

---

*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名蒋为总裁，从而确认了他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同时汪当选为副总裁。

自己国家的人士应该组织一个能够改变两国政府政策的和平运动。高对西园寺说："我要回中国去苦干一番，你在这里也这样干吧。"*

高回到上海后，考虑了他的下一步棋怎么走。他把东京之行的一份报告转给了周佛海。但是他决定不回汉口去见蒋，因为他怕蒋会大发雷霆，还可能由于违反了蒋的命令而被关进牢房。总而言之，他觉得要说服蒋辞职恐怕没有什么可能。由于悲观失望，精疲力竭并为个人前途担忧，高宗武自七月中旬回来后，约有六个星期没有露面。影佐等人只能在东京猜测，大概高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未获成功，也许说不定高来日本只是为了搞间谍活动。[64]后来到了八月底，那个不知疲倦的松本重治终于发现了高失踪的原因：高因患"轻微的肺结核病"，一直在上海一家疗养院疗养。可能是由于除了身体欠佳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使高中断了同参与和平运动的日本成员的联系。但是日方参与者对"呼吸系统有病"和"精神苦恼"这类说法似乎还是相信的。今井写道，高"发现自己陷人了尴尬的处境，感到十分苦恼"。[65]高的确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从未意料到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汪支持他的切实保证之前，就同蒋切断了关系。

中日双方参与和平运动的人都说，高宗武东京之行的报告送到了委员长的手里。周佛海看了这份报告后，就先同汪精卫商量，而汪对高的东京之行显然事先是一无所知的。汪听到日本当局希望他"背叛蒋"去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表示大为震惊。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把这份报告交给了蒋。[66]据报道，几天后，蒋介石把他的机要秘书陈布雷找去，问他是谁批准这个姓高的"家伙"出国的。看来蒋对这项消息的反应，与其说是大发雷霆，不如说是颇为恼火。委员长只是怒骂周佛海"荒唐，荒唐！"。[67]

再谈低调俱乐部

起先，汪对于高在七月间所转达的日本建议，曾断然加以拒绝，随着这一年光阴的消逝，他又暗暗地对它关心起来了。中国有识之士对于暗淡

---

* 一九四二年，西园寺由于向他的密友尾崎秀实（索尔格案件的关键人物）泄露了某些国家机密，因此违犯了"军事保密法"而被判有罪。但日本法庭宣判他并没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动机，将他的过失归站于单纯的疏忽大意。因此西园寺这个贵族免尝十八个月的铁窗滋味。在战后的年代里，西园寺献身于改进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工作。一九五八年，他迁居北京，而且在此后的十二年里，他一直住在那里，写下了一些赞扬中国烹调、酒类和音乐的文章，并积极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工作。他在缔结一九六三年民间协定的谈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协定，日本可以每年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的战局和抗战的痛苦代价感到日益沮丧乃是促成他起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蒋在撤退时所实行的焦土政策造成了巨大损失。例如，仅仅为了替中国军队赢得一点点时间，就在一九三八年六月把郑州附近的黄河堤坝炸毁了，把素有“中国的苦难”之称而且充满淤泥的黄河河水放了出来。在黄河于几百英里以北的地区找到新的出海河道之前，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有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好几百万英亩的农田被水冲毁，二百万人无家可归。由于洪水及其影响，可能有一百万中国人因此死亡。

周佛海深知当时局势已陷入绝境，但是他还必须以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和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一起去参加经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感到他们讲得有声有色的战果是与事实不符的。后来他写道：“当我听到周、郭两位先生的报告时，我的心都碎了，这些报道纯属虚构，其目的只是为了欺骗广大的老百姓。”[68]一九三八年，周佛海在已被包围的汉口主持了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日）庆祝会，听见郭沫若惊人地宣布接到了前线来的一个电话，说取得了一次战胜日军的大捷。他对郭所要的花招和“欺骗”欣喜若狂的群众的做法极为愤怒。他说，他感到中国的局势决不是花言巧语和“高调”所能挽救得了的。[69]他怎么还能号召人们誓死保卫已经注定要完蛋的汉口呢，

其实，就在举行庆祝会三天之后，随着乎汉铁路上的战略要地信阳于十月十三日陷落，汉口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信阳失守的前一天，日军在大鹏湾登陆，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同样也就决定了华南的广州的命运。一个月以后，在十一月十三日夜里，中国守军放火烧光了周的家乡——长沙市。它是这次战争中最骇人听闻的一次焦土事件。有关火烧长沙的全部真相至今不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互相责怪），但是在这个挤满了难民的城市里，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四天的大火中送了命。还可以肯定地说，将这座城市烧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当时日军距离长沙还很远，只是在六年之后长沙才落人了日军手中。[70]

由于十月份形势急剧恶化，不少人变得日益苦恼，汪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对国民党保卫他的家乡广州市的做法感到特别愤慨。汪叛离重庆后，曾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在广州发表广播讲话，对他的广东同乡表示慰问，并指出，他们曾经“再三得到军政当局的保证：日本军队永远也占领不了这座城市……。从当局的这种不负责的乐观态度看来，其主要职责似乎就是要使老百姓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71]汪接着就以斗争已经无用，焦土政策造成了“意外和不必要的牺牲”等为借口，替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那些逃兵们放的火“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也没有给他们的攻势造成任何困难。它只是把广东人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生计都毁掉了而已。”[72]

汪是不是主要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且由于他有某作家所谓的“恐战病”而去指责这种战争（并且终于叛离重庆）呢？[73]他本人事后所作的说明强调了这些想法，而且那些和他有私交的人的记述都着重指出了他那“诗人般”和“多愁善感的”气质，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汪自己的说法。尽管这样，那也没有什么必要去非难汪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来说明他离开蒋还有其他动机。他的一个明显的动机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尽管汪长时期以国民党左派的姿态出现，但是有许多证据足以证实以下的看法：他的“左派主张”不过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为了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搞平衡，并且还由于他与蒋之间的个人倾轧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反之，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汪对于象土地改革那一类“左派”纲领，或者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即阶级斗争）是深表同意的。就汪的“左派主张”中够得上构成前后一贯的理论部分看来，它是主张“着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实现宪政、并强调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的，而（他的）右派（对手们）则强调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以及（国民党的）训政作用。”[74]汪和他的国民党右派朋友们都是英雄主宰世界论者，汪和他们一样，都不愿意把中国的命运交给群众去掌握。一位作家在提到汪的“脱离群众”时评论说：“他把谋刺摄政王作为他早年最脍炙人口之事，这是意味深长的。”[75]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汪甚至对国共暂时联合也公开反对，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以惯用的夸张手法打了一个比喻：有人以为同共产党人合作是可能的，这种看法“是既可怜又可笑”屈为“这样做等于是饮鸩止渴”。[76]芦沟桥事变后，公开批评统一战线就同批评抗战一样，都遭到了严厉的禁止。尽管这样，汪至少还能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公开发表了一篇令人感到兴趣的揭露性文章，拐弯抹角地攻击共产党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承认焦土政策和游击战都有用处。的确，乍看起来，他似乎认为这两种战术都极为可取而且主张加以推广。例如，他在列举了一大半必须实行焦土政策的理由后作出结论说：“最后，军民奋勇战斗及英勇的牺牲精神鼓舞了那些幸存者，使他们也做到了同仇敌忾。决不允许一颗能结出有助于敌伪的果实的种子发出芽来。”[77]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汪为焦土政策和游击战术所下的定义，等于变相谴责了他心目中的共产党战术和不打阵地战的防御打法。焦土“意味着土地由于实际战斗而被烧焦。它并不意味着连仗都不必打，也不意味着不经激烈战斗的考验就把土地‘烧焦’。应该再次强调的是：‘焦土’是指一个地区必须是由于进行了战斗而整个遭到破坏。”[78]汪接着用西方人所熟悉的话来阐明他的论点：“烧焦的每一寸土地首先必定是沾满了人

民的眼泪和血汗。”[79]当一九三八年汪写这篇文章时，他还不便于直截了当地攻击共产党应该对他所反对的焦土政策负责。但是一年后，当他在日军占领区的安全庇护所里写文章时就可以明说了。他指责道，把广州“化为焦土”只不过是掩盖了军队退却的懦夫行径而已。为什么广州当局会照办呢 7“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那末蒋又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命令呢？“他只不过是按共产党的指示办事而已”。[80]

同样，当汪还在中国后方写文章时，在他的措词中，他又是（含蓄地）把毛泽东式的游击战排除于自己所赞成的那种游击战之外的。他说：“即使是经过改编了的职业匪徒，也切不可在‘游击’战中加以使用。他们会回避对敌作战，会避开敌人战线上的坚固据点。”[81]这种回避攻坚的战术当然是毛泽东的战略的要点。一年后，汪又更加露骨地说：“在令人难于置信的短时期中，就把空前未有过的大片国土送给了敌人。而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游击战术则把还没有被烧掉的地方通通变成无人区。凡是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的游击战只不过是大规模抢劫的委婉说法而已。”[82]

由此可见，汪反对这样进行作战，并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还有他敌视共产主义的因素。他显然深信战争的领导权正落人共产党人手中，恐怕国民党人再也无法获得主动权了。在汉口时期，他似乎对共产党控制着政府宣传部门的情况特别感到担忧。当时他曾写道：“除了各地有为数极少的汉奸之外，每个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认识到反抗侵略和侵略者的必要性。因此没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如果人民把精力都致力于实际有效的工作，而不把时间浪费在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上的话，效果将会好得多。”[83]

正如六年后汪在他“临终遗嘱”中所提到的那样，一九三八年欧洲局势的发展使汪和低调俱乐部越发感到沮丧。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份最后的几天里，在慕尼黑的会议桌上确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遗嘱说，在欧洲，西方民主国家节节败退，而在远东，当日本排命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时，他们却“只是袖手旁观”。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的国家，而苏联提供援助的唯一原因则是希望看到“中国由于采取无止无休的抗日政策而遭到毁灭”。据说，汪在一九四四年曾经这样解释说：与其成为苏联阴谋的牺牲品，与其遭受巨大牺牲而且最终还是控制不了中国的命运，“倒不如把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同日本缔结和约，那岂不更好？”[84]

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绝望和自暴自弃的情绪。这是由于下列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他们对空前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感到悲伤，他们对西方列强显然不愿提供有力的支援感

到愤恨，他们感到继续抵抗拥有绝对优势的帝国陆军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由于无法在汉口那种受压抑的气氛下公开说出他们的见解而感到失望，他们深信这场战争正使中国朝着加强国内的共产党人与国外的共产党人（指苏联）势力的方向发展，他们急于开始搞国家建设——如果有必要并能商妥平等条件的话，就同日本合作。最后，当我们在估量那些促使汪斟酌自己支持高宗武的建议有何得失的因素时，就不能忽略以下这个动机：即汪蒋之间的个人倾轧，而那些骂汪的人都讲这才是汪首先考虑并考虑得最多的因素。甚至钦佩汪的人也认为汪和蒋的磨擦是尖锐的、长期的，并且肯定是会影响汪作出他的决定的。但是如果贸然作出结论说：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那就会忽视许多其他同等重要（或者更为重要）的因素。

就在汉口失陷、国民党政府逃往长江上游的重庆后不久，低调俱乐部通过它的一个成员梅思平接到消息说：日本提出了一项带有“宽大”条件的“和平建议”，梅同松本和今井一直保持着联系，而这一联系是高宗武在病中为他安排的。松本和今井也一直与东京当局保持联系，并曾向梅保证，当时陆军省正在制订一项较为宽大的对华政策。努力培育了一年之久的和平运动马上就要产生效果了。

东亚新秩序

十一月三日，就在梅到达重庆几天之后，东京宣布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近卫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号召建立一个以中日平等合作关系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85]他向他的人民保证，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并希望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日本决不想在中国取得领土和特权，她期望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野心和争夺”。近卫放弃了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并且答应，日本甚至还打算“考虑”放弃她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鉴于他的国家在军事上正取得节节胜利，近卫竟会如此宽宏大量，真是令人感到意外。尽管声明也指出，“国民党政府除了作为一个地方性政权之外，已不复存在”，近卫总还是放弃了他在年初所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从而把他的政府引导到新的轨道上去。如果国民党政府愿意“更换人事组织，以取得新生成果”，那末，日本是欢迎它参加新秩序的。

就在同一天，傀儡头目王克敏和梁鸿志发表了他们各自的声明。他们说出了大陆日军各司令部的意见，公开宣称，只有消灭了中国共产党人，中日和平才能实现，而且只有推翻了蒋介石，才能消灭共产党人。[86]所以，

虽然近卫打开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大门，但是大陆日军各司令部（可能还有近卫本人）仍然坚决反对与委员长谈判。

尾崎秀实——近卫的出色的中国问题顾问——写道，近卫的东亚新秩序是中日冲突的“历史必然产物”。尾崎承认（也可能是警告）说，新秩序牵涉到“许多困难”，但是他坚称，由于它承认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它“日后的潜力将会是极大的”。长时期以来，日本人总是强调中国的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等方面，而忽视了民族主义。尾崎写道：“可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你在国共合作中能看到……在傀儡政权的头目中也能看到……在经济问题、和平问题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尽管中国有一切弱点，但是仍能坚持作战，其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不仅在国家一级，而且在个人身上……不仅在游击队战士中，而且在只‘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87]日本人之所以提出东亚新秩序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尽管这种认识为时已晚——他们永远无法用“单方面的手段”在经济上把东亚组织得对自己有利。*尾崎宣称，日本由于对中国问题束手无策，才最后想出了新秩序的主意，作为一种“使中国人愿意同她合作”的手段。[88]

尽管近卫关于“新秩序”的演说对于如何解决造成两国对立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并未作出回答（例如，没有提到撤军），可是低调俱乐部却已经感到它的调子很温和，值得进一步去探索和讨论了。因此汪精卫立刻命令梅思平回到上海去着手进行一轮新的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关于和平条件的详细协议。

---

[1] 我所使用的关于低调俱乐部的资料，是根据我访问参加过该俱乐部的幸存者或与该俱乐部成员有私谊的人们的谈话记录整理的。这些人是：高宗武、陶希圣、金雄白、何炳贤及李圣五。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

* 这时已与苏联间谍索尔格有了联系的尾崎，是一个典型的穿上了伪装的变色龙。他是一个日本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或曰社会主义者，由于跟着三十年代流行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风跑，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这篇文章（《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客观基础》，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 322—335 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说明这个机敏的“变色龙”如何用转弯抹角、婉转的、和模棱两可的话，设法通过当时严格的新闻检查，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尾崎用“单方面的手段”一词来说明日本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不用肯定会造到新闻检查删掉的词句。他用来避过新闻检查的另一手段是借中国评论者之口，道出了他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看到，他根据许多中国人的说法，把近卫的政策说成是一个“骗局”。在这里，尾崎接着补充说（同上文，第 329 页，为的是哄骗一下新闻检查官）：“中国人之所以那样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不理解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尾崎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喜欢用“东亚共同体”而不用官方的“东亚新秩序”一词。（见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第 5—8 页，第 119—120 页）

377—378 页和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九章及其他章节，有大量材料。

[2]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 220 页摘要引了胡适博士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的日记。

[3] 见陶希圣的《乱流》（载《传记文学》第二期第 165—194 页）。

[4] 同上文，第 166 页；另据访问陶的谈话记录。

[5] 关于周佛海生平的资料，取材于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 405—409 页，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376—384 页、及吉田东雄为《周佛海日记》日文译本写的序言第 l—34 页。

[6]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四号第 1 页）。

[7]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 405 页。

[8]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 97 页。

[9]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第 15 页。

[1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378 页。

[11] 关于高宗武的生平材料，取材于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385—392 页及其他章节、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72 页、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74—76 页。关于高的生辰众说不一，根据现有的人名录（东亚问题调查会编的《最近支那要人传》第 59 页）他生于一九〇六年，而他的和平运动的一个同事写的关于他的传略，说他生于一九〇七年（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406 页）。

[12]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载今井政一编：《昭和时代的动乱》第 268—329 页）。

[13] 见李圣五访问记录。

[14]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116 页）

[15] 见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姐妹》第 240 页。

[16]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 322—323 页。

[17]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 218 页引了胡适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日记两则。

[18] 同上书，第 218—219 页引胡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的日记。

[19] 同上书，第 219—220 页引胡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今井说高宗武同蒋介石的关系很密切，蒋还甚至在高结婚时当他的证婚人，（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 125—126 页）。但那些熟悉高宗武的中国人，则认为他们两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访问何炳贤和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20]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76 页。

[21] 同上。

[22]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230 页。关于吴震修的生平材料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26—30 页。
[2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77 页。
[24]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6—69 页。
[25] 同上书，第 66 页；另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34—136 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以及访问何炳贤与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26] 吉田东雄在他为周佛海的日记日文译本写的序言（见《周佛海日记》第 1—34 页）中暗示了这一情况，秦郁彦在《日中战争史》第 154—155 页同意这种说法。
[27]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92—93 页。
[28] 同上书，第 90—98 页。另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6 页。
[29] 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 221 页。有关国民党与浙江金融机构的关系的论著见 Y·C·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年》第十三——十四章。
[3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75—76 页，第 386—387 页。
[31]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劫秘史》第 95—97 页。
[32] 同上书，第 102 页。
[3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25—126 页。
[34]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04 页。
[35] 见影佐祯昭的《漫谈》（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349—398 页）。
[36] 这几封信的各有关部分，分别收录在影佐的《漫谈》第 359 页，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16 页、第 135 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7 页。作者都证明这些信达到了目的，全都转给委员长看了。
[37]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纪录。另见松方在影佐追悼会上的悼词（影佐于一九四八年去世），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26—127 页记述了这篇悼词。
[38] 见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载薛君度编《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 295—319 页）。
[39] 见埃米莉·哈恩的《我所知道的中国》第 44—45 页。
[40] 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25 页载一九七一年九月与松本的通信。
[41] 访问松本谈话记录。
[42] 同上。
[4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7 页。另我写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日本在华的傀儡政权》第 239 页，叙述较详细。
[44]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35 页。
[45] 同上书，第 135—136 页。

[46] 同上书，第 178 页。
[47] 同上书，第 185—186 页。
[48] 本章叙述的有关这次会见的说法，是根据我一九六九年访问松本时，松本谈到的情况。
[49]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86 页。
[5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387 页。
[51]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8—69 页，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46—47 页。
[52] 访问松本谈话记录。
[53] 见犬养毅为 K・K・河上的《日本谈论中日危机》写的序言第 7 页。
[54] 莱昂・沙曼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第 154 页引了这句话。
[55] 见影佐的《漫谈》第 359 页。
[56] 见犬养的《杨子江仍在奔流》第 49 页。
[57]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9 页。
[58] 见犬养的《杨子江仍在奔流》第 46—47 页，第 387 页。
[59] 同上书，第 5l 页，另见影佐的《漫谈》第 364—367 页。
[6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61 页。
[61] 同上书，第 44 页及第 72 页。
[62] 同上书，第 92 页；另见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63]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 284 页。
[64] 见影佐的《漫谈》第 359 页。
[65]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8 页；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578 页及访问松本的谈话记录。
[66]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 166 页；另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9 页。
[67]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69—70 页；另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 9 页。
[68]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第 11 页。
[69] 同上。
[70]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 42—43 页（张治中条）；另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 299—302 页，其中谈到长沙大火的责任问题。
[71]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二号第 8—13 页）。
[72] 同上文，第 10 页。
[73] 见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 115 页。
[74] 见杰罗姆・陈的《国民党左派的定义》（载《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五期第 557—573 页）。詹姆士・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 88 页有关汪精卫的论点也强

调了这一点。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09 页，举出下面的一个事实来说明汪精卫在思想上存在的权宜之计。当汪被要求解释他的武汉政府在一九二七年的政策——先是和共产党人合作然后又和共产党人决裂——时，据说，汪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为什么和共产党人合作？那是因为我们尊重我们的领袖（孙中山）的遗训。你们问到我们为什么以后又和共产党人分裂呢？那是出于对我们领袖的精神的尊重。”（重点是我加的）。

[75] 见劳伦斯・罗辛格的《汪精卫——一个卖国贼的伎俩》第 273 页。

[76] 见特拉弗斯・德基的《汪精卫与日本》第 88 页。

[77]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八年第二十一期）第 210 页。

[78] 同上。

[79] 同上文，第 211 页。

[80]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 10 页。

[81]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第 212 页。

[82] 见汪精卫的《抗战的真相》（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 70 页）。

[83]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第 215 页。

[84]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载香港《春秋》第 159——160 期，一九六四年二——三月）。

[85]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 477—478 页。

[86]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 368—389 页。

[87] 见尾崎秀实的《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客观基础》第 324 一 326 页。

[88] 同上书，第 328 页。

第十章 重光堂会议

重光堂坐落在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区一所公园附近，是一幢西式的大建筑物。中国事变的头几个月里，这所建筑物在巷战中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居住。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才急急忙忙地进行了修缮，并从附近的饭店里租来了足够七八个人用的家俱和摆设。十一月十二日最后布置完毕，工人和车夫都撤离之后，一个身着便服的帝国陆军军官开始接待“客人”。这位主人就是今井武夫中佐*，“渡边工作”†的负责人。今井接待的头一个客人叫梅思平，是刚从国民党政府的新都——重庆来的。在重庆时他与“低调俱乐部”和汪精卫都有联系。没有等其他客人到齐，这两个人就立即着手干他们本来要一起干的工作：商定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安排汪如何逃离重庆的详细办法。重光堂会议开了八天，于十一月二十日结束并签署了《协议纪要》，记载了日本陆军同汪精卫集团的初步谅解。[1]

日本人对梅思平并不熟悉。他在汪精卫和平运动参加者中是少数几个没有到过日本的、而且也不会讲日语的。他很不熟习日本的礼节，不脱鞋就走进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2]这一点的确使今井感到很吃惊。梅思平和高宗武、周佛海都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人们认为他是国民党 CC 派大头目之一陈立夫的党羽。因此，同高宗武、周佛海一样，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并不是很深的。犬养认为，梅思平是个“进步分子”。

他主要靠在南京附近当一个成功的实验县县长而出名的，据说这个实验县是蒋介石很关心的样板。今井称赞梅是一个不贪污，不利用县长职位去中饱私囊的模范官吏。一九三八年初，梅辞去县官后，陶希圣派他前往香港去充当“艺文研究会”办事处的负责人。从那以后，他一直与日本和平运动的成员保持着联系。

中国方面出席“重光堂会议”的，除梅思平外，还有高宗武和主要是担任翻译的周隆庠。今井的助手是由南满铁路公司来的伊藤芳男。在最后

---

* 今井武夫（1900—），1931 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任职，专门研究中国问题；1935 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驻于北平；1937 年—1939 年，陆军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支那课”课长；1939 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二课课长）；1942 年，任大东亚省调查宫；曾屡次参与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1944 年 9 月，任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译者注

† 渡边是一个很常见的日本姓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用来作为高宗武的代号。“渡边工作”是一项最终导致汪精卫背叛重庆的全部活动的综合性计划。

的细节都已谈妥时，影佐祯昭同犬养健从东京乘飞机赶到上海，主要是让影佐能参加部分最后阶段的商谈以及在《协议纪要》上签字。

在重光堂会议上进行谈判的有五个主要问题。根据会议的正式记录，三个参加者（今井、影佐和犬养）的回忆录和今井关于渡边工作的正式报告，使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双方所持的态度和写进了十一月二十日签署的《协议纪要》中达成的最后妥协。[3]下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双方对每个问题的态度。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满洲国的问题。它是历史记录不完全一致的唯一问题。今井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列举了双方开始时的观点，说明中国人是准备承认那个地区的自治的。这个报告如实地用材料说明了中国人在不少其他问题的保留意见，但却断然说中国方面表示“不反对”就等于给予了承认。[4]然而，据犬养回忆他在同影佐的谈话中，他们都一致认为承认一事是一个主要障碍。他也回忆了在会议结束时同高宗武的谈话，发现高宗武“非常关心在[即将发表的]近卫宣言中将如何处理承认满洲国这一问题”。高宗武认为，这一点如果处理不当，中国人民将会反对它，同时“汪精卫也会立即被迫逃亡到河内或法国去”。[5]对于今井和犬养记录不一致的解释只能是；会议没有那样认真地讨论过承认或不承认的问题，而仅仅讨论了日本将以什么方式宣布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十一月二十日签署的最后文件中，中国方面毫无异议地同意了承认满洲国。但是日本人没有能够说服中国人接受中国和满洲国同时相互承认的条款。正是由于中国人反对这个建议，今井才让步，所以没有满洲国的代表出席。[6]

会议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中国代表根本不考虑任何一种形式的赔款。今井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赔款的字样，这说明双方在最初的提案中都没有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十一月二十日签署最后的会议文件时，中国人准备接受日本提出“赔偿在华日侨因中国事变所受的损失”这一要求。日本对这一让步的交换条件是：同意不索取战争赔款。[7]犬养和影佐对于日本居然要求赔款都感到担心。在影佐看来，日本大藏省坚持提这种要求，违背了“和平运动在刚开始时就宣布了的”原则。[8]

关于在经济方面日本在中国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是在这个会议上进行了讨价还价的另一重要问题。梅思平、周佛海和汪精卫早在重庆时就已商讨了这一问题，所以梅思平这时准备宣布“中国对于中国和日本共同在华北进行经济开发全无异议”。[9]中国人的交换条件是希望日本答应“在华北不进行工业垄断”。梅思平也迫切希望双方都把华北看作是包括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和山东五省在内的地区，这就是说，让中国重新获得察哈

尔、绥远两省的全部土地，而在一九三七年，这两省的重要地区已划归内蒙古的德王所管辖。但是，在最后的协议中，既没有明确指出华北所包括的地区，也没有具体提到日本答应不在华北搞“工业垄断”。《协议纪要》第四款只规定了“承认日本在实现经济合作中的优先权，并为日本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提供特殊的便利条件”。[10]

中国方面在有关两国间经济关系的问题上赢得了几个重要的让步。《协议纪要》的一个解释性附件声明，第四款中所指的优先权仅仅意味着日本将享有最惠国待遇，别无其它含义。今井在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中说：“中国方面一直坚持希望在第四款中取消‘优先权’一词，因为在中国国内人们会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在国外则会助长其它强国要求给予同等待遇的压力。”

这些让步说明了今井和影佐的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代表的希望。看来今井由于接受了附件对优先权所下的限制性的、无害的定义，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意了中国方面的论点。今井通知参谋本部，在第四款的定稿上，他已达成写上“特殊便利”的协议，而没有坚持用“特权”一词，因为那几乎肯定会在中国引起“不良反应”。他还进一步听从中国代表的意见，放弃了日本关于建立“中日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要求。他说，中国方面害怕成立这样一个全面负责有关经济发展政策的机构将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下属类似机构的工作情况看来，中国方面这种害怕的心情是完全有根据的。由于今井愿意在这点上有所让步，最后的协议仅规定了“联合协商”等字眼。[11]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梅思平在重庆同汪精卫集团商谈的结果是，中国代表准备同意日侨有权在中国内地居住经商。他们希望日本能够放弃治外法权和在中国的租界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代表同意废除治外法权，但是认为租界问题则需要一段“准备”时间。今井说，只要西方列强仍然在上海、天津等地继续保有租界，日本肯定不会放弃她重要的租界。最后，虽然梅思平赢得了取消治外法权的谈判，但是，对于写上日本只是答应考虑把租界退还中国这一条，他也不得不表示接受。[12]

重光堂会议上更为棘手的争论集中在日本军事占领的问题上。日本方面表示愿意结束对中国的占领，但是其条件之多足以引起中国人的疑虑，拟议中的汪精卫政权在实际上将受日本军方所支配。此外，汪精卫集团感到，要使中国人民相信这个政权是在为他们最大利益而奋斗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证明它一直是在努力促使日本军队撤离中国的。为此目的它要求日本撤出除内蒙古以外的全部军队。留在内蒙古的日军仍可作为占领区的警备部队，但是他们要作为（至少在表面上作为）联合反共的防

御力量的一部分。汪精卫集团深信日本一定要坚持继续驻军内蒙古，因此他们迫切希望签订一项规定日本警备部队的人数、作用、地区和驻军期限的条。约。同时，他们还建议把中日联合防御力量的协定纳入反共防御条约之中，就象德国和日本签订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那样，“以消除中国人民方面可能有的任何疑虑”。*中国代表要求，除了内蒙古以外的其他地区，日本“在和平条约订立以后立即撤出军队”，并且还要求日本明确规定撤军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13]

日本方面强调要在内蒙古搞一个“特殊反共地带”。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日本愿意讨论限制她在内蒙古驻军的权力问题。日本设想的反共条约将是一项比她同德国签订的“反对共产国际”条约更为全面、更为积极的反苏条约。日本只同意，她在内蒙古特殊反共地带驻军的时间不会比“中日反共条约”的有效期限更长，这就是日本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情绪所愿作出的唯一让步。从日本方面在重光堂会议最初的态度来看，这是一个小小的让步，因为日本曾要求在“一定的”时期内驻军内蒙古，但没有确切具体的期限。

《协议纪要》的两个附件成了核心事项。十一月二十日签订的一个秘密附件，规定了拟议中的反共条约的细节。这个秘密附件特别划定了双方在中国边境的军事范围：中国在新疆地区驻军，日本在内蒙古驻军。一旦同苏联发生了战争，这些军队要联合作战。第二个是解释协议的附件，规定日本在平津走廊驻军，“以便保护交通线”，与驻在内地的反共警备部队联系。[14]

对中国谈判代表来讲，比日本对内蒙古的要求麻烦得多的是，日本坚持要在中国其他地区延长撤军期限。中国方面最初要求，一俟达成和平协定，日本军队就立即从中国撤走；但不行，只得退让为“几个月内全部撤完”。日本人所持的立场是，撤军不能在中国“恢复和平”之前进行，而且谁也不能说汪精卫政权将会得到承认，因此根本不可能定出一个准确的撤军时间。最后，日本方面终于同意撤军将“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并在‘恢复和平和公共秩序’之后的两年内全部撤退完毕。”[15]梅思平和高宗武认为，规定两年内撤完日本军队这一条是外交上的一个重要胜利，因为日本过去一直坚持拒绝规定撤军的时间。后来，日本政府以不承认这个两年撤军的条款为理由，否定了谈判代表的协议，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最不讲信用的行为。

---

* 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289 页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表面上只规定在日德之间交换国际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但秘密条款则规定，一旦缔约一方遭到了苏联的侵略，缔约他方不得采取对侵略者有利的行动。

重光堂会议的代表们除了讨论、制订具体的和平条件以外，还就汪精卫政权本身的问题做出了几点重要决定。特别是解决了将如何处理汪精卫逃离重庆的问题，汪精卫逃离重庆后将在和平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他希望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些什么援助等问题。研究一下这些讨论就可以使人们对汪精卫的意图得出以下两点深刻的印象。

第一，会议记录毫不含糊地表明，中国方面的建议是根据汪精卫逃离重庆及其后“建立一个新政府”和“组织一支新军队”的假设而提出来的。[16]被今井生动的回忆所证实的书面记录，[17]显然同后来汪精卫和近卫的说法大有出入。据他们的说法，汪精卫逃离重庆时，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由汪来领导的政府，而只是期待汪将领导一个同日本实现和平的运动。在我看来，这个出入只能有两种解释：不是汪精卫和近卫在他们后来的说法中没有讲真话，就是那时他们都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他们的谈判代表，不知道重光堂会议上达成了协议这回事。我们以后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第二，中国方面希望新政府将建立在“来被日军占领的领土”内。汪精卫集团具体建议新政府要在没有被占领的云南和四川等省开始其统治，等到日本军队撤离时，它的权力将扩规展到广西和广东两省。[18]

汪精卫希望获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以逃避被戴上“傀儡”和“卖国贼”等帽子的打算，最后之所以会失败，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是，放弃原来要在没有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地区建立一个新政府的计划，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在重光堂会议所有的讨论中以及汪精卫和他的同僚们在第二年的私下谈话中，都可以发现汪精卫始终在考虑有必要避免那些与临时、维新两政府有联系的傀儡们的命运。汪精卫和他的党羽们，甚至包括他的日本支持者，都决心不让汪当第二个梁鸿志或王克敏。就汪精卫的日本支持者来讲，他们之所以有决心，至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私下对汪精卫作出了许多承诺，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汪精卫一个人才能够为当时未经考验过的“东亚新秩序”增添活力。

然而，汪精卫的日本支持者也知道，汪能否使他们将来的计划有所进展，就得看汪是否能够证明“新秩序”是一个由平等成员组成的联盟，而不是一个掩盖日本的帝国主义目的的）假面具。要是汪精卫可以在被日本占领区之外进行统治，那么就最能说明他是不受日本控制的。当今井后来发现汪精卫竟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权时，他是十分惊讶的。今并曾以谨慎的态度对梅思平、周佛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担心汪精卫会步梁鸿志和王克敏的后尘。[19]

我们要回过头来谈谈为什么汪精卫最后决定要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地

区建立政权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探讨一下重光堂会议的设想。会议的记录和我同今井的谈话都很清楚地说明，谈判者们对于汪精卫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这一点是非常乐观的。一九三八年末或一九三九年初，日本方面透露了一个人们看了之后会有深刻印象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单，人们认为名单中的这些领导人可能就是汪精卫的可靠伙伴。作出这项推测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些象经济学家顾孟余这一类的人是汪精卫改组派的成员。其他知名的人如甘乃光、彭学沛、王世杰、张道藩等虽说与汪精卫的正式联系不多，但他们与汪的关系仍然密切得"可以被认为是汪的追随者"。[20]日本人假定（结果却是错误的）汪精卫的最大部分支持者将会来自蒋介石的许多政敌方面。他们对 CC 派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或其中之一会逃离重庆参加汪精卫的队伍抱有相当大的希望。三位一体的四川军阀一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一贯反对蒋介石的立场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他们在可能支持汪精卫的人名名单中是名列前茅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云南的龙云将军、广东的张发奎将军及陈济棠将军、桂系的头目白崇禧等等，也被着重说成是有希望（甚至很可能）成为汪精卫的支持者。甚至传闻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愿意加入汪派。[21]

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所有那些人都会倒向汪精卫一边。但是正如会议文件中所明确指出的，如果汪精卫准备在未被日军占领的西南诸省地区建立一个能存在下去的政府，某些关键人物、包括指挥大量军队的龙云和张发奎的支持是很重要的。要是没有那样一个军事基础，新政权既不可能抵挡蒋介石肯定要派来进攻的军队，也无法证明它是个不依赖日本的政府。然而这些决定性的支持，最后都没有落实。*

在重光堂会议上，汪精卫的代表们不光是推测某些重要的中国将领会来支持，他们做了更多的事情。他们要求日本军方尽一切办法减轻对那些有希望来参加汪精卫运动的军队的压力。十一月十五日他们明确地提出，要日本人从山西到广西这一整条很长的战线对中央政府发动战役，并从贵州省开始打击国民党军队。但那些中国人说，必须注意不要把在贵州的"中

---

* 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下列名单上所列的人谁也没有去投靠汪精卫。从一九二七年起批追随汪精卫的甘乃光，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二年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副秘书长。彭学沛是中国抗空公司的董事长。王世杰是政学系的成员、宣传部部长，常与蒋介石的意见相左。张道藩，知名的文化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人也曾经提到过可能支持汪精卫的人包括：内政部长何键，交通部长张嘉璈，四川大学校长、知名的教育家程天放。有趣的是，虽然在精卫没有得到这些潜在的反叛人物的支持，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后来对蒋介石的领导完全不抱幻想，于一九四九年投靠了共产党，其中留在大陆的两个人是邓锡候和刘文辉。一九五九年刘文辉担任了人民政府的林业部长。

央军”赶到效忠汪精卫的部队所辖的地区去，以免他们侵扰这些部队。[22]

会议后的几个月里，虽然汪精卫集团多次要求日军进行一系列“牵制性的攻击”以便“截击”和“孤立”蒋介石的部队，但是帝国陆军却毫无反应。今井回忆说：“我认为进行牵制性的攻击是一个好主意。为此我曾向东京当局商讨过，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汪精卫逃离重庆这一件事——但这事对许多人来说甚至算不上次要事项。不管怎样，等到汪精卫确实逃离重庆后，他们马上对发动牵制性攻击失去兴趣了，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23]当日本战略实力很紧张的时候，中国方面要求军事援助是得不到帝国陆军的支持的，因为帝国陆军对于为了保卫合作的尝试而消耗日本的资源和人力是不感兴趣的，何况看来合作的本身又得不到多少有意义的支持。

但是，汪精卫的支持者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互为因果关系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帝国陆军的牵制性攻击是引起各地起来响应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些驻守边远省份的军阀，类似龙云将军那样的人物中，反蒋的情绪是很厉害的，需要加以争取。据说，龙云与蒋介石的关系紧张到甚至他拒绝去重庆，除非蒋的夫人来昆明（云南省省会）作为人质，他才动身。[24]不论龙云多么急于同重庆破裂，但是他深知自己处境危险，因为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为了“监视”象龙云这一类潜在的反叛分子的军队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争辩说，蒋介石的军队就驻在龙云总部的家门口，准备一旦发现龙云不忠就向他猛扑过去。因此，只有中央军调离防区时，龙云才会有所行动。

东京对重光堂协议的看法

当两方代表在重光堂会议上摆明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以后，今井于十一月十五日飞回东京同他的上级会商。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陆军大臣板垣、参谋次长多田等十多个高级军官到会听他的汇报。会议从四时开到六时，会后，局长以上的高级军官离开了会场，留下低一级的课、班长来讨论上海所发生的情况，今井不得不反复保证他并没有被中国人欺骗，最后才消除了到会军官们的猜疑。可能也就只有那天是没有猜疑的。从第二年起，事实上大多数日本人就不相信汪精卫及其同党的动机了，对于汪精卫不断表白他所要求的一切就是为了和平这一点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日本人几乎普遍认为，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决心的诡计。[25]

在讨论了与汪精卫和他的同伙共事的利弊和要对那些可能是很广泛的计划承担责任所冒的风险后，这个课、班长会议显然得不出一个最后结论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今井在上海进行的谈判承担责任，甚至连支持象汪精卫和平运动那样一个没有把握的行动也不肯表态。这时，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提议，大家不要去管个人的责任，只要共同负责同意接受上海的协议就行了。其他军官一致同意，会议于下午九点结束。今井带着参谋本部同僚对他的支持，回到上海，继续完成重光堂的谈判工作。

对于这样一件严肃和重大的事情，由非正式的、低级的会议作出决定是“下克上”的一个明显的事例，而“下克上”是日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队系统的特点。“下克上”是指低级军官控制了高级军官。有时有人比较狭义地把“下克上”说成是不听命令而已，但这种说法在这里并不适用。以上述的事件为例子，“下克上”并不是用暗中搞阴谋的形式实现的，而是在陆军省里进行的，甚至还可以说是遵照陆军大臣自己的命令执行的，因为陆军大臣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决定让他们的部下来全权处理问题。就是在首相府也这么做过，影佐和今井拿着《协议纪要》去见近卫以听取他的反应。近卫“热情地”听了《协议纪要》，既没有肯定表示赞同上海协议，也没有表示反对。[26]他听到了报告，这就行了。

没有高级官员负责的决定，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汪精卫和他的同事们把在重光堂会议上所立下的保证当作日本政府的旨意，把日方代表当作是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会议结束还不到几个星期，东京当局就开始否认今井和影佐于十一月二十日签署的协议。[27]这个协议从国际法讲是无效的，因为在重光堂会议上确实没有互相认可的使节出席，然而并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日本的背信行为可以不受谴责。当然，日本方面撕毁重光堂协议无论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或东亚新秩序来说都不是好兆头。

据今井谈，“高级官员不负责任”使得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十分不稳定，而且在参加这项和平运动的中日双方看来，这也使日本的诚实大受玷污。在我访问今井时，他认为这很容易就可以解释清楚：

> 在和平运动中差不多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我个人的意图做的，并非根据官方旨意做的。如果做对了，还好。要是做得不对……（他说到这里，用日本习惯的手势，把一个手指横着往脖子上一抹，表示会遭到从降级到砍头的厄运，来说明他要说的话）。那些被派去干敏感的情报工作或政治任务的低级军官通常都是这样办事的：去探索各种可能性，制订详细计划，然后就靠自己的运气了。只有当工作已

经安排得很好了，并且看来前景很不错时，才把高级军官拉到前台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叫作“下克上”，但是，问题的实质是首脑们缺乏责任感。

这就是一个拥有无可争辩的资格的人士的解释。帝国陆军的军官在中国大陆上安排和执行秘密行动与谋略时，是没有几个人比他更加有经验的。正象今井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任何把“高级”军官说成是“低级”军官搞“下克上”阴谋的牺牲品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事实是高级军官——陆军中局长一级以上的军官乃至近卫内阁一级的官员——都完全不愿意别人把爆炸性政治计划的最初阶段的情况告诉自己，生怕该计划会失败。等到某个计划开始露出有成功迹象时，再去承认它并把功劳归给自己，也是为时未晚的。

至于他这个低级军官，凭他所掌握的丰富的地方背景知识、广泛的工作联系、充裕的活动资金和根据多年来艰苦的情报活动所积累的大量有关中国人物的档案，他是能够在他胆识所容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的。他的行动必须绝对保密，因为任何泄密的行动都会暴露他的中国共谋者，并使他们遭受报复。但是需要保密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个谋略家必须回避陆军中那些搞其他阴谋活动或反阴谋活动的同事们的耳目。今井告诉我，过早地暴露密谋，对密谋的执行者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当这个密谋遭到失败或是同另一个有高级官员支持的密谋抵触时，那就更加危险。（当我们谈到这里时，今井同刚才一样用抹脖子的手势来表达轻举妄动的后果。）

由于暴露就意味着谋略家的“完蛋”，因而具体参与某一秘密活动的人数总是保持在最低限度之内。一旦密谋失败，谁也不会知道。不过要是密谋有成功的迹象，就会准许更多的人参与机密，并把进展的点滴情况逐级上报领导，但至少在开始阶段总是以谨慎的和非正式的方式上报，以便使那些高级官员不承担正式责任。只有当某一计划得到高级官员们一定程度的支持时，才会将建议提交给高级文职官员，但也还得十分谨慎小心。例如，向近卫首相汇报时，最初总是很扼要的，并且是通过非正式的顾问们进行汇报的。如果他没有把这个计划的门关死，那么他同计划负责人的联系就会密切起来，越来越多的详尽情报就会通过象内阁书记官长这号人物的渠道送到他手里。在计划发展到关键阶段以前，却没有必要用官方的书面文件或通过正规的途径去报告近卫，因为没有必要让近卫为此事的进展承担直接的个人责任。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承担过任何责任。这种政府不承担责任的体制就是造成通常指责近卫的“软弱外交”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一九三八年日本的“中国通”同时进行各种“工作计划”——

其中有些是自相矛盾的——的部分原因。

---

[1] 《协议纪要》是《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简称。协议全文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293—298 页。

[2]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 124—125 页。其他有关梅思平的情况是据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87 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 9—10 页、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577—579 页以及访问陶希圣的谈话记录等写成的。

[3] 今井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先后从上海向东京陆军参谋本部发回五份关于“渡边工作”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全文收录在《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286—305 页。这些报告（除第二份外），也收录在《通往太平作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75—284 页。这几份报告连同今井的评论（见《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78—95 页）以及我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是我写本章的基本资料。

[4]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289 页。

[5]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93 页、96—97 页。

[6]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295—296 页。

[7] 同上书，第 294 页。

[8]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95 页。

[9]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289 页。

[10] 同上书，第 293—294 页。

[11] 同上书，第 294—296 页。

[12] 同上书，第 294 页。

[13] 同上书，第 289 页。

[14] 同上书，第 294—295 页。

[15] 同上书，第 296 页。

[16] 同上书，第 83 页、288 页。

[17] 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

[18]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83 页、288 页。

[19] 同上书，第 96 页。

[20] 同上书，第 93 页。

[21] 同上书，第 84 页、93 页、303 页；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集第 1519-H 号第 9—10 页。另《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第 201 页）报道说，陈立夫曾在河内加人汪的行列。

[22]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288 页。

[23] 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

[24] 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 316 页。

[25]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78 一 79 页。

[26] 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

[27]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00 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103 页、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155 页、和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317—319 页。

第十一章 河内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四月——

参加重光堂会议的代表们为汪精卫叛离重庆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它在纸面上相当简单。在重庆的汪和在东京的日本当局将研究会上签署的协议，然后在十二月三日前后把他们接受（或拒绝）协议条款的决定转告在上海和香港的代理人。如果双方都接受这个协议，汪就在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经昆明）首途香港。与此同时，近卫将发表一个“调整中日关系”的新政策的公开声明，声明将以概括的语言体现重光堂和平条款。接着汪亦将发表他的政见：国民政府应该同意以近卫声明作为谈判基础。[1]

日汪双方都按计划签字接受了重光堂协议。了解一下日本人给汪的信件中所表达的确切内容是有用处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重光堂签订的协议与十天后在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上日方所议决的和平条款之间的差别很大；可惜没有适当的记录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研究的线索。总之，汪表示接受的决定通过在上海的今井秘密传达到了东京，近卫则按计划准备发表他的声明。他原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大阪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对华“新政策”。[2]

但是，十二月九日事情突然发生波折，当时近卫得到消息说，汪不能顺利地逃离重庆。那些过去对汪的意图早有怀疑的人，现在更觉得他们持不信任态度是有道理的。甚至连今井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象他的某些陆军同僚所说的那样中了圈套。他的确想过要剖腹自杀；因为要是他在重光堂果真受了骗，那末唯一合适的出路只有自杀。在这疑惧日增的气氛中，匆忙地召开了一次“五大臣会议”。有田外相主张不管汪的下落或计划如何，讲话照样发表；但近卫决定“即使这也许是中国人耍的一个花招，他对欺骗也有所准备；既然他已经按计划干到这种地步了，他宁愿干下去，推迟讲话，以符合中国人的愿望”。[3]也许由于看了今井的报告，近卫对于高宗武这个“政客”是不信任的；但又由于有梅思平参加，近卫对于汪的和平运动仍具有一定信心。[4]九日晚间，近卫告诉两个朋友，他不得不取消大阪之行，并且“从今天夜里开始，我就要害病了”。[5]

果真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近卫躲到他的荻外庄别墅去住了几天，尽管他是以托病来逃避尴尬政治局势称著的，但这次却显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公众、甚至大部分阁员，对于国家政策马上就要改弦更张以及日本和

汪的勾搭，均一无所知。*直到几周之后，日方才得悉汪的计划受阻的全部内幕情况。

重光堂会议后的几个星期里，汪于（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安排了一系列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梅思平、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也出席了会议。陈公博同周佛海一样，曾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但很快就跟它分道扬镳了。关于他脱离中共的原因现在还有争论，但最普遍的说法是：他想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愿望同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责任发生了冲突[6]。假如真是这样，他的愿望最后占了上风，因为他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研究生。陈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很快就加入了国民党内的汪精卫改组派。从此，他的生涯与汪的事业就紧密相连了起来。每当汪的福星高照，陈亦飞黄腾达。一九三六年，汪下野赴欧洲，陈也去欧洲，汪返陈亦返。汪召集这些会议时，陈在成都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总之，他是汪最信赖的顾问和挚友。

在汪的官评所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争论得很久的问题：对于预期的近卫声明，是应该留待蒋介石去答复，还是汪自己先下手。如果我们认为汪及其追随者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事态发展的说法是可信的话，直到那时汪仍旧把有关和平运动的情况不断通知蒋，而且汪当时还再次要求蒋应答复日方。周佛海说，蒋为讨论这个问题召开过一次会议："许多显要的文武官员"中只有少数人出席，其中包括极力主张继续抗战的 CC 集团头子陈立夫。据周说，拥护这条强硬路线的人争辩说：一旦放弃抗战，中共、桂系、冯玉祥以及其它反国民党分子，就会利用反日的口号去取得民众的拥护来反对政府，结果必然导致内战重新爆发。在他们看来，要阻止这场他们似乎认定国民党准会失败的内战，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抗日。他们还进一步强调，国民党采取这种路线不会失掉什么：战争如以胜利告终，蒋会被捧为英雄；即使得不到胜利，"我们也会因为抵御了外侮而将名垂青史"。据周说，会上别无异议。蒋支持那些拥护继续抗战的人，决定拒绝近卫即将在外交上采取的步骤。[7]

假使以上情况属实，它意味着国民党已经察觉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无可奈何的境地。继续抗战，意味着保持统一战线并给中共提供一个庇护所，从而增加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获胜的机会，这正是汪、低调俱乐部以及蒋本人所最害怕的局面；但采取另一种办法，停止抗战，则甚至更糟，那

---

* 美驻日大使格鲁从东京致电美国国务院称，他"相当肯定地认为"，近卫因为跟吴佩孚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已经取消了他的广播演说。参看格鲁致国务卿 783 号电，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见美国国务院编的《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 417 页）

正好让国民党的对头，特别是中共，得以恣意攻击它的怯懦与姑息。蒋显然看出继续抗战是两害中之较轻者，而汪则选择了求和的道路。汪对那些指责他给了中共以很大好处的人们答复如下：中共乃是不管国民党主战还是主和都要滋生事端的“天生挑拨者”。他在一九三九年写道，“与其象今天那样眼看着他们能借口爱国暗中玩弄阴谋，还不如让他们站出来，公开制造反对和平的麻烦。”[8]

在这种尴尬而且看起来又是绝望的局面中，难怪蒋、汪二人在上九三八年末都彼此表现得犹豫不决，都彼此在高宗武及其同伙的求和努力中采取谨慎小心而又不作出承诺的态度。国民党欣赏这种不进不退局面的事实，更增加了汪经常重复的一种说法的分量，即他的叛离并没有背弃蒋本人于一九三八年也一直在考虑的政策。汪于一九三九年夏访问日本后，在回到上海时对一群美国和欧洲的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当时说，是蒋将高宗武调离外交部，并指定他安排对日和谈的。

> 说什么高宗武先生未经当局授权而自己搞活动，这纯属无稽之谈。在谈判进行中，曾有多次机会使双方观点十分接近，但双方总是因为涉及到蒋［是否下野］的问题而停滞不前，蒋也因为这个问题经常改变他关于和平问题的主意，我访问东京并非实行新的路线，这只是为了使高宗武先生开始的和谈免于破裂。[9]

汪宣称他一听说蒋决定拒绝近卫声明，马上就要求召开一次会议；他于十二月九日会见了刚从昆明巡视归来的蒋，仍旧希望蒋改变主意。[10]“我向蒋委员长表明了看法：当前中国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继续进行战争，而日本的问题则在于如何结束战争；若两国既承认各自的特殊困难，又能体谅对方的特殊困难，和平并非不可能。”[11]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大争论”，仍然没有把蒋说服，于是二人就分手了。据汪说，他直到此时才作出叛离重庆的最后决定。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他至少也还作了一次设法改变蒋的主意的努力。最后，他于十二月十八日面告蒋，他打算去成都向某个集会发表演说。究竟这是一种用来作为打掩护的说法，还是仅仅用来说明蒋对汪叛离没有任何责任或牵连，我们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汪在几小时之后离开了重庆，没去成都而去了河内。他

---

* 有些材料提到，汪说他想去成都，是因为他的同伙陈公博当时在那里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日本驻沪总领事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电告日本外务省；汪曾被邀请去成都四川大学发表演说。（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04 页）。蒋的顾问 W·H·端纳在几个月之后写道，汪在十二月十八日告诉蒋，“他要去成都向一次集

在给蒋的一封短柬中解释说，他离开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执行他所一贯主张的政策，即“和谈与抗战并行”的政策。在展望和谈的前景时，他预言：“你的任务比较容易，我的任务可困难了。”[12]

汪通过他的一个手下人，交通部次长彭学沛预订了所需的——也是难于搞到手的——飞机票。飞机票上并不注明由谁去使用；这是中国战时的普通保安措施，同时这种做法也让彭得以坚持说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飞机票是由汪本人使用的。汪全家上下除一人之外，都决定随他一道去进行前途未卜的流亡旅行。十二月十八日清晨，由四辆汽车组成的一支车队，载着佣人和行李，开始去河内的长途旅程。上午九时，汪夫人、汪的挚友兼私人秘书曾仲鸣，以及汪家另外两个成员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们惊慌地发现空军司令周至柔将军正等着搭同次班机。但当周对他们在机场出现并未表露怀疑时，他们又安下心来。汪本人在起飞前仅仅几分钟才到。登机前，他环绕机场稍事漫步，看起来非常轻松。飞机刚刚腾空，周将军就决心要给他的显要的旅伴表演一下自己作为一个飞行员的飞行技巧。当他走进前边的驾驶舱时，汪夫人和曾都在紧张地琢磨着周是否可能接到了重庆发来的最新指令后而驾机返航呢。但过了一段似乎很漫长的时间后，周从驾驶舱出来，回到原座；他经过汪的座位时，还行了个漂亮的敬礼。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汪的姿态都显得很轻松。[13]

午后不久，飞机到达目的地昆明，云南的省会、龙云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龙将军和一支军乐队在场欢迎这位副总裁。仪式结束后，汪等一行被领到龙的官邸，二人在此进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一直谈过午夜才罢。他们交谈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根据我们掌握有关汪、龙的足够材料，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次谈话对于汪的合作运动起着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龙是一个汉化了的罗罗族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军阀。云南这个边远的省份从一九二八年以来一直就是龙的私产。国民党授予他省主席的头衔，使他在云南的统治合法化；但实际上龙的心目中并没有中央政府。他保持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钞票，开采锡矿，控制赚钱的鸦片买卖，恣意为所欲为。从他的嗜好和他经营的企业看，他都是一个完全名符其实的“鸦片将军”。[14]

汪夫人借口旅行演说，早就到过昆明，为汪的到来铺平道路。她辛勤的准备工作，保证汪在昆明受到了礼遇并得以顺利出国。尽管如此，龙仍

会发表演说。”（见端纳的《蒋介石总部通讯》，载纽约《亚细亚》第三十九期第 195 页）龚德柏提供了最详尽的情况；他写道，汪在离开前不久，拜访了蒋的亲信张群并告诉张说，他将接受陈公博的再次邀请，去成都作一次演说；汪请张把他的旅行计划转告委员长，张应允照办。（见龚的《汪兆钧除敌叛国秘史》第 87 页）

旧没有决定是否全面支持汪的事业，这无疑就是十二月十八日所讨论的问题。龙显然并未坚定地表示支持汪，因为龙在动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决定跟重庆跑。*

在汪、龙谈判的同时，汪的内侄、昆明航校教官陈国璋，跟欧亚航空公司作出最后安排，包机飞往河内。[15]汪在十二月十九日给蒋拍了一个电报说，因为前一天的高空飞行使他的血压受到不利的影响，他决定“在回重庆之前，在昆明再呆一天。”†汪的随行人员这时又增加了陶希圣和周佛海。他们登上包机，直飞河内，于十二月十九日晚到达那里。

参加汪和平运动的人中，很少人相信蒋对于汪离开中国的计划竟会一无所知。我们即使不相信所谓汪赞成和平运动的事对蒋毫无隐瞒的说法、但蒋通过戴笠将军十万人的情报网、通过他在各处安插的大批私人密探，说什么也能侦悉大致情况，这一点看来是可以肯定的。例如，蒋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就跟和平运动的许多成员，特别是周佛海，有密切关系。[16]汪的长时期的合作者李圣五和何炳贤以及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全都坚持说，不能想象委员长会全然不知道汪的叛变计划；他们还认为，蒋完全可以叫汪走不成，如果蒋想那样做的话。绝大多数和平运动的参加者，都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况且，除了汪本人外，随汪一起顺利逃奔河内的亲近人物中还包括三个名人（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以及他们的亲属、佣人和行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消息灵通的日、中人士直到今天还确信：蒋“巧妙地利用了”汪的叛逃。[17]

金雄白当时是个上海报人，他回忆道，汪刚刚脱离重庆之后，跟国民

---

* 龙将军跟国民政府勉强的联合关系，一直维持到战后蒋迅速对云南省采取行动并建立强有力的控制为止。龙虽然在国民政府中获得一个挂名差使，但他仍然受到“相当于软禁的那种严密监视”。一九四八年末，他设法化装逃到香港。一九五〇年，他决心参加北京的中共方面。他先后担任过好几个官职；但在一九五八年被指控霸占了农民三千亩以上的土地之后，一切职务均被撤销。他死于一九六二年。（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第二卷第 458 一 459 页）

†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 30 页。金说，关于从昆明发电报的材料来自周佛海。但我没有找到任何可靠根据。既然在刚刚在前一天骗蒋说；他打算去成都（位于重庆西北，而昆明则在重庆西南），那么看来发这份电报就不通了。说去成都的这套把戏，很可能是为了说清蒋有任何牵连的污名，要是在汪离开重庆前叛离计划就败露了的话。一旦到了昆明，汪认为蒋对于他的行踪可能又需要作别的解释了。在汪到达昆明的前几天，周佛海早已借口有事先到那儿了；周告诉今井说，他接到过陈布雷给他的一份电报，指示他回重庆。由于周搞不清楚蒋对汪的计划到底掌握了多少，因此他难于抉择：要嘛听陈布雷的命令回到重庆，面临蒋可能已经知道汪的叛离计划而加以制止的局面；要嘛就抓紧时机赶快逃离昆明。假如他选择逃跑这一着，而蒋又没有自觉汪的计划，那么周过早叛离反而可能使蒋加速发现这个阴谋，从而危及汪的逃跑。周狡猾地选定了第三种办法，大体上是：他跟蒋取得联系，获准在昆明多逗留几天以便办完他的事。（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86—87 页）

党有联系的上海报界人士就从重庆得到通知：不要在报上攻击汪。[18]这跟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他与他的官员们例行的纪念周上，对汪奉命与日本人讨论和平条件一事加以否认的说法并不矛盾。蒋当时强调江在河内“接受医疗”，还谈到他这位副手“对国家卓著功勋”，并“表示希望：如果汪先生对国家政策持有个人意见，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回来和党政负责人讨论这些问题。”[19]

与此同时，今井大佐一直在上海等待汪叛离的消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给参谋本部拍了一个电报，证实汪已到达河内，并转达汪要求近卫首相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早先商定好了的声明。近卫不得不赶紧在二十二日晚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概述了三个“共同目标”。这个声明后被称为“近卫三原则”。[20]近卫宣称，日本人愿意和“中国的同感忧虑及共有卓识之人士”合作，以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些原则含糊得足以使汪精卫指出，近卫的声明证明日方变了卦。如果日本真正愿意成为一个“善邻”（这是三原则中的第一条，这个措词经常是按照罗斯福总统曾经时时用来指美国在西半球所担任的角色的提法译成英语的），那就有一切理由结束抗战、着手和谈。汪大概要说，日本变了卦的另一个证明是，近卫公开表示愿意跟国民党代表谈判，实际上证实近卫抛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21]

对于帝国政府在他叛逃后的首次官方反应，汪尽管公开表示赞成，但暗地里却大为不满。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虽然简短，但他超出了笼统的一般原则，以相当具体的词句接触到重光堂会议所讨论过的许多问题。他明白地表示，他不受重光堂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的约束。他也使自己会受到以下的指责：他对于合作运动的未来是如此之不关心，最多只不过是对鼓励汪的叛变以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倾轧感兴趣而已。汪记运动中的日中参加者都感到苦恼的是，近卫要求中国“放弃愚蠢的反日主义以及对满洲国的成见……自愿地同满洲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不仅如此，令人更难以忍受的是，竟闭口不提在长城以南驻扎日军的期限。影佐对于这项遗漏，跟汪感到同样的苦恼。陆军中的某些部门，利用传统的、笼统的照顾“部队士气”的呼吁，要求近卫不要对撤军作出承诺。影佐写道，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近卫经常提无限期地在中国领土上驻军，“激怒了全（中）国”。[22]

关于首相受到某些要求澄清撤军承诺的压力，我们可以从犬养健那里得到一些暗示。十二月二十二日晚犬养就在近卫的办公楼里。大养通过跟正在参加陆军参谋本部会议的影佐通电话得悉，参谋本部有些军官激烈反对近卫单方面宣布自行规定对华军事占领的任何限期。[23]带头起来反对的人，是头几天刚刚继多田将军任参谋次长的中岛铁藏中将和他的部下富永

恭次少将。富永决心使近卫打消此念，特别直言不讳，宣布他将“坚决拒绝承认如此丢脸的声明”。富永声称，战胜国就是不能向战败国作出承诺规定自己撤军的期限，任何这类承诺对于前方的英勇将士，都将是不可宽宥的污辱。他还说，他也不会因为在重光堂早就许下这些诺言而动摇；对于影佐曾经盖章同意的任何协议，他觉得都可以不受约束。认为今井和影佐所作的诺言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人许诺的这种论调，唱得越来越高。

据犬养说，这次通话就在首相办公室隔壁房间进行的，近卫无意中听到了通话的内容。首相竟会在如此意料不到的方式下，得知陆军反对重光堂协议的情况；这也很能说明近卫跟陆军之间的联系之薄弱。他的反应也同样地说明问题，他不愿——或者是不能——采取坚定立场反对强硬路线的拥护者。据犬养说，近卫不仅拒绝犬养的建议（让他促使参谋本部争取天皇支持宣布一个占领期限），而且对这种主张的反应简直就象个“漠不关心的第三者”似的。[24]

首相指示犬养：“请鼓励影佐在这桩事情上再做些工作，他是个解决难题的专家，对吗？”犬养争辩道，影佐在“和平亲善派”中的地位，使他“跟富永完全说不到一块儿去”，所以不能期望影佐可以起那种作用。尽管他全力以赴，也没有能够说服近卫采取任何特别措施，在道义上承认重光堂协议的承诺对日本占领期限有约束力。当近卫的记者招待会快要召开时——它到晚上八点二十分才举行——一影佐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想要见到近卫，希望使他记住：要是他不承认重光堂商定的条款对日本有约束力，和平运动就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但是，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拒绝让他进谒近卫，使他不能在最后关头当面提出意见。总之，近卫亲自准备了他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并且将它的内容对极力要影响他的军方各派系完全保密。一个首相事先不跟内阁中最高官员和军界有关成员商议，就发表如此重要的声明，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违反常规的。但是，近卫显然是决心要表现他既不屈从于强硬路线派也不屈从于“和平亲善派”所施加的压力。[25]

就在近卫接见记者时，影佐和犬养不胜骇异地读到了首相发表的声明。影佐后来写道，中国之所以进行抗战完全就是因为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因此“假如我们要使鼓吹和平的活动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绝对有必要表明撤军的意愿。”[26]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发表，几乎使汪的运动在顺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而近卫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使强硬派的意见更加嚣张。这些人根本没有让步，当别人正在上海试图为和平打好基础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把他们对中国的要求加了码。

近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新秩序”和“三原则”声明，是

以一九三八年堀场少佐的战争指导课所草拟的一个政策文件为依据的。半年来，这个《新关系方针》文件通过陆、海军机关各部门层层上报，并经这些部门讨论、修改，得到了必要的批准手续。[27]十一月三十日，它上报到了领导机构的最高层，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批准。关于重光堂会议精神与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精神之间的矛盾，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个政策文件中找到某些说明。在这个文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版“东亚新秩序”的更为鲜明的画面；因为《新关系方针》跟措辞含糊不清的官方公开声明相反，它是用严谨而明确的语言写成的。

这个《方针》的核心，就是近卫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各国“尊重”其它两国的“民族特点”，各国“尊重”其它两国的“领土和主权”。该《方针》相当坦率地表达了它的草拟者对于这些词句的见解，而近卫的“新秩序”声明却把它们掩盖于外交上惯用的暧昧词藻之中。该《方针》宣称，日本应当坚决要求“中国的新的政权形式，必须用与‘分治合作’相一致的原则为基础”。简言之，即日本将继续不准许中国的领导人完整地统一他们的国家。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政权（以及上海、青岛、厦门等“特别行政区”），实际上都应继续由日本人主持，如果在形式上和名称上不必这样说的话。日本将继续通过顾问在中国进行控制，这些顾问将派到任何可能建立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去；甚至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必须保证日本在内蒙古和华北的最高控制权，必须准许日本在这些地区无限期地保持一支“必要”数量的军队。

关于经济问题，近卫的“新秩序”声明仅仅谈到，中日之间的“紧密经济提携”；但秘密的《新关系方针》却可谓直言不讳了。例如，对于华北、蒙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最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国的需要。为了促进中国资源的开发，日本在华北、蒙疆以及中国其他各地，应该享受“特殊权利”。在十一月二十日的重光堂会议上由于中国人断然反对而被删去的这些词句，如此这般地又在《新关系方针》中重新出现，并于十一月三十日在天皇御前得到了庄严的批准。

在最重要的撤军问题上，《新关系方针》反映出对重光堂协议的精神和文字的蔑视，而这个协议却是促使汪叛逃的基础。该《方针》认为“共同防共”就是理所当然地允许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要地”任意驻军。对于反共“联防”的理论并不适用的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地区的占领也没有期限。“在赢得普遍和平以前”，将在该地区驻扎日军。此外，舰艇将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和“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驻泊。还有，中国不但必须容忍所有这些驻军，而且还必须承担全部有关费用。最后，无论日军驻扎何地，日本方面都要“保留对于铁路、航空、通讯、以及重要港口

和水道进行战略征用或监督的权利”。

《新关系方针》的主要起草人堀场少佐，后来承认“分治合作”思想的顽固性，反映了“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支那通们）的陈腐观念，它与现代趋向国家统一的潮流背道而驰”。[28]但是，在一九三八年，连陆军中的温和派——堀场也是这一派的人——除了继续搞“分治合作”之外，也想不出其它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甚至堀场自己也承认他的《方针》有毛病，他要求通过时间的考验来判断它，他觉得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过失。如他所说，那些企图使政府和天皇在一九三八年批准《新关系方针》的人，是想“确切地阐明战争的目的和范围”。[29]这使他们跟陆军和政府中不愿考虑战争有任何范围的人发生了矛盾。这些强硬派对于一场持久战给日本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毫无认识，他们不愿考虑其它解决办法，只想用军事手段越来越深入地侵占中国领土。我们已经看到多田将军和陆军参谋本部其他成员，在他们设法避免扩大战争时所遭遇的困难。堀场正是谋求对一场目的很不明确而范围又正在扩大的战争规定某些界限。即使我们看来，这些界限还是苛刻得令人难于原谅，但是按照堀场等人的看法，它们已是当时所能够得到的最宽大的条件了。

恶毒地攻击参谋本部（特别是对多田将军）为懦弱无能，乃制造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温和派明明知道，就算他们能够争取使当局同意一项包含合理宽大的和平条款的国家政策，但要使这项政策最后能够贯彻执行的可能性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意味深长的是，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才指定堀场开始起草一项新方针。那仅仅是由于台儿庄战败显示出日本为扩大战争所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之后，改变对华政策的主张才开始获得了某些支持。

堀场谈到他为新方针争取一定支持所遇到的困难。当陆军省最激烈的强硬路线鼓吹者川本芳太郎中住在场时，新方针草案在该省内部讨论都不可能进行。堀场写道，当川本发现该省官员乘他外出的时候已大体同意堀场的草案时，他简直“呆若木鸡”。堀场也遭到海军省的反对，幸而在那里得到一个叫藤井茂的海军少佐的支持。藤井由于支持方针草案，不久就失宠，并被当做“海军的思想异端分子”而受到审查。[30]

推进方针草案的任务大部分落到影佐大佐的肩上，他由于五、六月间的内阁改组已被调到陆军省，担任军务课课长，这个重要的职务使他有可能为《方针》的形成在陆军省内外进行游说。*同堀场一样，影佐也谈到了

---

* 影佐新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陆军省组织系统表上所载明的那种地位。实际上，他代行了他的顶头上司、健康状况不佳的军务局局长中村明人少将的职务。在军事系统

陆军省内部对新方针的反对。凡是没有要求割地、赔款的方针，都使“陆军和政府圈子里的不少人”对之视为软弱得无法接受的方针。影佐声称，其实这种看法只不过反映了一般公民的情绪，他们认为日本“由于中国事变作出了牺牲”，因此中国必须给予日本领土、权力“作为赔偿”，[31]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特别关心其形象和“面子”的陆军来说，要接受一项没有“割地、赔款”的解决方案是不容易的。

毫无疑问，有些人会指责堀场、影佐以及其他为该《方针》辩护的人，他们认为那是温和派在当时单凭理智所能争取得到的最好的方案。不过，人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同意他们的论点。十一月三十日在御前会议上的讨论肯定就能证实这一点。在听到有田外相宣读《方针》文本之后，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要求发言。虽然平沼（他在汪到达河内之后不久，继近卫任首相）觉得这个《方针》“总的来说是合适的”，但他认为，对于建立新的中国政权，本来是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的。他说，必须考虑到“形式的”和“实质的”诸方面。从纯粹形式方面来看，这个政权必须显得是“中国人民自发的、主动的”产物，但“在实质上它必须依赖日本政府的指导和协助，而［政府］则必须恩威并用”。平沼说，必须让中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调过头来反对我们”。[32]

平沼尤其反对《方针》对蒙疆的提法。他感到不安的是，《方针》在指明日本绝对需要蒙疆自治化方面不够积极。他承认，就当时情况看来，日本要求蒙疆自治化是为了反共，这一点倒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反共目的，我们也仍然必须要求［在蒙疆］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化”。平沼并不反对只是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但除此之外，蒙疆必须不受中国控制。假如日本并非由于要利用这个地区作为一个防共区而仍旧坚持内蒙古自治化，那末她的要求又怎么说得通呢，平沼答复了这个没有提出来的问题：“鉴于蒙疆与满洲国的关系”，日本在战略上有必要使该地区自治化。有田外相站了起来，要平沼对这一点以及其他各点都感到放心。他说《方针》提到了反共是日本有权驻军蒙疆的合理根据，但是“这仅仅表明它是最重要的目标”。可以假定还有其他理由——诸如蒙疆矿藏资源对满洲国工业的重要性等——也都包括在内了。至于平沼提出反对的另一点——《方针》也许把公共租界的交还设想得太快了一些，有田向这个男爵保证：“不消说，只是在设法使各欧洲国家都答应跟着干之后，我

里，军务局局长一职非常重要。他的一项主要职责是同其他政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如丸山真男所形容的是“搞不折不扣的政治活动”。丸山写道：由于他的“职务是管理政务，所以他能插手政治；由于他的职务只是管理政务，他又不负政治责任”。（见丸山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 119 页）

们才会干的。”[33]

读了十一月三十日的御前会议记录和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就不可能不同意今井的说法：它们是“片面的、强迫性的”，是“以过去的‘权益思想工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原则’为根据的”，并且是跟“重光堂会谈中日本所强调的东西相差很远的”。[34]最具有讽刺味道的是，许多人还认为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太软弱了，是近卫“优柔寡断外交”的进一步明证。

当我们回过头来谈汪在河内的活动之前，我们必须简单说说近卫对汪叛离重庆的态度。大部分记述部把近卫的态度描写成为冷谈的、猜疑的、悲观的。他显然没有影佐及其同伴的那股热心劲儿，把日本得以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汪身上，因此，难怪他也不象他们那样急于要对汪作让步以加强其地位。原田男爵（一个认真负责的、对日本昭和年代的事件、传闻作了逐日记录的人）记录了他在一九三八年秋季和冬季跟近卫的多次会见，可是在他的记事中却没有一处提到近卫把汪看作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合作者。近卫的私人秘书证实，首相对汪缺乏兴趣，并说“近卫对汪的态度，一定使汪感到极其失望”。[35]一句话，近卫——以及政府中的其他人——对于日本打算如何利用汪的叛离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内阁书记宫长风见章（近卫的一个亲信，秘密参与“渡边工作”的核心的少数非军人之一）写道：

> 其实，近卫根本没有考虑过，甚至没有梦想过，在当时［一九三八年］建立一个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近卫倒是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的调解人，使［日本］得以跟中国谈判，这样一来，事情就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一些。他所希望的仅此而已。根本没有理由去搞一个汪政权或者任何类似的东西。况且，鉴于华北与华中的新政权都无啥进展，要谈建立另一个新政权，对于［近卫］来说实在是不会有什么吸引力的。[36]

我们会看到，把汪作为调解人的这种观点，跟汪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调非常一致。[37]他一贯坚持说，他叛离的意图并不是要组织一个新政府，而只是要研究东京提出的和平建议。假如日本是诚恳的井且答应提出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他打算竭尽全力动员中国公众舆论支持以谈判来解决战争问题。如果重庆反应良好，那当然不错；但不论它反应如何，他当时绝没有想到跟日本合作建立一个新政府。汪自己对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时的动机所作的这种说明，同近卫把汪当作“桥梁”而不当作合作者的观点，恰好十分吻合。

然而，它跟今井大佐从重光堂送回的报告却不一致。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报告暗示：会上相当强调需要以军事行动去支持汪的和平运动，这是使之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的非占领区同重庆当局对峙的政府的第一步。今井指出，这些计划是“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但无论当时情况如何，他的报告承认，会上对于以下这一根本前提并未作认真的讨论：即中日双方代表都不言而喻地一致认为要搞一个汪政权。

汪作中间人的说法跟重光堂所提出的文件，二者之间的矛盾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会相信中国方面并没有提出他所记录的那些建议，而今井的报告纯属捏造，即使我们假定今井从谎报中方意见中会捞到什么好处，他也不能指望他们的观点会长期得不到澄清。中国方面在重光堂会议上就要跟今井及其同事发展有希望成为很密切的合作关系，看来今井总不致于认为如此卑劣地谎报中方意见会带来任何长远的好处的。

很可能是汪和近卫都把重光堂谈判的细节交给了他们的代理人去处理，虽然人们很难相信他们对会上所讨论的最基本的建议会完全不知道；对于把自己的未来卷人得如此之深的汪来说就更是如此。至于我自己，我认为最合理的假设是，汪及其追随者准备了两手。就是说，汪叛离后，的确打算向重庆呼吁，希望重庆接受他有可能从近卫那里取得的体面和平条件。然而，他不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任务可能失败，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他是考虑了其他选择的：最可能的就是出亡海外和跟日本合作这两条路。他的代理人在重光堂仅仅探索了与合作有关的某些方面和条件。当汪快死时，他深切地关心历史将对他作什么评价，这使我们后来不得不这样设想。由于他念念不忘历史总是要给予战时投敌合作者以极不光彩的评价，所以他在他“最后的遗嘱”里乃决定着重强调他最初的——也是预定的——目标，而把没有想到的结局掩盖过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日本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中国方面发表的第一个正式答复，不是来自汪而是来自蒋介石。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近卫的和平条件。[38]蒋首先关心的是使他手下的人无话可说，而在这些人身上近卫的“甜言蜜语本来有可能产生迷人的效果”。蒋宣称，近卫呼吁中日缔结反共公约，只不过是他要使中国承认日本驻军中国领土的手段；如果中国肯答应那一点，当初就不会打起来。

蒋也使他的答复指向西方国家，希望说服它们：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东亚，威胁了它们和中国的利益。的确，蒋一直在进行这类呼吁，不过，自广州、汉口沦陷后，他对西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美国大使纳尔逊·T·詹森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电报中，报告说近卫的“新秩序”声明发表后不久，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

拉克—卡尔爵士立即于十一月四日至五日同蒋委员长在长沙举行了会谈。克拉克—卡尔曾经通知美国海军武官詹姆士·麦克休说，虽然蒋“没有进行威胁性的谈话”，但他说过，“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他必须取得一项表明英国的意图以及有实质性证明的具体声明，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向全中国人民交代”。然后他要求给中国一笔支持中国法币的贷款，作为“英方的初步行动”。麦克休这个蒋家宫廷的熟客报告说，他的印象是，委员长“已经向伦敦提出了最后通牒”。不久以后，麦克休自己同蒋进行了会谈，蒋告诉他说，有理由相信日本会向中国提出“非常宽大的和平条件作为抛弃英国的交换条件”。麦克休反问蒋，他打算怎样向中国老百姓宣传反英情绪，他还没有作答，蒋夫人就插话说，“如果委员长告诉他们，中国最好是跟日本讲和，老百姓就会照办。”[39]十一月十九日，驻东京的格鲁大使给华盛顿送了一份“绝密”信件，报告在东京的英国同僚罗伯特·克雷吉爵士认为，“假使英国希望避免使蒋投人日本阵营，就必须采取进一步支持蒋介石的具体步骤。”[40]

在此后的六年间，差不多直到战争最后结束时，蒋一直以暗示和遮遮掩掩的威胁逼迫英国和美国。不过，他的意思倒是十分明白的：要是没有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支持，他觉得他的疲于战乱的国家就会由于负担太重而打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可能听从好些方面给他的劝告，跟日本合作建立一个“亚洲人的亚洲”。一九四二年七月，史迪威跟蒋夫人会见后，在日记中粗略地写下她再一次设法“吓唬我们”的情况：她直截了当地声明，“没有援助，中国就搞不下去了。”蒋夫人警告他说，亲日活动很有势力，要是没有更多的援助，中国可能不得不“另作安排”。[41]

在我们这里谈到的这段期间，中美关系中最经常一贯的主题就是威胁——时而隐蔽地，时而公开地——说，如果西方援助不能满足它的要求，蒋政权就准备跟日本“另作安排”。正如许多美、英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要是这些威胁“大部分是吹牛”的话，那么从重庆的观点看来，这些牛皮还是吹到了点子上的。恰好在汪逃离重庆之前两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了美国第一笔大宗援华贷款，这不能说只是巧合而已。美国驻重庆使馆代办威利斯·佩克写道，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的宣布“被中国人解释为表明［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开始采取行动去制止日本实现它在远东的目标；这时看来比较清楚的是，这种信念大大地激起并加强了长期抗战的意志。”[42]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当全世界的报纸都在推测汪的下落时——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报道他正在赴欧途中，而其他新闻记者的说法则各不

相同，说他在上海、香港、广州、河内的都有——重庆仍旧慎重地不予评论。据周佛海说，重庆方面大多数人们认为，汪的离去完全出于个人考虑，他不久就会放弃他强调和平的论点，回到陪都。[43]

为了使神秘的情况和离开的原因得到澄清，汪发出了一封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长电，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因为汪运动的前途仍然非常渺茫，特别考虑到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中基本上不能令人满意的条款，汪阵营中许多人都反对在这样早的阶段就公开宣布汪的变节。然而梅思平却成功地争辩说，现在还把电报保密是“不光明正大的”，于是电报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一家香港报纸上发表了。[44]

虽然汪的“和平通电”（西方报刊给它起的别名）是打给重庆的，但它同时也是说给东京听的。汪对国民党表述了他的观点：最近日本的声明已经改变了一月十六日的政策，此时日本已经愿意协商，而且“近卫三原则”也为谈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由于注认识到近卫的第二条原则“共同防共”，显得跟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相矛盾并且威胁到当时占主流的中苏友好关系，他就企图把这一点搪塞过去了事。他相当笨拙地宣称：反对共产国际的公约并不是把矛头指向苏联，它只不过是想“对付共产党人搞国际阴谋”。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只要它信守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诺言，它也没有理由害怕这个公约。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全取消［他们的］党组织和宣传工作，撤销［他们的］‘边区’政府以及［他们的］特有的军事体系，并绝对服从中华民国的法统。”

为了使东京听得进去，汪对近卫声明的条款笼统地表示赞同，并且吁请日本拿出行动来配合近卫的高尚言词。与此同时，他阐明他不同意近卫在日军驻华问题上的暖昧态度。只有把近卫提到的“特定地点”理解为所有这些地点都“限干在内蒙古附近”，才是可以接受的。还有，驻扎防共部队的期限必须限于“在拟议中的防共公约所规定的同一时期里”。至于中国本部，日本陆军必须“迅速地、全部地”从中国领土上撤走。最后，汪吁请日本“制订一项亲华的教育政策”，从而使日本人民及其领导人“抛弃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蔑视态度和进行征服的思想”。

汪给重庆的另一份电报于一月八日发表。这份电报是拍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日期是十二月二十八日，[45]在电文中，汪把他在叛逃前不久跟蒋进行争论的实质问题揭示出来了。他当时曾说，“和平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日中双方逐步认识到，战争对两国的害处都是很大的。汪继续指出，蒋曾经应允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通过陶德曼转达的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尽管那些条件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所提出的条件甚至“更为不利，更为不明确”。汪说，尽管有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已开

始流入中国，但它“决不足以影响战争的结果”，不过，其数量倒是足以给中国增加一些可讨价还价的筹码罢了。汪最后说，战争继续下去，只有让中国共产党得利。

这封电报一发表，上海和香港就传出支持汪的第一批公开声明。这些最早的热心支持者中较为知名的人物有：林柏生，新闻出版界名人、汪的长期支持者；傅式说（读作“悦”。——译者注），教育家、和平运动的最初成员之一；褚民谊，汪的连襟（后任汪的外交部长）。

一月十五日，今井的“渡边工作”报告指出了对汪记运动保持谨慎乐观的进一步的理由。[46]高曾告诉他，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从香港以及中国各地，给汪打来了“鼓励的电报”。（高说，也有不少人小心谨慎地致电重庆表示反汪。）据今井说，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部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表明：在一百五十九个回答者中，六十三人支持汪的行动，只有二十五人反对（其他人则意见不定）。今井还报告说，第三党（社会党）拥护汪，而且上海工会方面也有初步表示支持的迹象。他以为最鼓舞人心的消息是，好些军阀将领，包括龙云、潘文华、邓锡侯、张发奎和刘文辉，都跟汪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还有，云南的中心人物龙云只是在让汪去河内之后不久才向蒋表示效忠的。今井报告说，这一套都是“表面文章——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龙云正在玩弄“等着瞧”的把戏。一月十日，当重庆召开各省领导人会议时，龙只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同时，香港的汪的支持者借口援助龙云将军管辖区的货币改革，已给云南交通银行汇了约法币三百万元。

重庆对于汪的公开声明的反应是非常快的，而且是仔细考虑过的。在“和平通电”发表后一天，即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将汪开除出党，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更严厉的制裁——其中有对他的通缉令——只是在好几个月之后才宣布的。在汪出走初期，双方——重庆的国民党和河内的汪集团——都小心地避免采取可能使和解完蛋的行动。这并不是说汪在重庆没有受到他应得的口头上的辱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就认识汪的周恩来就这么说：“我跟汪打了二十年的交道，早已清楚他老奸巨滑”。[47]汪的一个长期的政敌吴稚晖，骂汪“为了个人虚荣心”卖国，断言他“不齿于人类”。[48]中共的《新华日报》把他同中国最为声名狼藉的卖国贼相提并论，其中包括三百年前叛明降清的吴三桂。但是，汪回顾中国的丰富历史，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要引征的先例。他要中国人回想明末的另一个人物，“土匪”张献忠，此人推行焦土战术来反抗满洲人，使国家元气大伤，以致无力抗御来自东边的满洲人入侵。汪的比喻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特别恰当的，因为“土匪”张献忠的老家就是延安。[49]

日本方面的批评，比中国的反应也许更叫汪感到沮丧。例如，右翼的《国民新闻》对“和平通电”加以评论说，汪的“条件，根本不可能被日本作为谈判基础来接受”。该报说，虽然日本可以找到某种尊重中国主权的办法，“但除非建立了真正的和平和秩序，目前在华的日本军人不会有任何人想离开中国大陆。”[50]

在一九三九年初的几个月里，汪有两项主要的急务：一是核实日本对他的和平运动的真正态度（由于近卫内阁在一月辞职使这项任务更加必要、更加复杂），二是在中国寻求支持者。与此同时，重庆玩弄等待的手法，对汪既加强劝阻又竭力把他搞臭。国民政府很了解，汪对他的运动的前途越来越感到泄气，到了一月下旬已在考虑流亡欧洲了；事实上他已经向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了签证。[51]此外，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经过非正式地与蒋介石核对了一番并“核实了蒋专门关心过要使汪能够出国旅行一事”之后，就“给［汪］发放了赴英旅行的签证”。[52]

汪之所以几乎就要放弃和平运动并自愿流亡欧洲，主要是因为他呼吁支持所得到的反应，特别是来自西南各省有势力的将领的反应，使他感到失望。一月十五日，今井把一份陈公博来的报告转发东京：重庆十分害怕汪可能跟西南地方部队勾结在一起，甚至已经在考虑对这些潜在的反叛者进行“讨伐”。今井最后说，“只能把重庆跟［广东与广西等］军队派系之间的关系视作暴风雨前的平静”。[53]

当这场风暴越来越明显地刮不起来而蒋又成功地诱使西南地方军人继续留在国民党方面时，汪的前途就显得日益暗淡了。当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广东军阀张发奎没有跟重庆反目相视，特别使汪失望；张有长期反蒋的历史，当一九三一年汪徒劳地呼吁在广东组织一个分裂政权时，张还是汪最强有力的军事支持者呢。

既然对于所谓“西南派”与重庆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缺少适当的研究，那就只能对蒋在西南取得成功的原因略加推测。我们已经提到一个可能的因素：美国在这个危急关头给予了贷款，以及美国和英国将来可能继续提供大量财政援助。龙、张以及其他汪的潜在盟友，也许因蒋有能力取得西方的支持和财政援助而动心，但对于日本会给汪多少这样的援助却大有怀疑。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民族主义的因素。象龙云这样的“鸦片将军”，他的主导思想当然更多地是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而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但是，要是日本人以为他的下级官员和老百姓也会随着他跟中央政府间分裂，那就错了。正如今井在回忆时提到，“他们受到民族主义的鼓舞，即使龙云将军并非如此。”[54]

这就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在一九三九年最初几个月里，即日本人不愿

答应全力支持汪的事业时，汪越来越悲观的道理。这种局面由于汪变节后不到两周近卫就辞职而更形恶化。近卫的辞职跟“渡边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对于那些与汪的事业有关连的人来说，由于其他国内问题恰好在这个关头迫使近卫内阁辞职，那简直太不巧了。这些问题是：中小企业倒闭剧增，通货膨胀率显著加速以及亲轴心情绪日益高涨——这种情绪是近卫内阁大多数成员所反对但又无法抵制的。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们从来也没有表扬过近卫具备知难而进的气质。一九三九年一月，汪不幸地成为首相的众所周知的“神经衰弱症”（按丸山真男的描写）的间接牺牲品。[55]

近卫的继任者平沼男爵，并不是“渡边工作”集团所喜欢的人物。当影佐和犬养正在去河内跟在建立联系的途中，他们听到了台湾一家电台广播近卫内阁辞职的消息。由于新闻广播所引起的烦恼，他们急急忙忙赶回东京去看看“渡边工作”是否还有前途。结果发现还能继续下去，但当时可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很清楚的，因为平沼采取了一种比其前任甚至更加不明确表态的“等着瞧”的态度；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日本政府认真地对支持汪感到兴趣。“渡边工作”的主持人今井，已奉命返回东京，到了二月份，他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一些新的活动上去了，其中包括设法去拉拢吴佩孚。

在这同时，重庆继续努力鼓励汪出洋。为此目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蒋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双双出马，到河内规劝汪。还有，原来是汪改组派成员、之后又倒向蒋介石的谷正鼎也两次被派到河内，劝汪回重庆或者去欧洲。据报道，汪对谷说：只要蒋继续搞不切实际的抗战，他就不回重庆。然而，他明确地要求一张去欧洲旅行的护照；三月中旬，当谷从重庆带着护照和“旅费”到来时，汪差不多都准备要动身了。[56]但是，就在谷离开河内返回重庆后一天，由于发生了一桩个人悲剧事件，使汪突然改变了主意。

曾仲鸣被刺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左右，汪的亲信秘书和挚友曾仲鸣在汪及其亲近人物的河内寓所内被刺身死。手执机枪的刺客顺利地进人这所房屋，它不象汪后来所住的私邸那样，保卫人员很少。一般人认为刺杀曾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汪，但是金雄白在回顾有关事件时，却强烈地指出汪本人才是刺客们原来想要刺杀的人。这也是曾的遗孀的看法。他们两人都

认为刺客弄错了房间，曾和他妻子住的是整幢房屋中摆设得最精致的卧室，而汪却睡在一间“简陋得象仆人住的”卧室里。*不管怎么说，无论是预谋或者是意外，刺客是朝曾的卧室扫射了子弹，这位有教养的翻译家兼作家受到致命的重伤。他的妻子，一个以其闺名闻名于世的画家，方君璧也受了伤。[57]

汪、曾、方，这三家自一九〇九年以来就有密切关系，当时曾的姐姐和他妻子的姐姐一起跟汪合谋行刺摄政王。当曾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还同时在汪的指导下没有中断过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一九二五年回国后，曾仲鸣在政府中历任各种职务，一直升到副部长一级；一九三六年他离开了政府工作，担任汪的秘书。正如某些人所说的，假如这次对曾的骇人听闻的谋杀是为了恐吓汪的话，那么其结果则恰恰适得其反。六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香港一家汪的支持者所主编的报纸发表了汪的一篇声明，宣布他决心继续进行他对日和解的计划，“这不仅是为了安慰我永世不能忘怀的朋友们，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了民族存亡所系的这种政策。”[58]曾夫人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说，“鼓吹和平可能带来牺牲，但我们

---

* 见金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 47 页。金关于那次暗杀的叙述（见同书第 187—188 页）是一篇第一流的侦探作品，是根据同汪的子女的个别谈话以及对有关文件进行了研究写成的。金指责王六樵（译音）和郑介民（一个蓝衣社成员）要对这一行动负主要责任，他还含蓄地提到了中国驻河内领事。郑逃回重庆，王六樵和其余二人被捕，供认他们计划要刺杀的人是汪精卫。这伙刺客住进了汪的邻屋，用望远镜对汪的寓所窥探了好几天。由于汪经常用这间摆设华丽的房间作会客室兼会议室，于是刺客们乃认定这就是汪的房间。尽管全部证据都有了，但金仍旧不想肯定地说汪是原定暗杀的对象。例如他提到，在审讯中的某个场合，刺客们曾一度声称他们原来想要谋杀屋里的每一个人。他写道：然而，他们显然不习惯于“半夜杀人”，所以“迷迷糊糊”地没有完成任务就离开了。

译者按：关于河内刺汪事件，据沈醉的说法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离开重庆去成都转往昆明去河内，发表声明，响应日首相近卫文麿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国民党的副总裁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和暴露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使蒋介石感到很难堪，便叫戴笠立刻派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以表明他还是反对投降的。戴笠便把原任军统局临法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帮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余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能操流利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去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因汪在河内，法国人派有大批越南军警保护他，迟迟不能下手。戴笠怕汪去南京后，更难找到机会，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便决定越墙而人。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了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搬到另一间房内去了。特务们半夜越墙进去后，还以为汪住在原来的房间，想用利斧破门冲进去。结果门打不开，只得在门上劈了一个洞，用手电照着开枪射击。因为曾忡鸣钻到床底下，只翼出半截身子，他们便以为是汪精卫无疑。打了几枪后，惊动了保卫的军警，结果除余乐醒、唐英杰两人逃走外，其余均被捕去，直到抗战胜利、日寇投降才释放。”（见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第 109—110 页）

不得不以自己的死去换取民族的生。”[59]

按照汪的说法，他在曾被杀前本已决心出洋，但他也通知过重庆：“如果国民政府一定要让目前这种绝望的局面继续拖下去而不作出明确决定的话”，他还会回来。他推测，一定是他说了他还要回来这件事激怒了重庆，“才引起了这场暴行”。[60]曾夫人也说，汪本来“明确地”决心出洋，但因她丈夫遇刺而使他改变了计划。[61]

一个并不太重要的政客的死，而且是死于弄错了刺杀目标的情况，这么一个事件的影响竟如此之大，这真是历史上偶然因素起作用的惊人例证。此外，汪对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反应，他之突然改变安排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几天前还似乎不愿实行的计划；这些都倾向于证实布尔曼对他性格的刻划：一个“浪漫的激进派”，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压倒其政治判断力”的人。[62]在当时情况下，似乎是他的伤感意识和个人愤怒压倒了他的政治判断力。

在三月二十七日声明中，汪不仅只是对曾表示哀悼，而且还作了耸人听闻的揭发，从而大大地加深了他与重庆之间的隔阂。他公布了据说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次会议的简要记录，这个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于汉口举行的会议是为了讨论陶德曼和平条款。会上，外交部次长徐谟传达了他在四天前举行的会议的报告；在那次会上，蒋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们一致同意，以日本通过陶德曼大使提出的和平建议作为和谈基础。

根据徐的报告，虽然蒋同意让德国继续进行调停，但他很快就把将领们的意见搁在一边。蒋在同一天（十二月二日）晚些时候跟陶德曼的讨论中声称，“他不敢相信日本，日本撕毁了许多条约，言而无信。”陶德曼则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忍让的方针”，并表示如果中国现在拒绝日本的条件，只怕将来的条件会更加苛刻。[63]

汪在揭发中所提到的事实表明，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就已经有赞成接受日本条件的舆论了。他并没有试图责备蒋阻挠了和平解决或破坏了陶德曼调停的努力。他只是要求公众注意：他自己在一九三九年春呼吁和平，跟一九三七年秋政府的最高级会议上占主导的意见是一致的。汪争辩说，要是中国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时日军尚未侵占南京、济南、开封、苏州、九江、广州和武汉）跟日本达成了协议的活，那该会是多么适时啊！他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在这些军事胜利之后，日方议和条件一定会更加强硬；可是看来日方现在提出的谈判条件其实并不比它一九三七年的要求更苛刻，所以中国方面应该作出积极的反应。汪在三月二十七日声明中并没有探讨具体的和平条件；那得留待将来的谈判详细地予以商定。简言之，汪认为“假如条件侵犯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那么和平是不可能的；假如条件并不危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那么和平是可能的”。[64]

在汪公布国家机密之前，由于汪在全国享有相当高的声望，重庆虽然很恼火，但对他的态度也还比较审慎、和缓；可是在这之后，重庆就可以公开指责他是个卖国贼了。[*]《大公报》独家揭发了一段汪与平沼（由高宗武出面谈判）之间一次近乎秘密协定的详情，以此作为回击。据该报称，汪曾提出要领导“一场反蒋、反共的战争”，但条件是日本人保证以占领西安、南宁、长沙、福州及其他战略要地来对他支持。日本将在一九三九年五、六月份完成她在此计划中所承担的任务；之后汪就不再要求蒋进行和平谈判了，而去履行他承担的任务，即对重庆发动全面战争。此外，《大公报》说，汪曾要求日方每月津贴三百万元法币作为政府开支费用，另加一笔二亿元法币的贷款帮助建立一支军队。[65]对于《大公报》的指责，汪并未正面加以否认，只是说“这些说法极其可鄙，我不想花时间去驳斥它们。”[66]

在这段时间中，汪记运动的前途无论多么暗淡，事实上中国方面仍旧跟日本人进行着某些谈判。例如，高宗武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回到了东京，进一步要求日本人进行“牵制性进攻”，把龙云、张发奎以及其他将领解放出来参加汪的运动。[67]《大公报》的那些指责看来还是有些事实根据的，尽管它似乎主要只是提到了汪及其亲信的主观愿望，而不是他们实际上搞的名堂。如前所指出，汪一伙人要求日本人向各战略要地发动军事进攻的愿望，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已通过今井大佐转达了。早在十二月三十日，汪也要求过财政援助，其数目恰巧与《大公报》所说相符。[68]不过，我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平沼首相在《大公报》所揭发的时间里曾向汪（或者高）作过坚定的承诺。[69]

救出河内

曾仲鸣被刺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平沼内阁即授权影佐大佐和犬养健去河内，探视汪是否要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确切地说就是搬到日本人保护下的地方去。虽然战后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法官勉强同意了影佐的口供，说汪是自由地选择离开河内的；但是，只要汪下了决心要领导和平运动，那么他就会要求回到中国领土去的，这也完全合乎逻辑。[70]况且河内的法国当局对于庇护一个反重庆的运动并不热心，也不愿给汪提供他日后所需

---

[*] 尽管如此，看来重庆仍在进行幕后活动，要汪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陆大维在四月初对汪转达了蒋夫人和宋子文的个人呼吁以及蒋的诺言：只要在返回重庆，既往不究。（见陆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 84 页所引日本外交部档案中未公布的材料）

要的保护。这时，汪在港、沪的同事，为他可能回到中国大陆所作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好几个月了。他们筹集了基金，拉拢了报纸和电台，并且跟地下帮会组织——只有它们能保证汪记组织的安全——建立了重要的联系。

影佐和犬养化名乘坐五千吨的专轮北兴丸，于四月十六日到达海防；两天后，二人一道第一次见到了汪。四月二十日，影佐请求陆军省为汪到达上海作出安排，这些安排包括：有钢板保护的密室、防弹的窗户、并在室内装有铁栅门。[71]汪的禁闭生涯即将开始。

四月二十五日，汪等一行登上为这次旅行包租的一条法国小轮船，第二天离开海防。那伙日本人在同一天乘北兴丸动身。但法国船设备很差，不久就遇到了风浪使它不能顺利航行。途中，汪等一行不得不转乘北兴丸。虽然汪力求避免这样做，但他还是在一位皇军军官陪同下，乘坐一艘挂着庆祝天皇诞辰彩旗的日本船，返回中国。[72]

海上航期将近两周（除在台湾补充燃料稍事停留外），使汪有充分的时间去回顾往事。一天晚上，他写了一首忧伤的诗；当时他正聆听着船钟的滴答声，悲悼死去的同志和他“平生的坎坷”，表达了他在返回中国土地时所感到的黯谈的失望情绪。[73]但是，这次旅行也使汪、影佐和犬养有机会了解彼此的观点。汪使这两个日本人深切地感到，最最困难的事是赢得一批同情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们。他说，主张抗战显然是爱国的；但要使别人相信倡议和平也出自对中国的热爱却是非常困难的。他说，重庆政府很顽固，仅仅通过呼吁还动摇不了它；因此他得出了结论：建立一个“和平政府”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先拿出事实来证明中日合作是富有成果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公众舆论究竟支持那条路线——是抗战，还是讲和。”[74]他认为，这么一条路线在最初肯定是会受到严厉批评的，不过如果中日合作进行得顺利的话，公众自然就会认识到抗战是毫无意义的。面临这种发展下去的局面，重庆政权就一定会了解为什么要朝着和平的方向采取行动的原因。

汪向影佐和犬养反复强调三点：第一，他坚持说，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和领导一个与重庆对峙的政府；那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他的最终目标是跟重庆重新联合起来，只要重庆和汪阵营保持分裂状态，就不能希望同日本实现一项有意义的和平解决。此外，汪还说，假如他的看法不错的话，要是那些在重庆的人们最后不得不参加他的运动，他就会认为他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从而“毫不迟疑地下野隐居”。[75]

第二，汪强调说，他最最不希望看到他的和平运动转化成为一场内战。他承认，“在我们建立了一个政府之后，我们当然要建立武装部队”，“但是

我将用一切办法来保证这些军队不跟重庆打仗，不给我国国民带来一场血腥的灾难”。影佐当时同意汪的意见，并且写下了他钦佩汪的“高尚精神”和政治上无私的精神。[76]

最后，汪试图使影佐和犬养认识到日本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的运动的最终成败，取决于日本是否愿意本着近卫宣布的“三原则”的精神，对他和中国人民以诚相待。汪说，光是谈论和平打动不了爱国的中国人，“鼓吹和平跟主张卖国之间仅仅只有一发之差……日本方面唯有执行公平、合理的政策才能使和平运动发扬光大”。[77]汪指出，他已经知道他的同事中有了分歧，有些人对和平运动失去兴趣，还提醒他要注意建立一个通敌政府的危险性。他说，香港集团中就有“不少人……对日本政府持悲观看法”。汪对他在上海的支持者的看法更是缺乏信心。据影佐判断，汪虽然要求并且盼望去东京全面搞清楚平沼内阁的意图，但他显然和那些愿意冒险把希望寄托在日本的忠实可靠上的人站在一起。[78]

关于汪的下一步行动会造成他自己阵营的分裂这一点，汪是估计对了。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少数集团，拥护后来（至少在“渡边工作”的日本参加者中是）相当闻名的高氏路线。在重光堂会议上，就是这个高宗武最激烈地坚持拟议中的汪政权将不受日本那怕是任何一点点的控制。他十分清楚地阐明：除非是设在中国非占领区范围内，并且拥有本地军队组成的军事基地，他甚至连考虑都不考虑建立汪政权的问题。否则他感到这个新政权就注定了非同其他傀儡政权的命运一样不可。对于他认为是汪独立行动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原则和其他原则，高在重光堂会议上进行了强硬的讨价还价，难怪今井和影佐二人都对他的顽固感到不满，而觉得梅思平比较好打交道。今井写道，“要是只有高一个人说话算数，恐怕我们从一开始就搞不到一起。”[*]

近卫和平沼对汪的叛离作出了令人不满的反应，这使高的信念更加强了。他开始跟港英当局商讨让汪在香港流亡的可能性。在这件事谈得毫无结果之后，他又竭力劝告汪不要去中国沦陷区。同时，由于他建议日本人停止跟汪接触，这就使他自己在日本人中很不得人心。到今天高还解释说，“我爱护汪，不愿眼看他成为日本的傀儡。”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说他曾

---

[*]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28 页。犬养也发现梅更为温顺，准备让步的东西“比高多”。（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94 页）然而，深深远虑的日本人还有其他理由不信任高：怀疑他在幕后利用各报刊泄露“渡边工作”的活动。有个叫市田的日本中佐，是个驻香港的特务（伪装成一个并不太象的蚊香推销商），他声称，他以绝密方式送给高的情报，竟不断出现在《大公报》上。（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39 页）我们将看到，高最后还是成了要对在许多中国报纸上泄露汪记运动的秘密信报负责的人。

给影佐打了一个电报，央求他别去河内；在电报中还提出了最坦率的忠告："你们的傀儡已经不少了。别再拉我的朋友下水吧！"难怪高从此以后大大不受信任。他回忆说："从那以后他们（日本人）竭力使我不能接近汪。当我在南京时，人家说我是头号亲日派；现在我突然变成头号反日派了。"[79]

汪阵营中另一派的主要发言人是周佛海。他的路线（也是汪所采纳的路线）是要在日本人管辖范围内建立一个政府，希望日本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肯定会对新政权作一些让步。周认为，假如汪政府能够有把握地使日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管的企业、工厂和房屋归还给中国原业主，从而证明该政府是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汪政府一定会受到一切讲求实际的中国人的拥护"。显然，如果这个政权是在中国沦陷区活动的活，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汪的政治纲领的"实际上有用处"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80]

一九三九年四月，西义显和周佛海在上海的一次长谈中，讨论了这两条不同路线的优缺点。[81]周对西义显说，他一度曾希望日本陆军会帮助汪在中国非沦陷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但现在，由干这显然已无可能，他觉得只有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一个政府，在那里继续搞和平运动。西义显对此表示惊讶：象周这样一个"忠实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人物，怎么会提出这么一条等于否定了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原则的行动路线？周答道，西义显把高的路线理想化了，因为不管高想要使汪政权多么独立，等到实际做起来的时候，它的建立还是要靠帝国陆军撑腰的。周□□□□□□□□□□的计划之间，归根结蒂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周的论点是难以驳斥的，但是西义显却不准备在这一点上让步。他坚持说，周提出的路线必定会使汪成为一个"对中国人毫无号召力的日军俘虏"。他建议周促使汪打消建立政府的念头，"用演说去启发你们的民众"和推进和平运动。周答道，直到前不久，这还是汪的想法，也许今天也还是这样；但他自己深信，现在光有促进和平的努力已经不够了。周说："你怕我们会变成俘虏，我对你的关怀表示欣赏。但是，那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则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假如日本政府把我们看作俘虏，不论我们这些人怎么干，和平总是不可能的。"这场辩论中，西义显的最后回答是一段提醒对方的话："我［在和平运动中］的朋友们，一直在设法改变我国政府的态度，使它的态度成为你们所希望的那样。然而很遗憾，我们远远没有成功。……假如日本政府真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大方，中日问题恐怕早就解决了。"[82]

从这次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方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士中也有两种想法。西义显，这个运动最早的组织者，当时正在等候北兴丸在基隆靠岸。由于一年多以来，和平运动的各个成员在通信联系中都用化名，当汪这么一个杰出人物俯允使用西义显的化名——太郎来亲密地称呼他时，西

义显着实感到十分光荣。但是汪的崇高地位并没有阻碍西义显跟他直率地谈话。西义显说，作为和平的最低条件，汪必须要求日本不附带任何条件归还长城以南的全部中国。如果日本真想建立“东亚新秩序”和“中日永久和平”，她就不能拒绝这样的条件；然而，假如日本坚持要对这一承诺附加条件，那么“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希望你与其攻击重庆政府还不如攻击日本政府”。[83]当汪没有回答这个坦率的忠告时，西义显把他的立场告诉了影佐。

西义显对影佐说，汪没有任何军事力量作支持就离开了重庆，仅仅只依靠近卫做他的事业的靠山，这是拿他的事业和生命去冒险。考虑到日本政府现在的态度，搞一个“和平政府”简直就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去利用汪精卫这位中国的政界‘元老’，那可真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84]假如影佐无法使汪免于受到这种操纵和利用；西义显明确表示，他一定洗手不干和平运动了。影佐，不仅同西义显一起赞扬汪，而且也同样对汪政权的未来忧心忡忡，尽管他本想尽力要西义显放心，但他还是无能为力——并且相当羡慕西义显有随便谈话、随便行动的自由。这次谈话回来后，影佐若有所思地对犬养说，“健兄，我刚才被别人训了一通。要是咱们也能象西义显那样自由，那岂不太美了吗？”[85]

汪于五月五日到达上海，这标志着汪记运动的“无罪时期”的结束。尽管和平运动的美丽词藻继续在强调抵抗无益、和谈必要等等，但是正如汪的一位支持者所写的，“上海的机灵人物都知道，这只是要在沦陷区建立一个政府的序曲罢了。”据报道，“几天”之间，有五百多位“机灵人物”秘密访问了周佛海在上海的办事处；周为了使和平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政府，已在开始罗致一些必不可少的有才能的官吏了。不管它的话讲得多么好听，不管它的领导人的意图如何，汪记运动的首要目标日益变成夺取权力了。[86]

这种转变必然给西义显这些最早支持汪记运动的人带来幻灭。他们已经把自己看作是第三种力量，既不为中国政府讲话，也不为日本政府讲话，而只是为超国家的“泛亚洲”目标讲话，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和平。假如他们没有阐明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会象西义显后来所写的那样感到：“实现中日和平的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日本放弃她的帝国主义政策。”[87]在西义显看来，日本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对汪的态度表明它是在扩大而不是放弃她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汪则正开始踏上一条毫无希望的、注定要灭亡的通敌卖国的道路。

---

[1]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97—298页。林翰笙的《汪精卫与

日本进和的努力》第 311—312 页，记录了更为详细的时间表。

[2]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588—589 页。

[3] 同上。

[4]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 233—234 页。今井武夫与影佐祯昭钦佩梅思平，但不信任高宗武。他们认为高“不真诚”。见影佐的《漫谈》（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349—398 页）和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78 页。

[5] 见矢部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588 页。

[6]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继续支持共产党的敌人、军阀陈炯明。见马丁・威尔伯的《陈公博的复杂经历》（载薛君度编的《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 455—470 页）。

[7]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22—23 页、57—58 页。

[8]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

[9] 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之目标》（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三号）。

[10] 某些日本资料认为蒋出人意料地返回陪都，迫使汪改变了计划。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86—87 页。其他谈论这个问题的资料乃是瑞纳（蒋的顾问）的《蒋介石总部通讯》（载纽约《亚细亚》一九三九年第三十九期）、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24—28 页（据与周佛海的谈话）、以及我写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日本在华的傀儡政权》第 278—280 页。

[11] 见汪精卫的《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汪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从河内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的信，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陈布雷的《回忆录》第 108 页也记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的会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 315 页摘译了陈布雷的记述。

[12]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 98 页。

[13] 同上书，第 31 页。

[14] 同上书；第一八六章。另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 457—459 页。

[15]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 27 页。据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87 页载，周佛海告诉今井，那架飞机是“龙云将军借汪使用”的。

[1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276 页和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47 页。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自杀）的文稿及日记无疑会对汪的叛逃透露不少增况。据我访问金雄白时，金说这些文稿为陈的兄弟所有，此人现是香港一家报纸驻马尼拉的记者。

[17] 访问李圣五、何炳贤及金雄白的谈话记录。金雄白说，一九三九年上海“了解内情的”新闻记者对蒋汪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双簧”表演。

[18] 访问金雄白的谈话记录。
[19]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 436 页。
[20] 近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战争的第三个主要政策声明，一般是指第三次近卫声明。其他两次是：一月十六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十一月三日的“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英译本收录在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 482—483 页。日文本见日本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 470 页。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 230 页把近卫三原则同广田外相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宣布的三原则作了对比。
[21] 见汪精卫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和平建议》（一九三九年《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第 56 页）及《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同上期《人民论坛报》第 59 页）。
[22] 见影佐的《漫谈》第 362 页。
[2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00—104 页。
[24] 同上书，第 101 页。
[25] 同上书，第 101—102 页。
[26] 见影佐的《漫谈》第 362 页。
[27] 这个文件的全称是《处理日支新关系方针》。我在讨论这个方针时所根据的文本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文件第 2178-C 号中的英译本和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191—194 页中的日文原文本。这个文件的主要部分是题为《处理日支新关系要纲》的一个附件。这个文件往在与另一个同名的文件混淆。虽然后者是在晚一年以后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批准的，而且一般是以前者为根据的，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的全文收录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的《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86—294 页。
[28] 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193 页。
[29] 同上。
[30] 同上书，第 196 页。
[31] 见影佐的《漫谈》第 360 页。
[32] 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224—227 页收录了平沼的发言全文。
[33] 同上书，第 228 页。
[34]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90 页及《昭和阴谋》第 128 页。
[35] 访问牛场友彦的谈话记录。
[36] 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 178 页。
[37] 我用了两项关于汪的声明的资料。一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与影佐和犬养的会谈，收录于影佐的《漫谈》第 365—367 页；另一是金雄白的

《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春秋》第一五九期第3—4页，第15页）中有关汪的遗嘱的要旨部分。汪精卫的遗嘱的可靠性在本书第503—512页《参考书目说明》中加以讨论。

[38] 见《东方事务》第十一期（一九三九年）第97—99页。

[39] 詹森自重庆向国务卿的报告，第547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365号。

[40] 格鲁自东京向国务卿的报告，第741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373号。

[41] 见西奥多·怀特的《史迪威文件》第104页。

[4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35页。

[4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2页。

[44] 汪精卫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和平建议》(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通电的英译本。中文一般称之为"艳电","艳"字是发电报的代日（二十九日)。日文则称之为"和平通电"。

[45] 汪精卫的《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就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电文的英译本。

[46]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2—304页。

[47]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第174页。

[48]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38页引了这句话。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一八五章详述了汪精卫与教育家、学者吴稚晖的关系。吴是"国民党的四老"之一。

[49] 见汪精卫的《在新秩序中的自由平等》(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188页)。

[50] 见《国民新闻》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

[51]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207页。

[52] 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给国务卿的第60号报告，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651号。原田男爵的日记记录了这份报告的准确的全文，并说明帝国海军也"收到"了这份电报。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287页，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

[5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3页。

[54] 访问今井谈话纪录。

[55] 见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97页。

[56] 见三轮君忠的《汪精卫政权和日本谋求结束在华战争的努力》(载约瑟夫·罗根道夫编的《对日本文化的传统和实践的研究》)第129页；又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3—34页。

[57] 除了金的记述外，我还取材于龚德柏的《汪兆铭降敌叛国秘史》第88

页。我也感谢曾夫人为我回忆刺杀曾仲鸣事件，之后我的妻子又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在波士顿访问过她。

[58]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另见汪精卫的动人的悼词《悼念曾钟鸣博士》（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

[59] 见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 49 页。

[60]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第 67 页。

[61] 访问曾夫人谈话记录。

[62] 见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载薛君度编的《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 317—318 页。

[63]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

[64] 同上文，第 65 页。

[65]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第 203 页。

[66] 见《东方事务》一九三九年第十一期第 276 页。

[67]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239—242 页。

[68]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304 页。

[69] 陆大维在《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 85 页中；断言外务省的档案“证明存在非正式的协议”。

[70]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记录第 24043 页等等（对影佐的盘问）。法庭上影佐的旁证、供词及盘问等等的主要记录见上述审讯记录第 23790—24141 页及被告文件第 1282 号。此外，见起诉物证第 1005-l 号至 1005-23 号。这些物证大部分有关日本人和汪精卫在一九三九年四——七月即汪叛逃前后从河内到上海这段期间的关系。我在本书第 503—512 页的《参考资料说明》中，讨论了影佐证词的用处。

[71]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物证第 1005－6 号。

[72] 见龚德柏的《汪兆铭除敌叛国秘史》第九章。另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记录第 24055 页等。

[73]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章第 91 页。

[74] 影佐的《漫谈》第 365 页和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62—164 页都记述了这段海上的谈话。

[75] 见影佐的《漫谈》第 366 页。

[76] 同上。

[77] 同上。

[78] 同上。

[79]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8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65 页。

[81]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243—249 页。

[82] 同上。

[83] 同上书，第 256—260 页。
[84]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65 页。
[85] 同上书，第 166 页。
[8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52—54 页。
[87]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日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423 页。

第十二章 讨论合作的条件

——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九月——

从一九三九年五月汪精卫到达上海以后，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的“改组的国民政府”成立为止，这十个月里他面临两项极其重大的任务。第一项任务是使日本当局相信：同他达成一项体面的和平解决办法，既对日本有利，也会使汪的新政权获得生命力。第二项任务是使他在沦陷区推行他的纲领方面得到支持。这两项任务关系密切，因为一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将使他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另一项任务。

汪在最初阶段的活动中的主要盟友是一个“支那通”小集团，他们在上海一所被日本人称为“梅园公馆”的建筑物里办公。这个集团未经官方合法的委任，所以也没有正式名义。那些故意强调这个集团是被影佐大佐所控制的人，把它贬称为“影佐机关”。但最普遍的称呼是叫它“梅机关”。[1]这个非正式的机关一直继续存在到汪政权成立。那时，它的两个最主要成员影佐和犬养，分别成为汪政府的武职和文职总顾问。汪政权和影佐之间的密切关系，招致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些道理的——各种指责，说影佐把汪的事业视为私人禁脔。

影佐用纯属消极的词句来说明“梅机关”的目的；“是保证汪政府不要成为日本的傀儡”。[2]令影佐伤脑筋的是，他的一些陆军同僚竟把这个机关看作只不过是另一个“特务部”——其任务恰恰是制造和管理傀儡的。[3]他反对“特务部”一味追求私利和专搞见不得人的活动等手法，并为之感到痛心；他对汪的敬仰日益增加并且由于得到汪的尊重而感到自豪。我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去怀疑影佐的老同事们对他一致的评价：影佐是一个以诚实著称的军官，他决心要证明汪对他的信任是有道理的。影佐至少有一次曾未经批准就向汪的手下人透露了国家机密文件，可见他对汪的开诚布公到了什么程度。影佐泄密的行为受到陆军参谋本部多次批评。不过，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觉得他作为效忠天皇的军官所起的作用，跟他努力为汪争取到日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和平条件这种做法，是完全不矛盾的。他认为，他这样做不仅是按照最优秀的日本武士道的传统办事——这传统要求胜利者必定要诚实，甚至在同敌人打交道时也要宽大，而且从长远看来也是符合日本的最高利益的。

梅机关虽然明明由影佐支配，但它的成员中也有其他陆军军官以及海

军、外务省和兴亚院的代表。也有一些不任公职的公民，特别是记者和教师参加。梅机关的第二把交椅犬养健，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讲是与兴亚院有联系的，但他几乎是以私人的身份参加的。*还有一些其他在公众生活中有显著影响的人士，也被邀来替汪讲话（例如在报纸上），使他不受重庆代理人和后来无法避免会有的一大群想当官又没当上的人的“恶意中伤”。[4]

影佐强调，梅机关的成员都“自发地”接受他的领导。看来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尽管在法律上他只有权管束其他陆军军官，可是日本政府的其他代表显然都遵从他的领导，只有当他们从顶头上级机关接到直接指示时，才有少数例外的情况。[5]一九三九年底，海军省命令它的代表须贺彦次郎将军可以单独跟汪集团谈判与海军利益有重大关系的问题，这是唯一的一次造成权力分散的危机。在其他一切方面，看来梅机关的活动还是进行得很协调，并且只有一个目标——影佐大一位给它规定的目标。

如果说梅机关内部是协调的，那么日本的军政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内部却并不协调。恰恰相反，影佐和他的“支那通”们遭到了日本一些政府部门的巨大反汪浪潮的冲击。反汪的主要根源在于对汪的意图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甚至在汪与重庆之间的裂隙由于曾仲鸣的被刺而大大加深以后，日本国内还有许多人认为汪和蒋是在唱双簧。影佐大佐自己不仅倾向于这种看法，而且后来还说他倒希望事实果真是那样就好了，因为尽管日本对于他们互相间的勾结必须特别审慎，汪却可以成为东京与重庆之间的一座很好的桥梁。[6]

一九三九年春，兴亚院由于机构太大、变动又多，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兴亚院中权力很大的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少将据说就“在采取行动，让反对建立汪政权的人不再有发言权”。[7]然而，总的来说，兴亚院对于与汪合作的想法还是显得冷淡，不愿意给他提供比给大陆上的傀儡们更好的条件。影佐和犬养二人都证实，梅机关在兴亚院里遇到了“阻力”；另外一些人甚至以更激烈的言词来描述兴亚院的反对意见。[8]对汪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兴亚院驻大陆各地办事处的官员。北平办事处长官、王克敏的后台兼保护人喜多诚一中将就公开敌视汪精卫，并且把他的好恶情绪变成阻挠的战术，事事都加以拖延，这就大大地损害了汪在一九三九年的事业。也许不仅仅是巧合，刚好在汪精卫政权最后建成之前一个月，喜多被撤销了他北平办事处长官的职务。

---

* 犬养为梅机关服务所得到的报酬看来是少得可怜，如果说还有任何报酬的话。结果他只得出卖他家藏的部分元代书画来支付他在中国工作的花销。为了出售这批名贵的家传珍品，近卫还帮他找到了一个买主。（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204 页）

除了兴亚院反对江之外，陆军中大部分将级军官不是对汪漠不关心，就是反对汪的事业。西义显把这种情况归因于他们“缺乏政治头脑”，并争辩说，这帮军人简直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汪和他的和平建议。[9]但是这个答案太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占领汉口的十一军司令官同村宁次中将之反对汪就有很尖锐的政治理由作依据的。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写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正在日益成为“早日结束战争的越来越大的障碍”。他感到，只有跟重庆打交道才能解决战争；认定搞一个象汪这样的“临时的”政府就能对重庆产生任何有成果的影响，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冈村害怕“其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10]

甚至一九三九年春支持汪的那些人，都强烈地趋向于采取“等着瞧”的态度。汪要证明他是有用的，就只有他能够获得充分的支持去实现下列两个目标之一：迫使重庆同意日本的和平条件；或者建立一个新政权，它有充分把握可以孤立重庆政权并最后使之不再成为一支有意义的力量。许多盼望汪能实现第二个目标的人，认为重庆被无法控制的派系斗争和紧张关系弄得焦头烂额，而这正是汪应该加以充分利用的。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参谋本部的战略专家们对于削弱重庆继续抵抗的决心，并不太乐观。一九三九年春，参谋本部对国民政府的最审慎的评价，对它的战斗实力和士气所作出的结论，跟在说给公众听的官方声明中把蒋政权说得一钱不值的提法，是完全相抵触的。参谋本部的研究报告经常提到一场“十年战争”的可能性，表明陆军根本不相信它自己那种把蒋贬低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军阀的宣传。甚至陆军中那些希望江能获得成功的人，都对只同他一个人达成协议的价值表示怀疑，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许多人都确信，使这场战争得到有意义的解决，绝对要有一项包括重庆政权在内的协议；他们多多少少与近卫的看法相似，认为汪的价值的大小，在于他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充当东京与重庆之间的桥梁。

在此期间，汪从外务省东亚局所得到的支持，也必须认为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尽管外务省在国内国外都暗示，“在适当的时候，日本坚决打算承认汪领导的新中央政权”；但正如历史学家臼井胜美指出的，这些声明看来倒并不象是对汪作出保证，而是要“各大国断绝对蒋的援助而施加的一种压力”。[11]

汪意识到对他的支持是这样的脆弱无力，于是，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到达上海后办理的头一桩要事就是安排一次东京之行。“五大臣”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向他发出邀请。六月二日，他带了少数几个随行人员，包括周佛海和高宗武，到达东京。

汪要求在东京举行高级会谈这件事，于五月末、六月初期间，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中制造了一种紧张气氛。为了设法解决对汪有争论的意见，并制订一个可行的统一政策，把前线的司令官们都召了回来，进行一系列的汇报和磋商。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到了六月六日才举行“五大臣会议”，这时汪到达东京已好几天了。经过五位大臣的商讨，在汪叛离重庆半年多之后，才制订出第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文件。要是汪知道了这个政策的详情，或者了解到对他事业的怀疑、冷淡的程度——有些人说，平沼首相甚至不知道汪已被邀请来东京——他对日本的信心必然会大受动摇。[12]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他在五大臣官邸所受到的诚挚的接待，虽说并未明确表态，但跟这五位大臣在六日会议上才搞出来的严峻的政策一比，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六月六日五大臣会议的基本决策是：汪精卫只应当是在中国建立任何新的中央政权的“成员”之一，吴佩孚以及其他现有政权的领导人都必须包括在内。重庆政府也有资格成为“组成部分”，只要它“改变主意并进行反省”；进行反省即意味着放弃反日、亲共政策。[13]

可见，五大臣并不急于立即建立任何新政权。还有许多准备工作有待完成。汪在这个期间，应当通过“把重庆政府内部的各种强大势力争取过来，而最主要的是把该政府的有名望的人物拉过来”，以证明他是起作用的。[14]进一步，他必须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有影响的基本团体，筹措基金，招募并充分地装备一支军队。在这筹备性的策划阶段，日本将“尽最大可能地限制来自外部的干涉”。详细的方式和时间安排，将在此后与日方洽商后再走。大臣们明确表示，关于新政权的设想，他们不作一揽子的保证。他们需要时间去估价“筹备工作的发展，特别是看看［汪］能搞到多少人员和基本力量”。[15]

除开这一切，大臣们还给随便什么样的汪政权开列了详细的照办事项。首先，汪必须同意“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应符合分治合作的原则”；一句话，就是同意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在内蒙古这个“防共特别强化区”内，中央政府最多只能有名义上的权力。华北的情况也一样，“鉴于国防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应该使之成为一个日支联合特别强化区”。由于纯粹经济上的原因，“长江下游”也应是一个“强化区”。最后一个条件，反映了帝国海军日益强调的“南进”战略计划，以及它所面临的美、英两国的对抗；它要求汪必须赋予日本在“华南沿海某些岛屿”的“特殊地位”。[16]

显然，这些要求比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所提出的要求更强硬了（甚至是扩大了，只要看看日本要求在华南沿海拥有特殊地位这一点就行了）。无论是持久战的艰苦性，或是对傀儡政权的明显不满，或是中

国抗战决心的日益增长，都不足以使日本的谈判姿态有任何软化的表现。这种立场究竟有多么顽固，从大臣们给六月六日政策声明附加的“几点意见”中就可以看到了。他们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得到一个前途光明、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日本的政策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在所有根本问题上同意这个政策。[17]

这时，暂不让汪知道日本会向他提出什么明确的要求。大臣们决定，在他们与江举行的会谈中，不讨论任何有争论或有分歧的问题，也不“对具体细节问题进行商讨”；而是强调他们对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信心，以及使支那事变得到公平、宽大地解决的决心。[18]四位大臣都坚决按这个决定办事；只有第五位大臣板垣陆相，在日本给予支持的问题上向汪提出了一些比较不含糊的保证，并对汪的爱国心和勇敢大加赞扬。

汪—板垣会谈

自从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在公开和私下的声明中，都表明她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可是，她的顾问制度构成了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严重干涉乃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汪在六月十一日与十五日跟板垣的两次会谈中得知，这个制度将会继续下去。

板垣记录了汪于五月二十八日，动身来东京的前夕所提出的书面意见。汪在意见书中概述了他准备建立什么类型的政府，并间接地表达了他想从日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合作形式。[19]在赞扬了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并预言它们将在历史上占有光辉篇章之后，汪明确地表示他要让它们尽快地成为历史陈迹。汪的意见书声称，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因此他的政府一成立，这两个傀儡政府“立即”宣告它们自行解散乃是“理所当然的”。

汪与其他大臣的会谈曾使他抱有至少会得到某种笼统的保证的希望，可是板垣对他的建议的分析必定对他是个打击。板垣说，日本的理解是，到了适当的时候，“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作为政府的名称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然而，日本并不想取消这两个政权的“实质和事实”。[20]

对此，汪简直吓坏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一直在告诉中国民众，只要日本同意以不侵犯中国主权为条件，同日本和平解决问题是可能的。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看来是尊重中国主权的，从而给中国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的途径。可是现在，自从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来，当他第一次有机会跟一位内阁成员就具体问题来讨论近卫的抽象概念时，他就获悉日本

的意图竟然是要在实质上保留她在大陆上建立的那些可恨的傀儡政权。汪的幻灭之深是不难想象的。汪问板垣："那么，归根到底，难道你连［中国的］主权都不提了吗？"

板垣承认是有一些涉及主权的问题的，但他提议最好还是把整个问题称之为"政治组织"问题之一。然后，他就开始发表一篇关于"分治合作"原则的演讲。他几乎一字不改地照搬六月六日"五大臣"决议中有关"分治合作"的部分。他说，对日本来讲，中国的不同部分都有其"特点"和特殊重要性，有些"地区"将来必须跟日本"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过，他还把五大臣的论点推进了一步，他最后说，日本在中国某些部分的特殊利益，使之"有必要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以保持日本跟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之间有过的联系"。他对汪说，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你尊重现有［傀儡］政府的实质和现实情况"。[21]

汪回，答说，他准备把这两个傀儡政权中的某些分子吸收到新的中央政府里去，不过要是日本试图为这两个政权保留相当程度的主权，那么他就不参加创建新政府。他坚持说，同日本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都取决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真正有主权的、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正是那些认为非搞"分治合作"不可的人所不予置信的事，而板垣则是那个阵营的坚定分子，绝不会发慈悲的。他说，他想的办法是用华北的自治势力，建立一个"政务委员会"，以加强该地区的中日关系。

汪承认，这类委员会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但他指出，以往采取的所有这种措施，都是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所决定的，并且都被看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如果日本想要把实权交给傀儡政权（或者象"华北政务委员会"之类的新机构），那么新政权显然只是一个徒具空名的最高中央政府。其必然的结果就会是：在中国内部造成混乱，中央政权和地区政权之间会为了管辖范围和权限问题进行斗争。汪声称，这样一种局势，不仅对中国有害，而且最后对日本也不利，因为面临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他根本没有可能去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假如日本决心把实权交给傀儡政权，那么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推迟。

谁都得承认：汪的结论——或者不如说是威胁——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他要是一直坚持不让步，那么人们在今天本来是会给汪以较高的评价的。然而，会谈到了这个关键上，另外一个人发了言。参加了六月十五日汪与板垣之间的三小时会谈的影佐大佐，这时插话要汪重新考虑。汪早就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新中央政权去求得"局势的解决"，怎么现在却谈到要推迟建立它呢？难道他打算提出什么新方案吗，除非他帮助组成一个新政府，否则他怎能希望得到足够的精神力量和权威去向重庆施加压力呢，影佐说，

建立新政权具有“极端的迫切性”；他还向汪保证，关于管辖范围和主权问题，加以进一步研究肯定是容易解决的。[22]

板垣赞成影佐的保证，但又作了某些“澄清”。他说，他并不打算让现有各政权获得实际主权。但与此同时，汪必须承认并且接受随着战争已遍及全国而在中国产生的“各种既存现实”；例如，“发展地区经济的机构”（即先前已提到的大控股公司）。汪一听到希望他承认“各种既存现实”，对他来说，板垣的“保证”就几乎不起什么保证作用了。板垣直截了当地说，决不能把时钟倒拨，日本是不愿意放弃战利品的。日本对于华北自治化的想法是固定不变的。

最后，板垣强迫汪作出了让步，而这个让步使汪政权甚至在建立之前实质上就已被阉割了。汪被迫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具有“较大程度自治的”“政务委员会”，而汪则要求他的政权在华中的权力不受任何侵犯作为交换条件。汪强调指出他所说的权力既指经济权力，也指政治权力。板垣点头同意说：“很好”。[23]这时，这位陆军大臣看来就不那么坦率了，因为刚刚在九天之前（在六月六日五大臣会议上），他还举手通过了一项不得默许汪的折衷建议的政策。

在这轮致命的汪—板垣会谈结束之前，汪就同意了（或者说，至少没有强烈反对）板垣的一些别的要求。他同意中国有必要承认满洲国。他对于板垣抱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日本被视作一种危险”表示谅解，并答应采取措施去澄清这“三个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这一比较麻烦的主义，因为它被许多日本人视为共产主义。最后，他同意放弃“一个政府，一个党”的原洲保证让国民党外的人士担任政府职务。板垣的推论完全不错，假如让汪和他的同事们按他们自己的政治本能行事的话，他们准会试图在上海“改组”国民党，并且使这个“改组了的、正统的”党实际上独家把持政府的要职和权力。对于要求汪扩大政府基础并使党“民主化”的帝国陆军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没有证据表明帝国陆军由于扮演了民主卫士这个不平常的脚色而感到不安，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保全它的傀儡，特别是保全在华北政权中的那些傀儡的权力地位。

汪连一声也没吭就同意放弃“一个政府，一个党”的原则。这不过只是形式上的让步而已，因为他坚持把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当作是国民党的任务。这种情况越来越意味着他不得不依赖一些虚构的说法去表白他的信仰。这类虚构的说法之一就是；他在上海的一小撮追随者才是正统的国民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捍卫者，而重庆的机会主义分子则完全无视并歪曲了三民主义。这又导致了另一种虚构的说法：这个正统的国民党打算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建立的政府并不是一个新政府，而是

真正的政府回到它的原址重新掌政。在“还都”之后，一切都要恢复原状。政府的五院结构将予保存；国民政府的主席一职，将留给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名誉职务的、年高德劭的林森。国旗的选择，是对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他坚决主张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尽管一九三九年六月汪访问东京时，连日汪双方是否已就建立一个新政权的问题达成了协议都还有问题；可是，选择国旗的问题，却在访问过程中——以及在其后很久的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主要的斗争问题。[24]

日本主张重新采用民国初期使用过的五色旗（华北傀儡政权当时已采用它），理由是如果国民政府和新的汪政府都使用同一旗帜，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误会：几乎可以肯定，被弄糊涂了的日本士兵有时不免会向友军开火。

但是，汪拒绝依从日本的要求。汪这样做是由于他要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甚至在辛亥革命前，孙就已强烈地要求把青天白日旗（后来加上红色的大地）作为国旗；也由干他希望把自己的政权打扮成为合乎法统的政府。令日本人感到讨嫌的是，自一九三九年春汪到上海后，青天白日旗就一直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人的——包括汪的——住宅上空飘扬。

关于国旗问题的僵局，在日本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以后，终于在东京解决了。只要汪同意在旗子顶上加上写有“和平建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后来又决定在小旗的口号上增加“反共”二字，从而成为“反共、和平、建国”）以区别于重庆用的旗帜，汪就可以继续采用有争议的国旗。汪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折衷方案”都很恼火——周佛海评论这小黄旗象一条“猪尾巴”——但最后仍在原则上接受了日本的解决办法。[25]中国人预料到日本强令加上小黄旗准会遭到反对；正如周佛海向犬养指出的，既然小旗是用绳子捆上去的，也就很容易会被解下来。此后几个月里，关于悬挂国旗的礼仪问题掀起了不少风波，对此双方都各有责任：中国方面按周佛海的意见办，悬挂没有那可恶的小黄旗的国旗；日本方面则允许“新民会”之类的傀儡组织继续挂五色旗。

在汪与东京当局会谈初期，对于日本干涉中国事务的全部不满的情绪，可以说都集中表现在这个国旗问题上。的确，只是当周佛海威胁如果日本坚持要求使用五色旗就要中断谈判之后，日方才提出折衷方案。周对最后的协议极为不满。他对犬养说，“当我的孩子们问我为什么要改换国旗时，我将难于答复他们。”[26]可能除了日本有篡改和随心所欲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企图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能象国旗问题这样激起汪、周二人的爱国义愤了。汪不断要求日本重新考虑他的立场，但日本都不予理睬。只是经过了四年的斗争之后，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才最后放

弃了她在悬挂令人看不起的小黄旗方面的要求。*

汪的东京之行，在汪记运动中掀起了一场新的激烈斗争，扩大了高宗武和周佛海两派的裂隙。早些时候，当汪把追随者全部召集到上海来讨论这次出行的价值时，[27]这时还在香港的陈公博就拒绝参加商讨。尽管这样，他还是派了一个同事何炳贤代表他出席。何与周佛海在会上发生了冲突。周说，唯有建立起一个政府，汪记运动才能有“安全”可言；何说，进一步参与任何跟日本人的谈判，都会使党和国家分裂并玷污汪精卫的“光荣的革命的一生”。高也劝汪不要去东京。

如前已指出，汪决心要去，拒绝了他最信赖的顾问高宗武和陈公博的忠告。后来，他们二人不得不作出决定，是否伴随汪去执行这次看来是困难重重的使命。经过几番痛苦的考虑之后，高决定还是去。高回忆说，“作为一个朋友，当时离开他是不对的。”[28]然而，陈拒绝参加此行，在中立的香港逗留了半年时间，最后，显然是出于友谊和忠诚才打消了他的疑虑，并且勉强地加人了汪的行列。

在东京，由于高老是劝汪要谨慎从事，乃引起日本当局对他甚为不满，而完全把他撇在一边。这位“捣乱者”没有被安排同汪的主要随行人员一起住在东京近郊的王子饭店，而是被弄到几英里外的浅草区去住。这种隔离，可能与高不久前害肺病，还在恢复的过程中有关系；但他和犬养都相信，把他从汪那里孤立出来是故意安排的，并且在事实上已被列入要加以毒毙的名单。显然是犬养把高从厄运中救了出来，但这次虚惊并没有使高对日本东道主与日俱增的疑虑有所减少。[29]

要说汪在东京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日本傀儡政治中所奉行的“分治合作”这条大原则。日本军方代表“间接地”建议汪在返沪途中，最好去拜访拜访王克敏、梁鸿志和吴佩孚，汪表示同意这样做。假如日本以要求新政权是一种松散的联邦，并让上述人物都在该政权中有一个席位作为支持新政权的唯一条件，那么日本当然必须要求汪跟他们改善关系。[30]因此在汪与板垣的会谈结束三天之后，汪就离开东京前往华北。

汪的华北之行甚至比他的日本之行更为失败。虽然吴与汪有信函往来，似乎同情他的事业，但他拒绝见汪。刚刚拨出一笔一千万日元巨款去资助

---

* 译者按：据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第 29—30 页称，“到了一九四三年，三角小黄旗也取消了。据陈公博告诉我，取消这面有六个字的小旗，不是意味着南京政府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反共的；同时，也由于南京政府已追随德意日轴心国家正式向美英等国宣战，今后任务不只是反共而且要反美英等国，范围更大；所以不要那六个字了。”

“吴工作计划”的兴亚院，不是不愿意就是无能为力诱使吴去跟汪会谈。同其他人一样，吴对汪的叛离以及蒋在其中的牵连，早已感到捉摸不定，就到那时，他也可能还有重大的怀疑。[31]或者，他可能（正如汪后来宣布的）因为想当新政权的主席——而汪则坚持要把主席这职位留给林森——所以拒绝见汪。[32]

汪与华北傀儡们举行的会谈，只是突出地表明，汪日后跟他们合作可能发生困难。跟王克敏的会谈特别没有结果。汪、王二人彼此没有好感。汪精卫尖锐地抨击跟王克敏政权关系密切的“新民会”的纲领根本不起作用，汪坚持说，它连对付北平学生都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对付中共了。[33]汪、王会谈举行时，王克敏的帝国陆军主要支持者（包括喜多将军）都出席参加。有了这样的靠山，并且不理睬东京要临时政府与汪合作的愿望，这个华北傀儡不仅拒绝支持汪而且宣布他将不参加汪建立的任何政权。汪一走，王克敏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政府决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34]从而更加证实了公众的怀疑：汪王二人的关系不妙。

日本官员没有参加汪、梁会谈。虽然这次会谈显然比汪、王会谈友好一些，但它并没有增加汪对合作前景的乐观情绪。梁和他的内政部长、老牌国民党人陈群发言的调子清楚表明，他们两人都认为汪蒋合流。他们两个都急于向汪表白，他们并没有攻击过委员长：一九三八年，他们不是曾经派了密使去武汉说明为什么成立维新政府，向蒋保证新政府纯粹是一种“临时措施”，并让蒋知道“一旦局势允许［他］返回南京，大家都会表示高兴”吗？[35]

如前所述，一九三一年在国民党内自相残杀达到最高潮时，汪精卫凭借张发奎部队的支持，曾在广东搞过一个短命的分裂政府。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月间，汪精卫进行了东京、北平、南京等一系列希望渺茫的会谈之后，他乃孤注一掷地企图在广东重新试行自治化。他跟他的日本后台考虑到，这次冒险若能成功，将使他能够把同其他傀儡合作所牵涉的某些问题回避过去。

是汪还是日本人首先提出这个想法，现在仍未弄清楚。日本中央当局看来并没有插手制订或者支持这个计划。根据冈崎胜男总领事从广州发出的报告来看，日本外务省完全被蒙在鼓里。[36]这一计划肯定同六月六日的五大臣设想并无类似之处，而那个设想要求以汪精卫、吴佩孚和现有的傀儡政权为基础，建立新的中央政府。

如同华北、华中傀儡政权受到各地区方面军的支持一样，华南政权将从安藤利吉中将统率下的华南方面军得到它的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支持。尽管梅机关在这次冒险中所起的全部作用还搞不清楚。但它的某

些成员确实出席了汪与华南方面军将领之间的会谈。[37]八月初，中日双方代表已经一致同意在广东成立一个新政府。它将包括南方和西南的五省，将拥有比别的中国政权更高、更大的权力。例如，华南方面军打算在警察和保安问题以及在政治、经济事务中，给汪予管辖权。[38]预期这个政权最后将发展成为一个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关于这个计划的其他特点人们还知道得很少，它非常象是匆匆忙忙搞出来的，几乎未提到细节问题或长远打算。

汪到他的出生地广州去，亲自出马寻找支持。八月九日，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感情充沛地"指责蒋在十个月以前的短暂的广州防御战中，使广州民众遭受了"无谓的牺牲和不必要的苦难"。汪强调指出，中国明明没有足以打败日本的军事力量，却不断跟着蒋"继续抗战的高调"跑，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到头来从抗战得到好处的只能是共产党人，这些人"没有一点民族意识"，只是听命于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非常希望中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斗中两败俱伤。即使中国在持久战中打败了日本，共产党人也会说胜利果实是他们夺得的，到那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会是向他们从前的盟友报仇。[39]汪三番五次地强调，打一场时间长、代价大的战争只会使共产党人坐收渔利。他的崇拜者认为他这个论点是他在政治上预知未来的敏锐性和准确性的明证。[40]

汪寻求支持的公开呼吁，与其说是讲给广大的市民群众听的，还不如说是讲给军阀将领们以及他们手下力量可观的部队（特别是他的老搭档、广东同乡张发奎）听的。在他的广播演说以及较不公开的呼吁中，汪保证说，他已跟安藤将军作出了安排，只要中国军队支持他的和平建议，就会得到公正的和平。这就等于说，如果蒋跟他的将领们愿意投降，他们的军队。将不予遣散，还准许他们本人跟他们的部队同汪一起统治华南。汪还许诺说，"广东一定要交还给广东人"。[41]

汪的呼吁毫无用处。长期以来都指望（或者至少是长期以来都在暗示）那些据说是动摇的将领们会表示支持，可是没有成为事实。到八月底，汪和华南方面军都显然已经知道，汪再也不会从张发奎那里得到军事支持了，因此华南自治运动也就悄悄地不了了之。一直随汪在华南游说、隶属于梅机关的外务省中国问题专家清水董三，曾生动地回顾了汪的广播呼吁所得到的可怜反响。[42]汪由于南行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回到上海后就投入了一场争取公众支持的新斗争。

八月二十八日，汪召集那些被认为是支持国民党的人士，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个被汪的报界代理人当作"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传了好几个星期的会议，在这厄运高照、失败累累的夏天里，成了又一个更加阴郁

的失败。

汪私下一直强调重庆国民党领导人物中存在着不和，因此断定有很多人会参加他的事业。例如，他向王克敏保证，预期出席大会的三百名代表中，将有许多是重庆来的同志；其余还有许多同志，包括 CC 集团的陈立夫和军政部长何应钦，都急于要叛离，只不过干起来可能会有困难。汪以一种过份乐观的估计对这位华北的合作者说，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的国民党部队（包括张发奎部队）不久就要参加他的事业。当这些支持没有一样成为事实时，汪的威信乃急剧下降，他向日本人和其他傀儡们讨价还价的力量也都丧失殆尽了。

其结果是，出席“六大”参加创建“正统国民党”的国民党代表只有二百四十人。的确，假若代表名单没有把那些最露骨的投机分子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恐怕连这个令人失望的数目也还达不到。甚至汪最热心的辩护士之一的金雄白也承认他的忧虑：在他参加的这次会议里，充满了“跟汪毫无关系的人，以及那些头一天还在高呼抗战的人”。[43]（关于这个问题，金本身的代表资格就相当可疑；虽然他被指定为两个区的代表，可是他自己连个国民党员都不是。）报界吹鼓手再多，也掩盖不了“六大”的闹剧特色；许多观察家解释得很正确；纵使日本人（说得确切一些就是影佐）尊重汪的意愿，不干预大会的议案，这次大会仍然只是起着认可日本要求的橡皮图章作用。事实上，在这次人数不足、长达五小时的“大会”中，没有进行多少讨论。会议结果，同意了日本对于扩大（即包括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基础以建立新政府的要求。影佐用不着派出观察员或顾问去保证大会领会和依从这一要求；因为如所周知，两个多月前在和板垣的六月会谈中，汪早就俯首从命了。

为了让日本人满意，汪（和“大会”）扩大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使它不仅包括国民党的成员，而且还包括其他“具有杰出品德和优异才智的人物”。大会宣言表示，在要到战争结束后才能结束的“训政”时期内，中央政治委员会仍将是“全国最高政治机构”。[44]从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正统国民党内的地位，跟在原来国民党中的地位一样；重大的差别是，新委员会比蒋领导的机构更加遵行孙中山的主义中的第二点即“民权主义”。或者说，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最后被选到中央政治委员会去的绝大部分有德有才之士，都是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的首脑人物，这一点也是不足为怪的。

汪的许多国民党同事很瞧不起傀儡政权的头头，汪只能以忍受这部分同事的埋怨情绪作代价，才使上述措施在大会上通过。大会前夕，正统国民党的一位忠贞代表恳求——据一则报道说他是声泪俱下——汪跟现有政

权中的“走狗”断绝关系。[45]（这些人指责梁鸿志以及其他人为汉奸，不配跟正统国民党一起来承担未来重任。对此，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此中的讽刺意味。）政治斗争正使老牌傀儡们和新的夺权者成为同床异梦的伴侣。甚至汪最亲密的支持者都承认，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紧张局面完全是汪和他的追随者的狂妄自大造成的。这些支持者中的一员，外务省的大田一郎困惑地写道；“简直无法理解，汪、特别是汪的年轻助手们竟会对王和梁那样粗野。”[46]

“大会”闭幕三周之后，汪邀请主克敏和梁鸿志跟他在南京会面，希望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达成谅解：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和职能； 华北与新政权的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傀儡领袖们同意汪精卫担任委员会主席，并有权指定它的全部委员；而汪则给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席位比他原来打算给的稍多一些作为交换。

然而，除此之外会议就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了。王和梁断然拒绝讨论任何实质问题，理由是他们没有资格和权威；他们声称，在同他们各自的顾问喜多将军和原田将军磋商之前，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这两位顾问都是以不愿向汪作重大让步著称的人物。[47]会议到九月二十日休会时，王克敏公开表示感谢汪对他的表扬，然后就圆滑地用这些表扬来作为继续搞华北分裂、自治的合理证明。王声称：“汪先生争取和平的讲话，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因为他表扬了这个［临时］政府成员过去的政绩……。假如我们过去做的事有利于总的国家形势和大众生计，**我们希望按照实现我们原定的目标继续前进**并去取得成就”。[48]

陶希圣和梅思平陪同江参加了南京会议，陶以冷酷的嘲讽语调，写下日军对这三位中国“首脑人物”的“保护”情况：街上满布着皇军的岗哨，日本宪兵的摩托车队担任他们的警卫车队，如此等等。陶和梅把汪—王—梁会谈比喻成为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但打牌的人却从来不决定自己的牌怎样打法，而是由日本官员（喜多、原田、影佐）从后面把手伸过他们的肩头，来替他们摸牌、出牌、作决定。一回到上海，陶就说：“谁都不愿提这次旅行”；“我们全都感到忧郁、屈辱、可耻和后悔”。[49]

东京的期刊《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十月号刚好在南京会议时出版，刊载了汪精卫写的一篇文章，他对日本的极度不满跃然纸上。[50]他写道，日本的“东亚新秩序”的具体条件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它答应要给东亚提供手段，使之摆脱西方“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对孪生大敌。中国无疑需要帮助。而曾经非常成功地清除了这两个敌人的日本，正好又有能力来帮助中国。如果他的日本读者对于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的援助那样缺少热情感到迷惑不解的话，那么汪是可以作出解释的。简单的

事实就是，很多中国人害怕日本人，甚至超过了他们害怕西方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日本不仅是中国必须抵抗的另一种残暴势力，而且还是“残暴中之最残暴者”。

汪问道，当日本的行为迫使中国人想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可能遭到毁灭的时候，日本怎能希望他们会对建设东亚感兴趣呢，他建议日本人回想一下古代某个中国皇帝的故事：当一个廷臣向皇帝说明，所谓的灾年就是指谷物供应不够养活老百姓的年份时，这个皇帝被弄得莫明其妙。他惊奇地问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呢，汪希望日本人肯定会明白；“中国人害怕亡国，就好比缺少谷物作为粮食；而建议去建设东亚，就跟讲什么吃肉一样。”

---

[1] 这所建筑物的中文名称是“梅花堂”。影佐的《漫谈》第373—374页记述了梅机关。

[2] 同上书，第374页。

[3] 同上；另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4页。

[4] 见影佐的《漫谈》第376页。例如，其中的一员是《朝日新闻》的记者神尾茂，他报道汪记运动的文章，写有《汪精卫与和平运动》（载一九三九年《近代日本》第八期）和《汪精卫与重庆》（载一九四〇年《近代日本》第九期）等文。

[5] 见影佐的《漫谈》第374页。

[6] 同上书，第363页。

[7]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7页。

[8]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6页；影佐的《漫谈》第378页，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39页。

[9]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27页。

[10] 见稻场正夫编的《冈村宁次大将》第339页。

[11]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09页。

[12]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一卷第208页。

[13]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70页。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61—265页对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的五大臣会议及其决议作了很有价值的评论。

[14]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63页。

[15] 同上。

[16] 同上书，第262—263页。

[17] 同上书，第263—264页。

[18] 同上。

[19] 五月二十八日意见书的正式日文译本称为《关于处理形势的具体建议》，收录于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306—310页。

[20]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656—657页。重点是我加的。引文是引自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汪—板垣会谈的速记记录稿，见上书，第652—659 页。

[21] 同上书，第 657—658 页。

[22] 同上书，第 657 页。

[23] 同上书，第 658—659 页。

[24] 关于国旗的问题，在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91—195 页、影佐的《漫谈》第 368 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95 页和 97 页以及查默斯 •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 47—48 页都有叙述。

[25]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95 页。

[26] 同上。

[27] 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 95—96 页对此有所论述。

[28]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29]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另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71—173 页。

[30]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1519-H 号，第 4 页。

[31]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11 页。

[32]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1519-H 号，第 6 页。

[33]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11 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34]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 82 页，另见梨本祐平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第 115 页。

[35]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12 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36] 冈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致有田外相的报告，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1519-I 号，第 1 页。

[37]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13 页。

[38]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华南特务机关副长原致海军军务局第一课课长宇垣的报告，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246 页。臼并在《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13 页论述了关于成立华南自治政府的计划的另一个重要材料来源：“竹内［汪精卫］与［陆军］小组会议要点”。“竹内”是日本常见的姓氏，是汪的代号。

[39]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 10—12 页。

[40] 例证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56—58 页。

[41]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 12 页。

[42] 访问清水的谈话记录。

[4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55 页。

[44] 全文见《人民论坛报》（上海版）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 107—116 页。

[45]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73 页。

[46]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15 页引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47] 同上书，第 214 页，另见影佐的《漫谈》第 376 页及陶希圣的《乱流》第 170—171 页。
[48]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第 174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49]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 171 页。
[50] 见汪精卫的《依靠日本——中国与东亚》（载《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第六二五期）。

第十三章 “从地下到天上的一切”

影佐把汪从河内护送到上海后，成功地使汪重返中日关系的政治舞台。但这出戏经过五个月的排练之后，没有人能说究竟何时能够开始演出，或是否真能演出。甚至没有人能预言，汪是否准会担任头号角色。日本有许多人对他的号召力存在怀疑，而且吴佩孚和其他人还正在舞台旁边等着。结果，汪对于跟日本实现合作的前景所感到的幻灭迅速地增长。

他经东京之行后，发现近卫“三原则”的崇高理想与板垣陆军大臣办公室透露出来的、关于合作的严峻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他乃感到幻灭。他呼吁支持，但没有得到什么反应，他又感到失望。没有一个重要人物响应他的号召，唯一例外的是他的老同志陈公博，陈在香港犹豫、动摇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同意支持他。他不得不忍受现有的傀儡们和他们的日本顾问对他的折磨，这使他经常感到苦恼。他也察觉到有人主张设法抛开他而寻求与重庆直接谈判，他为此而感到不安。汪意识到，他叛离重庆的个人动机——那无疑是正直的、爱国的——恐怕不足以使他逃脱被他的同胞们扣上“汉奸”的帽子，对于象汪这样一个对他自己在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敏感的人来说，这也许是最最痛苦的事了。汪面对着这些显然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究竟是坚持下去还是退而重演他流亡国外的故伎，这需取决于影佐的诺言和对他的保证。记者松方吉三郎回忆道，“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和平运动是光靠私人关系维持下去的”。[1]

影佐比较接近板垣陆军大臣，而且又能把汪的事业吹得娓娓动听，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使陆军中亲汪的情绪逐渐有所增加。但是，促使汪时来运转的重要得多的因素，却是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它发生在满洲国跟苏联仆从国外蒙古交界的哈勒欣河边远地区。在这个地区的诺蒙坎村附近，关东军与苏联红军（以及它们各自的傀儡军队）之间打了六个月的仗，日本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吃了大败仗。日本碰到一个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使用现代化战术的敌人，这还是头一次。事实证明，关东军完全不是拥有优越得多的大炮和坦克的苏联军队的对手。苏联的运输和供应能力——都从四百英里外的兵站运来——令日本情报部门大为震惊。苏联轰炸机在满洲国境内的轰炸，对日本来说是个不祥的威胁。最后，苏联军队具有的素质跟日本在上次战争中所碰到的沙皇军队的素质大不相同。他们所显示的坚韧不拔和勇敢的精神，使日军从七月一日至九月十六日（诺蒙坎战役主要进行期间），出现了伤亡达百分之七十三这一惊人的数字。[2]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参谋本部总是把苏联的威胁当作是急务。从对华战争最初阶段起，参谋本部的战略家们就在寻求解决办法，使他们能把注意力集中去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诺蒙坎的失败清楚地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它也证明了在陆军指挥官中存在拒不听命的危险，他们竟敢完全无视东京所制订的国家政策。板垣陆军大臣本想把边境冲突交给外务省，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同时参谋本部采取了一项实质上要求“不管体面或不体面都要及早结束冲突”的政策。关东军研究了这一政策后，却狂妄自大地决定不予理睬。[3]

甚至还有比诺蒙坎冲突影响更大的事件。八月二十三日，在诺蒙坎的战斗达到高潮时，德国跟俄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大大地解除了欧洲方面的负担，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她在亚洲的敌人。亲轴心的平沼政府由于它昔日的反共盟国的出卖而大受震动，马上就垮台了，由以阿部信行大将为首的内阁继任。阿部素以同情汪精卫著称。（后来他被任命为日本驻汪政权的第一任大使。）

对汪的事业更重要的是接着发生的陆军人事变动。这项变动使关东军司令官、“分治合作”最坚定拥护者之一的植田谦吉大将被解除职务。而最重要的变动则是大陆指挥机构的改组。九月二十日，参谋本部宣布，解散华北、华中陆军指挥机关，代之以一个统一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这不单只是个提高效率的措施，而是参谋本部方面通过解除地区指挥权，以统一陆军对华政策的一个措施。有关建立统一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项重大措施是，任命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担任该派遣军的总参谋长。这一切措施的结果，使汪的事业突然抬高了身价。在某些陆军部门中，决心要统一日本的对华政策并尽快结束战争的主张又抬头了。至于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好途径是依靠汪、还是通过与蒋和解，肯定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然而，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设立，至少有希望减少地区陆军指挥机关及其傀儡们对汪所构成的威胁。

在这方面，很有趣的是，正当王克敏和梁鸿志的日本顾问们和影佐在南京开会的时候，王、梁在与汪精卫（于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会谈中，还在处处作难。据说，王克敏的后台喜多将军，在听樋口季一郎将军指示时，受到了“申斥”。（樋口是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特地从东京飞来，指示参加开会的将领们认识新近改组的重要性）。樋口对他们说，阿部内阁保证，要把影佐支持汪精卫的计划“进行到底”。[4]

樋口对那些要跟重庆直接谈判的主张持否定态度。他说，直到三个月以前有些人还赞成那种做法，但是“现在，这样的傻子一个也没有了”。樋口特别提到关于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教育家司徒雷登进行调停的情报。据

说，司徒已跟委员长取得联系，蒋表示：他对于王克敏跟日本达成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衷心赞成，只要汪精卫和他的一伙人被排除在外就行。樋口的分析是，“司徒是一个老骗子；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把汪甩掉，那就是抛弃武士道。”[5]

汪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自重庆叛逃出来的。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这一年里，日本人自己经常在讨论、争辩关于导致“重新调整中日关系”的条约和协定的细节，而且也跟汪和他的同事们就同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这些讨论总是非正式的、没有结果的。因此，在此期间跟汪的往来一直停留在个人讨论这一级的水平。即使在这种水平上，汪也无法详细地了解日本人真正的意图何在。例如，他急于要求澄清日本顾问的人数和权限这件事，简直就被置之不理。按照汪的观点，在私人会谈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日方所撕毁。甚至当这种谅解已经写成书面的东西并且经签字盖章（就象重光堂协议一样），都还有可能被否定掉。这种做法，既表明日本对于支持汪是否有利拿不定主意，也表明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权力分散；以致到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汪叛逃差不多已一年之后——日本仍不愿就谈判一项基本条约的问题作出承诺，而日本如果打算承认汪的新政权的话，谈判一项基本条约显然是必要的。

兴亚院主要负责确定日本在这类条约中的立场。它拟出了一项“计划草案”，草案实际上是一张详细清单，开列了如要日本支持建立新政权汪就必须遵从的各项条件。参谋本部的堀场大佐，既负责使这个计划获得必要的签字批准手续，也负责联系影佐大佐和梅机关。在讨论到象撤军时间表一类的具体问题时，堀场发现“在制定《新关系方针》时期曾暴露出来过的同样的贪婪情绪”，在好些部门中，又不断有所表现。[6]计划草案的内容，是以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作尽可能严谨的解释为基础的，但又补充了几条粗暴的新要求。一九三九年十月，当堀场带着兴亚院的方案去上海时，他告诉影佐说，要是汪承认了这些条件，他想汪大概就没啥可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了。影佐表示同意说：兴亚院的计划草案是“一曲挽歌，甚至在汪政府成立之前，就标志着和平运动的失败”。[7]

由于兴亚院条件的粗暴，堀场建议影佐，不要向汪透露草案细节，只要设法使汪笼统地同意它就行了。他劝影佐把兴亚院的方案当作专供他个人参考的文件，并把当时的各项要求只看成是进行初步讨价还价的东西。只要汪承认了一系列总的要求，兴亚院的条件可通过“政治性的讨论”来加以修改。据此，影佐应该是可以随意“对汪作出适当的让步”的。[8]政治

性的讨论大概是要在汪政权正式成立后举行的大使级会谈中进行。

影佐和整个梅机关的看法都跟堀场一致，认为兴亚院的计划草案非使和平运动完蛋不可。然而，大多数人并不同意堀场的信念：那怕日本——用清水董三的话来说——“要求从地下到天上的一切”，谈判也还能进行。[9]外务省的“支那通”争辩说，在这种建议的基础上跟汪谈判，“将会令人怀疑日本的诚意，结果对日本不利”。[10]清水和梅机关其他成员，恳求影佐摒弃兴亚院建议，把它当作一项名誉扫地的政策退回东京；还恳求他应该讲清楚，即使汪同意了这项计划草案的条件，和平运动也会蒙受耻辱，终至毁灭。

影佐对堀场和梅机关中反对者的劝告，都加以拒绝。他之所以不能接受堀场的建议，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影佐倾向于对汪完全开诚布公，让汪自动起来反对它。不管怎么说，那时他早已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向汪出示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提出的条件的全文，事到如今，他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改变他开诚布公的方针。[*]其次，影佐意识到，汪对于日本的意图深表怀疑（特别是自从他知道了十一月三十日会议的苛刻的细节以后），看来不会愿意在措词模糊的一般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事实上，汪希望澄清日本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最后，影佐不同意堀场的乐观看法——兴亚院的方案在以后的政治协商中，最后总会有可能软化。恰恰相反，在影佐看来，堀场大佐——一个“善良、诚实的人”——对于把自己那怕只是有半点跟兴亚院的方案联系在一起都感到不自在的这一事实，正是“日本被一种狭隘的强硬路线的观点所统治着的证据”。[11]直到那时，堀场完全是盲目乐观的。正如今天我们所知，随后发生的事件的确也没有证明那种乐观情绪是有根据的。

影佐虽然同情梅机关的同事们的意见，但也拒绝了他们的劝告。他对他们说，归根到底他们的任务不是制订政策，而是执行政策。对于一个守纪律的军人来说，拒绝在兴亚院指示的基础上去进行谈判，那是毫无道理的。因此，他向他的同事们保证，他打算把兴亚院的计划向汪和盘托出，听取他的反对意见，然后回到东京去商讨一个修正方案。关于他自己的苦恼，影佐对他的挚友犬养讲得更为坦白；他承认，“我连穿这身制服都感到可耻”。[12]

---

[*] 在听到这个文件已向汪泄露之后，堀场十分震惊地抱怨道，“影佐总是把中国人当同志一样对待”。（见《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318 页）

愚园路会议

一九三九年夏当汪不在上海时，在“越界筑路”区为他准备了一所警卫森严的住宅；它虽然在公共租界的范围之外，仍然受租界巡捕的保护。在愚园路1门6弄围墙之内有十二幢房屋；不仅汪，还有他的全部高级顾问（包括周佛海、梅思平和陶希圣）以及他们的家属，都住在那儿，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办公。如果说他们被监禁似的生活并不方便，但显然比那些住在外边、随时都会遭到袭击危险的同志的处境要好得多。国民党刺客和恐怖分子，使在上海的汪分子的寿命大大地缩短了，那些能活下来的人算是够有胆量的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影佐大佐、犬养健以及梅机关其他成员到愚园路1136弄，开始进行为时两个月的谈判。从最后于十二月三十日签署的“非正式协议”看来，汪对于日本的要求几乎全部都屈从了。[13]这一协议，稍加修改后就并人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使日本与汪政权的关系合法化的“基本条约”中去。

日本人在愚园路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是那样得寸进尺，以致汪和他的同事们都忍受不了，会议经常由于激烈的交锋搞得不欢而散，至少有一次是完全闹僵了。只是由于梅思平，特别是陈公博坚持得比较厉害，汪才能在愚园路会议上使日本人作出一点点让步。陈之所以参加汪集团，是出于个人对汪的忠诚，而不是认定汪的路线正确；恰恰相反，陈相信：汪是个诗人而不是个政治家，他总是“把事情看得过于乐观”，所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被近卫欺骗了，而且往后还会再受骗。[14]陈试图说服汪，为了得到较好一些的条件和较明确地保证日本有诚意，应该坚持到底，可是陈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很有限的。尽管汪不参加实际谈判，但他通过“诓哄”不妥协的陈并使他勉强顺从，从而扮演了会谈中的决定性角色。甚至象犬养这样坚定的支持者也不否认，汪的确让步太多，把他自己将来成功的机会都妥协掉了。[15]要精确地估计汪的软弱性是困难的，但陈说汪在气质上不适于

---

* 周佛海经常对那些说他叛逃是为了个人安全的人指出，生活在狂轰滥炸的重庆，比在上海还安全得多。他还写道，老实说“一个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不管在哪儿［在重庆］都有最坚固的防空壕，挨轰炸时总是安全的。空袭警报发出后，总有充裕的时间去作准备。对比一下，“我［一九三九年在上海］的生命却经常受到共产党分子和国民党政权特务分子的威胁。由于刺客的来临事先没有警报……；我想，这些恐怖分子对生命所构成的威胁，比日本的空袭要严重得多。”（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第2页）周的政敌对他的说法并不信服。龚德柏在一九六三年（周死后十五年）写的文章中，仍然坚持说，日本人对重庆的空袭使周怕得要命，他“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吓得屁滚尿流”。（见龚德柏的《汪兆铭除敌叛国秘史》第54页）

担负跟战时敌国谈判的艰巨任务，这至少的确可以说明部分情况。看来汪对影佐的信任似乎已经到了无需保证的程度；虽说影佐的正直和节操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为汪向东京索取让步的能力却是很有限的。[16]

尽管这样，影佐还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甚至在会议闹僵了的时候（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还赶忙回东京去为汪请求放宽条件。由于怀疑陆军省的最高级官员不一定充分了解上海会谈的情况，影佐带着他的问题直接去找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并且发现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畑俊六对于愚园路会谈的“详情一点也不知道”。影佐发现畑同情他要求放宽条件的请求，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得到畑的认可”。然而，在一些诸如撤军和日本管理中国铁路等关键问题上，畑并不让步；而后一个问题，更是日益成为谈判解决中国战争问题的一个症结。在这些问题上，影佐发现东京有些人说，“假如我们跟重庆谈判，我们可以把条件放宽一些；但现在［那就是说在与汪谈判中］我们却不能这样办”。可是也还有些人继续坚持说，“即使是跟重庆谈判”，条件也不能放宽。[17]

影佐在他写报告时不愿意点出那些坚决反对向汪让步的人的名字，因为写报告时他还在执行战时任务；但是堀场大佐在战后谈到这同一事件时，则确定这个强硬路线的中心是以富永恭次少将为首的参谋本部作战部。富水集团极力主张对兴亚院的计划作生硬的、强硬路线式的解释，对于堀场的任何意见，如“宽大地”对待中国将有利于两国之间友好“提携”的利益，他们都采取敌视态度。当富永和堀场在撤军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时，二人之间（堀场当时在富永手下工作）的关系就愈来愈紧张。富永坚持有必要在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区永久驻军，特别是顽固地坚持在南京留驻帝国陆军部队的必要性。堀场最后不得不对他的上级提出批评，说他违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指出在南京驻军就“好象穿了一双脏鞋踏进主人家的卧室”。由于讲了这一句轻率的话，堀场受到发怒的富永的痛斥，要他具结保证不得与梅机关再有任何联系，然后被“踢出”了富永的办公室。此后不久，就把他调往中国。[18]从此，对堀场称之为“在华特殊利益政策”进行的重要批评在东京中央所起的影响就告结束。（与此相反，富永却一直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后来升任东条内阁的陆军次官。）

不象重光堂会议那样没有保存记录，愚园路会议给我们留下了每次会议几乎是一字不漏的记录。[19]这些记录，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一九三八年近卫说得非常好听的“三原则”，把同日本帝国合作的丑恶现实掩盖到了何种程度。除了会议的逐日记录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好几个愚园路会议参加者的报告书。每次白天的正式会议结束后，犬养都要跟周佛海、高宗武以

及别的中方参加者碰头，摸清他们的想法，回去向影佐汇报；然后影佐就准备他下次会议上进行讨价还价的战略。

这些会谈，实质上集中于五个主要问题：顾问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军事问题、华北问题以及各“特别区”的问题。[20]为首的顾问问题，是汪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很关心的问题。在东京时，他就曾请求日本不要往中央政府指派顾问，“为的是要打消中国民众可能会有的任何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疑虑”。他认为，负责谈判两个政府之间的分歧的合适人员，是大使而不是最高政治顾问。汪准备接受派来的技术顾问，但他们的职能只限于在科学技术方面，而且他们必须在幕后跟中国官员配合工作，不跟公众见面。[21]日本人与中国公众之间的任何直接接触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十月里，日本人就开始对汪的请求开刀了。他们声称，尽管他们不会向中央政府派出任何政治顾问，但是“向中央政府有关的直属机构，指派教师、海关官员、技术人员等等，对于中日友好关系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22]中国方面比较心平气和，却又是相当可怜地要求谅解，中国并没有什么条约义务非聘请这种顾问不可：“只有当我们感到有必要时，我们才打算聘请非纯粹技术性的顾问。”当影佐上报他已同汪达成了这个妥协协议时，他附上了一条他自己的看法：“中国方面认为，要中国在正式条约中同意聘请这类顾问是很令人难堪的；但在实践中，中国是会同意这样办的。”[23]后来，就是在愚园路会议期间，中国人仍然被迫同意把“财政的、经济的顾问”当作技术顾问看待，从而根据以前的协议，这些顾问也就成为可以接受的了。此外，日本还要求几乎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派遣各种各样的顾问——包括政治顾问——到华北、蒙疆以及象上海、厦门这些“中日合作关系密切的特殊地区”去。

汪对于不让日本人参加地方和省级政府，并要求不向这级政府派出任何政治顾问这件事也关切备至。如果日军在从某地撤退之前，需要地方官员合作时，他“希望日本［一定］采取外交措施，而不独断地签发书面或用口头的通知。”影佐答道，日本一般地会按照汪的意愿办事，但汪必须理解，向地方一级政府指派日本顾问，“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和对某些特定的地区是不可避免的”。当影佐的答复汇报到兴亚院时，兴亚院对他错用了“不可避免的”一词，感到遗憾，应说中国应当“自发地同意接受”这样的日本顾问。影佐大胆地通知东京，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并不真正期望”日本会接受他们在派遣日本顾问到地方政府问题上所提出的限制。[24]

汪在东京时，也曾寻求在经济问题上达成某些谅解。他提醒他的日本东道主，重光堂会议已经同意经济合作将“基于互惠和平等的原则”，他要求将一切被日本人占领或没收的矿山和工厂，迅速归还中国业主。他也请

求日本改善存在于许多合营企业中的“不合理状况”——日本要求拥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但对提供资本的承诺却从未兑现。此外，汪还声称，日本总是低估合营企业中中方资产的价值；他要求日方采取步骤“以客观标准”重新估算那些资产的价值。最后，汪不愿背上日本跟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签订的经济合同包袱，其中很多合同在订立时都是极其无视“平等互惠的原则”的；他要求，他应有权立即——甚至在新的中央政权建立之前——重新开始谈判所有的合同。[25]

最早的答复来自梅机关：说日本会“考虑”把矿山、工厂归还中国业主的某些合理方案，但是中方必须承认“战争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军事需要”；而且，有些工厂早已“由于是敌产而被当作战利品来处理了”。至于重新谈判现有与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之间的合同问题，那只有在中方能指出它有什么地方违背《新关系方针》的情况下，才许可那样办。[26]

兴亚院对中方建议的回答相当强硬。兴亚院对于曾经没收或占据矿山或产业的问题一概予以否认。它说什么“我们只是采取了措施去保护［中国的］产业”，显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的措词的讽刺味道是多么辛辣。兴亚院还说，“经讨论后”，产业将予发还。但是，这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一项附有条件的诺言，因为兴亚院说得很清楚，“那些涉及军事需要或特殊情况的［工业］，大概［将］不予发还”，或者即使发还，也自动地转变成合营企业。至于那些跟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商定的合同，它们都是“公平合理的”，根本不是什么重新谈判的题目。[27]

中国人以为在重光堂早已解决了的特殊权利问题，在愚园路会议上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尽管日本先前已同意放弃任何特殊权利的要求，兴亚院的草案则具体要求经济利益，特别是开发华北和蒙疆地下资源。影佐和他的技术顾问小池，在回答周佛海关于要求澄清特殊权利时说，所谓的特殊处理“大体上说”是指煤和铁方面，“……但是，也还指对国防很重要的各种轻金属”。小池说中国有必要修改不准外国资本在煤、铁工业方面投资的法律，这就是日本人心里所想的事例之一。梅思平反对兴亚院似乎一心想要占用华北和蒙疆的全部煤铁以满足日本的需要。梅抱怨道，中国的煤和铁几乎全部产自华北，假如日本不同时考虑中国的需要，那“麻烦”可就大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小池关于日本并不想占用全部有价值的地下资源的保证，几乎不成其为保证，因为他是这样说的：中国肯定可以使用“日中合建的高炉生产的剩余产品”。[28]

在这个问题上，周佛海请求影佐放弃这种特殊权利的要求。他问道，汪集团已经同意给日本在全国各地开发资源的优先权，为什么日本还要坚持在华北、蒙疆的特殊权利呢？影佐的答复明确地说，这是一个超出语义

学范围的问题。他说，就以煤矿资源的开发为例，优先权就满足不了日本的要求。假如有关煤矿开采的法律禁止给予外国“便利”，那么日本即使享有优先地位，也没有资格得到那种便利。影佐争辩道，“优先权是一种消极的东西，我们现在谈的是经济合作，那可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东西。”[29]影佐解释说，一句话，它的意思就是把其他外国完全得不到的“便利”和特权都给予日本。影佐经常发现他自己在向一群中国人兜售经济合作时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因为这些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所谓合作的片面性日益采取嘲笑的态度。最后，他对周所担心的“特殊权利”一词的问题作了让步，因为中方坚持说把这个词译成中文后显得十分刺耳。但日本的要求的实质并没有怎么改变，只是用“特殊便利”一词代替了“特殊权利”。最后经双方一致同意的有关条款是这样的：

> 遵照共同防御和经济合作的精神，中国应该给予日本特殊便利以发展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自然资源。……在中国其他地区，按照经济合作的精神，中国应给予日本以必要的便利，使之可以发展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关于前项资源的利用，应考虑中国的需要。[30]

在“合营企业”的管理问题上，最后协议给予日本控股权的范围如下：在一般企业是稍低于控制水平，在“特定企业”则为百分之五十五，凡是涉及日本军事需要的企业都笼笼统统地被划为“特定企业”。由于汪承认了日本有权派遣顾问，这就更进一步地保证了日本的经济控制，因为这些顾问在各个工业部门对于计划和资源分配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

最后，日本还享有一些财政上的特权。这些特权——是中国方面最不愿意给的特权之一——允许日本在中国使用军用票，实际上等于允许日本，按对她本身有利的方式，去操纵中国的货币、汇兑率和国际收支。梅思平以厌恶的口气批评道，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会议不公平地把日本撵出了中国，而现在日本则用把其他国家赶出中国的办法，来纠正那次对她的不公平处理。他说：问题是，日本的要求“可能造成这样一种误解，认为日本正在试图把中国人赶出中国去！”梅认为，这不仅只是梅和汪的意见，凡是知道日本要求内容的任何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31]

会议讨论的第三个主要议题，是日本军队和军事顾问的安排问题。汪在东京时，曾要求派遣一个国际顾问团，协助制订“国防规划”。汪提出，顾问团有一半是日本人，另一半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其目的显然是设法把日本对他新政权军队的控制减少到最低限度。所有的顾问只向军事机关和军事学校派遣。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各级部队派遣外国专家，但如果

经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派遣，而且外国专家们又不插手部队人事问题的情况下，专家们去巡视各部队则是可以接受的。最后，汪提出了如何对待“归顺”的军队，即宣布效忠新政府的中国军队的问题。汪要求，一旦在某一地区有“归顺”的军队，日本人就撤走自己的部队，把防区控制权移交给中国军队。

他解释道，那怕只有一“部分”日本人愿意执行这样一种政策，那就会“对把部队拉过来”参加他的事业产生“巨大影响”。[32]看来，这个问题又是对日本人是否有诚意的一次考验。

对汪的建议的最初反应，几乎完全是否定的。《新关系方针》设想的是，只有日本顾问才能在建立反共的永久防御中起作用，任何第三国的干预都是不能允许的。至于向野战部队指派日在顾问的问题，梅机关感到中方的愿望可以“作为一个一般原则”予以照办，但仍暗示，派遣日本军事顾问到有些“特别关键的地区”和“特定部队”恐怕还是有好处的。中方的答复是相当可怜的：“你们能否说明一下什么是‘特别关键的地区’和‘特定部队’呢？”[33]

在愚园路会议上，中国方面转到批评日本计划在中国领土驻军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共同防共”的问题，而日本的计划，则几乎使永久驻军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合法化了。看起来，中国人在会上情愿让蒙疆遭受永久驻军的命运。到当时为止，由于日本一再强调蒙疆必定要成为满洲国的附庸，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要跟他们作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但是，华北却是另一码事。一九三八年的重光堂会议同意帝国陆军的反共部队有权驻扎在“平津走廊”，但在一年之后，日本方面竟把那个相当确切的限制取消了，要求有权在华北“各要地”驻军。当周佛海对这种改变提出疑问时，影佐仅仅这样答道，在过去的一年中形势改变了，中国红军部队已经遍布华北。梅思平说，这项新的要求是个“意外的打击”。陶希圣指出，中国方面从来没有把近卫的“防共”理解为要求日本人在中国领土驻军，也许只有蒙疆除外。陶对影佐说，不管日本是多么地想使在中国驻军合法化，“中国民众都会认为它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会使我们退回到三年以前的境地”。周接着说，假如日方可以用“形势改变”为理由，说明她的要求是有道理的话，那么他看不出日方要求的逐步升级会有个完。他提醒影佐，共产党的新四军最近已在长江以南出现。周问道：“那末说。难道这就意味着也得在长江以南驻扎反共军队吗？”周气愤地对影佐说，“如果你们硬要用‘形势改变’为理由，来证明你们改变对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那可就会没完没了啦！”。[34]

日方在愚园路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中，允许反共部队驻在中国的规定，

跟允许日军在和平和秩序恢复之前可留驻在任何有些必要的地方的规定，是放在同一条款之内的。这使中国人特别恼怒。他们恐怕反共驻军会成为蒙疆和华北生活中的丑恶的、永久的事实，因为不可能说服日本人对这种驻军规定任何时间限制。如今，日方在同一条款中又提出要在中国其他部分驻军——并非作为反共驻军，而只是作为治安部队。中国人说，把这两个问题并列在同一条款中，不可避免地暗示日方打算——以这一个或另一个借口——搞到任意在全中国各地驻军的权利。

周坚持说，难道不可能至少把这两个问题在条约中分开，把无限期的反共驻军规定列为一条，把有可能规定限期的、维持“国内秩序”的驻军列为另一条，影佐直率地说，“这些条款无论搁在那里，都是要保密的，因此，民众是决不会晓得的”。周反驳道，“当然，它们都得保密。但民众会看得见军队，那总得有人去解释解释呀！”影佐答道，中国人不该把这种驻军跟那种驻军分得那么清楚嘛。他以常有的坦率说道：反共驻军不一定就是永远留驻，“维持和平的部队留驻的时间也不一定就那么短”。[35]

对此，梅仍不罢休。他说，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听起来“维持和平”一词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味很强烈。这条规定是针对中国的；而反共防御的建议，则大概是针对苏联的。谈到这里，影佐似乎不再有耐心了，无论如何，他对他的中国同事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他尖刻地答道：

> 和平当然好，那是一回事。但是，要信任直到昨天还在打我们的中国军队，那是另一回事。在我们能够诚挚地进行合作之前，还得花费很多的努力和时间。如果我们为了不干涉中国内政而把日本立即撤军作为一条绝对原则的话；那么，流了这么多的血全都是为了什么？日本的民众就会这么说的。当你谈到干涉时，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们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战争结束了，就完全信任中国军队。所以我们还得让维持和平的部队留驻一个时期，那不算是干涉。[36]

当这个坦率的解释仍不能打动中国人时，影佐采取另一种策略，把之所以需要一支维持和平部队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自己头上：“你们经常说，一旦汪运动搞起来，军队就会归顺，运动就会有真正的军事力量。然而，从当前看来，情况不象是这样。有影响的人士已经强烈批评汪不能号召军队。局势既然如此，目前日本乃不得不承担起比去年所设想的更多的责任来[在军事上]加强你们。”[37]汪没有从难于驾驭的军阀将领那儿搞到军事支持，结果害了自己。一旦影佐击中了汪记运动脆弱结构中的要害，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好反驳的了。

同时，汪集团在愚园路会议上，也赢得了一点主要的东西。经过在上海和在东京参谋本部多次争辩之后，日本方面最后同意了分阶段撤回维持和平的部队，撤军从恢复和平以后开始，“在两年内”撤完，“在这段期间，中国负责保证维持国内的秩序”。[38]

汪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与板垣的会谈中，曾经同意让华北实行高度自治，因为日本打算维持并扩大她自一九三五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来在华北拥有的特殊经济、军事地位，这一点是明摆着的。实际上留给愚园路会议谈判者去决定的，只是华北究竟享有多大的独立性，以及它的疆界怎么划定的问题。在作为影佐谈判指导方针的兴亚院计划中，涉及华北的那一部分条款是最苛刻的部分之一。犬养回忆说，当他看到兴亚院要求让华北在实质上独立时，他自己的想法是：“恐怕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傀儡政权”会接受这样的条款。[39]

汪的整个和平纲领的最核心的一点是：只要日本同意尊重中国对自己的全部国土拥有主权，中国人就能实现体面的一和平。在他叛离重庆时，他曾向中国民众保证，他对近卫“三原则”的理解，使他深信日本在这方面有诚意；一年之后，他在公开呼吁中一再强调，他跟日本领导人的讨论已经证实并加深了那种信念。因此，他迫切地需要一纸证明，来向中国民众交待：他的新政府是能真正控制华北的。日本要是同意给他以这一纸证明的话，他无疑是能获得公众的充分尊敬和支持的，因为人们会认为他在消除引起中日战争的最大的根源方面立了功。可以肯定，汪的威信提高之后，对日本也有好处，同时汪政权——以及东亚新秩序——的全部历史，本来也都有可能因而改观。

可是日本并没有给汪所需要的证明，这对汪来说是很不幸的。十二月三十日的协议规定，他的中央政府在华北只能有象征性的权力。与此同时，日本将在那儿享有特殊的经济和军事特权；从汪的观点看来，更糟的是，要是在这些特权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日本用不着同汪的政府打交道，而是同华北政务委员会去解决分歧。这个华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个新机构，而骨子里却只是临时政府这个傀儡组织稍加伪装的变种。汪设法尽可能挽回一点面子。他期望日本承认他的政府有权任命该委员会的成员，有权否决它的决议，并有权决定华北的财政政策。但日本对这三项要求的答复，都是一个不字。

最能说明日本决心建立一个独立的华北的事例是，她采取了措施，保证拟议中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财政方面的完全独立。将从中国的关税、盐税以及消费税中拨数目比较大的；固定份额——实质上等于华北的全部现金收人——给该委员会支配。汪只能跟日方谈判代表讨论多拨或少拨百分

之几的问题。此外，还允许该委员会发行公债，而北平傀儡管理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则可继续进行金融活动，包括发行钞票。对汪来说，这样把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力加以取消，简直是件太丢脸的事情。但重要得多的是，它造成了很大的实际问题。（不过，透过这一切来看，我们应该记得，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在芦沟桥事变前几年。中国才刚刚开始采取初步的措施，去改变各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搞自治的局面。）

十二月三十日协议对日本为华北设想的自治化作了另一些说明。华北政务委员会将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拥有专属的权力：共同防御，特别是涉及防共以及在华北维持秩序方面的问题；由于日本在华北驻军所产生的一切问题；关于给予日本开发地下资源的特殊便利的一切问题；合理地供应日本、满洲国、蒙疆和华北所需的原料问题；以及实际上所有涉及该地区的交通、运输设施等方面的问题。[40]

最后，华北政务委员会将有权建立自己的军队——一支所谓“绥靖军”，同时，整个新民会组织机构将在半官方的水平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以便日后组成一支反对汪的纲领的力量。后来，在汪就职后第一次华北之行时，《新民报》通过刊载一篇痛斥汪以及汪企图复兴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声明，从而制造了一次耸人听闻的事件。声明最后说：“汪答应要组成一个正直的政府，但这是吹牛；他心中毫无半点诚意。”[41]同这种情况相类似，当汪继续前往内蒙古首府时，德王想尽办法无视汪的存在，拒绝在正式的机场欢迎仪式上会见他，也没有按照一般礼仪对汪进行回访。[42]

汪仅仅在华北地区的地理区划的问题上，从对方获得了某些让步。兴亚院原来的计划，要求华北包括“[一九三八年以前的] 黄河故道以北的河南省一部分”，以及横贯东西的重要的陇海铁路（它正好在黄河以南）。如果同华北方面军当时提出的华北疆界方案相比，兴亚院方案对华北的理解的确还算相当厚道的。根据前一方案，华北的疆界朝南伸得更远，直至包括“安徽和浙江*的部分地方”，即包括长江流域在内。[43]在愚园路会议的过程中；周佛海——这位“妥协大师”——直截了当地声明，在兴亚院给华北划的、不现实的疆界问题上，毫无妥协的余地。最后，影佐让步了，正式划定华北指“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北至（并包括）长城，连同山东省”。

华北只是日本在愚园路会议上要求特权的几个地区之一。其他有关地区是蒙疆、上海、厦门和海南（岛）。汪被迫承认蒙疆具有一种“特殊性质，是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之间国防与经济合作密切有关的地带”，从而必须享有“高度的自治”。兴亚院原来关于蒙疆的建议，除了极其含糊地暗示这个

---

* 浙江恐系江苏之误。——译者注

地区将留在中央政府主权统治下一点外，把其他规定都删掉了。不过，在愚园路会议上，汪集团却设法从影佐那里获得了保证，规定蒙疆政权权力的确切范围将根据中央政府制订的规章来确定。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个空洞的胜利，因为在紧接其后的条款中，中国人又答应在制定这项规章之前必须先与日本磋商。[44]

因为兴亚院把长江下游看作是中、日之间“经济合作特别密切的地带”，上海的控制权当然不会全部交给汪的新中央政府。兴亚院要求继续保留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来就已建立的“大道市政府”在事实上的自治地位。要求汪政府通过顾问与“联络人员”，跟“新上海”的行政机构密切合作，使汪政府能在有关城市建设、长江航运、民航以及一般财政、经济事务等问题上，同日本进行最充分的合作。

中方人员在愚园路会议上，激烈反对日本企图把上海和长江下游从新中央政府的控制下搞走的主张。周佛海、陶希圣和梅思平反复地迫使影佐解释，为什么日方坚持要单把长江下游划出来，作为一个“特殊地带”或“加强经济合作地区”。

他们问道，汪已经同意同日本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适用于全中国，这难道还不够，陶对他的日本同事说，“当你们不断增加这些关于长江下游的特别条款，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你们对于中国的这一部分具有某种不可告人的野心。”陶给影佐讲了近代的中国历史；他指出，长江下游是中国经济上最重要的部分。重要的金融界巨头全都集中于这个地区，它是决定汪的新政府成败的地区。“假如长江下游的金融巨头反对我们，那就等于说在［汪］政府的心脏地区出现了一股反对势力，这样一来政府就会被削弱。”陶又说，此外，日本这样做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西方大国很可能把日本要求在长江下游得到特殊权利的做法解释成为：这是日本有意独占中国这一部分经济利益的证据。陶评论说，日本跟维新政府过去的关系表明，情况就是如此。[45]跟往常一样，对于日本有可能与西方大国发生冲突的危险这件事，中国人仿佛比日本人自己还要更为关心。

影佐对于陶的多余的演说感到生气，他气愤地说道，“听起来，你好象想把整个长江下游的问题从我们的讨论中一笔勾销。我不能不对你的动机表示某些怀疑。”他坚持说，日本并不想在长江下游的经济生活中把其他国家都撵走。“然而，事变前的情况是，中国愿意同任何国家合作，只有日本除外。今天我们只是想要纠正这种局面而已。”[46]

没有必要去谈愚园路会议关于上海问题达成最后协议的复杂细节。只要提一提以下事例就行了：汪在受围攻之后，不得不同意在许多经济活动方面，甚至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都要跟日本人“事

先商量”。为了保证那种“合作”，上海市政府将在其社会福利、教育和警察等部门中，聘用日本联络人员。[47]

厦门市在战略上地处面对台湾的海峡，日本跟它的关系打算搞得甚至比跟上海的关系还要密切。按一九三九年六月兴亚院的计划，“厦门特别市政府”几乎得完全听命于日本官员；市长的任免要呈送日本高级专员批准；市议会的半数成员应为日本人；只要市议会的日本议员提出要求，警察局的正、副局长都可以是日本人；为了保证全面控制，兴亚院厦门办事处主任对市政府处理的一切“重要问题”都具有否决权。此外，任何重要的企业都得合营。看来兴亚院是在打算把一个日本作家的梦想成为现实；这个作家考虑到厦门对于日本的战略意义时，曾写道：“从非常实际的意义上着眼，必须把厦门看成是日本领土台湾的一个延伸部分。”[48]尽管兴亚院关于厦门的。一些最令人难堪的要求受到了愚园路谈判代表们的反对，但是保留下来的条款也还足以保证使这个城市变为一个“具有日本人控制下的特别情调”的城市。[49]

海南岛是一个特别刺激参加愚园路会议的中方代表的问题，因为它甚至在一年前重光堂会议的议程上都没有的。然而，自那以后，以夺取东南亚英、法属地为目标的“南进”战略，已开始在东京海军省的机关内具体化了。如果没有海军航空基地和海军船坞，“南进”战略显然是搞不成的；于是海军就坚决要求兴亚院说服汪，实际上要汪允许将这个岛屿变成日本的海军基地。

看来影佐总的说来是不赞成海军的“南进”战略的，对海军关于海南岛的要求尤其反对。[50]结果，海军解除了他谈判这个问题的责任；命令它在梅机关的代表，特别熟悉中国沿海情况的、年高德助的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去直接谈判这个问题。影佐竟相当莫明其妙地向汪透露，海军之所以派“这个老头子”来谈判海南岛问题，是由于它对海南岛的要求“连表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都没有”；于是就想利用这位温厚和蔼、以喜欢汪出名的须贺，以他个人的影响来说服中方。由于周佛海不愿与须贸谈判，免得在谈判中因为言词粗鲁而冒犯这位“神一般的老人”以致触怒老天爷，[51]后来这个任务就派给了陈公博。

在为期六天的谈判会议中，中国方面再一次表达了它对于南进战略的危险性的深切关怀，因为这战略会触发一场跟英国、而最后则是跟美国的战争。[52]陈（以及汪记运动中的一些其他人）在很多场合下都竭力劝阻日本，不要采取会使日本同西方大国打仗的行动。至少部分是出于这种恐惧，陈下决心拒绝同意须获提出的要求。但是，帝国海军——特别是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山本五十六海军中将——都同样有决心取得海南岛，假如海军

的目的达不到，那就坚决毫不含糊地要搞垮整个汪的合作计划。所以，最后汪命令陈让步，实际上给了日本任意利用海南岛的权利。[53]愚园路协议准备公开发表的那一部分，仅仅规定中央政府将派出全权代表到海南岛以促进日、中之间和谐的合作关系。而协议的一项秘密附件，则具体指出了所谓“合作”是什么意思：日本不仅可以随意驻军、建立海军设施并干一系列其他有关军事需要的事；而且还有权开发海南岛的地下资源。[54]

十一月一日，当影佐宣布开始进行愚园路会议并把兴亚院计划草案全文送交中国方面后，陶希圣马上就扼要地谈了他对这次会议目的的理解。只是因为重庆拒绝了对日和解，所以汪集团才“不可避免地有必要”筹组一个新政府。但这个新政府只是达到某个目的的一种工具。随着会谈的开展，会议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应经常考虑下面这个长远的最高目标：“使重庆政府垮台，才能获致和平。”按陶的看法，会议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汪“获得充分的说服力，去动员中国民众搞垮重庆政府”。这一点要是办不到，全部工作也就完了。[55]

日本根本不给汪以陶所谈到的这种成败所系的“说服力”；她加诸于汪的条件是如此之苛刻，以致几乎准会断送他的和平倡议。从愚园路谈判开始的那一天起，就有灾难临头的预兆。影佐在听了陶的开幕词之后说：“我必须请你重新考虑几点”。影佐说，结束战争并不是日本跟汪合作的最终目标。假若那是她的目标，她就会满足于恢复到战前状况。日本的目标，事实上是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保卫东亚［免于赤化］”。[56]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日本才提出了她对加强合作和共同防御的特殊地带的要求。尽管影佐作了肯定的说明，全体中方谈判人员，特别是陶，仍旧继续对日本的“更大的目标”深表疑惧，整个会谈中一提到特殊地带就象被念了紧箍咒似的。

日本由于抛弃了重光堂会议上的协议而失信于中国方面这一事实，使后来的谈判气氛一直受到败坏。影佐在他的秘密日记中写道：当他发现那份他不得不用来作谈判基础的兴亚院计划中，包含有“不少新条款”，诸如海南岛问题，日本对重要铁道有广泛的管理权，给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大权，扩大永久防共驻军地带，等等，连他自己对此都感到惊异和失望。[57]那么，后来汪阵营感到的幻灭和失望又该会是大多少倍呢；被汪集团十分疏远的高宗武，这时已经很少参加愚园路的正式谈判了；他奇怪地发起诗兴来了，写了一首日本传统形式的小调：[58]

北方，
南方，
高山，

海洋。

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

中国百姓将何处为家，

到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高的诗兴早已烟消云散。就在那一天，参加愚园路会谈的谈判代表们聚集在汪的住处，祝贺新年并签署他们花了两个月辛勤劳动搞出来的协议。高、陶二人都称病，没去参加那个情调低沉的仪式；六天之后，汪记运动的这两位主要奠基人就抛弃了汪。

---

[1]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记录。

[2] 见林三郎的《皇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陆军》第 15 页。

[3]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卷第 80—8l 页；另见胜 • H • 杨的《诺蒙坎事件：日本帝国与苏联》第 93 页。

[4]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14 页，引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5] 同上。

[6]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317 页。

[7] 见影佐祯昭的《漫谈》第 378 页。

[8] 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319 页，影佐的《漫谈》第 378 页。

[9] 访问清水董三的谈话记录。

[10] 见影佐的《漫谈》第 377 页。

[11] 同上。

[12]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99 页。

[13] 十二月三十日文件的正式名称是《调整日支新关系会议文件》，收录在《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86—295 页。

[14] 见梨本祐平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第 125—127 页。

[15]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282 页。

[16] 陶希圣叙述了在愚园路会议中汪精卫“决定”中断谈判后，影佐仍说服汪继续进行谈判。见《乱流》第 172—173 页。

[17]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273 页和影佐的《漫谈》第 379 页。

[18] 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319—320 页。

[19]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249—315 页。

[20] 上书第 316—335 页，记述愚园路会谈之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各个重要问题上的换文，计有：中方文件（有汪精卫的序言，日期为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日方的复文（日期为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中方对日方复件的答复（无日期）以及兴亚院对这文件及各复件的评语（日期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

[21] 同上书，第 318 页。

[22] 同上。

[23] 同上书，第 319 页。
[24] 同上书，第 320—321 页。
[25] 同上书，第 325—326 页。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同上书，第 264 页。
[29] 同上书，第 265 页。
[30]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87 页。
[31]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254 页。
[32] 同上书，第 322—325 页。
[33] 同上书，第 324 页。
[34] 同上书，第 259 页。
[35] 同上书，第 257—258 页。
[36] 同上书，第 258 页。
[37] 同上书，第 259 页。
[38]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87 页。
[39]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267 页。
[40]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88 页。
[41] 见奈•施泰格尔的《日本无法结束僵局》（载《时事报》第七期）第 466—467 页。
[42] 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 20—21 页。
[4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15 页。
[44]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89 页。
[45]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253—254 页。
[46] 同上书，第 254 页。
[47]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90—291 页。
[48] 见绪方界的《兴亚院联络部及其四长官》（载一九三九年《改造》四月号）第 296 页。
[49]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20—221 页。
[5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278 页。
[51] 同上书，第 280 页。
[52] 须贺与陈的会谈记录，收录在《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302—315 页。
[5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278—280 页。
[54]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294 页。
[55]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251252 页。
[56] 同上书，第 252 页。
[57] 见影佐的《漫谈》第 376 页。
[58] 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267 页引了这首诗。

第十四章 “为蒋留下的一席盛宴”

在愚园路会谈之前几个月，高、陶二人就已经开始不信任影佐了。高现在把他看成“只不过是另一个土肥原罢了”。他们都提醒汪切勿信任这位大佐；两人都劝汪不要签署愚园路协议。他们也开始察觉到，日本人对他们的疑心已经达到可以危及他们性命的程度。陶从友人处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控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务机关、著名的“七十六号”〔因它设于上海极司菲而路（现名为万航渡路。——译者注）七十六号而得名〕，已经打算要杀害他和高了，因而他们都设法逃出上海。[1]

把他们从“七十六号”手中救出来的主使人，是上海地下帮会头子杜月笙。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杜的错综复杂的形象，使傅曼竹*同他一比起来都显得象个圣人一般。[2]在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和复杂的性格方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最大的城市的那些流氓头，都根本无法同上海的这个土霸王相比。杜是水果摊贩出身，但他从上海老家的青帮†组织层层向上爬，成为这个城市的头号匪徒。他把持着赌场、妓院、麻醉毒品，并庇护敲诈勒索；在这个城市，这些行当是很有油水可捞的。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的武装打手帮助蒋介石把上海的左翼工会和左翼学生连根拔掉之后，他才爬上政坛，有了权势和威望。由于杜在把上海“移交”给蒋（人们普遍相信他早年曾是青帮成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上海的西方企业界将他捧为名人，蒋给他授勋，还选拔他担任各种公众组织、医院、学校、银行等等的显要职务。

对于暴发的社会名人认识迟钝的《大英人名辞典》，到一九三三年才第一次把杜的名字收进去，当时把他称为“著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如果骂他的人没有骂错的话，他那擅长于利用他慈善家和社会公仆的地位去干穷凶极恶的事，就是他的才干最出众的表现。例如：作为禁烟局的成员，他却扩大了他对于毒品销售网的控制，使这项买卖空前兴隆起来。作为中国红十字会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他又从医药供应中大牟其利——有一个时期，军队中疟疾流行，盛传他的仓库里却囤满了奎宁，等到价钱涨足了的时候，

---

* 傅曼竹是美国资产阶级作家为了污辱中国人民，虚构的一个混迹于美国地下社会并颇有能量的中国人。——译者注

† 青帮是几百年来在长江沿岸发展起来的各个秘密会社的上海嫡系。关于这些帮会形形色色的活动情况，哈罗德·艾萨克斯写道：“他们贩卖鸦片和奴隶；他们搞绑票索取赎金；他们干敲诈勒索的买卖和行凶谋杀。从长江口直到四川三峡，几乎个个店家、商人或船主都得给他们纳贡送礼。”（见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 142 页）

才让他的代理人到黑市去抛售。[3]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杜把他的防弹小轿车送给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将军，并把他的总部从法租界杜美路上他的豪华大厦迁往香港。尽管他远离上海，他却仍旧牢牢地遥控着这个城市的地下社会，他特别给他在上海的一万五千名私人队伍分派了某些爱国活动任务。青帮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阻止中国知名人士参加亲日机构，特别是“维新政府”。当这些帮会匪徒不能用贿赂——重庆每月拿出五十万元法币供杜随意使用——来阻止这种叛国行为时，他们就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青帮谋杀了许多亲日分子和汉奸。

高、陶二人跟汪决裂后，就转而向杜求援。杜与高联系后，即飞往重庆去见委员长。蒋当时正在桂林巡视，一听说杜是来汇报有关高宗武的事，就立即赶回陪都，并批准杜协助高逃离上海。[4]一九四〇年元旦，高和陶去周佛海家拜年，高当即明显地暗示周，他将脱离汪阵营。周在他那天的日记里写道，“我们两个人都同意，为了在中国实现和平这同一目标而分头努力。”[5]三天后，高、陶搭上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前往香港，于一月五日到达那儿。

此后十六天里，这两人杳无音讯，他们在九龙被杜手下的人保护起来了。实际上，官方的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跟这些变节者是有联系的，而且他们在一月二十一日交出了愚园路会议上所用的机密文件。同一天，香港《大公报》以通栏标题宣布“惊人揭露”“日汪密约文件”。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高、陶给汪的一份电报也公开发表了。二人在电中宣称，他们对于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在道义上不再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他们已得出结论，日本正策划“要肢解我们的国家，并使我们亡国”。他们恳请汪“悬崖勒马”，放弃他的努力。[6]

这些文件的公布，震撼了整个汪阵营。周佛海很可能从高的暗示中听出马上就会发生叛汪的事，但他大概肯定没有想到高、陶二人会揭露愚园路谈判的内容。他二十二日的日记写道：“高、陶这两头畜牲，我誓要消灭他们。”[7]

汪系报纸很快就指责高、陶因为没有当上官而不满意，并对他们的揭发的真实性加以否认。关于第一项指责，除了他．们在汪政权中大概只能当得上第二流职务可作旁证之外，别无其他根据。陶希圣这个老练的经济专家大概已被内定为宣传部长而不是他意中的工商部长；汪显然早就决定要把那个职位给梅思平。至于高宗武，这个比其他一切人都更有资格被称为汪记运动的前辈人物，是个办理外交事务的权威，但他却被派定在汪夫人的妹夫褚民谊这个糊涂虫的手下，当个外交部次长。[8]褚民谊这个看来不

大可能会是汪所中意的外长人选，虽然从法国大学得过医学和药学的学位，但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工作实践。褚本性温和，同汪在国民政府内是老同事，常年担任典礼方面的职务——如主持庆祝孔子诞辰、比利时一百周年国庆纪念等等。在外国人看来，他是个对体育卫生有特别爱好的怪人而闻名：他是一家通俗卫生杂志的主编，一种练习拳击用的机械人对手的发明人，普及传统的太极拳运动的提倡者，还是一个喜好放风筝的人。[*]假如高的叛汪果真只是由于心怀不满，那看来倒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显然是由于裙带关系，并且也是日后类似情况的先声。例如，广东省实际上成了汪夫人的私房，相继由她的兄弟、侄子统治，到战争末期则由她的妹夫褚当政。[9]

关于对高、陶的第二项指责——说他们揭发的文件不真实——在技术上说倒是不错的。对一个英译本的分析，表明他们揭发的文件是影佐在十一月一日送给汪集团的那份，而不是会议最后产生的文件。因此，该文件对于汪的谈判代表能从影佐那里搞到多少让步条件（例如，关于华北的疆界问题），并未充分加以说明。但是，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文件的公布对于注记运动的名声——如果不是对于实际进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他们揭发出来的许多东西，本想写在未来某项“基本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里永不宣布。这些文件的揭发给了重庆以巨大的宣传胜利。

不消说，高、陶的揭发传到重庆时，全城似乎笼罩在一片欢腾之中。据说，蒋立即给高去了一封信，夸他是“浙江才子”。[10]几个月后，高接到重庆发给的护照，乘船赴美国；从此一直住在那里。到珍珠港事变日本人占领香港之前，陶一直住在香港。他好几次都差一点被日本人抓走了，因为日本人当然是急于想搞掉他的，但他在杜月笙帮助下设法逃离了香港。[11]一九四二年二月，陶重返重庆，参加了委员长侍从室的工作。此后不久，他即开始为蒋的战时著作《中国之命运》收集材料，他也许就是这本书的真正执笔者。一九四三年起，陶加入《中央日报》，先任总编辑，后当社长。自从蒋及其支持者一九四九年迁往台湾后，他一直住在那里。

随着河内后期高的影响在汪阵营中下降以及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的叛汪，所谓周佛海路线就成了汪阵营中的主流了。这时，大多数人都准备同意在中国的日占区内成立一个合作政权的原则。从汪一九三九年五月到达上海起，他马上就发现自己夹在进行斗争的两大敌对势力之间，而且双方都一点也不保护他。一方是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和情报人员（由戴笠指挥），

[*] 埃米莉·哈恩追溯到褚民谊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对雌兔阴道震动的研究》，以证明他是个以怪人出名的人。（见哈恩的《我所知道的中国》第 21 页）

他们与杜月笙的青帮合作。另一方是帝国陆军的特务机关以及它所雇佣的大批中国特务和恐怖分子。我们知道，汪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军事靠山。在一九三九年的上海，他光是为了活命，就必须跟能保护他的人结成联盟。要活下去，并且建立一个总部、罗致党羽、发动报界支持、组织新的政府和政党、以及向那些愿跟他共命运的人提供安全保障，他就必须跟一个有力量同戴笠及杜月笙联合势力相抗衡的集团结成联盟。

日本陆军具备这些条件，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汪还不愿接受被帝国陆军保护的丑名声。曾经传出一个故事，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在这个问题上，汪夫人的决心甚至更大。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当晚，汪留在船上住下，为的是要避开显然已经获悉汪一行人的行踪的《朝日新闻》记者。在这同时，其他人员都被送到市内日本人控制区的重光堂去过夜。这些人大都很欣赏日本人的礼遇，而且对于日本警察巡逻队所提供的保护感到的确相当不错。但是高和汪夫人的想法可不一样。高宣布他不愿住重光堂，要搬到法租界去跟他兄弟一起住，从而引起了影佐的不满。汪夫人公开表示对这种安排不满，她干脆说，如果日本东道主不发给她到法租界去的通行证，那她就打算游过苏州河去（它在日本人控制的虹口区与公共租界之间）。犬养一想到这位“胖老太太”要在半夜里游过浑浊的苏州河这幅图景，就感到可笑；但今井却被汪夫人“强烈的自尊”和避免成为“敌人傀儡”的决心所感动。[12]

既然排除了日本人的公开保护，汪除了发展他自己的保安机构之外别无其他办法；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周佛海。当汪还在河内时，周已经以两个阴险的恶棍为核心，着手建立一个保安系统；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帮助下，这两个恶棍不久就能跟杜月笙相匹敌，成为上海地下社会的两大恶魔。由于李士群和丁默村这两个嗜杀成性的恶棍对于汪记运动的特点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们的背景会是值得的。[13]

一九三九年时，李和丁都是三十多不到四十岁的人。但两人在外形上并不相象；李体形粗扩，肤色黝黑，而丁则面色灰白、虚弱、只有五英尺一英寸高、害肺病。他们都加人共产党而开始其政治生涯；后来二人都抛弃了共产主义，参加了戴笠的主要特务组织之一，说得好听一些的名称是“中央调查统计局”[*]（原文如此，应为“军统”。——译者注）。一九三八

---

[*] 亚洲战时的秘密警察组织，没有一个可以同这个强大和可怕的“局”相比；这个“局”是在蒋直接控制的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巴巴拉·塔奇曼曾把戴笠叫做“中国的希姆莱和胡佛的混合物”（见《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261页）。战时在华的多数美国观察家都很看不起戴；总是把他的警察机构和德国的“盖世太保”相比。虽然他的特务组织本应进行抗日的反间谍活动，但他们却更为积极地从事镇压共产党人及反蒋运动。参阅美国外交官约翰·卡特尔·文森特以及其他人从中国发回有关戴

年左右，李因为从事某种违法行为潜逃香港，以避免受“严厉惩处”。土肥原将军的驻沪特务机关随即网罗了他；尔后不久，重庆派遣他的老上级下去劝诱他回重庆。丁不仅没有成功，连自己都被李说服了去参加土肥原的特务机关。这段历史表明，这两人之所以献身于汪的事业，可以说完全出自个人利益和权宜之计。

一九三九年初，土肥原转赴北平去进行大功尚未告成的“吴佩孚工作计划”。上海特务机关移交给晴气庆胤中佐领导，晴气迅速地帮助李、丁组织了一个由恐怖分子和特务间谍组成的可怕的集团，以上海“三不管”地区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的一幢老式洋房为据点进行活动。对残暴的特务组织并不陌生的今井大佐写道，李和丁“嗜血成性，永远干血腥的勾当”。他说，“七十六号令人毛骨悚然。……使［上海的］一般市民感到胆战心惊”。[14]

周佛海早期在南京时，曾与丁、李交往多年，当时他们三人全是 CC 集团成员，因此周自然要找老同事帮忙。但实际上正如西义显写的，“这不是周去‘降服’李、丁的问题。事实刚刚相反，李、丁正等着把周抓过来。”[15]一九三九年春，汪与周的实力还很软弱，因为既无军事后盾，而财政支持又很少，所以不可能向李、丁发号施令。他们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去恳请七十六号能否帮助汪摆脱困境。结果，汪记运动从此就同七十六号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进出于七十六号警卫森严的大门的则是大批各式各样的恶棍和找官当的政客。

汪也许从来没有去过七十六号，但负责联系李、丁和接见并收罗那些川流不息的登门求职者的主要人物则肯定是周佛海。在这些求职者中，有些人“昨天还在高呼反汪口号”，但现在他们却在汪的和平十字军中找到了个人发展的机会。[16]周能够拉进汪记事业中来的人员，质量都很低劣，这对汪记运动以及后来的汪政府实质上成了七十六号的同义语至少有一部分关系。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汪政权中缺少有才能的、忠诚的、爱国的官员，既是汪自己陷于失望的缘故，也刺激了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在愚园路会谈时，影佐责骂周和其他中国人说，“你们同胞的眼睛在盯着你们哩！”影佐继续说，汪的追随者在重庆时曾致力于和平运动，但他们一到上海态度就变了。现在他们一心只想捞个一官半职。他申斥道，“汪政府总得是个

将军的电报（载《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的中国部分索引中戴笠条目下）。战时与戴密切合作过的海军中将梅乐斯所著的《一种不同的战争》一书，则对他大加吹捧。梅乐斯在哀悼戴（死于一九四六年）时曾写道：“许多非常熟悉中国的人曾经说过，假使戴笠没死，也许中国就丢不了。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以前就打败过共产党人，现在也有可能再打赢一次。”（见上书第 576 页）梅乐斯之吹捧戴，可见一斑。

比职业介绍所更好一点的机关呀！”[17]

七十六号设法维持的恐怖平衡，使上海变成一个搞报复和反报复的鬼地方。《圣经》上关于“以眼还眼”的说法，到了上海就变成“以银行家还银行家，以主编还主编”。这里稍谈一下受恐怖分子们袭击的这两类主要对象。往往每当重庆的青帮或蓝衣社分子杀死一个亲汪的银行家，七十六号就立刻干掉一个亲重庆的银行家，同时确实还扣留了一批不幸的人质，把他们关在七十六号的地牢里作为候补。然而，也有些被李、丁抓去的人能设法保全他们自己。有个十分熟悉这所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的人写道：“被七十六号抓去的人，通常是被枪毙或自杀，但要是你投降了，你就会在政府中得到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18]那些家里很有钱并且愿付巨额赎金的人，有时也能赎回自由。例如，曾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受教育并曾任蒋政权财政部官员的徐佳斌（译音），当他家里交出了全部财产——三十万美元之后，他就被释放了。事后，徐对一个美国友人说，抓他的人对他讲，只要他当上了汪所建立的国家银行系统的官，很快就能捞回他的财产。[19]

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分子陈恭澍投降了七十六号之后，考虑到“个人的发展”，写了一部揭露的书《蓝衣社内幕》作为报答。被他点到名字的人中，有国民党驻沪地下人员的重要领导人物吴开先和蒋伯诚。他们终于被日本秘密警察抓住，并移交给了七十六号。算他们运气好，重庆说服周佛海释放了这两个囚犯。[20]这只是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中的一件，它说明上海的恐怖统治并非总是象乍一看起来那么野蛮和不受管束。尽管有不少汪的追随者在恐怖事件中被谋杀了，但汪集团的高级官员中却没有一人遭过殃。

七十六号在乌烟瘴气下，小组织纷争和派系倾轧大量滋长，这也损害了汪阵营的公开形象和一般道德名声、我们知道，汪迫切需要军事支持。有一个名叫何天峰的将军是最早投奔汪的将领之一；但汪对何的这次归附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在一九三九年圣诞夜间何就被枪杀在“三不管地带”的一家夜总会里，刺客就是他的十八个保镖中的一个。此人虽然很可能是重庆收买过去的，但盛传何跟七十六号的某人发生了“利益仲突”。何的部队后来被当过司机的丁锡山接管了过去。丁锡山在七十六号的任务是驾汽车在上海到处跑，到七十六号所控制的无数赌窟去收集赃款以及抓政治犯，“在汪政权初期，差不多每一个对汪不满的人都是被丁锡山或吴世宝抓起来的。”[21]吴是七十六号的另一干将，也当过司机——事实上，他当过一个时期公共租界工部局美国公董的司机。由于有市政府车库的门路，他从汽油、轮胎的配给中大赚其钱。他也从事各种敲诈勒索活动，成了一个“脑满肠肥、踌躇满志”的人物。汪政权组成时，吴参加了七十六号，成了“警察”官员，并在那里爬上了相当有权势的地位。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了

吴的作风：

> 他的习惯是在傍晚时带犯人出去散步，最后走到高墙深院的一个角落，那儿有几个刚填上土的坟墓。然后吴把手亲切地搭到受害者肩膀上，告诉他参加傀儡政权、或者捐出一笔大款子去支持这个政权所能够得到的好处。他几乎没有必要指出拒绝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22]

这两个前司机在七十六号的发迹是短命的。一九四一年，汪注意到丁锡山的犯罪活动，乃下令将他扣押；但后来不久他就越狱逃往内地去参加国民党了。吴在七十六号向上爬得太快，抓权大多，到了一九四一年，他的事业就猝然结束。当七十六号与周佛海之间对于流入七十六号的款项如何分配的问题发生一场争吵时，吴世宝不仅丢了他“警备队长”的官，而且还送了命。在他被解职后不久，七十六号的第二把手李士群就把他毒死了。

为了把对七十六号内部自相残杀、互相倾轧的讨论告一段落，让我们来看看李士群一生的最后一章。[*]周佛海由于任命了他的一个亲信负责一个油水很大的政府企业——它主管把上海海关税收解往汪政权的国库——而跟李结了仇。不久，一家同李这一派有关系的报纸就登出了一篇社论，攻击汪政权领导人物（包括周佛海）的腐化生活。周给李打电话。李说，他对此事不负任何责任；又说，这是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的事情。虽然周无法确定这件事一定跟李有关，但他们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越来越坏。此后不久，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同村少佐请李到他家里去吃了一顿日本叫做“带馅饼”的美味点心。他回家不久，浑身就发肿、变紫，一直“汗如雨下”，二十四小时之后，放了毒药的“带馅饼”毒性大发，让死亡结束了他的痛苦。[†]

---

[*] 译者按：关于李士群的结局，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第 63—71 页有详细的叙述，主要是因为李士群在在伪政权中，与周佛海明争暗斗，也不肯归附戴笠的军统。戴笠便决心除掉他，乃命周佛海执行，周假日本人之手把他毒死。

[†]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31—32 章。七十六号的副头目丁默村多次逃脱重庆特务的暗算而保住了性命。最惊人的一次牵涉到他的不到二十岁的情妇郑苹菊（译音），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据信郑小姐是忠于她母亲一方的；实际上，重庆也收买了她，把她变成一个双料特务。她把丁诱进上海一处设有埋伏的地方，可是他还是设法逃了命。这位富有同情心但很不谨慎的郑小姐却很不幸，她暴露了自己的复杂身份，因为她在丁的口袋里放了她的名片，上边写着祈求她的情人平静归天的一段佛教祈祷文。根据丁的命令，她被带到一个墓穴边枪毙了，并且还拍了照片。拍摄叛变者的尸体，是上海恐怖战中双方都用来宣传反间谍技术成就的一种方法。（见犬养的《扬

高、陶的叛汪和七十六号的恶行，激怒了汪阵营并使之士气不振；但它已陷得太深，无法改变它的进程了。除非重庆对日本的和平条件认真地表示有兴趣，这种趋势才能扭转过来。当东京在注视重庆发出的信息时，梅机关搞了一次汪与各傀儡政权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使汪记运动朝着“还都”的目标更进一步。会议于一月二十三日在青岛开幕。一九三九年六月五大臣关于新政府中要包括吴佩孚在内的指示，由于吴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突然死去而被取消了；五大臣原来要汪先证明他能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人士背叛重庆然后再支持汪的有关决定，经过了这几个月，也悄悄地无人再提了。

上次（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南京举行）的汪、王、梁会谈出现的争吵气氛，到青岛会议时已经不再存在了。愚园路会议所作的安排，对于这三个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帝国陆军发起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还不是完全令他们满意的。青岛会议只就维新政府如何并入汪的新政权的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例如，梁为监察院院长），并为临时政府换了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新招牌，其他照旧。[23]

青岛会议为建立汪政府清除了最后的显著障碍，汪的发言人甚至迫不及待地宣布新政权即将诞生。然而，在青岛的讨论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东京的主要注意力已转向开始暗示对和谈感兴趣的重庆方面了。且不论东京是多么亲热地在公开场合夸耀自己的未婚妻，但它私下对于是否同汪政权结婚还是犹豫不决。虽然蒋介石被东京骂得一塌糊涂，但他毕竟还是更为迷人的伴侣。与此同时，大约从一九三九年八月以来，特别是八月底“正统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汪集团与重庆之间的关系大为恶化，使汪充当通向重庆的桥梁的任何希望都化为泡影了。

汪在报界的支持者早已准备大露一手，为扩大跟重庆的裂隙作出贡献。上海《南华日报》主笔林柏生剥下蒋政权的伪装，指出它正在干它称汪所干的大逆不道的事情，那就是说蒋也在谋求谈判和平解决。林斥责道，重庆和汪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重庆是偷偷摸摸地追求它的目标，而汪则直接把和平问题公诸于世。林认为，汪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一个立宪政府要决定和、战这类国家大事，就应当把关系国家生存的问题提交民众或立宪机构来公断。林写道，正当的政府绝不应该“不让民众议论”，不应该搞“敢于偶语［和平］者弃市”。他本人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宣布拥护汪以后，就曾被残暴地刺伤，眼睛挨了一枪。[24]林除了批评重庆压制和谈之外，还

子江仍在奔流》第 237—252 页；今井的《昭和阴谋》第 135—137 页）

就蒋被公认“受共党支配”的问题大做文章，实际上暗示被人操纵的是蒋而不是汪：

> 近年来，莫斯科显然热中于使中、日保持不和；因此，直到目前为止，它的一切努力都是直接反对任何和解的。因此，中共也是反对一切和平努力的。请看这些先生们是多么顺从莫斯科：紧接着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就声明德国不再是中国的死敌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莫斯科由反德变为亲德，中共也就跟着干。斯大林说，“转”，我们全都转！
>
> 日苏之间于九月十五日签订的诺蒙坎协议表明，在长期的日俄纷争中，中国一直被俄国当成卒子来使，这一点是更加清楚了。一旦莫斯科认为同东京讲和有利，重庆就被抛在一边了。人们不禁要问；最后共产党会不会把日本同德国一样都当成中国的朋友呢？
>
> 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蒋介石将军不管是否明智，都一直在玩莫斯科的那一套把戏。正因为共党对于委员长的这种控制，而他们自己则按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结果使得中国的利益附属于俄国；所以这才促使汪先生跟重庆决裂。无论“反共公约”是否存在，它跟这种局势都是毫不相干的，并且对汪先生的地位和论点也毫无影响。无论现在共党是粉红、深红或者不红，也都没有关系。他们仍然是依附莫斯科，一旦得到机会，他们就要使国家布尔什维克化并且附属于苏俄。他们是现代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最能干的买办。[25]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汪自己也在加紧攻击蒋本人及其政策。他八月在广东的一次讲话中，抨击蒋“对自己的个人利益看得比民族利益重得多”。汪声称，蒋在西安“把国家奉送给了共党和第三国际，作为保他一条命的报答”。[26]一九三九年双十节，汪把蒋描绘成“一个自命不凡的独裁者，［此人］甚至连做一个普通人的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品质都没有。”[27]从汪这方面讲，这倒不仅只是诽谤的逐步升级，而是根据孔夫子关于一个恶毒暴君必然丧尽人心的教导而进行的自我辩护。汪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因此，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推翻个人独裁，纯洁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机构。”[28]

尽管汪在加强他跟国民政府的论战，但他讲话中一直坚持不变的主题依旧是他所谓“和平和全国统一”。有些人说，由于抗战的结果，中国正在迅速实现长期以来一直在追求的全国统一的目标。为了回答这些人，汪写道：

我强烈地反对这种论调。自有史以来直到今天，当政者总是以维持国内和平以求抵御外侮为己任，而不是从事对外战争以求维持国内和平。打一场对外战争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此我们怎能把它作为实现国内和平的手段呢？中国现在进行抗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她国家独立的地位；她并不只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而打仗的。我坚决反对利用抗战作为统一国家的手段。况且，正如今天的现实情况那样，主张和平决不会对中国的统一有丝毫损害；而不主张和平倒不一定能够防止统一战线的破裂。[29]

汪为了捍卫他的和平政策，并没有硬说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完美无缺的，而只是主张要设法制止“循环报复”。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他所谓“循环报复”的意思：

例如，日本说；“中国人仇视日本是沈阳事件的起因。”中国说：“中国人仇视日本是日本侵略造成的。” 日本说；“要改善中日关系，中国就必须先放弃‘以夷制夷’的政策。”中国说：“要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就必须先放弃侵华政策。”如此等等。他们都责怪对方，都希望另一方首先改善态度。这只能促使局势恶化。[30]

“桐工作计划”

随着重庆与汪之间的仇隙日益扩大，而且用汪充当通往重庆的桥梁的可能性又在沪、渝互相攻许中化为乌有，于是日本人着手探索一系列新的行动，想绕过汪而跟重庆直接重开谈判。一九四〇年初，这些行动之一显得颇有希望，致使汪政权的建立被推迟达数月之久。甚至在汪政权于一九四〇年三月成立之后，日本也还拖了六个多月没有正式承认它，为的就是要让这次谋求通向重庆的新秘密外交途径的审慎探索得以进行下去。和汪最亲近的日本支持者，特别是梅机关集团，曾经正确地估计到有些途径是走不通的，因为打开这些途径是重庆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阻止日、汪实现东亚新秩序。然而，除了这些忠诚的人士之外，只有少数几个日本人是宁愿冒着有可能危及跟重庆和解的风险而过早地与汪结成联盟的。况且，尽管我们今天知道海机关正确地看到了重庆对和谈的兴趣至少有一部分是假的，但在当时谁也不能肯定重庆是有诚意（还是没有诚意）

的。的确，时至今日也仍然不可能肯定，究竟这些和平努力中最有希望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是纯属骗局，还是重庆方面的一次有诚意的和平行动。31

“桐工作计划”是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一系列谈判的代号。这桩神秘的事情，是从铃木卓尔中佐在香港碰到一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宋子文和宋美龄（蒋介石夫人）的兄弟——开始的，当时铃木正在香港执行情报任务。关于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按理说帝国陆军的情报档案中是应该有大量资料的，可是档案却十分不完备。等到把资料匆促地汇集起来时，才知道宋在三年多以前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后来到香港任西南运输公司经理。每当蒋夫人经常为了治病或为了摆脱战时重庆的艰苦生活来香港疗养时，宋氏一家人——包括宋子良在内——总是要在沙逊路孔祥熙夫人（宋霭龄）的家里聚会一番。当铃木在思想上对于这条直接通向重庆最高当局的途径的全部潜在价值有了定见之后，他就找今井大佐跟他一起干。一九四〇年二月，今井大佐以“南满铁路的佐藤先生”的化名身份到了香港，准备跟蒋介石的内弟进行第一次会面。

在初次见面时，今井就敏锐地察觉到，他不能确信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宋子良。这个陌生人看起来约四十岁上下，五英尺二、三英寸高，似乎文质彬彬，颇有风度，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偶尔也抽支雪茄。今井说，可惜他无法找个认识宋子良的人去查对一下相貌是否相符。把铃木介绍给宋子良的人是一个名叫张志平（译音）的记者，他一度为冀东傀儡政权做过事，自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良是同班同学。今井在冀东时就认识了张志平——但是这个人可靠吗，

今井带着这些印象返回东京，但上级批准他继续进行“桐工作计划”，尽管有可能受骗。一九四〇年三月，经过周密的安全布置后，在香港某中国商行二楼，开始了认真的会谈。偶尔会谈也改在澳门一所房屋的、点着腊烛的地下室内举行——“它使我想起德川幕府时代的一些事情”，今井回忆道。[32]每天晚上从九点开始，有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今井和两个助手（臼井茂树大佐和板田诚盛）跟中国的代表团一起开会，这时中方代表包括蒋的军事总部派来的陈兆林（译音）将军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主任秘书张玉山（译音）。会上主要发言人是张，但他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听陈的。宋不过“当个中间人”。

日本当局对于全部中方参加者都保持严密监视，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中国谍报员协助下，他们发现，无论散会散得多么晚，中方代表都马上聚集在一起商量很久，然后派遣一个联络人员到机场去。有一架飞机经常在半夜里飞往重庆。

另一件使今井相信他的确是与重庆联系上了的事情是，香港报纸透露蒋夫人当时也正在香港，从幕后支持着某种和谈。

谈判顺利地进行了一些日子，所碰到的唯一障碍是今井的一个对头和智高次少将制造的。和智用向上海报界泄露和谈在进行的手法，企图破坏和谈。日本方面经过会谈弄清了许多事情。首先，重庆明确表示它绝不考虑跟汪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据说蒋政权对美日关系恶化感到欣慰，并且认为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看来准备要支持汪政权了。重庆坚持指出，假如日本要和平，她就必须认识到日本在华北驻军是“绝对不行的”。此外，日本还必须了解，关于承认“满洲国”的要求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此这个要求“在目前”必须不提。今井写道，由于汪自己早已同意承认满洲国，所以日本政府“在满洲国问题上的态度倒是变得有些无所谓了”。“我们并不认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会对和平造成多大的障碍，因此当我们了解到重庆的真实感情时反倒觉得非常惊讶”。[33]

当会谈到了这个阶段时，筹建汪政府的计划已经进行到定好三月二十六日为庆祝“国民党还都”南京的纪念日的程度了。然而，由于“桐工作计划”的前景大有希望，所以当重庆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去解决承认满洲国问题时，兴亚院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都要求东京把就职典礼延期至四月十五日举行。东京当时怀疑重庆没有诚意，也许重庆只对使汪下不来台感兴趣（到这时，日本还一直没有对汪作出任何解释，为什么他的新政权成立大典被一再延期），因此只肯给国民政府四天的时间去考虑。假如三月三十日仍得不到重庆的答复，汪政权的成立典礼即将在是日举行。后来，重庆并没有答复。

一九四〇年五月，“桐工作计划”谈判重新开始。两位主要的中方谈判代表随身带来了委员长签署的证书。[34]同时，宋子良的身份则仍无法核实。据今井说，甚至连真正的宋子良年龄究竟有多大都无法断定。“桐工作计划”的情报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生于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九年之间的某一年。今井怀着要解决这个神秘问题的希望，在香港格兰特饭店布置了他自己跟宋的一次会见。他精心地将来安排在正对门上钥匙洞的座位上坐下，当二人谈话时，铃木在门外蹲下来通过钥匙洞，拍了几张照片。当这些照片交给周佛海和陈公博去看时，一个人说这人是宋，另一个却说不是，这使今井大为生气。

虽然周和陈对于日本谍报机关的受挫私下感到欣慰，但他们却无法挫败它进行这项努力的本身，“桐工作计划”还继续进行。这个谜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才最后被揭穿。真是无巧不成书，“桐工作计划”的日方译员板田诚盛当时从上海附近某集中营一群中国俘虏中正好认出了这位“宋子良”。经

审讯后，他招供他的名字叫曾广（译音，另据［日］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158 页载，此人是曹宏上校。——译者注），是蓝衣社成员，六年前他的确冒充过同他长得挺相象的宋子良。他直接受蒋的特务头子戴笠将军指挥。战争结束八年之后，将“宋子良”介绍给铃木的记者张志平拜访了今井，也证实了这次骗局的原委。据张说，当时蒋委员长和戴将军直接掌握这次谈判，并对谈判抱着很大的希望，但在会谈内容被泄露之后，蒋受到要求中断谈判的极大压力，最后到一九四〇年九月就中断了。[35]

尽管中国方面在来的问题上进行了欺骗，日本分析家仍倾向于相信，参加“桐工作计划”的中国人实际上跟重庆有联系，并且认为这些谈判看来已接近于有成果了：到八月份，双方都在认真地讨论停火以及板垣将军跟蒋委员长在长沙会见的问题了。最后，由于兴亚院对委员长的处境困难毫无体会，“桐工作”乃以失败告终。中方谈判代表强调蒋真心渴望对日媾和，因为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关系正在增长，“大概到［一九四〇年］八月就会表面化”。今井报告说，重庆认为，宣布跟日本举行正式的高级会议，将会促使中国提前发生一场全面内战，而国民党自然希望到时候能够消灭共产党。因此，东京必须放弃在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要重庆事先作出承诺的要求。但是，日本的最高司令部不肯在这一点上让步。板垣将军告诉今井，尽管陆军极其希望与中国好和，但它还抱着它的“强硬”政策不放，并且坚持非承认满洲国不可。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最后决定，中国“没有诚意讲和”，把“桐工作”降格为仅仅是一条“情报渠道”。[36]

与此同时，汪和他的同事们则认为“桐工作计划”是个严重威胁。六月前后，影佐把秘密谈判的进展情况全部告诉他们之后，由于看来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们也就变得日益灰心丧气。到七月份，周佛海阴郁地在他的日记中预言道：“和平实现后的一年左右；蒋还可能认为我们对于同日本人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但时间更长一点，也许我们全都会被干掉。”[37]周的不安是针对着日本人心目中汪精卫的全部活动的一个根本弱点。无论在新政权建立之前或以后，汪记运动从未依靠自己站住阵脚，而运动的本身也从未被当作是个目的。由于东京顽固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跟重庆和解上，它一直不许汪政权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发展或取得一定程度的国家尊严，而要做到这一点，日本不保证给予支持是不行的。再没有比日本这个后台老板兼保证人对待汪政权那样漠不关心更能说明汪政权的傀儡性质了。也再没有比日本那样不尊重她自己搞新秩序的头一个伙伴更使东亚新秩序名誉扫地了！

在一九四〇年三月的最后几天，跟重庆直接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后，

东京才批准梅机关着手安排汪政府的就职典礼。尽管对这个新政权的信心不大，但当时重庆方面的希望则更渺茫。海军军官宇垣天于三月十六日评论道，到头来东京可能把每个中国人都得罪了；日本人必须小心谨慎“避免两头落空”。[38]

尽管安排节日活动的设计者不那样想，三月三十日汪的就职典礼事实上是凄凄惨惨的。在这惨遭日本人踩踏的城市里，早已没有什么欢乐的气氛了，这天还碰上了凄风苦雨。全副武装的帝国陆军仍然还出现在眼前，看到通向现代中国最崇高的圣殿——位于紫金山麓的中山陵——的各条大街站着日本警卫人员，很少有几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在占领中国的整个期间，日本军队一直都是这样干的。他们这种无视民族感情的做法在无数细小的骄横行为中也有所表现：诸如将街道重新命名（把南京的征服者松井之流的受人厌恶的名字当作街名)；把中国时间改定为东京时间；发动大型的学生集会去庆祝日本军队占领中国城市。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汪曾下令把被人讨厌的小三角旗从庆祝就职典礼会场上升起的青天（白日）旗上取下来。但影佐撤销了这个命令，在典礼开始前又把黄色小三角旗挂上了，这就好象在重申日本的决心——就连中国国民生活中的象征也要加以控制。

就职典礼在一个简陋的礼堂里举行，因为城里最壮观的政府大厦都被帝国陆军征用了。日方曾通知日本官员最好不去参加这个简短的仪式。这个仪式包括：汪发表一个很短的声明，介绍他的部长们，他们每个人从用粉笔圈好的位置向前走几步行一鞠躬。当天稍晚，汪接见记者，对日本发出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警告。他宣布“改组政府”赞成“近卫三原则”。但是，“中国首先必须保持独立的主权和民族自由，这样她才能贯彻执行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诸原则，进而分担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责任。”[39]

在就职典礼后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于四月一日会见报界，谈新政权的问题。从须磨的发言中汪可能一点安慰也得不到。须磨在答复有关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他并非有意讽刺地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一样。[40]被提名为“改组政府”的主席林森（由汪任“代主席”暂时代替他）发表的声明，也使汪得不到什么鼓励。林从重庆电台广播，说汪的所作所为助长日本的侵略，号召把他当作汉奸加以逮捕。[41]在重庆的其他国民党官员则用焚烧丑化他们夫妻二人的模拟像，并筹集悬赏要他脑袋的基金来祝贺汪的高升。[42]

东京发出了正式的祝贺。但是中国报纸却把日本派阿部信行将军作为

参加庆典的正式代表一事，看作是对新政权的藐视。假如日本政府决心表示它对新政府有信心的话，它本该派出近卫或地位与近卫相当的人物，而不是派这个没啥影响的阿部。更加丢脸的事是，东京并没有给予汪政权以外交上的承认。

愚园路会议时，堀场曾向影佐强调，日方当时提出的条件，体现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汪政府成立后，是可以放宽一些的。究竟汪有没有把堀场的保证信以为真呢，那就不知道了。如果他相信了的话，那倒是有助于说明他为何在十二月三十日接受了苛刻的条款。同时，这也有助于驳倒连他的崇拜者都说他天真和太顺从的批评论调。尽管条款如此苛刻，都还有充分理由怀疑日本可能把这些条款当作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东西，只要这样做对她有利的话。就象对待过去的协议和谅解一样，她可以干脆背弃十二月三十日的协议，只说它未经政府正式批准就完了。当汪在一九四〇年夏跟日本开始谈判“基本条约”时，他就领教过兴亚院是完全打算照此办理的。

奉命与汪谈判条约的是阿部信行，这位大将（前任首相）曾代表日本政府出席过汪的就职典礼。阿部的名义是准大使级的特使，他不从外务省而从兴亚院（更具体地说，是从铃木贞一中将那里）接受指示。兴亚院对他的指示以两个基本前提作基础。第一个前提是，只要战争在继续进行，汪就不能指望日本作出任何会使军事行动复杂化的让步。铃木将军告诉有田外相，只要敌对行动继续存在，就谈不到同汪正式讨论就任何军事或经济事项达成妥协的问题。历史学家臼井写道，兴亚院设想的政府形式，“只不过是控制占领区的一种手段而已”。[43]

兴亚院在“调整中日关系”问题上的指导思想的第二个前提是，对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前途起真正关键作用的，不是汪政权而是重庆政权。中国派遣军的首脑们宣称：“新的汪精卫中央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努力同重庆和好。”[44]兴亚院是全心全意地赞成这种看法的。一九四〇年三月，大阪《每日新闻》的松本宗吉声称：“重庆政府仍旧得到千百万中国人的拥护，大多数中国人是反日的，因此日本和汪必须进行一场长期宣传战，能争取多少中国人就争取多少。”[45]铃木将军在跟一个美国记者十分坦率地议论到蒋和汪时，也反映了这种情绪：“我们非常清楚［蒋］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我们也注意到汪精卫在历史上总是抛弃同他合作的人。不过，在目前形势下，日本最多也只能找到象他这样的人。”[46]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部门，跟兴亚院同样对汪缺乏信心并且继续谋求同重庆直接挂钩。的确，对于日汪联合是否明智的问题，日本全

国上下的许多人都对此深表怀疑。在国会内一场辩论中，民政党的老资格领导人斋藤隆夫，向这个温和、被动的立法机构发表了一篇语调和内容都很少见的讲话。[47]他痛斥了政府的对华政策达两个多小时之久。他宣称，政府“侈谈‘圣战’，无视现实，并且有意隐瞒人民被迫作出牺牲的真象。政府使用诸如‘国际正义’、‘道义外交’，‘共同繁荣’以及‘世界和平’这一类词句，但是要了解这些词句的意思，那就好比水中捞月那样。”[48]

斋藤对政府支持汪精卫特别恼火，斋藤害怕这会使跟重庆和解的一切可能性都告吹。在说明他对汪很尊敬的同时，斋藤向国会讲了一堂关于国际法和国家力量的现实情况的课；

> 当我退一步考查局势时，我简直不能理解那个[汪]政府将从那儿获得力量。根据国际法，一国之所以成其为国家。它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部并且履行其对世界各国的责任。从哪里去取得实力来做这些事呢？取自军事力量。不论你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结构……没有军事力量就没有一切。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个新的政权总是拥有优势力量……蒋介石拥有那种力量，所以他能统一中国……但是这个新政府有那种力量吗？[49]

斋藤回答他自己的问题说，汪政权——“从上到下全是匪徒和被打败了的散兵游勇”——根本毫无能力去建立国内和平。如果日本政府想要把这个政权支撑起来，必不可免地要在人力和财力上作出重大牺牲。斋藤因这次攻讦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由于诋毁圣战和指出政府“应该能够比光要求人民作牺牲做更多的事”而被众院纪律委员会所传讯，并被开除出国会。[50]要是支持汪就意味着烧掉通往重庆的最后桥梁，所以斋藤这个和平主义者才怀疑全力支持汪是否明智；可是兴亚院的鹰派成员们不是也有同样的怀疑吗，这真是够有讽刺意味的事！

兴亚院不断强调跟重庆实现和解的必要性，这正意味着它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是不惜牺牲汪的。总之，日本是不会向汪提出最宽大的条件的，那得保留起来，以便将来好跟重庆谈判。正如犬养所指出的，跟汪的谈判就象举行一次宴会，但在这个宴会上却把最精美的菜肴留起来不给已请来的客人（汪）吃，以便为尚未请到的客人（蒋）在将来摆“一席盛宴”时再拿出来。[51]

最后的谈判——基本条约

当阿部把兴亚院提出的“基本条约”的内容通知汪和他的同事时，他们最初的想法是，“日本从［十二月三十日的］非正式协议中把她的全部要求都抽了出来，为的是要把它们放进即将签订的条约中去，而剩下来的其余部分则都将成为一堆废纸。”[52]等到正式谈判在七月份开始后，这种想法的正确性就在一个个问题上显示了出来。例如，汪要求阿部说明日本打算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将日本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意图（这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经近卫宣布，后又在愚园路会议上得到重申）付诸实现。但阿部拒绝说明，却说什么日本商人在中国的地位还不牢靠，他们斗不过拥有庞大资本和大量买办人员的英帝国主义者。为了平息关于日本不承认过去的协议具有约束力的谣言，汪试图把十二月三十日协议中的某些秘密谅解写入“基本条约”。对于那些大体上规定了对日本经济活动（诸如军用票的发行）加以某些限制的条款，阿部毫不让步。

汪最难以吞下的苦丸，恐怕要算阿部拒绝明文规定中国铁路国有化了，而铁路国有化是十二月三十日协议中特别明确地要求采取的一个步骤。汪拚命地恳求从东京来访的有影响的人士向近卫首相说情，给新政权留点必要的面子，使它能独立地站起来。他的要求清单上第一项就是，日本遵守十二月三十日的协议，将铁路（至少在上海、南京地区的那些铁路）交还给中国人管理。[53]兴亚院却以“军事上的必需”以及“铁路与帝国陆军的绥靖行动关系密切”为理由，坚决加以拒绝。结果，铁路仍旧归中日联合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包办。

在与汪谈判“基本条约”的过程中，阿部毫不妥协，在差不多所有实质问题上，他都是坚持不让的。中国人只是在有关措辞或程序问题上略有所获。有时在用字上的长时间争论中，使人们有趣地看穿了汪的心思——或者说看穿了汪的副手们的心思更恰当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实际谈判工作是周佛海和梅思平二人干的。例如，当日本人提出第五条规定日本舰艇部队驻泊长江是“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周请求把“共同利益”一词改为“根据事变前的惯例”。周说，归根到底日本舰艇部队驻泊长江是一种既成事实——而且那是蒋介石批准的。

周显然希望，改变一下词句，就可以把允许驻军的责任都推到重庆政府身上去。阿部妥协了，在最后的文本把两个提法都写进了条约，作为日本海军在长江驻泊的正当理由。[54]

在最重要的撤军问题上，不用说，汪是无法从阿部那里得到任何让步

的，而且基本条约附属议定书第三条还用了许多十二月三十日协议里用过的语言。通过把两年的撤军期限与汪政府保证做到“在此期间确保治安”联系在一起，于是基本条约就等于规定了一个几乎是无限长的占领期限。

周跟影佐之间的一场对话，说明双方在撤军问题上的距离。周说：“你们说除非这儿有日军，否则日本人［平民］就不会来中国。假如你们以客人的身份来，那么我们会欢迎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日本人觉得只有带着枪才感到安全，那种局面将令我们非常难堪。”[55]周还说，南京政府如果在条约上签了字，就等于表示它同意让日本军队永久占领，这就会使公众心目中的新政权蒙受严重损害。影佐答道：“你说什么枪哪、客人哪，都不对。日本人本来要穿‘和服’来作客，但是你们的‘房间’条件太差。事变前，日本想跟中国友好相处，但中国国内的气氛却不是那么和谐。在中国，和平维持得不太好。因此，你们欢迎的那种客人——佳客——是不会来的，除非你们能保证和平和秩序。这些你都是完全清楚的。”[56]

八月三十一日，基本条约的最后文本通过了，为日本宣布她正式承认汪政权扫清了道路。可是，东京却一拖再拖。

再度推迟：“钱工作计划”

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宣称，陆军“在年内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决心结束战争”，反映了帝国陆军对于在中国的冲突没完没了深感走投无路。在一九四〇年这一年的许多政策声明、研究报告和决议中，都明显地发出了要在这一年内决一死战的类似信号。然而和以前一样，陆军在依靠武力还是采取诱降的问题上仍然拿不定主意。为了要结束战争，恐怕二者都得兼用。[57]

但是，看来一九四〇年的重点还是朝着不断扩大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由于日本对英国同情中国很恼火，于是乘英国忙于应付欧洲战场的机会，要求英国关闭中缅边境（这就是说要关闭运送源源不绝的援华物资的滇缅公路）。日本还要求关闭香港边境，并且陈重兵于新界，进入戒备状态，作为这一要求的后盾。英国就象过去对日军早些时候炫耀武力时一样地作出反应：呼吁美国的支持，以抵制日本的要求。美国的反应也同过去发生类似情况时一样：极力主张英国采取坚定立场，但又拒绝采取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英国不愿单独得罪日本，不得不在七月十八日关闭了滇缅公路和香港边境。

四天后，近卫公爵被任命为首相并且组成了全体一致同意建立“一个

高度国防国家”的内阁。用历史学家罗伯特·布托的话来说，它的意思就是要成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力的政府’，将更加广泛地援用全国总动员法，建立一种战时经济体见制，储存战争物资，并且扩大日本航运的吨位”。[58]东条英机中将被任命为陆相，松冈洋右为外相。布托写道，在近卫上台后不到一周，于七月二十七日举行了两年来第一次（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会议产生的决议“导致变中日战争为大东亚战争的关键阶段”，[59]这些决议的实质是，在搞外交失败的地方，日本将“使用武力”去实现她在亚洲的目标。

一旦日本开始策划在东南亚搞一个由日本控制的经济集团时，她需要依靠武力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样一个集团对于维持她在大陆上的军事机器是极其重要的；要是没有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同蒋介石打一场持久战几乎肯定是要失败的。当美国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实施一种针对日本的贸易限制制度时，这种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两个月之后，当废铁被列入美对日禁止出口商品名单时，朝着经济封锁迈出的这谨慎的第一步就开始使日本受到严重的损害了。

松冈任外相后最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要求法国新上台的维希政府关闭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阻止物资流入国民党统治区。他进一步要求允许日军进驻印度支那的北部。贝当总理拖了一个月，希望美国也许会出面支援法国驻扎在印度支那的军队。当华盛顿的援助看来无望时，维希政府权衡了它能否抵挡得住日本从海南岛新建的海、空军基地以及邻近的广西省陆上基地发动的一场进攻。最后，正如丘吉尔认为还是在滇缅路问题上让步为好，贝当在印度支那也步此后尘。八月三十日，法国大使查理·阿塞纳—亨利在跟松冈的换文中，同意讨论缔结经济协定并将在印度支那为日本提供军事便利。

与此同时，一九四〇年春德国人的毁灭性的闪电战进一步使日本外务省认为“大英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自称亲美的松冈辩称，受到中国事变和美国经济压力两方面影响而被“削弱和孤立”的日本，必须依靠另一个国家的力量来使自己度过危机。[60]他断定，选择德国是符合逻辑的。结果，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于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了“三国公约”。但是，这个公约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它不但没有把美国吓得消极起来，反而加速了日美关系的趋于破裂。

在日美关系日趋破裂之际，重庆重新燃起了希望。十月十二日，美国驻重庆大使纳尔逊·詹森汇报了外交部次长徐谟曾讲过如下的话：

“委员长以及中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现在感到，美英两国正日益

认识到，中国的斗争可能对于这两个民主国家未来的安全起重大的影响；而且远东的这场战事与欧洲的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中国目前比开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接受和平建议。”[61]

詹森还说，“要说现在中国的士气比中日开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那是不会错的。”英国声明将在十月十八日重新开放滇缅路，这更进一步鼓舞了重庆的士气。中国人除了对大量的汽油、卡车和其他物资能再度源源送到中国表示满意以外，还由于重新打开了跟缅甸的联系而在心理上受到了大大的鼓舞。

这就是近卫内阁在重新制订对华政策时重庆的心情。在《处理支那事变纲要》声明中所包含的新政策，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正式批准。[62]这一新政策要求日本在年底以前继续谋求跟重庆进行和谈。不过，对汪政权的承认尽管因对“桐工作计划”抱着希望而一再被推迟，但仍将在十一月三十日以前付诸实现。因此，松冈乃着手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设法说服重庆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

松冈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他首先说服日本的新轴心盟友去迫使重庆认识到继续抵抗是毫无用处的。十一月十五日，德国外长约契姆·冯·里宾特洛甫把中国驻柏林大使找到外交部，提醒这位大使注意，整个欧洲已在德国控制之下，预言战事最迟将在一九四〇年底或［一九四一年］初春结束。里宾特洛甫说，中国不久就会丧失国际支持。因此，她必须对松冈的和平建议做出良好反应，并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加人轴心国。他警告说，要是蒋介石不尊重这个劝告，德、意两国就不得不继日本之后，承认汪政权。[63]

与这种威胁、毁灭的策略相呼应，松冈的主要意图还是设法同重庆达成和解。他的门徒、在创建汪记运动时曾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西义显，如今又成了代表松冈与蒋接触的人物。西义显在这次努力中，利用了他早先在南京认识的两个中间人：前任交通部财务司司长张钦礼（译音）和与蒋有私交的银行家钱永铭（即钱新之——译者）。就象“桐工作”的情况一样，日本．官员们在进行“钱工作计划”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蒙在鼓里，确定不了他们是否真跟蒋联系上了。其实，他们是联系上了，但这是直到战后才弄清楚的。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钱工作”期间所讨论的各种条件的两份报告，彼此并不完全一致；[64]但是，两者都指出，松冈一度原则上同意了张钦礼一九四〇年十月访问东京时所提出的条件。如果这属实的话，那么松冈所同意的条件要比汪政权被迫接受的条件宽大得多。例如，松冈同意在实现

停火后六个月内撤走自芦沟桥事变以后派至中国的全部日军,(这一期限可以根据预期要签订的一项防御条约延长到一年。)而汪则同意了撤退占领军的期限为两年。关于开发资源的问题，规定将最优先考虑中国的需要；在中国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日本才有权购买她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而且还得按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购买！[65]

松冈——显然还有东条——甚至愿意考虑以这样的条件作为跟重庆谈判的基础，这就有力地支持了以下这种论点：即近卫内阁本来是极不乐意签署同汪政权之间的基本条约的。犬养坚信，把“最好的菜”留起来是准备给蒋的，这种判断显然是正确的。日本人对汪政府持冷淡态度的进一步证明，在枢密院十一月二十日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这时的枢密院，主要是天皇陛下的显要大官的养老院，但它仍旧保有一项最后的权力象征：批准条约的特权。这些枢密院顾问们显然对承认汪的这种想法感到忧虑。有马赖安伯爵代表许多在场的顾问们讲话，就曾把汪跟蒋进行了对比：汪的变节证明他“不正直，连中国人自己都信不过他，[反之]蒋由于他英雄的生平，却受到了中国人的信任”。[66]枢密院第二天复会时，顾问们继续表示对重庆的兴趣超过对南京的兴趣，同时松同外相则表明他对自己所进行的和谈很有信心，从而希望消除顾问们的疑虑：“[重庆已经]向我们靠拢得更紧了，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松冈以及其他人都请顾问们放心，即使承认了汪政权，帝国政府也不会停止劝诱蒋参加汪政权的努力。[67]

不幸得很，从这个关键性的时刻起，“钱工作”在历史上却只记下了日趋暗淡的记录，它只反映了那些中间人在疯狂地进行奔走，而有些利益攸关的方面则为了阻止基本条约的签署在进行着最后的、无指望的努力。[68]关于为什么跟蒋的接触最后以失败告终，以及为什么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一次联席会议上作出了两天之后签署条约的决定，我们除了只能作一些猜测之外，手头上一点材料也没有。正如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些跟汪政权关系最密切的人，都认为整个行动完全是由于重庆玩弄狡猾手段以拖延对汪政权的承认，而汪和影佐所施加的压力，确实对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签署条约的决定起了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假如重庆跟香港之间的联系没有在最后一分钟被推迟的话，“钱工作”本来是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的，那么对汪政权的承认也就有可能还要再往后拖延。[69]

很明显，重庆就是利用谈判向英、美强调，要是她们不对中国进行大量的援助，那就必然要冒迫使中日和解的风险而这种和解将使日本得以任意南侵，从而危及西方的利益。当宋子文和陈纳德将军都在华盛顿呼吁援助时，蒋则把日本的和平建议以及德国愿当日本和平条件的保证人等活动，统统告知了罗斯福总统。驻重庆的詹森大使显然害怕重庆快要接受松冈提

出进行谈判的建议。在他兴高采烈地汇报重庆士气高昂之后不到六个星期，这位大使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却以完全不同的情绪写道：蒋已通知他，美国如果不“拿出极积态度”来对付轴心国即将对汪政权的承认，他的抗战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70]十一月二十七日，詹森再次致电华盛顿，说他认为蒋“对于自己继续跟国内困难局势作斗争的能力，已经丧失信心；并且感到他为了抗击侵略，已把他国家的实力消耗殆尽，而他这样做既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同样是为了英、美两国的利益；因此现在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时候了。”[71]

这种压力在罗斯福总统身上起了作用。十一月二十一日，他要他的顾问们加速拟定一项贷款协定，准备好在十一月三十日左右宣布。结果，就在阿部与汪在南京签订“基本条约”时，华盛顿就宣布了一项空前巨大的援华计划。美国将拨款一亿美元归蒋支配；立即交付五十架新式驱逐机，并答应以后提供更多的飞机；还将采取步骤，准许美国公民在中国担任飞行员或飞行教官。[72]从此以后，汪政权的命运与美国越来越深地在东亚的卷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了。

蒋介石评论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签署条约，就象“在［汪的］坟前念祭文”似的。蒋说，汪在这年早些时候高、陶揭发他时就已经寿终正寝了，他的葬礼在三月三十日就职典礼时已经举行过了。[73]那些对汪还比较友善的人，也不否认在条约签字时南京的气氛挺象葬礼。据某观察家说，在在预定举行仪式的中山陵前等候阿部到来;“他站在那儿似乎心中感到十分茫然。两眼凝视着紫金山顶上的朵朵白云，由于痛苦和烦恼而把脸拉得长长的，泪流满面。”这同一观察家还评论道，这个仪式“揭开了一场历史悲剧的帷幕”。[74]

汪完全有理由满怀辛酸地去回顾与那一天到来有关的一桩桩事件。自从重光堂会议打开他叛离重庆之门以来，已经整整两年了。他的叛离是为了要以孙中山“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的铭言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生的中国。但是汪的善良的动机并不足以保住他的运动，不受这充斥着错误的估计、误解和误会、口是心非和不讲信义的两年的冲击。他经常谈论中日两国“同生共死”的必要性；而过去两年的事实，却有力地说明了他的前途相当不妙。三个星期后，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当他还在汉口和重庆的时候，他对日本的看法是“荒谬”的。醒悟了的周佛海供认，“那些主张抗战的人的观点则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75]

[1] 访问高宗武、陶希圣谈话记录。
[2] Y·C·王的《杜月笙（1885—1951）：政治人物传记试稿》（载《亚洲研究杂志》一九六七年第26期）第433—435页有最详细的论述。另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328—330页。在英语的出版物中，杜的名字有不同的译法：Dou Yu-seng，Tu Yu-sen。
[3] 见韩素音的《没有鸟儿的夏天》第84页。
[4] 关于高—陶—杜联系的情况，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一八二章、一九八——一九九章。
[5] 见《周佛海日记》第36页。
[6] 这个文件及高、陶的电报的英译本，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第341—344页，标题是“汪精卫的叛卖”。
[7] 见《周佛海日记》第52页。
[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71—72页。
[9]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220页。
[10]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114页。
[11]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177—193页。
[12]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9—170页，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30页。
[13] 除了在本章所引用的资料外，另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49—52页，晴气的《上海阴谋》。
[14] 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35页。
[15]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52页。
[1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2页。金雄白在此书第47—54页，讨论了周佛海罗致人员的策略及其后果。
[17]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68—269页。
[1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49页。
[19] 见约翰·鲍威尔的《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第335页。
[20]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三十五章。
[21] 同上书，第197页。
[22] 见鲍威尔的《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第336页。
[23] 关于青岛会议的会议记录和绝密的梅机关报告，收录在国会图书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1—493卷，S1.1.1.0-27号，第5580—5645页。
[24] 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42页。
[25] 见林柏生的《中国和平运动》(《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
[26]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1页。
[27] 见唐良礼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88页。
[28] 同上。
[29]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第65页。
[30] 见汪精卫的《中日关系》第5页。

[31] 我记述“桐工作计划”时所根据的文件，主要是今井大佐与几个中国谈判者的谈判记录，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12—150页、326—375页。其他使用的资料是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52—164页，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66—67页，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29—237页，以及《周佛海日记》有关部分。一九四〇年日本人同时进行的其他工作是：“司徒工作计划”（对美国的教育家司徒雷登做的工作）、“兰工作计划”。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9—160页，略述了这两项计划。

[32] 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61页。德川幕府时代是一六〇〇年——一八六七年。

[33] 同上书，第158页。

[34] 周佛海怀疑代表证书签章的真实性。见《周佛海日记》第169页（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日记）。另今井在《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37页也表示对此怀疑。

[35] 据张志平说，对委员长的压力之一是来自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今井接到冒充宋子文的曾广本人的信后，更进一步证实这个委员长和戴笠确实卷进一九五五年的“桐工作”中去。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149—150页。

[36]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34—247页。

[37] 见《周佛海日记》第166页（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日记）。

[38]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33页。

[39] 见《人民论坛报》（上海）一九四〇年第二十八期第301页。

[40] 见《远东评论》一九四〇年第三十六期第127页。

[41] 见青木德三的《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背景》第三卷第310—311页。

[42]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第200页。

[4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24页。

[44] 同上书，第223页。

[45] 见松本宗吉的《中国人民的倾向》（载《外交时报》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第八四六期）第113页。

[46] 见约翰·戈特的《日本为亚洲而战》第126页。

[47] 斋藤的讲话全文收录在《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336—344页。

[48] 同上书，第338页。

[49] 同上书，第339页。

[50] 同上书，第339页、第343页。最后引的那些话，获得了其他国会议员的喝采并高呼：“听！听！”

[51]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18页。

[52]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25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53] 传讯西园寺公一与审判尾崎秀实等人的关系，见《现代史资料》第三卷第490页。

[54] 见矢野征记的《矢野文件》。和“基本条约”谈判的速记记录最近似的文件是外务省官员矢野征记做的记录。参看我在本书第 511 页《参考资料说明》对这资料的论述。
[55] 同上。
[56] 同上。
[57]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25 页。
[58] 见罗伯特·布托的《东条与战争的到来》第 143 页、第 152 页。
[59] 同上书，第 153 页。
[60]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 115 页。
[61]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〇年，第四卷第 424 页。
[62] 《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载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年——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 464—465 页。
[63] 见格鲁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〇年，第四卷第 444—446 页。
[64] 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272 页等有第一手的报道；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32—244 页有较好的综述。
[65]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 242 页。
[66]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 507 页。
[67] 同上书，第 509—510 页。
[68]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 302—305 页；另见《周佛海日记》第 248—256 页。
[69] 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 456—457 页。
[70]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〇年，第四卷第 440 页。
[71] 同上书，第 447 页。
[72] 见赫伯特·菲斯的《通往珍珠港的道路》第 135 页。
[73] 见《中国季刊》（重庆版）一九四〇年第五期第 936 页。
[74]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12 页。
[75] 见《周佛海日记》第 267 页。

第十五章 太平洋战争时期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虽然选择足以反映现实的名称是费事的，一但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开始被轰炸的时候，中国事变就演变成大东亚之战了。天皇在日本帝国对美英两国宣战的诏书中声称：正是美英之“庇荫”，重庆政权才能坚持“兄弟阋墙而不悔”；而且还说“长此以往，帝国多年安定东亚之努力悉归泡影，帝国之存在亦濒于危殆。事既至此，帝国现为自存自卫计，惟有蹶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1]

唐纳德·基恩描述了日本知识分子听到战争扩大的消息时情绪高昂，欢欣鼓舞。由于写作了记述中国战场的战争日记而被国际上誉为日本的埃里克·雷马克*的火野苇平报道说，当他听到广播时，竟情不自禁地幻想横扫东亚的情景。“我相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种感情的……。我就不相信有谁在听到宣战的圣旨后，会不感动得热泪奔流。”以托尔斯泰派基督徒及善邻信仰者而闻名的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为这次战争将能给亚洲人以机会，把本国的英美势力撵走而欢呼，并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竟“愚蠢”地以日本为敌表示惊讶。[2]

汪政府可并不这样想。珍珠港的消息使他们大吃一惊，日本决定和美英开战事先并没有同他们磋商过，大多数官员一直都以为日本打苏联的可能性比“南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汪政府的一位成员金雄白回忆说，之所以会那样判断是有很多理由的：日本和俄国是世仇；在中国事件期间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比其他国家都多；日本陆军急于为张高峰和诺蒙坎两次败北报仇雪耻；反共是近卫颁布的三原则之一，而且反共被认为是“日本政策的核心”；德国向日本施加强大的压力，要她进攻苏联并停止刺激英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深信德国会从欧洲东进，日本则从太平洋西进，发动对苏联的庞大的钳形攻势。人们肯定很自然会这样想：对日本来说，这样干的前景当然比她十二月七日实际上是轻率地进行冒险会更有吸引力一些。[3]正如汪精卫夫人在战后被判为叛国罪时所说的，如果日本将炸弹投到西伯利亚而不是投到珍珠港的话，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会完全不同，而汪政权也就可能不会失败。一位中国国民党的外交官从不同的角度看这问题，他曾对一位美国同行说，“你

---

* 雷马克是原籍德国的美国小说家，著名小说《西线无战事》的作者。——译者注

们的珍珠港日就是我们的对日胜利日。”[4]

金雄白回忆了当他听到十二月七日（在远东则是十二月八日）的消息时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他感到这是中国自开始抗战以来的第一次“曙光”，因为日本“造成了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而中国最终将从日本进攻美国的失策中得到好处。在另一方面，他当时也看到了一幅暗淡的前景；“要是他们（日本人）打赢了，他们将会变得更为妄自尊大，并将对我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是一旦他们开始失利，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将会越来越多。”为此他很担心。[5]

到了一九四二年初，金雄白和汪政权其他人的担心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时东条政府正开始要求设立一个大东亚省[*]。外相东乡茂德正确地指出，这样一种机构将会激起中国的对抗情绪，但是他的反对并没有起作用；还不到年底他就辞职了，而那时新成立的大东亚省则已开始办公了。被认为是汪政权的朋友和支持者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被召回了，由一个被认为是东条将军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谷正之所接替。此外又分别将汪政权的军事和民政首席顾问影佐和犬养召回。当犬养把基本条约谈判的情报泄露给了西园寺公一和尾崎秀实时，他几乎被卷进了尾崎—索尔格间谍案。影佐被召回的原因倒不那么清楚。犬养认为，东条政府对影佐不满并将他调职的原因是由于他对汪的态度“大慷慨”了，但有些人则认为他的调动仅仅是陆军正常的职务轮换。[6]无论如何，当时已升为将军的影佐先是被任命为驻在满洲国的一个野战部队的部队长，后来被调到南太平洋的拉布尔，他在那里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负有防守那个要塞的不光彩的任务，而盟军在采用越岛战术时绕过了这个要塞。汪对将他所信赖的影佐从南京调走感到不满，并让日军知道他的不满——可是那也白搭。[†]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美、英的战争。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的秘密协定和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则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接

---

[*] 大东亚省是东条内阁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宣布成立的一个政府机构。东条内阁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肃清被占领地区的一切抗日势力，搜括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满足日本垄断资本的欲壑，以继续进行侵略战争。该省成立后，原拓务省被撤销，外务省的部分权限亦划归该省。——译者注

[†] 影佐调职数月之后，帝国陆军最出色的谋略家之一辻政信大佐去会见汪。通过译员交谈了一会儿后，汪就叫译员出去，开始和辻政信用笔谈的方式进行密谈，这是当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只会讲自己的语言时所通常使用的方式。汪对那些他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共事的高级顾问和外交官员颇有怨言。他觉得他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信不过，对此他表示悲叹。当辻政信问汪愿意挑谁当军事顾问时，他毫不犹豫地写上“影佐将军”。（见辻政信的《大东亚的两个领导人：石原莞尔和汪兆铭》第 214 页）

着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由汪和谷大使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来代替基本条约。甚至在此协定生效以前，日本就已开始放弃一些对中国主权最明显的侵犯行为：交还了汉口、天津、厦门及其他城市的日租界，一九四三年六月日本同意让汪政府接管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权。

没有什么必要对新条约和有关归还租界的各项协定加以详细的叙述了。因为事实是，尽管把上海公共租界交还给中国管辖可能是汪政权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可是由于迟迟才交还，所以不论对汪政权的生存或对日本在许诺一项新秩序方面的信用，都产生不了任何重大的影响；何况，首先放弃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的是盟国而不是日本政府。一九〇三年的中美条约就作了这项许诺，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十月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才最后将条约草案交给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履行了该项许诺。虽然重光葵认为日本早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就考虑采取这项行动了，[7]但正式废除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条约的荣誉都必须给予美国和英国，因她们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都同重庆政府签订了条约，结束了她们在外国保有国中之国的特权。

重光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指出，日本宣布废除她的某些特权的时间不仅仅是迟了几个月，而是迟了整整六年。他写道，要是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就采取了这样的步骤，那就不会发生中日战争了。[8]对此，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这种灵活的程度只要早三年提出，就会使汪政权的声望大增，但此时已为时过晚，无济于事了。要是在那紧要关头，即一九四〇年春在美国动用其武装力量去保护蒋政权之前签订这么一项条约，那末，在使日本所许诺的新秩序显得有一定的诚意和荣誉的同时，也会使汪蒋之间的斗争变得对汪更有利一些。一九四三年日本的让步虽然满足了汪，但对支撑他的政权已起不了多少作用，而且也太晚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一项“对华新政策”。[9]日本之所以决定采取对华新政策，是她迟迟不对中国作出友好和尊重中国民族感情的姿态的另外一个方面。这项政策于一九四三年初由大陆的派遣军司令部以所谓善意援助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重光葵的杰作。[10]正象这项政策的名字所表明的，政策的这种改变说明军方认识到：它对汪政权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等于是对纯属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现在对中国行政机关只提供间接的帮助，这就意味着特务机关的结束。人们瞧不起的特务机关被联络部所替代。从特务机关到联络部的转变不光涉及到官僚机构名称的改变而已。还对军官们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对中国公民和政府官员使用粗暴或傲慢的语言。与以前相反，将采取一种以“援助、建议和指导”为其特点的低姿态的新办法。据一位前军官说，军方并

没有主动采取这项政策。

> 谁是这个政策的后台呢？我们不能肯定，但是我们相信这是天皇的意旨。如果这个命令只是来自军方，它是影响不了日本军官们的想法和习惯的。但如果通过大本营的口说：天皇的意愿要求我们应该对中国人更尊敬一些。那才会对我们起很大的影响。即便如此，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变了过来。变化必须逐步实现……要是早就这样做了，那该有多好。过去五年或五年多我们一直采取强硬政策……比方说，要是我们在汪政府建立之时就改变了做法，那该有多好。共产党人不正是在汪政府成立后的那段期间变成如此强大吗？[11]

在承认汪政权之前和之后，日本一直因为没有能够制定一个前后一贯的、统一的对华政策而感到烦恼。一些日本领导人不断地呼吁同蒋介石和解，而比较少的一部分人则极力主张加强南京政权。但是帝国陆军不变的野心——“幻想”一词或许更恰当——是要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别和割据斗争一举而征服敌人。帝国陆军由于有一个效率极高的情报网，所以才能够获悉国民党阵营内某些有势力的地方军事将领有任何不满的迹象。不过，知道他们有不满情绪是一回事，但要从中得到好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帝国陆军总是断断续续地把蒋介石的军队将领之间紧张关系加剧的希望，集中寄托于一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将军名单上。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龙云、张发奎和刘文辉以外，这个名单还包括：广西的李济深、陕西的刘建绪、广东的余汉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以及一大批师长。[12]

到一九四四年一直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是颇受注意的对象，不仅因为他在政府中据有要职，同时也因为不断有情报说他快要在重庆的领导层中挑起分裂。根据一份情报，一九四二年初确实曾发生过分裂。*这份情报不仅指出何以及一些其他将领在战时首都组织了一个和平集团，而且还说他们“和南京政府一起合谋迫使蒋流亡到印度或伊朗去”。这以后，何及其追随者打算和汪精卫达成协议——这不过是他们自己想接管南京政府的一个序曲而已。[13]日本人之所以相信这些有关何应钦的报道是依据以下的事

---

* 这份情报是一个名叫陈友仁的中国人通过兴亚机关转来的。这个以冈田吉政少住为首的机构，其任务是逮捕并扣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大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中国要人。虽然有许多重要人物都被捕了，但最大的目标却逃脱了冈田的罗网：蒋夫人乘委员长派来的一架小飞机逃离了这个海岛。（明石祐冶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156页引他和冈田的一次对话）

实：他大概是重庆反共将领中最积极的一个。他是制造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生冲突的主要策划者，这一冲突象征着统一战线开始崩溃了。何将军对共产党所持的“顽固态度”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中是很闻名的，这些美国外交官对他公开主张不加强对日作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他怕把战后必需用于消灭共产党的兵力被消耗掉了[14]。而且日本人从周佛海那里得悉，何坚信，日本要是被彻底打败的话，战后的中国必将完全附属于美国，因此他曾“派人与周接触，试探同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15]

日本另一个重要的注意对象是北方的军阀阎锡山。没有其他中国领导人能比阎锡山（当了山西省将近四十年的土皇帝和省长）更能说明在二十世纪中国某些人士对日本的爱和憎的复杂感情。阎是东京士官学校一九〇九届的毕业生，他对日本的进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中国时，他对日本掌握诸如 X 光这样的先进技术（他在日本医院治病时有亲身的体会）和对他们废除旧的社会习惯（如把牙齿搞得很黑）的积极态度极为钦佩。但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他对日本的钦佩……被他对日本威胁中国独立的认识所冲淡了”。[16]

满洲事件后，阎对国民党政府不愿坚决采取全国抗战的政策公开表示遗憾。他的部队对一九三六年日本指使满蒙军侵略绥远省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促使《字林西报》评论道：“许多人相信，阎锡山在绥远抵抗日本的进犯使很大一部分中国人都站到阎的一边来了，这是史无前例的。”[17]芦沟桥事变后，阎邀请共产党的八路军进入他的山西省协助他抗拒日本的侵略。他保卫太原的意志是如此坚决，以致连本身是以勇猛著称的朱德将军也指责阎采用“自杀战术”来抗日。[18]

但是到一九四〇年间，日本却深信她能够通过发动一个名字叫做“对伯工作”的重要行动计划就可以把阎将军吸引到她这边来。田中隆吉少将是该行动初期的主管人，他和阎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就是朋友了，当时日本人在阎和他的主要对手冯玉祥的军阀斗争中支持了他。[19]看来日本的希望是根据：阎对重庆不供给他军火不满；阎对他在八路军中一度是同志的人日益冷淡。阎和共产党在山西的合作逐步崩溃，及至一九四四年，双方的军队就公开磨擦起来了。虽然阎欢迎——并且显然也接受了——来自日本的援助，但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要阎发表一个支持日本的宣言，却没有达到。[20]根据田中说，阎认为日本海军一九四二年春在中途岛海战中已丧失了战斗力，这就预示着日本终将战败。从此，间便，“不愿意因成为（日本）的同盟者而有损自己的名誉了。”[21]

另一个行动也值得一提，哪怕只是由于它本身很离奇古怪。一九四四

年参谋本部的一个情报官员小组（其中有晴气庆胤大佐——他是曾经帮助组织声名狼藉的上海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的特务部头子，现已提升为中国课课长——和情报局局长有末精三少将）和两个属于参谋本部的文官。他们建议向延安共产党提出有无可能单独和平解决的问题。这两个文官是佐野学和锅山贞亲，都是日本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他们两个人都曾因过激行动于一九二九年被捕并于一九三二年被判无期徒刑。一九三三年，这两人改变了他们的共产党观点，宣称日本共产党“反人民”、“脱离群众”、只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宣传机构”而在左派世界里引起了国际性的轰动。[22]尽管他们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但直到一九四三年他们才被从监狱里拜放出来。那时，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的知识——他们对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和苏联方面的任务有丰富的经验——为陆军参谋本部所赏识，因此很快就被指派为文职官员。

一九四四年春锅山被准许前往华北两个月，去调查共产主义运动。他回到东京后向情报局提出报告，主张同延安共产党人进行和谈。他在报告中说，延安政权是一个独立政府，拥有领域明确的根据地。锅山的论调与消息灵通的美驻华外交官差不多在同时送到华盛顿的报告的腔调相类似，指出“延安政权是深受人民尊敬和拥护的廉洁的、不贪污的政府”。[23]锅山的结论是；虽然不能无视莫斯科对陕西苏区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日本也应该与延安进行直接谈判。令人难于置信的是，看来参谋本部事实上竟被锅山的建议所打动，并作出了执行这项建议的计划。该部显然忽视了以下这一明摆着的事实：延安的存在就是依靠它成功地动员了爱国的抗日运动，任何想与延安谈判和平解决的计划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锅山计划也许比其他方案都更加强词夺理一些，它只不过是旨在从日益加深的危机中把帝国挽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行动计划之一而已。

中途岛、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马里亚纳群岛——这些地名标志着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帝国逐步陷入灾难。一九四二年中开始的争夺瓜达卡纳尔的战役，三个从中国调去的师团都被歼灭了。从这时开始，每当在太平洋进行一次大的战役，都迫使日本重新调拨部队和供应，从而削弱了她在中国大陆的力量，并且促使东京重新考虑同中国和平解决的条件。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日本人在同中国领导人谈判时所持的态度反映了日本单方面决定和平条款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即使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岛失守促使东条内阁倒台并使日本本土处在美国轰炸机航程范围内，日本的和平谈判代表仍在坚持强硬的条款，这种态度和他们的国家已陷入无可救药的局面是完全不相称的。

例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当美军已作好在菲律宾登陆的准备时，已退

休的宇垣一成将军受新首相小矶国昭之托亲自去中国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宇垣起程前六天，新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所决定的和平条款注定了他的使命非失败不可。一方面给重庆一个刺激——把香港的主权交回给中国，另一方面新的和平条款在日军从大陆撤退的问题上留有余地（只是在英美的军队撤退后才付诸实施），同时仍旧一如既往，坚持满洲国得维持现状。[24]小矶首相以一种近乎荒谬的和解姿态建议说，宇垣可以答应给重庆“某些南方领土——例如法属印度支那”，以顶替满洲国。[25]不用说，宇垣的提议并未引起重庆作出反应。

这时，对汪的改组国民政府来说，如果不是取得了一个独立政府的实质的话，也算缓慢地取得了一些表面的东西，使汪满意的是一九四二年底颁布“对华新政策”之后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些东西中汪最感兴趣的一项是“清乡运动”†这运动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就开始全面开展了。这运动的目的在于建立清除了共产党游击队并全面恢复了经济生产力的“模范和平区”。

为了在这些地区取得必要的社会控制，汪政权退回到古老的连坐制度，即所谓的保甲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第一步是审慎地核查人口并建立基层单位：每一家庭为一户；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级的领导都是指定的，授予职责和权力并建立地方民团。每个地区都设有封锁和检查站。颁发身份证，一行一动都要求有通行许可证。每一家都得在家门前挂上牌子说明居民的情况。

当“清乡”制度执行得好的时候，它对游击队的渗透是个强大的障碍，也对居民行动加强了控制，而且甚至是个控制思想的机构。然而清乡的意义还不止于是恢复法律和秩序而已。汪希望清乡委员会可以促进模范和平区的经济恢复，所有模范和平区主要都是根据它们经济繁荣的程度挑选出来的。大部分的模范和平区都在江苏、安徽和浙江等省，这些省是南京政权控制最紧的地区。‡比方说，第一批开始搞清乡运动的地区就是长江下游

---

* 最高军事会议于一九四四年八月成立，把四大臣会议扩大到包括陆军参谋在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在内。

† 译者按：汪伪在日寇指使和支持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在伪国民政府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为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攻击对象主要是新四军。（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轮载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在伪政权的经过》第 20—30 页）

‡ 美国陆军部估计，到一九四三年底为止，中国被占领地区（指日本最前沿据点后面的地区）的总面积约为三十四万五千平方英里；其中共产党控制了大约十五万五千平方英里，这些地区大部分是人烟稀少的华北山区，而日本大约控制了八万二千平方英里，其余的地方被认为是无人区或游击区（约六万七千平方英里）以及重庆控制区（四万一千平方英里）。所谓中国被占领地区的总人口约为一亿八千三百万人，估计居住在日

三角洲的沪宁杭三角地区。人们都说，清乡地区包括那些“一季熟就足够供应大部分中国人的吃和穿的地方”。[26]

由于各种原因，清乡的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首先，汪虽是清乡委员会的主席，但他很不明智地把日常工作都交给一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著名的七十六号的）李士群去管，李直到被毒死时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秘书长。此外，由于对日本获得胜利丧失信心，老百姓对南京改组国民政府的货币极担心，于是就开始囤积物资。美国陆军部一九四五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囤积食物和其他物资的情况，在日本占领区比重庆政府的地区更厉害。一九四三年起日本占领区的通货膨胀开始与重庆管辖的地区不相上下……到一九四四年达到了极为严重的阶段；从那以后它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重庆睿辖的地区。”[27]

交通工具不足也削弱了清乡计划。车辆损坏，共产党破坏铁路运输，美国飞机对铁路桥梁和码头的轰炸，阻碍了中国的货物流通。此外，某些清乡技术虽有成果，但却对农村的生产起了预期不到的影响。例如，封锁和检查站对控制土匪和游击队的渗透是有效的，但同时也妨碍了城市与清乡地区的农村之间的物资交流。在分发交流许可证和通行许可证方面，官僚主义作风和无限制地拖延也与导致清乡计划的失败有关。

执行清乡计划的许多职责是掌握在南京政府的军队手中。根据“对华新政策”，防守占领区的任务很快就由帝国陆军交给了南京政府的军队。但南京的军队只起维持治安的作用，并没有协助帝国陆军去和盟军作战。据一位南京政府的宫员说，汪的确拒绝让哪怕“一兵一卒”去与日本并肩战斗。[28]汪在给日本天皇关于他的政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备忘录中说道，他打算以宣战的方式来告诉重庆：他的南京政府拥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士气也很高，与重庆所宣传的完全相反。[29]

据多数人的估计，南京的武装力量在高峰时的总兵力为九十万人，正规军以及地方和各省的非正规军各占一半。[30]除了只是在纸上存在的空军之外，南京政府还拥有日本赠送的“几条小舰艇”——这就是由汪的连襟海军部长褚民谊所统辖的“海军”。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认为对褚的任命是不折不扣的轻率行为。[31]

汪的正规军中有许多（也许有大部分）都是叛离国民党的分子。他们

本占领区的占七千万人，在游击区的有四千三百万人，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的有五千四百万人，在重庆控制区的有一千六百万人。（见范斯莱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第116—117页）根据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调查，大约有五百六十万中国人居住在清乡方案所审慎挑选的目标地区 其中约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的人口被组织在保甲体系内。（见西谷省三的《在战争中的国民政府》第159—160页）

中许多人是跟孙良诚、李明扬、吴化文、郝鹏举、庞炳勋和张兰峰等一块儿投降过来的。[32]据汪政府的一个成员说，这些参加南京政府的将领们可分成四种类型：一、自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互相倾轧和角逐的牺牲品；二、受到日本和共产党军队的两面夹攻，投靠汪以求生存者；三、实质上是国民党军的编外军队，缺少力量，备受歧视者；四、发现帝国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武器的质量和数量都悬殊太大因而完全丧失对抗战信心者。[33]

如果有从重庆方面过来投降的军队，南京的部队通常是欢迎的，但反过来则不然。蒋对向他投降或宣布归顺他的傀儡军总是非常怀疑，因而许多汪的士兵本来可能准备投蒋的都投向延安去了，而延安则对他们表示欢迎。吴化文将军的情况最足以说明问题。吴有一个时期曾指挥过山东的第三绥靖区，先叛离重庆投降南京，后来为了保存自己，又一次向重庆表示效忠，但蒋介石却不相信他，最后吴的部队“被迫”参加了共产党。满洲国部队的许多士兵也相似地加入了红军队伍。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傀儡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很清楚的，虽然许多将领并没有象吴将军那样具体地公开宣布他们效忠的态度。到一九四四年中帝国陆军进行有名的“一号攻势”的大规模进攻时，大部分前线是稳定的，对双方许多士兵来说，在相对平静的五年间，战争成了“官样文章”。这种官样文章的战争在所谓的无路区着得最清楚了，这些地区构成了南京的中国和重庆的中国的边界。一个美国官员描绘了华南这种“边界”地区之一的生活状况：

> 这“无路区”纵深大约二十英里，周围是美丽的稻田，部队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军官和他们的家属带着佣人住在征用来的农舍里，这些农舍是既大又好，而且又在如此富饶的地区。他们都从事走私或征收走私税而发财致富了。通过这条边界线所进行的贸易是经常不断的，他们运出大米、盐和各种原料，运进衣服、香烟和奢侈品。一个狡猾的商人只要通过前线到后方走一趟就能赚到五倍的利润。[34]

国民党军队与南京军队间不断地保持友好，其结果往往对国民党军队比较有利。美国海军情报军官米尔顿·梅乐斯中校对于傀儡军队竟心甘情愿地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表示很惊讶：

> 关于中国傀儡军队为日本人执行许多任务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在占领区，差不多都驻有这类由他们自己的军官指挥的军队，有时还让这些军队负责维持某些日本控制区的秩序，或让他们执行其他

与此相类似的任务。当然，这些军队的粮的都是日本人供应的，所以他们并不是不愿意为日本人效劳。可是，他们又都是中国人，内心里总还保留了许多效忠本国的想法。我问过(一个姓曾的上尉)，这些傀儡军是否总是愿意合作……。曾上尉回答说:“噢，是愿意的。当然，他们对日本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但有时在他们感到是很保险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邀请我们去赴宴。日本人给他们钱，当然希望他们会忠诚老实，但是日本人也派任务给他们，如果在他们的防区发生了骚动事件，日本人就处分他们。所以，要是他们不按我们的要求办事，我们只用进人他们的防区打它几枪——这就足以证明发生了一些骚动事件，于是日本人就会替我一们去处分他们。这真是个绝妙的办法。”[*]

美国官员们对那种行为是密切注意的，因为他们有必要去判断某一将领是否值得支持，而那种行为既使他们莫明其妙又使他们震惊不已。对于顾祝同将军（统率国民党第三战区——浙江地区——所有部队的司令长官)，职业外交官约翰·巴顿·戴维斯的评价是:“并非特别不忠诚——也不特别忠诚——因为他同日本人做买卖忙得不可开交。……他对商业的兴趣超过了他对军事或政治的关心。”[35]从一九四二年起，顾祝同实际上同在南京的周佛海几乎从未中断过联系。

美国观察家们常常发现，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此,“醋”乔治·史迪威将军曾大骂过——非常不乐意把他们的部队投人战斗。那时，部队的军粮、军饷、枪枝、汽油和各种军需供应品都是按照部队的人数来配给的。部队人数成了衡量一个将领的财富的标尺。它不仅决定着某一将领的军事地位，也决定着他的政治威望。要是他的部队满员无损，他就能既有钱又有势。只有鼠目寸光的将领才舍得让自己的部队去同敌人拼，去博取眼前的荣誉而冒日后永远丧失政治地位的风险。将领们不乐意与日本人作战是可以理解的，而日本人则欢迎而且鼓励这种态度。虽然不应指责所有的国民党将领都是按兵不动的，但是那些非蒋介石黄埔嫡

---

[*] 见梅乐斯的《一种不同的战争》第 59 页。海乐斯对于美国未能充分利用许多愿意叛离南京的傀儡军队这件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特别指责艾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应对此错误负责。这也许有点道理，因为魏德迈于一九五一年在参议院武汉部队委员会作证时，在回答有关傀儡军队的问题时给人们以这种印象；他对于傀儡军队究竟指的是哪些军队竟连一点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如何去充分利用他们了。魏德迈经过了努力的回忆，最后才想起来：在战争初期，是有些傀儡军队在“某个姓汪的将军”领导下曾有过一些活动。后来他又补充说，在他到达中国（一九四四年十月去接替史迪威的职务）后，这些傀儡军队就没有任何重要性了。（同上书，第 490 页；美国八十二届国会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听证记录”，第 2300—2301 页）

系集团的将领们肯定非常了解他们自己的处境，总是设法避免打仗，以保存他们的军事实力。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有机灵的手腕。例如，统率广东省在占领前所有国民党部队的广东将领余汉谋，由于他“对日本人采取谨慎的策略”，既避免了同日本人公开合作，又做到了“使他的七个师基本完整无损”。[36]

无论怎么说，采取这种“谨慎策略”的并不是只有那些“非嫡系”的将领，甚至可以说主要并不是他们，而是蒋介石自己圈子里的将军们。而且，这种在大多数时间都普遍存在的谨慎策略，到了一九四四年五月开始的六、七个月里简直成了流行病了。就在五月份，在孤注一掷的“一号攻势”的冲击之下，国民党在长沙的防线被突破，中国军队开始向印度支那边境方向溃逃。到了十一月，日军已推进到通向边境的走廊地区，并在途中占领了美国在中国最大的基地——桂林。节节胜利的帝国陆军然后移师西指，越过了贫瘠的贵州省，向该省省会贵阳推进，有直叩重庆周围之势，这时中国的阵线最后才算守住了。在“一号攻势”于十二月份达到高潮的前夕，国民党军队损失了差不多五十万，八个省及一亿以上的人口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一号攻势”才开始减弱。正是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重庆政府即将垮台或者被李济深将军领导的政变所推翻的传说广泛地流传了好几个月。李是广西的一个军阀，长期以来都是反蒋的。此外还盛传将会出现最常见的那种“谨慎策略”之类的合作局面。

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对以下来自许多途径的大量间接证据则完全不可能视而不见：据说蒋介石被李济深分裂运动的日益得势吓得要命，以致他自己都在打算越过采取谨慎策略的阶段同日本人合作。“一号攻势”恰恰在李济深将军和薛岳将军控制的地区之间穿过，打开了一条很宽的通道，而薛岳当时正在考虑是否将他的一支强大力量——十二个师——去支持李济深。至少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蒋介石对于尽力抗阻日军前进的李、薛二人是既不支持又不给增援的。谁也不能指责美国驻重庆的大使克拉伦斯·E·高斯有偏袒李的分裂运动的倾向，因为他命令他的下属不得给该运动提供它赖以生存下去的美援。他于一九四四年八月电告华盛顿：“我们的意见是，李和他的同僚们认为他们的运动的发展，已使得他们没有必要采取任何行动来保卫（东南）地区不被日本占领，中央政府显然不打算保卫该地区，也不打算给当地部队以给养和装备去保卫该地区。”[37]

李将军的朋友们、共产党人以及流行的传说都认为，蒋介石比不给他的潜在对手们以帮助走得更远。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从李济深的老根据地桂林报告说，据称蒋介石曾经“要求日军摧毁薛岳统率下的第九战区的部队，他认定薛岳策划了反对他的阴谋……。同蒋介石有联系的日军据

说曾向李济深及其同伙下最后通碟：如果李不放弃他加强反对重庆的。计划，日军将摧毁他的集团和整个华南地区。”[38]

根据流传的说法，日军与蒋介石甚至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日军就保证蒋介石的华西——即所谓大理—潼关方形地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39]虽然从日本和南京的档案中找不到确能证实有该项协议存在的材料（也许根本不会有任何正式的协议），但是南京与重庆之间经常派遣象吴开先那样重要的国民党代表当信使来来往往，很可能与这项非正式协议有关。[40]不管怎么说，“一号攻势”一打到大理—潼关方形地区就停下来了，正好在方形之外的桂林被日军占领了；正好在方形之内的贵阳就没有被占领。

一九四四年末蒋介石的处境垂危，使得重庆同日本与南京政权进行有限合作的传闻更加可信。达成这样一种权宜性质的谅解，对于防止蒋政权的崩溃来说可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的那几个月里，这样一种谅解在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很可能对国民政府有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巴顿·戴维斯是对中国复杂政治局面的最敏锐的分析家之一。他写的报告里就经常强调这一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戴维斯草拟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扼要地叙述了蒋介石处境危急，共产党和各个军阀都已准备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戴维斯最后说：

> 蒋介石要在国内继续掌权，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与日本支持的中国傀儡们进行合作。假定美国（也许还有英国）会把日本人从华东赶走或使日本人从华东撤走，蒋介石要重新保住特别重要的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城市的最稳妥的战略，就是同傀儡们进行合作，而这些傀儡很可能在日本人撤走之后蒋介石来到之前这段真空期间谋求对上述地区的控制权。因此，对干有些将领向敌人“投降”并将部队编人伪军，蒋介石如果不是给予批准的话，至少也是听之任之、心安理得的。与此同时，他还通过戴笠和其他特务同傀儡们经常保持联系。他通过这些渠道，可以接触日本方面的和平试探者以及其他和平建议并给予答复。*

戴维斯明确指出，他并不认为蒋介石决要投降日本人了，因为“蒋从

---

* 戴维斯把这个备忘录报送给罗斯福的特别顾问哈里·L·霍浦金斯，并在备忘录前加按语：“我想你会对讲到关于日本和傀儡们的那一部分特别感兴趣。”（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 724—727 页）

我们这里可以比从日本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又指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同日本人战斗。他所要的是（而且也许已经有了）一项与日本人互不侵犯的协定，从而可以给他积蓄力量的时间，以对付他认为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内战。”戴维斯还说，此外，日本人也欢迎这么一种态度。“我们不能再假定日本人想要消灭蒋介石和他的政府了。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何况这样做还可能使一个强有力的抗日联合政府形成起来呢。”

一个月以后（一九四五年一月），戴维斯又报道了一个“很聪明并且与高级官员有广泛联系的中国记者”对他透露的情况。这个记者说，“蒋介石重新控制华中和华东的最大希望就是将来通过与傀儡们的合作。……因此，重庆现在同南京与北平〔华北政务委员会）保持着接触。”他还说，日本人知道有这种接触而且批准这种接触，因为他们现在不想消灭蒋介石；了（“蒋现在对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了”）。[41]

戴维斯在写这报告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很有理由把蒋介石当成不可缺少的了。要是把蒋打垮了，他们就得设法对付李济深和薛岳这些人的坚决得多的抵抗，更不用提得对付在华北的日益强大的共产党了。不过，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李的分裂计划已不再构成认真的威胁了，这是由于在“一号攻势”中他的军事实力有所损失以及美国未能给他支持所造成的。多数美国观察家当时都认为李济深是一支进步的政治力量，而且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李就曾寻求美国支持他在东南地区搞反蒋的改良政府。驻在该地区的美国官员对他的请求是持同情态度的。例如，美国领事林沃尔特就曾认为，要是李济深的计划会迫使重庆政权垮台的话，“对中国和盟国的事业来说，其结果未见得会是一件很坏的事。”[42]不过，高斯大使大概是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办事，下令采取“不介人政策”，因此李济深分裂运动的势头也就逐步减弱了。[*]

对国民党的事业来说，南京政权和日本的军队只是在过了一年半之后——直到战争末期，尤其是战后最初几个月——才真正发挥了作用。这些军队被证明是国民党同共产党夺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它的领导人汪精卫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死去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

[*] 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 505—506 页；同上编，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 159 一 160 页。一九四七年李济深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加人了共产党阵营。他在一九五九年逝世之前，担任过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几项重要职务。他的潜在合作者薛岳则始终未对李承担义务。尽管他与蒋介石一贯不和，却于一九四九年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中得到了一个职位。

汪精卫的死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大东亚共荣圈集团内七个政权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了两天会。正如缅甸代表巴莫所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宗旨是“鼓舞亚洲的新精神首次公开发表政见”。*会议没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要讨论，倒是成了滔滔不绝或小心翼翼地对日本表示信任的时机和场所。印度的领袖苏巴斯・钱德拉・博斯说道；“我认为，大会在旭日之国召开决不是偶然的。全世界向东方寻求光明和指导也并非第一次。”[43]东京政府也乘此机会作了一些表示善良愿望的姿态。例如，为了对博斯的颂扬作出反应，东条首相就站起来宣布，日本决定将东印度洋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交给自由印度。对某些领导人来说，他们是头一次会面，对另一些人（如何塞・劳雷尔与巴莫）则是在战后东京鸭巢战犯监狱再度见面前的最后一次会面。汪精卫参加了那次会议。巴莫这样写道：“他仪表堂堂、笑容可掬，对谁都点头致意。他很少讲话，而且用词十分审慎。声调则是柔和中听。从他举止显得拘束和讲话时声调拖得很长等迹象看来，人们很快就会觉察到中国要出现一场悲剧了。”[44]

巴莫的回忆录所未提到的是，汪精卫的健康状况不行了。一九三五年企图刺杀他的那颗子弹一直还留在他的背部没有取出来，它所造成的严重感染症和他多年来所思的肝病并发。一九四四年元旦，汪的病况趋于恶化，是年三月由他的家属陪同飞往日本进行手术治疗。手术除了使他减少了一点痛苦之外并没有多大效果。从那时开始，汪的身体已不宜工作了。在这之后的八个月里，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一职由陈公博代理。

十月下旬，当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病重时，他自己预感到生命快结束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习惯不一样。西方人习惯于在健康状况还很好的时候就先写好遗嘱，而中国人则认为遗嘱可能是有吉祥预兆的文件，只是到了病人恢复健康已毫无希望的时候才愿写它。因此，汪精卫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口授下述声明：“自从我到日本来已经八个月了。过去几天以来一直发高烧。对我这个已经六十二岁的人来说，我自己的将来究竟会怎样是没有把握的。”†美国 B-29 飞机的轰炸是在十一月份开始的，因

---

*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 338 页。日本、中国（指汪伪政权。——译者注）、印度、缅甸、菲律宾、泰国和满洲国（指伪满。——译者注）等七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苏巴斯・钱德拉・博斯代表自由印度政府，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

† 参看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见香港《春秋》杂志第一五九期第 2 页），也可参看作者在本书第 503—512 页的《参考书目说明》中对汪遗嘱可靠性的讨

此，汪精卫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在地下室避弹所呆着，而那里的室内温度很低，通风设备又很差，于是他的病况急转直下。十一月九日他猝发了肺炎，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就死了。他的遗体被送回南京，打算在中山陵附近安葬。不过，他的精心修建的坟墓没有完工，重庆军队于十四个月之后再度控制南京时，何应钦将军经蒋介石批准把汪的坟墓破坏了。破坏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至少在一百五十磅炸药的爆炸声所允许的范围内是保密的。汪的尸体被烧毁了，骨灰被秘密地处理掉了。[45]

周佛海接管大权

虽然汪精卫的可靠同僚陈公博继任国家元首，但南京国民政府的真正大权早已落到周佛海的手中了，直到战争结束时都是如此。周佛海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许多职务，但没有哪项重要职务能反映他真正享有的权力。周佛海是靠他在玩弄阴谋诡计方面的才干和绝招而得到权势的。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早年是个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但他对于他自己晚年时代的思想信仰是否前后一贯这类高度原则性的问题，看来却非常无所谓。他把历史上谁是谁非这一类苦恼的问题留给汪精卫和陈公博去管。

同周一起搞和平运动的日本同僚们给周取了一个浑名——菩萨。[46]但那只表达了他的体型的外表。在个性上来看，他完全带有他家乡湖南的那种味道：感情用事而且容易激动——据说这种脾气同湖南人爱吃辣椒有关，当然周佛海也不例外。耶稣会的神父奥・布里埃是个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敏锐的评论家。他曾说过，虽然周佛海“并不是毫无优点的，但他却是个朝秦暮楚的家伙，老是定不下心来。”[47]正如我们上面讲过的那样，周佛海刚刚安下心来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他马上就开始考虑他自己背叛重庆政权是否明智的问题。日本人的专横早就使他气得要命。在战后周佛海以叛国罪受审时，周宣称他在对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中“和日本人合作是为了使中国得到好处，而在战争最后几年则同中国人合作与日本人进行了斗争。”[48]审判周佛海的中国法官在宣布对周的最终判决时，肯定对周的这种辩解持有相当的保留。和对周的最终判决来对照一下，周的说法显然是为自己辩护的成分过多，不过，其中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周佛海很可能从未中断过同重庆的联系。不管怎么说，早在一九四二年周肯定就几乎每天都同重庆的代理人们保持着畅通无阻的接触。周通过两个秘密电台同重庆联系。一个台是向他的老朋友戴笠将军——国民党主

论。

管军事情报的头头——的总部发报联系；另一个台是同他另一密友顾祝同将军联系。当然周佛海并未设想日本人对他所进行的这些无线电联系会一点儿也不知道，所以他同一些日本官员澄清了这件事。起初日本人对这种做法表示极不信任，但周佛海设法利用了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通过好友们的帮忙，终于得到了必要的批准。这位能说会道的周佛海甚至使日本人信服，这种电台接触有助于安排一项同重庆和平解决战争的办法。

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军部中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存在着两个秘密电台的事。[*]汪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冈田洋次海军少将就是少数几个知道有电台存在的人之一，同时他也是周佛海所信赖的盟友之一。[49]另外一个知情者就是金雄白，他大概算是周佛海在政治上最亲密的心腹了。金雄白感到周佛海最糟糕的错误是：哪怕是最小的事，他都要同重庆商量，这几乎已成为他的习惯了。例如，一九四三年末，周佛海在接受上海市市长一职的任命前就曾征求重庆的同意。显然重庆对周佛海的感情的照顾同样也很周到，至少在周佛海母亲死去这件事上就能说明这一点，因为重庆当时马上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周佛海。[†]

据金雄白说，重庆在一九四三年末交给了周佛海好几项任务，这时正是汪精卫体力已不能胜任工作之前不久。周在开始执行他的任务时“情绪非常饱满”。这些任务包括：为国民党军队筹措军粮、任命重庆点头认可的人当省主席、保证南京的伪军一定不同效忠蒋介石的军队发生冲突、以及一般不乱花南京政权自己能掌握的资金（周当时除本职外，还兼任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50]

在战争将近结束时，交给周佛海的任务就更加多了。一旦盟军可能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时，周佛海就得负责在日军防线的后方协调抗日的暴动和起义。他再一次热情地接受了重庆给他的使命。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捞到机会来证明他对重庆的耿耿忠心，因为美军在太平洋的越岛战略取得成就加上原子弹的轰炸，排除了在中国大陆搞牺牲很大的登陆的必要性。金写道，要不是由于这个原因的话，“周本来是还有机会去显示他的重要性的”。[51]

---

[*] 周佛海把每天进行无线电联系的任务交给了两个经过严格审查的中国人。不过，他的审查显然还是不够严格，因为两人中之一的彭森木就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至少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起，彭就已经在为重庆效劳了，这时彭在陪同汪和周去东京访问时担任翻译。（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05 页及第 250 页）

[†] 周佛海在收到他母亲死去的消息的当天就要尽人子之孝道，准备向上海新闻界发表讣告。当时金雄白劝周佛海等个时候再办，免得把与重庆有无线电联系这件事给暴露了。可是周佛海这个孝子却要金少管闲事，仍按原计划宣布了讣告。（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252 页）

即使如此，周佛海也还有“显示他的重要性”的余地。一九四五年初，许多在中国的人，特别是上海的企业和金融界的，巨头们都害怕帝国陆军一撤走，城市恐怕就会成为一片“焦土”。的确。象上海这个地下是一大摊烂泥的城市，弱点是非常之多的。电力的中断会使整个城市排水系统不通，接着几乎肯定会发生一场瘟疫。当然，这个城市也有可能被付诸一炬。美国外交官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报道说，“中国中央政府和傀儡的头头们都极力设法避免打一场会毁灭他们主要经济中心的战争，因为他们在那些城市里都拥有很多财产，而且许多人都还有家人和亲属居住在那里。”[52]谢伟思指出，日本人恐怕也很不愿意使上海成为一片“焦土”，因为对那里“大量的日本侨民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人是希望予以保护和保存的”。中国红军也许比国民党军队更易于占领上海的真正可能性，把整个问题搞得进一步复杂化了。在估计这些复杂的未知情况时，谢伟思最后认为，“中央政府、傀儡们和日本人之间有一种共同利益”。[53]事情完全是这样的。作为上海市——虎穴——市长的周佛海成了这种共同利益的关键人物。周于一九四五年初写道，他了解到蒋介石正在计划举行一次反攻，这大概是周与他的老上司进行的唯一一次直接的个人接触。他说，就他自己来讲，“我身处虎穴，因此帮助你进行反攻的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拖延时间，我们的准备就会不充分；如果我们匆忙行事则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对你的命令，我会优先执行。等胜利之日来到时，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严厉处分，那怕就是死也情愿”。*

上海、南京以及其他长江沿岸和沿海的城市最后都由傀儡军和日军交给了蒋介石的军队，而没有交给共产党，不过整个过程完全不合乎常规，而且进行得并不很快。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同村宁次将军在日本投降三天之后，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对他的部队规定一项投降后的基本政策：在重建中国方面进行合作‘ 协助国民政府努力把中国人民统一起来；如中国共产党确有反日活动，那就“坚决予以惩办”。[54]

冈村命令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他就是七年前汪记运动早期起过重要作用的那个今井——到湖南芷江去同国民党当局安排日本军队投降的事宜。当今井于八月二十一日在芷江下飞机时，他发现机场排列着美国和中国的士兵，都急于想看一看从被击败的日本派来的第一位军使是什么模样。今井之行以后，接着国民党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于八月二十七日开

---

*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70—271页。周的信是由国民党地下活动的头子蒋伯诚转交的。据说蒋介石收到了这封信，对于周持恭敬的态度印象很深。他本来想回周一封信，但有人建议，从政治上考虑，送一个口信比写回信更好一些。（同上书）

始与冈村会谈。[*]冷欣要求冈村进行合作，以便“接收”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青岛、广州与香港等八个主要大城市。冈村表示同意，但他指出他的军队在对付共产党军队方面已经遇到困难，而且将来也还会不断遇到困难，因为共产党军队也要求日军把武器和装备交出来。冈村建议冷欣尽早派出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去华北，因为华北地区的局势特别麻烦。他又说，他个人相信：虽然日本的将来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中国的将来——假定共产党的威胁被消除之后——则会是“和平而且宁静的”。[55]臼井指出，冈村—冷欣的会谈基调表明：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56]

当帝国陆军和傀儡政权的部队开始为他们昔日的敌人保全中国各大城市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在准备开始打一场为肘四年的你死我活的内战了。在上海的日军仍处于武装戒备的状态，甚至九月二日（日本投降十八天之后）到达上海的美国人还被他们抓起来了。[57]这事件发生在国民党军队开始大量开到上海和冈村宁次将军九月九日在南京签署投降文件之前几天。九月十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报道说，周佛海在使“傀儡军变成国民党”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德丁还写道，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怂恿，周佛海“在上海地区负起了‘维持治安’的职责，所用的军队据说还是一支相当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现在仍然起着维持治安的作用。”[58]直到十月三日，周佛海才被抓起来，用飞机送到重庆去。同时被抓的是丁默村，汪精卫的社会部长兼（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的头头。

这时，正如冈村所许下的诺言一样，在华北的日军和共产党的军队发生了冲突，而不是向他们投降。九月九日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报道

---

[*] 译者按：庞镜塘写的《日寇投降后冈村宁次的一个反共建议》（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第58—60页）一文中，谈到冷欣曾亲自告诉庞本人关于冈村宁次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反共建议。兹录于下：冈村宁次说，“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的问题。这是中国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另一方面，我们的军队连同军队附属人员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总共不下六、七百万人，骤然被遣散回国，不要说安置职业成问题，就是吃饭也大成问题。与其回去无法生活，还不如就在中国住下来好些。因此，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得到采纳。但事不宜迟，恐怕稍延时日，军心一经涣散，战斗力就不保险，要大大削弱了。”此文还揭露说，“冷回来后即密报何应钦请示，很快便得到蒋介石从重庆来电，要冷欣携带冈村的具体计划飞重庆当面报告。事后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这份建议，深得蒋介石的‘嘉许’。”

说，共产党接管冀鲁地区的企图受到阻挠，因为国民党的司令官们得到了傀儡军和日军的“增援”。赫尔利觉得，其结果是：共产党很可能转而北上试图控制平津地区，不过看来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日本人牢牢控制着交通线，使得共产党军队的调动很困难”。[59]

在九、十两个月中，美国大力帮助国民党这一边，提供运输机把他们的军队空运到华东和华北的主要地区。等到空运也不敷时，美国就派了五万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以占领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等的港口和机场。这些交通中心不仅对控制华北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控制满洲国也是很重要的。（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早已占领了满洲，不准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秦皇岛于是成了华北地区离满洲最近的港口。）到了十月底（战争结束后约七十五天），美国驻天津的领事报告说，控制北平到秦皇岛这段重要铁路运输线的日军经常受到共产党的攻击。他的电报说，在这个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几乎完全靠前傀儡军和日本军队维持铁路沿线各城镇的秩序”。[60]

日本投降三个多月后，驻华美军总司令艾尔伯特・魏德迈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向美国参谋总长汇报说，“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不可能继续有效地解除日军的武装，其原因有三”：中央政府的军队被抗击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任务所牵制；国民党政府正使用日本军队来保护交通线及交通设施以对付共产党；要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其有实力的地区把日本军队解除武装，那末共产党军队就会开进来，不仅会接管日本人撤离的地区，还会把日军的武器和装备都接收过去。[61]

对于国民党、傀儡军和日本军队的勾结，毛泽东在延安曾加以严厉的谴责。在日本投降的两天前，他在一篇题目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新华社评论中大骂蒋介石：

> 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

---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直排版，第 1137 页、《选集》编者对“曲线救国”一词的解释是：“‘曲线救国’，是……实行降日反共的一种卑鄙手段……。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寇，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解放区，党称为所谓‘曲线救国’。”（见同书，第 1140 页）

紧接着战争结束之后，帝国陆军的某些部队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关系发展得特别亲密。[*]从阎锡山开始控制山西后的三十四年中，阎与蒋的关系最坏时（在一九三〇年）可以达到公开打仗，最好时也不过只是勉强共处而已。在战争结束时，阎坚决让国民党在山西的权力徒具形式。然而，对他的权力提出了真正挑战的是共产党。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共产党八路军的确已从他所控制的山西省夺走了一大部分地盘。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威胁，阎锡山在战争期间同日本人的合作是时断时续，及至一九四五年，这种威胁已经加剧，他就开始加强他和已被击败的敌人的联系。

阎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说服日资山西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和公司的几个技术专家留在太原，帮助他在经济落后的山西省制订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62]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这时是阎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不是别人而是河本大作。正是这同一个河本大作在一九二八年（当时他是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布置了暗杀张作霖将军的事件，而且是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的煽动者之一。[†]

战争结束六天后，阎锡山派他的女婿王靖国将军到临汾这个日军的重要据点，去同第一一四师团的师团长三浦三郎少将谈判一项协定：阎的军队不但不解除在山西日军的武装，而且还愿意同他们紧密合作以“防御”共产党军队。不久后，一支完全是日本志愿兵的队伍组成了一个特务团，并且开始了保卫阎锡山的山西帝国的战斗。[63]

阎锡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对于日本陆军的团结精神和军事传统异常钦佩。他聘请了一批日本军官在太原办了一个军事学校来训练他山西军的军官。日本人对这种盛情的邀请迫不及待地表示了同意。一九四六年初的一天，当阎锡山去视察他的部队（通常他总是由一位穿着帝国军服的日本将军陪同）时，他手下的一个中国将军领着集合起来的士兵高呼了一系列的口号。“中华民国万岁！”——等到激昂情绪过去之后，又高呼：“日本帝国万岁！”一位日本目击者显然很自豪地写道：“这是战后头一次公开听到‘日本帝国万岁’的口号，而且还是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一块高喊的。”[64]

---

[*] 译者按：关于阎锡山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情况，可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 158 页赵瑞写的《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一文。

[†] 军阀张作霖，又称老帅，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八年是“东三省”（即满洲）的统治者。当日本最初插手这个地区时，日本人发现张作霖还是日本扩张主义计划驯服的合作者。可是到了一九二八年，他变得不那么顺从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河本大佐所策划的事件中炸毁，几天之后张就死了。一九三二年河本离开了军队，当上了南满铁路的董事。

战争结束十八个月之后，在太原的美国旅游者看到太原满街都是穿着阎军军装的日本兵，不过这些日本兵都在他们自己的指挥官指挥下进行作战。[65]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阎同共产党频频交战，当红军终于粉碎了阎对山西省的控制时，“日本士兵已构成阎军的主力了”。[66]当一九四九年四月最后时刻到来时，为阎锡山的事业最后卖命的就包括今村丰作将军的饿得半死、走投无路的部队在内。*

尽管这样，山西的情况毕竟是个例外。在其他地区，遣送日本部队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到一九四五年末，日本人在中国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不过，某些有影响的帝国陆军军官明确对蒋介石表示，他们将竭尽全力帮助蒋与共产主义作斗争。例如，石原莞尔的一个忠实信徒辻政信大佐在一九四五年就表示愿意为蒋服务——他是“亚洲人的亚洲”的鼓吹者，对华北和满洲国日本人反共活动情况非常了解的情报军官。在战后年代里，帝国陆军军官中为蒋介石服务的最高级军官要算冈村宁次将军了。他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战后，他的许多同事当时分别在马尼拉、雅加达、东京和其他城市作为战犯而受审判，而他却在为国民党政府应该在内战中采取什么战略的问题出谋献策。一九四九年一月，当上海的一个法院正式赦免不到七年前曾在华北搞“杀光、烧光、抢光”等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时，毛泽东愤怒地宣布，“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

合作者的命运

至少早在一九四四年一月，重庆政府（在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就暗示过，“在可以说得过去的”情况下，某些汪政权分子将会得到宽大处理，甚至会得到赦免。[67]在战争结束后，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大多数低级官员，甚至有些部长一级的官员，只是舒舒服服地被监禁起来，到一九四九

---

* 今村将军宁可服毒自杀而没有投降共产党。阎也表示他宁可服“毒茶”也不投降共产党。《生活》杂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41 页）登载了阎锡山怎样向人显示一盒子氰药片，说是为他自己和他的一家人自尽准备的。不过，他最后找到了一条既不投降又不自杀的道路：他与蒋介石和解了，并于一九四九年底同蒋一起逃到台湾去了。他于一九六〇年死在台湾。（见唐纳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 287—288 页）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直排版，第 1399 页。一九四九年辻政信和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冈村在退伍军人组织方面积极活动，在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辻政信于一九五二年当选国会议员。他于一九六一年到河内为《朝日新闻》采访印度支那战争新闻时神秘地失踪了。

年就被释放了。在被监禁期间，不仅准许这些“犯人”互相自由交往，而且还准许他们与外界自由接触。汪政权的教育部长李圣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他和他的狱友们“得到的印象是，国民党政府最初并不打算处死任何人”。他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处理缪斌妻子的问题上改变了态度。缪斌是新民会第一任会长，参加汪政权后任考试院副院长。一九四五年，他自称是重庆密使到东京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究竟他是否真正代表国民党政府，谁也搞不清楚，不过（日本）最高战争委员会无论如何对此表示怀疑，于是梁的使命也就失败了。[68]据李圣五说，缪夫人“愚蠢地”公布了暗示重庆高级官员与她丈夫的和平使命有关的文件。李圣五解释道，“这些文件显然使某些人感到很尴尬，因而不久之后，缪斌、陈公博以及其他人的处决就开始了。”何炳贤说，他们是根据特别指示被处决的。[69]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合作者头头们的遭遇。

如前所述，周佛海尽管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些日子里在上海为国民党效劳，但他还是被逮捕了。戴笠亲自照管这个犯人，并陪他一道口到重庆。周和他的家人一起被软禁在重庆。戴同周私交甚笃，而且也是周和重庆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飞机失事丧命，这对周来说是很不幸的。戴之死对于周和其他汉奸的命运之不利，正如上述缪夫人公布文件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但还应指出，在这个期间，共产党报纸指责国民党政府迟迟不把汉奸们交付审判，这也许在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方面也起了些作用。）[70]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戴死后两个星期之内，政府就开始起诉。周佛海和缪斌是头一批被审判的。周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在他对这类案件颁发的少数几个特赦行政命令之一中把周减为无期徒刑。[71]特赦令宣称周在一九四四年重新效忠国民党政府。周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在狱中因心脏病死去。

陈公博害怕会被处死，于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就从南京逃到日本京都去了。他在那里躲藏了大约两个月，然后在十月里被解送回南京拘留受审。一九四六年春，他和汪政权的其他头子们在苏州以叛国罪受到公审。他极力为自己辩护，最后声称；汪政府没有哪一天停止过同日本人的斗争。他于四月五日被判处死刑，两个月之后被枪决。

维新政府的前主席、后来汪政权的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一度躲了起来，但后来同他的姨太太一起被抓住了，并在受审判后被处死。临时政府的头头、后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于一九四五年在北平的一个监狱中等待审判时死了。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三年间也当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揖唐是一九四六年九月被处决的。其他被处决的大头目中还有梅思平、林柏生和褚民谊。据金雄白估计，汪政权的军政头目中约有二

千七百名被处决，另外有二千三百名（包括汪精卫夫人）被判处无期徒刑。[72]

有些合作者从未上过法庭就被民众团体处决了。陈春宇（报纸说他是日本驻杭州秘密警察的头子）就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被群众抓住了，游街示众后，很快就被处死了。[73]不过，这类事件在乡村比在城市要普遍得多。在共产党军队解放的农村市镇中，干部们通常把当地的豪绅们抓来，进行简单的公开审判，摧毁这些豪绅们在农村的铁腕统治，为土地改革和日后的集体化准备条件。地主们最通常的罪状之一就是同日本人勾结。的确，这种罪状往往都是证据确凿的。许多富有的地主为了要保住他们特权的经济地位，毫无疑问是有亲日倾向的。总之，"解放区"的有产阶级面临以下两种选择：要嘛同敌人合作，要嘛向共产党打击富豪的政策投降。他们之所以选择了不爱国的办法也是不足为奇的。许多选择同敌人合作的地主往往在"人民法庭"上激起人们怒火般的义愤。

贫苦农民终生受到专制地主无数苦难折磨，而地主同敌人勾结给他们的折磨则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还不是主要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关于山西省石墙村严惩地主的报道告诉我们，那些苦难和折磨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多得罄竹难书。在那里，地主为了从当地日本军队指挥官那里得到减免征粮的优待，经常（向他的佃户勒索必要的菜肴）在家里设宴招待日本军官；强拉壮丁到日本劳工队去干活；强迫妇女去满足日本军官的兽欲；总之，把日本人当作大棒来威胁任何敢于反抗他们在农村的铁腕统治的人。[74]考虑到贝尔登所讲的"诉苦会"往往是处决这些可恨的豪绅的前奏，看来村民们并不光是因为地主同敌人勾结这一条罪状而引起愤怒的。他们的愤怒没有针对地主的卖国行径，也没有指控地主有类似叛国这种罪名。与敌人的勾结只是被当作地主们为了加强千百年来对农民的残暴统治的另一条附加罪状而已，正是残暴的统治才引起农村广泛地对地主们愤怒地行刑。

在非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同敌人勾结的罪名有时完全被摆到一边去了。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一年间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了。从一九四〇年起，爱国人士（特别是华侨中的爱国人士，而许多华侨的老家都在福建）就一直在批评陈仪的政府贪污成风、镇压成性，还批评陈仪不肯同日本人割断联系，不在全省进行全面抗战。[75]最后，蒋介石总算于一九四一年满足了那些要把陈仪撤换掉的要求，命令他到重庆去——可是，并不是使他丢脸或予以惩处，而是任命他为行政院秘书长。

一九四五年十月，福建人士又猛烈抨击陈仪是个汉奸，是"全省人民所鄙视的无法无天的军阀"。[76]陈仪被控为逮捕和处死千千万万抗日人士的

元凶，还被控曾把南满铁路的人员请到福建去开发矿山等等。可是陈仪不仅没有被判为应对此负责，反而被任命为刚从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之后解放出来的台湾省的省主席。这项任命的宣布激起了极大的义愤，福建和台湾人士象潮水般地纷纷写信到重庆，要求蒋介石重新考虑这项任命。曾在战后最初几年驻台湾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写道，“这里有一股不满的暗流。现在日本终于被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同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结为盟国，嘴里不知讲了多少有关前途和改革的好话，可是现状却是这样。”[77]蒋介石对那些抗议置之不理，认定陈仪是最适合任省主席的人选，因为陈既有同日本打交道的经验，又有统治福建省的经验，而福建同台湾隔海相望，又是台湾岛上大部分居民的老家所在的省份。

陈仪在台湾一年半的统治使他更加声名狼藉。在大多数台湾人的眼里，国民党已从解放者变成了掠夺者。日本人对台湾岛的统治尽管是严峻的，并且经常进行镇压，但他们的统治至少是有效率的、不贪污的。台湾人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还得到过一些好处（譬如，该岛居民的识字率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比日本本土略低，比中国大陆则高得多）。台湾人很快就对他们的新统治者不感兴趣了，同旧统治者相比，新统治者是傲慢、无能有余，而在廉洁方面则远远不如旧统治者。[78]一九四七年二月，台湾人的不满上升成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眼看就有爆发全面暴动之虞。这时陈仪乃下令镇压，其残暴的程度是岛上居民在日本人统治之下都从未经历过的。

等到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告一结束时，“好几千台湾人被屠杀了，其中包括人数不多但差不多全部受过现代教育、有行政经验、在政治上较成熟的台湾领袖们在内”。[79]魏德迈将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台湾人害怕“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南京的摇摇欲坠而又腐败的统治机器，正在计划血洗全岛，我认为他们的恐惧是很有理由的。……许多人都不得不承认，在[日本]的专制统治下，也许情况还会好一点呢。”[*]

---

[1]见约翰·梅基的《一八九四——一九六〇年间在远东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文件》第 105 页。

[2] 见唐纳德·基恩的《日本的作家和大东亚战争》（载《亚洲研究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十三期）第 212 页。

[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68—171 页。

[4] 同上书，第 168 页。

---

[*] 见美国国务院统的《美中关系》第 309 页。蒋介石不能再无视反对陈仪当省主席的抗议呼声，于一九四七年四月把他召回南京。一年之后，陈仪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一九五〇年初，蒋介石下令处决陈仪，理由是：陈仪是个共产党阴谋家！

[5] 同上。
[6]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29 页。一九七〇年我访问今井和冈田洋次海军少将时，他们认为影佐当时的调动并非出于政治原因。
[7]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二卷第 169 页。
[8] 同上书，第 167 页。
[9] “对华新政策”不是正式全称，其正式全称是：《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全文载日本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 580—581 页。今井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 281—284 页有所述评。
[10]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一一五期）第一一三期第 49 页；另见访问山崎重三郎的谈话记录。
[11] 见访问山崎的谈话记录。
[12] 见明石祐治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未发表的手稿）一文。关于薛岳，见沃伦·科恩的《谁在湖南抗日？——对中国为战争所作努力的几点看法》（载《亚洲研究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七期）第 113—114 页。
[13] 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 17 页引了畑俊六将军在他未发表的《畑俊六日记》中的记录。
[14] 实例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二年第四卷第 212 页；另见埃德蒙·克拉布的报告，载上书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 786 页。
[15] 见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 63 页。
[16] 见唐纳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 11 页。
[17] 上书第 236 页引了《字林西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评论。
[18] 同上书，第 272 页。
[19]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 171—172 页。关于“对伯工作”的文件，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449—521 页。
[20] 见平野礼次的《满洲阴谋家：河本大作的灾难的足迹》第 199 页；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 282 页从上书引了这一情况。
[21] 见田中隆吉的《日本战败的原因大白：军国主义者飞扬跋扈的真相》第 18 页；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 280 页从上书引了这一情况。
[22] 见高□满俊的《鼓吹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第 166 页。
[23] 见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 68 页。
[24] 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 327 一 328 页。

[25]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 385 页。
[26] 见李恩国的《汪精卫的晚年经历——特别是有关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间他的国民政府对日合作的问题》第 176 页。关于模范区和保甲制的论述，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 61—67 页，210—212 页。
[27] 见莱曼·范斯莱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第 121—122 页。
[2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75 页。
[29] 见汪精卫的《汪主席献给日本天皇的纪念文章》。
[30]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估计数字，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 222 页。范斯莱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第 96 页引美国陆军部的估计数字。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94 页，估计正规军人数为六十万人。
[31]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88 页。
[32] 同上书，第 210 页。据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 128—129 页载，这些将领都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
[3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210 页。
[34] 见格雷厄姆·佩克的《两种时代》第 573 页。
[35]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 160 页；另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94 页。
[36]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 199 页。
[37] 同上编，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 510 页；另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 472—473 页。
[38] 见林沃尔特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致高斯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 151 页。
[39] 见格雷厄姆·佩克的《两种时代》第 580—581 页。
[40]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47—153 页。
[41]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 161 页。
[42] 同上编，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 151 页，414—415 页。
[43]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 345 页。
[44] 同上书，第 338 页。
[45]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二〇二章。
[46]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8 页，第 376—384 页。
[47] 见布里埃的《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年五十年中的中国哲学》第 21 页。
[48]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164 页。
[49] 访问冈田洋次的谈话记录。关于秘密电台的叙述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

质》第五十七章。

[50]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215 页等。

[51] 同上书，第 217 页。

[5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 52 一 53 页。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53] 同上。

[54]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第 188 页；另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第 364—368 页。

[55]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第 189—190 页。

[56] 同上书，第 190 页。

[57] 见梅乐斯的《一种不同的战争》第 531 页。

[58] 见《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第 4 页。

[59]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五年第七卷第 553 页。

[60] 同上书，第 599 页，原文中“日本军队”有括号。

[61] 同上书，第 663 页。

[62] 见条野的《山西独立战争记》（载青地信编《大陆梦》）第 281—282 页。

[6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第 197—198 页；另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第 378 页。

[64] 见条野的《山西独立战争记》第 298 页。

[65] 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第 285 页，引《纽约时报》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的两篇文章。

[66] 同上书，第 286 页引了平野礼次的《满洲阴谋家：河本大作的灾难性的足迹》第 210 页。

[67]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四年第六卷第 319 页，第 333 页。

[68] 见韦斯利・菲谢尔的《日本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和平攻势》（载《远东季刊》一九四九年第十三期）第 387—397 页，另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 174—180 页。

[69] 访问何炳贤和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70] 例证见《纽约时报》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18 页。

[71]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455 一 456 页。金认为周佛海的朋友陈布雷安排了蒋与周佛海的两泪汪汪的妻子见面后，蒋就发了善心。

[72]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 490 页，引了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73] 见《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第 5 页。

[74] 见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了全世界》全书，特别是第三十章。另见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

[75] 明石的《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第 74—8l 页，记述了陈嘉庚（南

洋华侨总会主席）发动的打倒福建省主席陈仪的运动。关于陈嘉庚和陈仪的生平，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165—170页，第25l—254页；以及乔治・克尔的《福摩萨被出卖了》第53—56页。

[76] 见《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2页。

[77] 见克尔的《福摩萨被出卖了》第56页。

[78] 见马克・曼柯的《死心绝望的海岛——台湾》第2页。关于叙述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成就的著作，见江藤信吉的《台湾历史梗概》（载马克・曼珂编的《今日的台湾》第43—58页）。

[79]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253页。

第十六章 估价

自从汪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离重庆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签订中日基本关系的条约为止，中间经过了两年。对汪说来，这两年是几乎不断失败和节节投降的两年。汪错误地设想中国政界已“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派”，但事实并不是这样。[1]他的和平运动没有打动重庆政府，没有使有些关键人物倒向他这边来，没有赢得东南亚广大华侨的支持，也没有得到被人认为是摇摆不定的任何军阀将领的赞助。日本人的想法是：“反蒋”的人就意味着“亲日”，或者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使他们转变成为“亲日”派。这种想法使汪错上加错。汪并没有能够使重庆的紧张政局和派系斗争加剧从而削弱其进行战争的能力及决心，眼看着蒋介石把政敌们一个一个地加以制服，他在河内和上海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因为这时蒋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及要继续进行援助的诺言。蒋的实力加强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虽说够不上典型统一战线的水平。但在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之前也一直进行得还算顺利。

总之，中国从来没有那样团结一致，齐心抗战，而汪却越来越背离了当时全国的民意。根据各方面的了解，在他的私人秘书和密友（曾仲鸣）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被国民党刺客暗杀以前，他差一点就要承认失败而流亡国外了。但是那次暴行激怒了他，使他重下决心来反抗重庆对他的恐吓。

自从他在日本帝国陆军军官陪同下，乘一艘日本轮船从河内出发回到中国土地上那一天起，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的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时为止，他把大量的中国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人——而这正是他原来常常发誓坚决不肯干的事。他同意了建立顾问体制，这使日本人能有效地控制几乎所有各级政府机关。他承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和蒙疆（包括长城以南的地方）的自治。由于他同意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他就配合了日本，使那中国历史上的心脏地带成为受日本紧紧控制之下的自治区，并且使这个极为重要的地区和日本的战略目的联系在一起。甚至据称他的政权尚能自主的首都一带，即在长江下游地区，他对于日本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享有特权的要求也一一应允。

总之，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从未有过一个类似法国未被占领地区的维希政权那样的政权，而维希政权几乎在同一时期从它的征服者那里争取到了一个非占领区。我们知道，汪的同事们同帝国陆军参谋本部最初达成的谅解是要在华南没有被占领的省份成立一个政权的。我们没有必要把这

个计划为什么失败和怎样失败的情况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但是值得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同意在占领区而不是在非占领区建立政权，对这个政权的性质和目的有重大关系。高宗武和汪的其他追随者早就意识到这样干下去，汪政权就会受到人家指责它对日本奴颜婢膝而无法辩解。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她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暧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的确有一些日本人主张对汪采取远为宽大的政策。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人是根据石原莞尔将军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战略观点的，而石原认为苏联才是日本真正的威胁。这种观点要求日本非同中国和解不可，因为有一个持敌对态度的中国在背后，日本是不敢同苏联对抗的。为了改善和稳定中日关系，石原提出要建立一个符合两国利益的东亚联盟。这个建立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松散联盟能够保证向日本提供对抗苏联所需要的安全和经济力量，石原认为，只要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和扩张的果实持否定态度（令人费解的是，他自己也曾经参与并发动过这一侵略行动），那就不难诱使中国来支持这个联盟。*这样一来，这个联盟的目的不但适合，而且还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因为中国也同日本一样，有了这个联盟而会得到加强，能够抵御不论是来自苏联或是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

---

* 在本书中，我始终有意要对石原异常尊重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高度赞扬。虽然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也不应该使我们对于石原思想中的一些很有问题的内容视而不见。他毕竟提出过要让参谋本部来决定国家政策的建议；而克劳利则曾指出（见《日本谋求自治》第 394 页）：“这一建议会否定内阁和首相决定官方政策权力的合法性。”其次，我们应该记住，石原并不把同中国搞和平当作目的，而是把它当作手段，以便发动一场不可避免的对苏战争。最后，由于石原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凡是没有规定完全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的任何一种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他肯定都不会接受、人们现在只能猜想石原的想法究竟会把日本带向何处去；但是参谋本部大权独揽、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加上日本卷人重新爆发的中国内战等等，这一切大概不会给日本带来幸运。

象犬养健和影佐祯昭等一贯最亲密地参与日汪合作的日本人，都自认为是石原的信徒。他们一心一意要依照石原的设想来建立汪政权，力图降低日本对汪的要求并对汪作足够的让步，以消除其傀儡的臭名，使他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并能生存下去的政权。由于影佐的重要地位和他同陆军上层人物的关系，加上犬养和首相的交往，汪对他们能够履行其诺言抱乐观想法是有点理由的。但结果却证明这种乐观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因影佐和犬养等等都无法说服日本领导人别提出过高的要求，这就注定了日汪进行合作的试验和日本大泛亚主义的目标的命运非失败不可。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影佐和犬养的奔走没有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日本政界中有一种固定而又普遍的想法：感到重庆极为重要，决不能予以忽视，如果重庆不作为协商的一方，就不可能达成一项解决中日争端的有意义的办法。由于蒋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和汪之间人所共知的矛盾，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同汪搭上了关系， 那就一定会使对华战争拖下去，更不要说进行全面合作了。所以这个时期的文章经常出现这样一个比喻：就象犬养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把汪看作只不过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而蒋才是盛宴以待的（尽管是迟到的）贵宾。虽然今井将军很钦佩汪，但他也很坦率地承认：同汪合作“并不完全象在阴间碰见了菩萨那样”。[2]可见，连最赞助汪的人也感到有必要设法同重庆达成协议，因此，他们在究竟以支持汪政权为最终目的还是利用汪作为通向国民党政府的桥梁这两者之间一直摇摆不定。

还有其他原因有助于说明石原—影佐—犬养对中日合作的设想为什么会成为泡影。最明显的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分治合作”政策打击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能够期望中国人会拥护一个参与肢解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呢？可是日本却要求她的中国盟友不仅要容忍满洲国和华北伪政权的存在，而且还得公开表示赞同。一九三八年底，北平的学生们被迫去参加为庆祝武汉三镇陷落而举行的大规模田径长跑比赛之后，怎么会不痛恨日本呢？当这些学生（以及他们的教师）在一九三九年参加一次运动会而集合时，当他们头顶上飘扬着临时政府的五色旗，眼前看到（那纳粹纽伦堡阅兵式的东方翻版）由好多人群组成“东亚新秩序”五个大字时，他们心里准会怎样想呢，难道他们不会象历史学家臼井那样都能看出“统治沦陷区的不是临时政府而是日本军队”？[3]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在参加了要通过决议感谢帝国陆军创立满洲国而召开的一次会议后，决心再也不受同日本人合作的气了。试问又有多少个和日本人搞合作的中国人不和他抱同感呢？[4]

可是日本抓住她战利品不放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就是那些对中国民

族主义最表同情的领导人也没有考虑过放弃满洲国。石射的《意见书》中就从未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石原在他反对政府的多次演讲中肯定也从未提到过这件事。石原反而（振振有词地）争辩说，满洲基本上不算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把满洲人、蒙古人以及朝鲜人的这块土地变成了殖民地的。日本到那里去，为的是免得它落到西方国家的手里去；现在它只不过是"一个中日共有的殖民地"。[5]在我们所调查过的那些和平试探活动中，日本没有考虑过要放弃满洲国。据我所知，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人才认真考虑过这一让步，甚至这时也还得不到东京的支持。[*]但无论如何，这时重庆已无意同日本单独媾和。没过一个月，苏联军队就跨过满洲边界蜂拥而至，从根本上把日本能作自由选择的机会一笔勾销了。

历史学家冈吉武所谓的日本"在心理上孤立"[6]于亚洲国家之外，乃是中日合作试验之所以失败的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冈吉武认为：由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有其独特之本源，所以这种孤立状态就得到了发展。正是因为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是经政府灌输而来的，所以它就具有一种人为的性质。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从整个世纪极其痛苦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容。总之，由于日本人没有经历过受外国人凌辱的历史，他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饱经屈辱的亚洲邻国的思想感情。只有缺乏这一心理因素才能说明为什么日本硬要以蒋介石辞职作为停战条件之一，而且不顾石射猪太郎和另外许多人的劝告，坚持这一要求。而石射等人则意识到了蒋是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强大象征。日本完全无视这一事实，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汪，用种种苛刻的条件剥夺了汪和他的政权的爱国号召力，然后通过把汪打扮成与日本同心协力为一个受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求解放的解放者的办法，希望他重新获得那种号召力。这种异想天开的愿望只能用"在心理上惊人地脱离"了中国民族主义这种说法来解释。能够理解这个愿望所包含的巨大讽刺意味的日本人是极少数的，但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十分清楚的。

在这以前的整整四十年中，日本倡议的"泛亚"设想先后曾有过多次，但能符合石原将军所要求的真正平等的则寥寥无几[7]。石原的同僚中因泛亚主义的循环推理而作茧自缚的却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泛亚主义赋予日本以制止苏联和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张的责任，但为了实现这项解放的使命，她自己就得向中国扩张，并在中国取得战略基地。这种泛亚主义的概念在

---

[*] 这是由今井将军所进行的多次秘密活动之一。这次他（奉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之命）试图同国民党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将军谈判一项和平解决的协议。（见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另见今井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 336—338 页）

日本人的思想中得到发展，而这些人的思想充其量只能说是刚从他们国家过去历史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中解放了一半而已。封建社会使它的人民从等级，而不是从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难道我们还用得着问日本泛亚主义者究竟认为哪一个国家应该坐第一把交椅吗，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帝国主义及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同态度，就提供了答案。

中国的态度是软弱的，而日本的态度则是强硬的。假若要把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对孪生的祸害从亚洲清除掉，显然不能把这项任务的领导权交给中国。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中国连领导这场圣战的最起码条件也不具备，因为她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酒井隆少将于一九三九年写道:“中国只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国家。”他接着说：“或者还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土匪的社会。”他又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常用的口吻说：“中国人民是污染世界文明的细菌。”[8]

日本人对于中日两国在泛亚秩序中相应的地位如何的独特看法——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威胁最大——表现在他们对于“天职”的信仰。根据这个狂热的想法，不管中国愿意与否，日本不但有权而且是不得不去拯救中国的。只有当人们理解了“天职”思想的支配作用时，才会对松井大将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为侵华战争所作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感到中听：

> 中日之间的斗争总是“亚洲大家庭” 中兄弟之争……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斗争当作是使中国人进行自我反省的办法之一。我们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才这样做，恰恰相反，我们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了。这就象在家庭中一样，当老大哥对行为不端的弟弟忍无可忍时。就不得不揍弟弟一顿，教他规矩点。[9]

至于日本士兵和平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常常够不上松井所谓的“老大哥”的品行的问题，我们就不必大加谴责了[10]。战后东京审讯所提供的证据就足以说明老大哥们对中国人的暴行的规模。不过，假如战时暴行果真是可以解释的话，那么这些证据也并没有说明这种非人道行为的原因。但是，由于日本在中国大陆驻军的野蛮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象汪那样极力为日本涂脂抹粉的人的失败,我们不能不略加评论就轻轻地放过这一点。

当然，日本军队军纪的败坏可以部分地从日本社会制度没有一套概括的伦理准则来解释。这套准则既能约束在自己家乡生活的农民，又能在他穿上军装被派往中国去驻守一个城市时仍然起作用。日本人在国内遵守一套既繁琐又有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则——这套规则几乎把他管束得透不过气来——凡是他可能遇到的一切社会环境或道德场合，都得照章办事。他

只要遵守他从小就学到了的章法和习惯，就能保证他个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当日本人遇到了这类章法本本所不能解决的场合，或者遇上约束他日常行为的规则范围以外的场合，他就很可能胡干一通。埃德温·赖肖尔写道："比起我们这些依照比较概括的信条和为数较少的具体规则生活的人来，日本人在本本范围以外行事时会更加感到无所适从。"[11]赖肖尔又说，日本人的那些"人人必读的处事指南"，在通常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它"比起我们自己那个比较带个人主义的操行准则来，也许的确可以少制造一些摩擦和紧张关系"；但是"一旦遇上意外的情况，他们的伦理准则就会比我们这种比较概括的伦理概念崩溃得更加彻底，从而使日本人倒退到按照他们排除约束的本能来行事的地步了"。

日本作家乐于强调军队生活对各级士兵的有害影响。野间宏战后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陆军的小说《真空地带》，把军队描绘成一个建立在镇压人类本性基础上的非人道机构。他以亲身经验描写了军官之间为了向上爬、搞贪污、尤其是搞暴行而进行不讲信义和野蛮的竞赛等一系列令人寒心的事实。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把"无情破坏个人私生活以及广泛使用暴力"描绘成为"从反面影响社会化"的方式。她写道："社会化执行者的暴戾和目空一切达到了顶点，而被社会化的对象的痛苦、恐惧和屈辱也达到了顶点。"[12]这个社会化过程的目的是禁止士兵按自己的意志去想、去做，甚至连觉得自己还有意志都不行——一句话，就是要造成野间在他小说中所说的那个"真空地带"。只有这样，士兵才会在被"社会化"之后去送死——那就是说，使他乖乖地去送死。

丸山真男认为，日本军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所犯的暴行是一种"转嫁压迫"的行为。士兵受到上级压迫和虐待之后，遇到了任何他可以压迫和虐待的人，就如法炮制，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补偿。丸山并没有为高级军官开脱他们对日军在中国所犯暴行的最后责任，但是他指出，犯罪的都是那些一般士兵。考虑到日本社会的性质，他作出结论说："在平时，过着平民和军队生活的士兵找不到任何可以转嫁压迫的对象。当他们一旦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一下子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压力通通解除掉，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13]

姑且先不提奸淫掳掠这类事，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日本"老大哥"也和任何其他士兵一样，极其喜欢在他们日常用语中讲种族侮辱性的话。日本话"中国佬"相当于英语中的"chink"（美国俚语蔑视中国人的称呼。——译者注），而且也是以同样鄙视的音调说出来的。火野苇平所写的战争报道（以《战争和士兵》为题译成英文）中提到，不论"中国佬"是抵抗还是欢迎日本兵，他们都是被看不起的。他在写到一九三七年末速决的杭

州战役中，某些城镇的居民对他竟以笑脸相迎而大感惊讶时说：

> 假使日本城市被敌人占领了，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无论男女老幼都不会忘记他们是敌人，而且始终会对他们抱着敌意。日本人就是死也不愿和敌人友好的。我们可以同中国的个人友好，而且甚至可以爱上他们。但是看到他们在自己国家命运处于危急的情况下，还要对敌人微笑和诱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象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怎么能不鄙视他们呢？在我们士兵看来，他们都是些使人瞧不起而且没有骨气的人。[14]

这样就不难看出，这种民族优越感——或者用一些沙文主义的口号（例如“发扬国威”）来表明国家最终目标的做法——是怎样使石原那些泛亚主义者的梦想归于破灭的。重光葵在批评自己国家在战时陶醉于发扬国威时写道：“不幸的日本呀，她不仅理解错了，而且连克制自己都感到不耐烦、不可容忍了。讲来讲去，只有国威两个字才是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决定了国家政策，决定了作战计划。战时人民的心理状态也是由这两个字塑造出来的。这固然很了不起，但是看来忍耐和明智恐怕要更可贵一些。”[15]

汪精卫向中国人民兜售孙中山的泛亚思想时，所碰到的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汪的一切辩才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一九四〇年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本世纪初叶时对孙中山友好、赞助国民革命的日本了。孙中山在死前几个月，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日本去作了他多次旅行中的最后一次。他对日本人发表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中，谈到了泛亚主义。他把以仁爱、正义、道德，亦即王道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同西方的霸道文化作了对照，他向日本听众提出这样一项挑战：“虽然日本现在已经很熟悉西方霸道文化那一套了，但也还保持着东方王道文化的特点。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究竟是要做西方霸道文化的老鹰，还是要做捍卫东方的长城，这是日本人民面临的抉择。”[16]

影佐、犬养以及他们的同事们都未能回答孙中山所提出的挑战，他们也未能为汪争取到本来可以使他和日本处于平等地位的让步，这样就证实了：一九二四年以来，霸道牌的泛亚主义已经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占着统治地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当汪正准备叛离重庆时，近卫还只不过给自己心目中的泛亚主义取了一个新名字——东亚新秩序。那时怎样把他话里的抽象内容变成具体政策还要拭目以待。但事后看出“新秩序”原来就是日本控制她的泛亚伙伴的那一套，却是不难的。但是在当初，的确有理由相信“新秩序”有实现真正伙伴关系的某种可能性——这倒并不是由于近卫

和他的顾问们真心真意要搞真正的平等合作（虽然某些人确是这样），而是由于他们希望约束日本军人集团，从而结束严重消耗日本国力的战争。把“新秩序”解释成为对汪有可估后果的并不是近卫和他的顾问们，而是那些兴亚院的成员们。兴亚院头目之一的喜多城一将军后来在战犯审讯中，以少有的直截了当的话宣称：兴亚院的任务就是“使中国日本化”。[17]

让我们再指出石原的泛亚平等概念之所以站不住的最后一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军人中最有势力的那一部分人并不同意石原的基本设想。属于那一集团的东条英机、田中新一、富永恭次、杉山元等人肯定对石原担忧苏联的见解抱有同感。但他们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不应该以同中国交好的方式来使中国保持中立，而应该把她消灭从而使她中立化。

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不顾石原的警告，逐渐采取消灭的政策。当人们看到决定国策的各种会议记录时——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四大臣会议以及五大臣会议——就会感到十分惊讶：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对重大问题的分析又是那样平庸，尤其是他们在制订计划时竟会那样目光短浅。总之，无数证据说明：日本正是象石原所预见的那样，一步一步地滑进大陆泥沼中去。许多日本人，不论是局内或是局外人，都评论过这个过程。丸山真男论及日本领导人未能“根据既定的明确目标来调整对策”，从而“使用残暴的力量来推行政策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直到最终无法挽回。”[18]近卫在一九四五年写了一段悲伤的悼词：“情况已是这样，形势的发展逼得他们（陆军）继续往前走，战线越拉越长。中国事变之所以造成极大的危害，其原因就在这里。”[19]

近卫特别把应承担的责任推到陆军身上去，其实我们都知道消灭政策在一九三八年曾得到他的内阁的完全赞同。要是说近卫没有象尾崎秀实那样会拉响对华作战危险警报的谋士，他不是也有象永井柳太郎那样的谋士吗，而且“温和的永井是毫无疑问够得上通常称为自由派的开明文官的”。[20]可是，即使象永井那样的温和派也会把消灭国民党中国的政策说成是合理的。他争辩说：日本的真正敌人不是中国人民，而是“白人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南京傀儡（蒋介石）之间的罪恶联盟”。[*]近卫不是没有觉察到战争拖延下去的危险性，但是沉醉于执行日本神圣使命的迷梦则足以麻痹他对危险的警惕心。

---

[*] 见杜斯的《永井柳太郎和“白人之祸”，一九〇五——一九四四年》第46页。永井在近卫第一届内阁中担任过许多职务，并于一九四二年担任驻汪精卫政权的特使。他后来认为，传统的政党制度已无法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满足日本战时的特殊需要，因此他和近卫联合起来要求解散各个政党（包括他自己的民政党），以组成一个包括各方面的政治组织。结果在一九四〇年组成了大政翼赞会，直到一九四四年他死时为止，他一直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使历史学家感到兴趣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日本历来一贯认为为了保卫日本就必须消灭——或最起码得征服——中国。至少早在十八世纪，象兵器专家兼防御战略家林子平（一七三八——一七九三）那样的作家，就已把中国和俄国描绘成为对日本的威胁，并且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政策来应付这种危险。一八二三年，著名的医生、药物学家兼天文学家、西方军事科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佐藤信渊（一七六九——一八〇〇）写了一本名叫《混同秘策》（即《并吞的秘密计划》）的书。这本书强调指出，一个弱小的中国使日本面临危险。[21]它并不是说中国本身会威胁日本，而是因为中国容许真正威胁日本的英国在亚洲获得立足点。佐藤认为：日本的对策应该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作为屏障，以阻遏英国进一步的扩张。

由于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把中国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虽然不是直接的），以及把中国看作是没有人瞧得起的贫弱、腐败的国家的论调乃甚嚣尘上，这是二点也不足为奇的。在此以后，有影响的思想家象会泽正志斋（一七八二——一八六三）、横田小楠（一八〇九——一八六九）、福泽谕吉（一八三三——一九〇一）及德富苏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等人对中国的攻击日益尖锐了。日本之所以推迟进攻中国及其保护国朝鲜，并不是由于她对这一行动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还有什么怀疑，而是对进攻的时机和准备工作是否成熟还有争论。在没有摆脱过去封建时期的分裂状态、没有形成有力的国家意识、没有掌握西方军事优势的秘密以前，日本是不敢动手的。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许多人感到这些条件已经具备，同时中国受屈辱和失败的惨状也更加成为定局了。

这时，扩张主义者的思想中增加了一条崇高的公正说法。说什么他们主张对中国进行扩张并不是从国家自私利益这个狭隘的理由出发，而是为了保卫文明——尽管对于他们所要拯救的究竟是“近代文明”还是东方文明，远远没有一致的意见。大教育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的传布者招泽渝吉就常常强调这一点。他在一八八一年写道：“我国一定要从军事上保护她（中国〕，从文化上指导她，向她指出达到近代文明的道路。”而且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国甚至可以用武力威胁［中国］以保证她的进步”。[22]一八八五年福泽在他所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虽简短却堪称驰名的文章。就象它的标题《脱亚论》的含义那样，这篇文章要求日本“退出亚洲”，就是说要日本抛弃她的亚洲传统，以西方为样板全力进行现代化。与此同时，任何要使落后得不可救药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文明起来的想法都必须予以放弃。他写道：“我们不必因为中国和朝鲜是我们的近邻而对她们特别客气。我们还不如照西方国家那样来对待她们。”[23]松本三之助就在《脱亚论》中找到了日本侵华的根源。他写道：“不可否认，这篇论文起了为以后几十

年日本对亚洲大陆搞帝国主义扩张进行辩护和鼓励的作用。”[24]

德富苏峰和福泽一样，也是宣扬西方进步事物的重要代言人。他利用他那有影响的报纸《国民之友》的社论栏来为终于在一八九四年八月爆发的对华战争进行辩护。他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发生的前一年写道：日本马上就要变成“大日本”了，就要变成一个驰骋于整个亚洲和南太平洋的国家了。他说：他所鼓吹的扩张目的不仅只限于发展贸易或建立殖民地，“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向全世界显示国力”。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又写道：“从各方面看来，是中国阻挠了我们扩大国家威力。当我们要建立‘大日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困难的原因是在中国而不在欧洲。”[25]当一八九四年夏日本找到了对中国挑起战争的适当借口时，德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意味着那是使日本能够获得一个“和世界上其他扩张主义大国并驾齐驱”的机会。[26]当他所支持的“漂亮的小战争”终于爆发时，他简直是乐不可支。战争开始不久。他写了一篇社论，纠正了某些人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索取巨额赔款的想法。他指出：“日本就是为一举而决定［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战。”他又说：“假如我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以前的一切误解都会消除。我国和我们民族特色的真正性质就会象太阳冲破浓雾那样，突然显示出来。”[27]

明治时代日本最早的基督徒学者内村完造（一八六一——一九三〇），他虽然后来是以和平主义者而著称，但在战争发生时也附和这种日本负有历史使命的论调，并且宣称这是“历史的需要”。他援引古典著作、圣经和欧洲历史来证明“高丽战争”（他的说法）是一次“正义战争”。他争辩说，“高丽战争就是要决定：到底‘进步’能否象在西方早已实现那样成为统治东方的法则，还是让先是由波斯帝国、以后由迦太基、再以后由西班牙、而现在最后（但愿这是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则由大清帝国所代表的‘倒退’来永远统治东方。”[28]

日本在对华战争中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一连串胜利。这在国内是非常得人心的——无数老武士要求参战，以致天皇不得不特别降旨，命令他们守住自己的岗位。当这个国家充满自豪感和对中国的蔑视时，日本人把以前在文化方面可能对中国怀有感激的心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唐纳德·基恩编了一本书目，把庆祝那次短暂的战争的流行歌曲、剧本、诗歌以及“锦绘”（彩色木版画）都收集了进去。在“锦绘”中，中国人总是被画成怯懦、毫无尊严、毫无理性和不体面的劣等人。歌曲则把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大加嘲笑（“李呀，李呀，扁鼻子李鸿章呀！”）。一个人问：“在亲王马前打滚的是什么呀？”另一个人鄙夷地回答：“是支那人的南瓜脑袋，难道你还不知道？”[29]当著名诗人与谢野宽（一八七三——一九三五）听到宣战时，他

就在诗中提到那臭名昭著的耳冢——十六世纪日本领袖丰臣秀吉对朝鲜战争中从中国士兵头上割下的耳朵建成的耳坟：

何须自愧不如古？
再建耳冢时已近。[30]

诚然，当时也有许多日本人并不抱这种反华情绪，到了三十年代，中国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的确足以使日本人改变他们鄙视中国的态度。但是先人为主的观念还存在。我们已经看到，象石射或者石原那样，敢于对长期以来把中国的孱弱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的荒谬见解提出挑战的人毕竟是个别的。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忠告是很少有人听得进去的。就是第二次大战日本的战败也没有完全把某些日本人认为必须消灭中国的偏见铲除掉。鹤见和子援引了一个即将被处死的中将战犯的遗嘱为例，说明上述那种看法是多么顽固。"我的肉体死亡后，我的真正灵魂将会在天上飞翔。它一直要等到日本报了她战败之仇以后才会停止飞翔……只有消灭美国，征服中国，才能复兴天皇的国家。只要我国仍然处于美国或是中国的压力之下，她就复兴了，也实现不了大日本的世界使命。"[31]

在本书开头我就同意了角田顺的意见。那就是，理解象石原莞尔和犬养健（我还要把石射猪太郎也包括在内）这些人作出的"努力最后为什么会流产"，对于理解中日战争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在缅甸的主要合作者巴莫曾经设想过那些人的努力要是没有"流产"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在他最近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对日本"背弃"了她的亚洲同盟者和合作者的可悲后果表示惋惜。他写道：假如日本没有被她的军国主义者和"种族狂"们所背弃，那末亚洲和日本会有多么不同的前途啊！

假如日本真正具有亚洲的本性，假如她就象在战争开始时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忠于亚洲人的亚洲的概念，她的命运本来是会完全两样的。半个甚至半个以上的亚洲，不会因为日本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勾销对她的信任和感激。那就会大大有助于使她在亚洲有其应有地位的战后世界中，找到一席崭新的、伟大的、永久的地位。[32]

汪的动机

属于梅机关的外交部中国通清水董三曾经说过：只要汪精卫出席了有日本外交官和军官参加的社交场合或是正式场合，日本人“相形之下，都显得黯然失色”。[33]汪的堂堂仪表起了鼓舞他的追随者的作用，但那也无法弥补长达六年的战时对敌合作给他们一生所造成的损害。美国参战后，汪政权的绝望处境使它的许多成员意志消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观泛滥。金雄白写道：“许多人借酒消愁。汪是例外，而李士群、梅思平、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个个都和女人有纠葛。”[34]汪的私生活一直是无可非议的。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无法把通常指责他下属非法牟利和生活糜烂等罪名加在他的头上。他家中摆设简单，并没有一般认为象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应有的豪华气派。汪喜欢请客吃饭，但吃的总是“极平常的西餐”。他总是和妻子、儿女坐在一桌，客人就坐在另外一桌。据说有一次，汪夫人买了一些西餐餐具，汪误以为是昂贵的东西，暴怒之余把它们摔得粉碎，而且责备他的妻子说：“你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时候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呢？”[35]

随着对日合作的紧张关系的加剧，平常性情温和的汪精卫发脾气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他常常在会议开到一半时发起火来，用拳头捶桌子，找一把椅子或是其它什么东西来摔，要是找不到东西的话，就在在场的人——通常是他的联襟褚民谊——身上出气。一九四三年有一次，当他听说他的下属准备把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关到战俘营里去，就勃然大怒。他气得泪流满面，责备他的同事没有爱国心。他说：日本当然希望把他们当作敌人和战俘来看待，但是这些人毕竟都曾经为“祖国”卖过命，中国同胞除了向他们致敬之外，还能怎样对待他们呢？[36]战时对日合作不可设想的尴尬局面就在这类事情中集中表现出来。它还表现在汪于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后对他儿子的教导。汪充分理解，美国参战对他自己和日本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因此要他儿子作最坏的打算。要是中国能够得救、能够得以幸存，那末他自己的生命。和名誉就保不住了，他的家庭和房子也就完了。汪告诉他的儿子说：“你一定要有应付这个日子到来的勇气。”[37]

当汪叛离重庆时，他不会没有想到历史对通敌者所作的结论。汪自己就谴责过溥仪（他毕竟还不是汉人），说溥仪是配合日本搞满洲国阴谋的“汉奸”。[38]他一定知道他的政敌和多数同胞准会把他自己说过的话回敬他。例如，他在一九三四年所作的声明：“中国（将）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反对任

何默认或意味着承认‘满洲国’的步骤。”[39]又如他在同年发表的声明：“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背信弃义地侵占沈阳以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始终坚持拒绝签订任何有损中国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条约。我们准备现在遭受苦难，为的是使将来少受些痛苦。”[40]再如他在叛逃前一年所说的：“难道我们会甘愿做傀儡吗，假使不愿意，唯一可走的路就是作最大的牺牲……个人牺牲是不够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同胞在活着的时候去当傀儡。”[41]

假使汪果真确信他的人民是受日本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那么他又怎么可能为自己同侵略者的合作开脱呢，大概只能这样解释：他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出于一个错误的估计，误认为日本会获胜，因此才作茧自缚。虽然后来他早已明白这样做既无助于国家，又不利于个人，但还不得不继续同日本人合作下去。

在那篇据说是汪的遗嘱中，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正是由于日本掠夺他的人民——而不是不顾他的人民——他才和日本谈判，并且终于同她合作了。[42]这文件承认汪是处于软弱的讨价还价地位来进行谈判的（“我是赤手空拳的”）。但他争辩说：恰恰由于他本身和中国都很孱弱，所以他的对日合作是有道理的。中国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似乎处于绝境，外国朋友的重大援助充其量只能说把握不大，在这同时，中国最重要的领土正被残暴的敌人所占领，其余部分则被无能透顶用防御部队的焦土政策所破坏。绝望之余，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蒋介石不可能鼓吹和平或者提出同敌人妥协的主张，因为他的责任就是以武力保卫祖国，而且全国人民“慷慨激昂”的情绪也决不会答应他这样做的。所以“与其他来，不如我干”。由于汪的软弱——不象蒋，汪并没有军队——所以他显然没有理由对自己的使命抱乐观想法。但是他至少可以通过谈判，利用日本军人之间的倾轧，并且设法和一些比较明智的人物（例如天皇）挂上钩。

> 我为什么要玷污自己的名声，并且不顾自己四十年来献身国事的光荣业绩？其原因是，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只有靠机智才能保全它。要是我们能乘敌人之不备，收复国土，安抚流离失所的民众——只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我的余生会如何困难，我也置之度外。了解我的人们会同情我的困难，不会说我的做法不正当的。[43]

由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认为，汪的影响也许大到有可能获致和平，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保障”，拖延敌军的进攻，在享有中国的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竞争”。所以在汪看来，充当对日合作者，签订一些

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特别是在由谁来控制中国主权方面进行竞争。一旦战争结束——假如盟国获胜（他终于不得不作这样的假定）——反正这些条约也只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

南京和维希

使汪精卫决定和日本合作的因素同促使法国的比埃尔·赖伐尔及贝当元帅对德合作的原因大抵相似。把汪和他们相比较，我们就能对中国进行合作的经验的动机、成果和特点作比较精确的估价。

汪和他的同事们也有和法国对德合作者一样的反英偏见（认为英国是准备打到把法国人最后的一兵一卒都搞光了为止的自私的帝国主义者）。所以，尽管汪等对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援助中国颇为愤慨，但却为自己也能出一份力量把西方帝国主义赶出东亚去而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满意的情绪。无论在中国或在法国的情况下，对敌合作者的怒气不仅针对英国人，而且也针对国内那些在军事上，尤其是在经济上，过份依赖英美的人。汪的某些同事尖锐地攻击蒋介石，说他是英国（还有苏联）的傀儡。这可能是一种宣传手法，或者说明他们自己做贼心虚，所以不足取信。但是对日合作者陶希圣是一个受尊敬的、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冷静的、有分寸的分析必须看作是一种在性质上很不一样的评论。陶在论及中国工业的缺陷时写道：

> 除“买办资本主义”以外，工业中的民族资本微不足道。可是，连这么少量的民族资本也还得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外国资本。所以中国的实业家辨别不出国际问题的征兆。他们尤其缺乏独立自主的民族观点。当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要琢磨外国资本家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因而拿不定主意。如果问题比较大，他们就靠国外援助，否则就跑到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寻求帮助或庇护。所以实业家的利益同一般民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依靠外国或外国租界过日子，但是有钱的实业家却能在英国、美国或者上海和香港获利致富……作为一个弱国的中国，要是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一定会造成俗语所谓“远水不救近火”的局面。[44]

法国对敌合作者和中国对敌合作者观点之间的第二个主要相似点，而且也是两国之所以有姑息让步情绪的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到来自左派威胁

的那个妖魔的存在。法国在一九三五年末到一九三六年年初的那个冬天成立的人民阵线和中国在一九三六年末到一九三七年初的冬天成立的统一战线把两国的右派吓得要命，使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濒于多少受莫斯科控制的左翼联盟接管的危险。那个时期在法国流行的“与其勃鲁姆，不如希特勒”的口号概括了这种恐惧。（社会党人莱翁·勃鲁姆担任过人民阵线产生的第一任内阁总理。）

虽然在中国没有一个和这个完全相当的口号，但不用多思索就可以想象得到，汪和他的同事们也会喊出“与其毛泽东，不如日本”的口号。（“与其莫斯科，不如东京”可能更为贴切。因为毛的势力只是在统一战线时期中才开始被人们所承认。不管怎么说，汪和他的同事们感到真正的威胁来自莫斯科，而不是来自延安。）在法国，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生效期间（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和法国共产党开始配合第五纵队来破坏法国进行抵抗的努力时，主张对德合作者和日后的姑息分子的反共情绪有所减退。但汪集团的反共情绪却没有类似的减退。与此相反，象我们上文已指出那样，随着战争的发展，汪和他的同伙越来越相信最后只有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的莫斯科“主子”）才会是胜利者。

法国和中国的对敌合作者都使出了标志着老练的通敌手段的混身解数——骑墙手法。所以只消把名字适当地换一下（例如：把德国改成日本，第三共和改成国民党），历史学家戈登·赖特对赖伐尔所作的描绘就可以同样适用于汪精卫或者周佛海。赖特指出：一九四二年的赖伐尔和一九四〇年的赖伐尔大不相同。

> 那时他相信德国马上就要胜利，他设法要为法国在“新秩序”中争取一席有利的地位。现在（一九四二）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了，他改变了主意，要用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德国的勒索，并且多少保持一些法国自治的模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甚至想过要实现把维希恢复到第三共和的和平过渡。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为止，他一直扮演着他自己在一九四二年所选择的角色。演技相当熟练巧妙，但是却越来越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45]

那篇据说是汪所写的遗嘱透露了类似赖伐尔（以及其他人）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关心的事情。它要中国人别忘了汪曾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以复兴国民党的名义，作过公开演讲；他一直坚持中央军校的信条；他不允许日本要求在中国学校使用把中国人描绘成“奴隶”的教科书；他并且经

常使学校学生记住本朝的二位伟大的爱国者岳飞和文天祥的事迹。*那篇遗嘱也为“同生共死”这类口号作辩护。日本人曾对此大事宣传，以证明汪赞同他们在华的意图。遗嘱坚称这些口号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在战前都流行过，其中有些还是被巧妙地修改过的清末反满的爱国口号。[46]

虽然汪在遗嘱中的自我辩护，会被某些西方读者看成是抽象的遁词和无力的表白，但是它也有其独特的中国气质。保存了受人敬爱的孙中山的主义，追崇了几百年前的爱国者，清除了教科书中有害的内容，并且使儒家的传统保持下去——汪无疑感到，当他本国人对于他和日本合作的这几年加以估价时，这些成就一定会得到他们赞赏的。在对日合作这段期间，他的写作总是引证历史先例来证明他的确没有越出那古老而光荣的传统的界限，它把同战争中的敌人合作提高到和抗击战争中的敌人一样高的地位。

中国在整个漫长的历史中，学会了用灵活手段来对付她国境以外常常在军事上处于优势的“蛮夷戎狄”的威胁。即使在无法使用武力来控制蛮族的时候，她还是可能用“以夷制夷”的手段，用笼络手段（或曰羁縻政策），或者在情况实在糟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派人纳贡以缓和入侵者，从而达到保护中国文化和儒家生活方式的目的。[47]爱国的中国政治家并不排除采取诸如割让领土、甚至和敌人积极合作等更为极端的措施，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用这类方法来使中国免受蛮族的蹂躏，而那些蛮族则留待儒家经书的感化力量来加以同化。汪能够找到充分史实来说明这种政策的远见性，因为外来的敌人往往来到以后，由于蒙受中国文明之惠就被“同化”了。野蛮民族总被中国所同化的明显史实——不管他们军事力量有多大——使中国人对于同敌人合作产生一种自满，甚至乐观的态度。历史学家林翰笙写道：“在中国历史经验中……和外国敌人的合作是常有的事。其实这样做反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扩大了中国的领土和影响。”[48]

所有这些并不等于说汪集团喜欢同历史上一切媚外者和对敌合作者去相比。例如陈公博就不同意审讯检察官把汪同中国两个最臭名昭著的通敌者张邦昌和刘豫相提并论。这两个来代官员在十二世纪时曾背叛了皇帝去为入侵的金人效劳。[49]汪喜欢自比为张之洞和李鸿章。这两个人在一九〇

---

* 汪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美国情报人员以深刻的印象。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一篇报告中，美国战略情报局指出：在汪影响最大的广州，“极少”学校教师为敌人作宣传，因此“大部分学生没有中毒，并且痛恨日本人”。这个报告最后说：“总的说来，教育系统并没有受到敌人的重大干扰。”（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编的《日本对华政策纲领》第二卷第 15 页）汪的教育部长李圣五在战后审讯中实际上被判免罪。这主要是由于汪政府所用的教科书和梁鸿志政权所采用的教科书内容不同的缘故。陈公博也利用教科书这个问题在战后审讯中作为为自己辩护的主要理由。（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402 页）

〇年拳乱时（指义和团运动。——译者注），对西方帝国主义者采取了和解政策，从而就会因“谄媚洋鬼子”和违反圣旨而担被非议弹劾的风险。汪认为应该把张和李的谨慎和有远见的政治家风度同聂士成将军虽英勇但基本无效的抗战政策作对比来进行评价。聂是在率领其部下同外国军队作战中牺牲生命的。汪在一九三九年写道：“的确，将士和民众都很多勇，然而他们至多只能步聂士成提督（原文如此。——作者注）的后尘，忠贞至死，可是他们的死却挽救不了国家的命运。”[50]

汪日常穿西服，长年在国外生活，对西方习俗很熟悉，以及他对现代事务的高深知识，跟他的儒家背景大不相称。当他开始在东京学现代政治科学以前，他曾考中秀才（通过了科举制度的第一关），因而他的写作显出浓厚的儒家倾向。在他一九四一年所写的一篇纪念孔子诞辰的文章《孔子与中国道德的关系》中，汪批评有些人认为古代儒家学说没有什么可学，因而转向外国即共产主义的俄国或资本主义的英美去寻找医治中国弊病之道。这些国家无法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却是造成中国问题的根源。汪认为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造成中国在十九世纪的孱弱和“不安与徬徨的状态”。第一个因素是教会在传教时不遗余力地使“下层阶级”脱离他们原来的习俗。“他们设立医院、搞种种慈善活动，为的就是要不知不觉地赢得贫苦阶级的心。后来，教会又采用了以通俗的方言来传播教义的方法……。这样一来，中国固有的文化就在下层阶级中遭到了破坏。”[51]使中国变弱的第二个原因是有教养的阶级虽然不受教会的影响，却爱上了西方的科学。汪写道：“不用说，当构成国家中坚的上层阶级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时，就要产生严重的危机。”[52]汪严肃地说，那些“嘲笑”中国的人“已经忘记什么是构成一个国家的要素。文化的重要性仅次于血统关系和语言，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就是看不起自己的种族和国家。”[53]

汪认为中国文化的菁华包含在儒家礼教之中。所以只要回到孔子那里去，中国就能够获得“道德上的重建”和民族团结精神。中国需要这些精神来抵御给她带来了那么多苦难的西方影响。从汪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谴责、对儒家经典能重振中国的信心、以及他特别支持新生活运动等方面看来，我们就能发现他同他的头号政敌蒋介石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点。汪在一九四一年所写关于孔子的文章中的观点，无一不存在于蒋在两年以后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两者之间在语气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蒋的著作中反对西方的话更显得恶毒，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在此书中“蒋把军阀主义、卖淫、私贩军火、吸鸦片、抢劫以及在中华民国诞生时的所有流血混乱局面全都算在外

国人的帐上。［他还］埋怨外国教会以及他们的大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汪的著作，不论是政论文章或是诗词，一律都反映了“君子”（德行高超的人）的观感。没有再比重视为人正直的观念更接近于儒家关于君子的想法了。——“假若皇帝行义，他的大臣也会行义，假若大臣行义”，等等。汪的毕生经历以及他在中国所受到的尊敬，说明他在政治上变节的缺陷得到了他为人正直和有高度勇气的弥补。他对自己，特别是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及其学说的解释者，在道德上的完整无缺是有信心的，他也意识到他自己本人很有吸引力。这两点合在一起就使汪有了如同他所敬仰的文天祥那样坚韧不拔的性格。汪和他的宋代样板文天祥都犯有“不合情理的行为”的错误，但是这种不合情理的行为符合儒家最优良的传统。就象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W·莫特所说的那样，“文天祥明明知道自己的事业毫无希望，甚至违反天意，但他仍然坚持忠贞的原则。”[54]汪在早年为自己所取的名字“精卫”二字就表示着他日后事业的某种英雄气概。（据说，这个名字原指传说中的一种鸟。其非凡的毅力是汪决心要推翻清朝时希望仿效的一种品德。）

再把汪和赖伐尔在个性上作个比较也很适当。即使赖伐尔的性格并没有受过儒家学说的熏陶，他和汪之间也存在着饶有趣味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指的并不是通常都把傀儡们看成是浑浑噩噩、任人摆布的那种说法。历史学家杰弗里·沃纳对赖伐尔的描绘也同样适用于汪：“［赖伐尔］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对自己的能力有无限信心，而且不幸地还秉赋着确能说服别人的本领。”[55]要同强大的战胜国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是一件艰巨而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决不是一个怯懦者担当得起的。恰恰相反，不少最出名的对敌合作者倒是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典型性格。小说家赛林纳称贝当为“法国最后的一个国王”，而且贝当的确使用过国王用来自称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腓利普·贝当”，[56]就象生来就惯于用这一套词汇的人似的。维达孔·吉斯林因叛国罪受审时，就曾夸耀他自己“是在古挪威海盗墓丛中、在圣经所述的历史和古北欧英雄传奇之间长大的……吉斯林这一姓氏……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王室旁支的姓氏”。[57]至于汪，高宗武曾称他为“一个伟大而有勇气的人，因为他敢于去做他所认为正确的事，不管这

---

* 见怀特和雅各比合著的《来自中国的雷声》第 126 页。1943 年版的《中国之命运》是中文本。前面已指出，许多人都认为陶希圣是这本书的捉刀代笔人。它是蒋对中国政治作广泛分析的初次尝试。原版本中仇恨外国的激烈态度引起了中国的战时盟国纷纷提出正式抗议。他们对于蒋把他们同帝国主义的日本相提并论，把他们描述得一团漆黑而表示不满。显然由于这些抗议，这本书初版印出五十万本以后就不再发行。虽然一九四四年已将一九四三年原版的一部分译成了英文，但经过审定的——修改过的——英文版本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出版。

件事是多么不孚众望”。[58]

汪和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对汪精卫坟墓的污辱象征着蒋介石对他的老政敌的表面上的胜利。但是蒋的胜利注定是短命的，正如汪所预见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力量大大增强，崛起成为国民党的劲敌。在芦沟桥事变前夕大约只有五万人的红军，到战争结束时，已拥有五十万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了。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从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的陕北山区的一小块根据地朝东发展到四面环山的山西省，再从那里进人华北平原，甚至深人到华中。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控制了总人口为七千万到九千万的十九个游击区根据地。[59]这时共产党只用维持他们以抗战时期所鼓动起来的那股爱国热情为基础的势头，再利用国民党的错误和腐败就能稳妥地取得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胜利。汪终于能够从他的坟墓——他的衣冠冢，而不是他那被人污辱过的钢筋混凝土陵墓——看到他的敌手蒋介石的胜利在短短四年之中就烟消云散，最后可耻地逃到台湾去了。

难道汪的追随者就可以把他说成一个先知吗，我说：“不能”，因为他固然预见到共产党会从持久的对日战争中得到胜利果实，但他的洞察力也仅仅到此为止。他在一九三八年以后所作的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警告，令人听来有声嘶力竭和蛊惑人心之感。他反复强调的不外乎说共产党恶毒狡猾，说他们无情地使用暴力，说他们不顾人民相利，特别是说他们抗日并非出于爱国的动机。八路军所以能赢得农村，是因为他们在那里的行为同以奸淫掳掠而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士兵的行径截然不同之故。可是对这种情况，汪却只字不提。汪的倒霉的清乡运动说明他并不是不知道农村需要进行改革，但是从中国实际需要的情况来看，他所采取的步骤只能算是半心半意的。在汪的演讲和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够说明汪察觉到共产党人正在把人民争取过去，因为多数人民欢迎共产党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憎恶一直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由来已久的高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尽管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初期所推行的这些改革还只是很有限的。[60]汪肯定也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样，看到了不合理的战争重担都压在贫苦的农民头上。富人的儿子可以用钱贿赂免服兵役，或是当上军官，通过贪污公款或黑市投机而发财致富。但是穷苦人家父子两代则被人用绳子捆在一起，硬拉到新兵集中地去，在那里他们变成了军官的剥削对象和牺牲品。一个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控制区都有过丰富经验的美国军

官戴维·D·巴勒特上校写道："要是有人说在共产党地区也有人被绑去当兵的话，我可没有见到过。"[61]

汪提出过共产党会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警告，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点足以说明他察觉到了共产党能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他们善于先使抗战成为一场真正得人心的、爱国的斗争，然后抢先掌握进行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尽是一大堆歪曲的话和陈词滥调。汪尤其坚信共产党"毫无民族意识，他们只是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62]汪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写道：

> 共产主义同爱国主义是格格不人的。共产党人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痛苦经验告诉我：在我们中间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分子是在共产国际命令之下才这样做的，为的是替凌驾于中国利益之上的共产国际利益服务。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效忠莫斯科，而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而且] 他们的动力是来自莫斯科，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也是莫斯科。[63]

同月，汪召开的没有代表性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称：共产党人利用战争以"执行他们摧毁中产阶级和偏下的中产阶级的政策，使大部分民众失去工作，无家可归。这样，在赤贫的情况下，人们就容易被共产党所利用。"共产党的政策还要"通过非法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使群众变成愚昧无知。因为一个国家要是在知识方面破了产，那就可以使人民盲从得更加厉害。"这次大会还说，共产党就是期望通过这种方法用他们的"边区政府"来代替"国民政府"，并且最后把整个国家"变成苏维埃中国，永远成为苏联的一个保护国。"[64]

我们完全有理由不对这种估价作过于严厉的批判。在一九三九年时，人们普遍认为克里姆林宫和延安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实际上，直到五十年代后期中苏之间发生冲突以后，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才受到充分的赏识。此外，在汪从重庆出走的一九三八年，以及在他从事大量写作以争取支持的一九三九年时，中国共产党才刚刚开始进行尔后赢得民心的许多改革。历史学家对这些改革在中日战争初期所涉及的范围及其影响还有争论。[65]但这些都有点离题，我们的主题是，汪只把共产党的社会和经济措施看作是"掠夺"，并且低估了毛泽东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抗战大熔炉中融合为一体的能力，因此犯了严重错误。他没有能够估量出中国人民的需要，也没有能够摸清整个国家的爱国意向。我们还可以顺便再补充一句，他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如此。对于那些要想领导伟大国家的人

说来，错误估计了形势是致命的。因此汪和蒋两人都得把领袖的地位让给毛泽东。

需要爱憎兼有的感情

汪在三十年代中期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比他早年推翻清朝的目标要难得多。在芦沟桥事变前的几年中，他并不是为日本的罪行开脱责任，而是由于他深知中国极端虚弱而又极不团结，才主张对日和解的。他一面提出纠正那些弊病的计划，一面主张进行谈判，并且在必要时作出让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被刺中弹，几乎由于主张让步而送了命。从那以后，民族情绪越来越敌视姑息政策，而汪本人也越来越没有权了。一九三八年出现了一个规模虽小但能量颇大的和平运动，该运动有了通往东京首相办公室的渠道，更重要的是，有了通往日本参谋本部的渠道，于是，汪就有恃无恐，乘机叛离重庆，到别处去探索有无同日本进行和解的可能性。连那些批评他的人们也不能责备他这一次在政策上前后有矛盾。我认为，更没有理由责备他为了眼前的利益或贪财而失节。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担子。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中，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汪没有活到战后，没有活到在战后审判中为自己辩护。在那次审判中，几乎他所有的同事都被判处死刑。但是他的遗孀陈璧君却经历了整个战争时期和战后审判，自清朝末年她同汪一起在北京干埋炸弹的大胆行为以来，无论是汪的政治生涯或是私生活，都是同她分不开的。这个极端自信的女人不听她亲戚们的劝告，拒绝在汪死后退出政治活动。这时日本的败局已经十分明显了，她的家庭成员劝她退出南京政府，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在战后不可避免的叛国审判中，博得重庆的宽大处理。汪夫人回答说，虽然她对战争胜利谁属的问题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她感到有责任继续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以尽量防止日本人对中国沦陷区进行报复性打击。

汪夫人于一九四六年春在苏州受审时，她极力为她的丈夫辩护，并痛斥了囚禁她的人。她振振有词地反问道：汪怎么可能出卖中国呢，他显然不可能出卖重庆所控制的地区。至于南京控制下的地区，它本来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她还自诩她的丈夫连一寸中国领土也没有丢失过。他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要收复那些叛国的、只顾自己逃命的高级军官所丢失的领土。汪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来满足那些“被遗弃的民众”的需要。

她宣称："对于已故的汪精卫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所做的无可非议的工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衷心钦佩。"[66]她非但没有认错，"反而捶桌子、大声盘问检察官"，使得旁听的群众为她鼓掌称快。匆促的审问结束以后，"好几十个听众围住汪夫人，要她签名，她都爽快地签了。"[67]接着她在苏州国民党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当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原文如此。——译者注）拿下苏州时，她落到了他们的手中。以后她一直多病，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度过了她最后的十一年。[68]

通过对汪（以及其他对敌合作者）的个性、观点、动机和成就的概括叙述，我试图把汪从爱国者变成傀儡那样一个看来是突变过程的自相矛盾之处给弥合一下。历史学家对前后不一贯的人抱怀疑态度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相信，只要花点力气把带有爆炸性的"傀儡"一词和蔑视味道稍少一点的"对敌合作者"一词的含义冲淡一下，那么这个前后不一贯的明显矛盾就会得到解决了。

亚洲近代历史中的对敌合作者，从满洲国的既不要险又没有头脑的溥仪。直到被人捧得过份的印尼民族英雄苏加诺。真是什么样的人物全有。应当用比"傀儡"这个笼统的称呼含义更全面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暂时不给他们作结论。我只是想说明一下，战时对敌合作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充满了两可的含义。赖伐尔就看出了这种两可的含义，他对他的朋友们说："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69]的确，在汪精卫所处的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本身就有其两可的含义，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一百来年饱受来自多方面的侵略和蚕食。与其说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中国摆脱所有的敌人，还不如说问题在于弄清楚哪个敌人对她威胁最小。要对陷于这种两可情况下的对敌合作者加以评价时，我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种合情合理的爱憎兼有的感情。当汉奸汪精卫夫人在受审时，支配那些拍手称快的旁观者的心理的，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感情。

---

[1] 访问今井谈话记录。

[2]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97 页。

[3] 见臼井胜美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载《朝日杂志》社编的《昭和时代历史片断》第一卷第 285—293 页）。

[4]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 220—222 页。

[5] 见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 246—247 页。据自石原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在东京对满洲留学生的讲话。

[6] 见伊凡·莫里斯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右派》第 38 页。

[7] 近年来，日本的学者已经致力于研究日本的泛亚思想及计划。例证见《参考书目》中开列的两次圆桌讨论会后公开发表的纪录文本如林房雄等人的《为什么要重新估价大东亚战争》、竹内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和实况》；另见冈吉武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理智》（载《对现代日本思想史的研究》）、马林·梅奥的《对亚洲的态度及日本帝国的兴起》（载格兰特·古德曼编的《日本帝国及亚洲》）、入江明的《出跨大平洋：美国与东方关系内幕交》、以及马里阿斯·詹森的《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艾伯特·费尔韦克尔等人合编的《探讨中国现代史的途径》）。
[8]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246 页引了这几句话。
[9] 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 95 页引了这段话。
[10] 见保罗·达尔及迈克尔·梅村高有的《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使用索引》第 6—7 页。
[11] 见赖肖尔的《美国和日本》第 139—141 页。
[12] 见鹤见和子的《社会变迁与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后的日本》第 116 页。关于这一主题，请看该书第三章：《死亡的社会化：在学校和在陆军中的道德教育》。
[13] 见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 19 页。
[14] 引自《东方事务》一九四〇年四月第 217 页一篇未署名的评比。火野苇平是玉井胜德的笔名。
[15]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英译本为《日本和她的命运》第 270 页。
[16] 见孙中山的《中国与日本：天生之友而非天生之敌》第 151 页。
[17]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 CE835 号第 8 页。
[18] 见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战时领袖》（载东京的《东方与西方》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五期第 41 页。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引了这几句话。
[19] 见近卫文麿的《近卫公爵回忆录》第 4015 页。
[20] 见彼得·杜斯的《永井柳太郎和“白人之祸”，一九〇五——一九四四年》。松本三之助在《民族主义在现代日本人思想中的重要性：某些理论上的问题》一文对杜斯的作品作了有价值的评论；而杜斯为了进一步深人研究永井，又写了《永井柳太郎：革新所遇到的策略上的窘境》。
[21] 见赫伯特·诺曼的《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第 38 页。
[22] 松本三之助的《福泽谕吉对文明的概念及其对亚洲的看法》第 167 页，引了福泽的《时代潮流的批判》。
[23] 同上书，第 159 页。
[24] 同上。
[25] 宫川彻和井桁武的《德富苏峰》第 519 页引了德富的《支那论》，此文载于《国民之友》第二三〇期。
[26] 肯尼思·派尔的《一八八五——一八九五年明治时代的日本一代新人：在文化上的同一性问题》第 173 页，引了德富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写的社论。

[27] 同上，引了德富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三日写的社论。

[28] 唐纳德·基恩的《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载唐纳德·夏夫利编的《日本文化的传统及其革新》第128页，引自《内村完造全集》）。

[29] 同上书，第134页。

[30] 同上书，第127页。

[31] 见鹤见和子的《社会变迁与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后的日本》第156页。

[32]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185页。

[3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89页。

[34] 同上书，第288页。

[35] 同上书，第290页。

[36] 同上书，第166页。杨益周的《太平洋战争的前夜》第148页叙述了一桩相似的事件：一批学生在散发了谴责汪为卖国贼的传单后被逮捕了。

[37]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90页。

[38] 唐良礼的《伪“满洲国”》第28页引了汪精卫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讲话。

[39] 同上。

[40]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12页。

[41] 《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第179页。

[42]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载香港《春秋》杂志一九六四年二——三月第一五九——一六〇期）。

[43] 同上，见《春秋》第一五九期第4页。

[44] 见陶希圣的《中日经济关系》（载《人民论坛》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146—152页）第150—151页。

[45] 见戈登·赖特的《现代法国：一九六〇年到现在》第516页。

[46]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春秋》第一五九期第4页。

[47] 见杨连升的《关于中国式的世界秩序的历史札记》（载费正清编的《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本杰明·施瓦茨的《中国人在过去和现在对世界秩序的观念》（同载费正清编）论述了中国与蛮夷民族之间的交往中，这些手段的重要性。

[48] 见林翰笙的《中国人对敌合作方面的专题研究：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的南京政府》（未经发表的手稿）第1页。

[49]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90页。

[50] 见汪精卫的《中日关系》第6页。

[51] 见汪精卫的《孔子及中国的道德重建》（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第263页。

[52] 同上。
[53] 同上书，第 266 页。
[54] 见弗雷德里克 • 莫特的《元代儒家的遁世主义》（载亚瑟 • 赖特编的《儒家信念》）第 234 页。
[55] 见杰弗里 • 沃纳的《赖伐尔的没落与垮台》（载《今日历史》杂志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
[56] 见朱尔斯 • 罗伊的《贝当元帅受审记》第 172 页。
[57] 见拉尔夫 • 休因斯的《吉斯林：不光采的预言》第 21 页。
[58]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59] 见查默斯 • 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 73 页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 235 页。如果把民兵算进一九四五年红军的武装力量中，红军力量的增长更为显著。
[60] 马克 • 塞尔登的《中国革命中的延安方式》对共产党的纲领作了极好的研究。
[61] 见戴维 • 巴勒特的《迪克西使团：一九四四年美国陆军驻延安观察小组》第 86 页。巴勒特不可能被认为是一位共产党同情者。他曾写道："赤色中国是我们在当代世界上的死敌。"但他引人入胜的专论对战争年代中的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作了大量的对比（他总是不恭维蒋介石的军队的）。
[62] 见汪精卫的《中日关系》第 6 页。
[63] 同上，并另见汪的《欧战与中国前途》（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 102—103 页）。
[64] 同上，并另见汪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 4 页。
[65] 例证见吉林在一九六四年《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三期第 269—289 页评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的文章中。
[66]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369 页、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 253 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卷第一六一——一六三章。
[67] 见香港的《南华早报》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第 1 页。
[68]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 220 页。埃德加 • 斯诺在《大河彼岸》第 547 页提到在夫人一九六一年仍在人间并囚禁在华德路监狱一事，显然是弄错了。
[69] 见赖特的《现代法国：一九六〇年到现在》第 518 页。

参考资料说明

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后，他的遗体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运回中国。不少人问汪夫人：她的丈夫最后曾否留下政治遗嘱让追随他的人们有所遵循，她总是明明白白地回答说："没有"。在这位卧病的领袖临终前的几个月，时常去探望他的其他至亲好友也都说：他既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嘱，也没有同任何人商讨过留遗嘱的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香港《春秋》杂志发表了一篇据说是汪的"临终的感想"之前，再也没有人提起过遗嘱之事。

《春秋》发表这篇文章的过程是从一九六三年秋开始的。当时该刊办公室收到了一封寄给朱子家的信，而朱是一个驻香港的记者，有时为该刊撰稿。该刊甚为粗心，竟让那封信在办公室里沾满了灰尘，直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朱本人碰巧来办公室串门时才领走。朱打开一看，信封上只写上了香港某保险公司的回信地址，里面是一份长达四页半用毛笔书写的文件。据说这就是汪的遗嘱，但笔迹显然不是出自汪之手。在另外一张纸上写着"临终的感想、兆铭。"等七个汉字。书法秀丽，的确象是汪的亲笔。信中还有一张普通的黄色便条，上面写有汪精卫长子在九龙的住址以及"请转交"等字样。此外给朱子家本人倒没有写什么。

"朱子家"是金雄白的笔名。他曾在汪政府担任过次长一级的官，是周佛海的亲密同事。下面将要提到金所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是我写本书的史实的重要出处。金追述说，他曾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这份长达五千字的四页半文件，最后才认定它是真的。他曾设法寻找那个匿名的寄信人，但一无所获，那个唯一的线索——保险公司的地址——也没有起什么作用。既然信中所附汪精卫长子的地址并无错误，那么寄信人本来完全可以将文件直接寄给汪的儿子，因此金认为他自己应该在将文件转给汪子之前予以公布。于是他就把文件交给了《春秋》杂志，并在该刊一九六四年二月号的一期上全文发表。（参看金著《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载香港《春秋》杂志一九六四年二——三月。）

我曾多次（特别是在本书结尾的一章中）引用过的这份所谓遗嘱，其所署日期为一九四四年十月，月份后的具体日子则空着没写。它一开头就说：汪正在向他的妻子口授遗嘱，并希望她将遗嘱交给一个未指名的"某人"妥为保管起来，在"将来某一适当的时候，也许在我去世的二十周年时予以发表"。按照中国人的计算方法，那个忌辰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到期（这大约相当于写给金的信付邮之时）。

这篇所谓遗嘱的发表，引起了一场争论该遗嘱是真还是假的风波。事隔八年，在作者编写本书时，仍无人能证明其真假。汪的追随者以及参加对日合作运动的中日双方当事人对此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在我所调查过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它是真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则认为它是假的，其余的人经再三研究后，也坦率地承认他们拿不准。

不少汪的最亲密同事在该文件发表前曾加以审阅，断定它决不是汪所写的，并奉劝金不要发表它。他们之中有些人，特别是何炳贤和李圣五，是完全有资格来验证这份文件的真伪的。何炳贤是汪精卫、陈公博二十多年的密友。他是专门研究汪的著作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在精心编纂、分析汪的作品。李是汪的老同事，至今仍和汪家关系密切，汪的子女们都以“伯伯”称呼李。他们两人都断然排除了这篇所谓遗嘱是出自汪的手笔的可能性，甚至连经汪认可的可能性都没有。他们说，无论是文章的风格或是文章的内容都说明作者不是汪本人。他们也不能相信象陈公博这样的人竟然会不知道留有遗嘱这回事，因为陈在汪临终前的几个月曾到日本去探望过汪两、三次。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同陈过从如此密切，陈一定不会不对他们说起有遗嘱之事。他们承认自己猜不透遗嘱的真正作者的用意何在，而且宣称他们对作者究竟是何许人一无所知。但是，当别人一定要他们“尽量猜一猜”时，他们以极其有保留的态度提到了一个已故的名诗人龙榆生的名字，不仅汪本人，就是毛泽东都颇赞赏龙的诗。龙当过汪家的家庭教师，以其文风类似汪而见称。（一九七〇年三月作者同何及李的谈话。）

这篇所谓遗嘱发表一个月后，金雄白在同一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把相信者（包括他本人）和怀疑者的看法都予以披露。金在文章中写道：汪的长子汪孟晋对这篇遗嘱的真实性抱有怀疑。（这话显然是打过折扣的。因为何及李都说，汪精卫全家所有的人不仅否定了这份遗嘱，而且还恳求不要把它发表出来。）金报道说，汪孟晋还对这份文件提出了若干疑点：他在他的父亲临终前的几个月间，几乎一直侍奉在侧，不可能对他父亲曾口授五千字的遗嘱之事一无所知。无论怎么说，如果他的父亲决定口授他的遗嘱的话，他肯定只会口授给孟晋，而不会口授给汪夫人。遗嘱一开头就用了“我去世的周年”一类的话，这显得很不真实。因为汪一贯赋有革命者的脾气，对于一切稍微沾了点形式主义（尤其是针对他本人或其家庭）的做法都深恶痛绝，并且决不会硬要人家记住他的忌辰。由于汪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作风。如果他要留什么遗嘱的话，那都只可能涉及他要他的追随者今后应如何行事的内容，而不是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解释。最后，孟晋本人也曾经要求他的母亲劝他的父亲立下遗嘱，可是她为了免得使病中的丈夫“心烦”而拒绝这样做。

金雄白反驳了孟晋的论点，他认为，无论文章的风格还是内容都说明它是出自汪的手笔。金说，要回答关于汪不可能在无人获悉的情况下写出遗嘱的指责，那是很容易的。可以假定汪在去日本之前就已将它写好了，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只要作一些最后修改并写上一九四四年十月的日期就可以了。的确，孟晋本人似乎也承认，遗嘱有可能是他的父亲一九四三年末在北平休养时所写的。（见金著《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

汪的长期共事者、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承认，孟晋对于发表遗嘱之事“极感不快”，但他争论说：“决不能把遗嘱看做是伪造的。”据胡兰成说，汪的密友严家宝告诉他说：“遗嘱毫无疑问是讲了不少历史真相。”（一九七〇年作者同胡的通信。）

日本《每日新闻》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发表了遗嘱的日译文。五月二日《每日新闻》接着又发表了同汪交往最密切的两个日本人今井武夫和清水董三的评论。二人都毫无保留地认为这篇遗嘱是真的。今井称它为“历史事实的重大发现”。这遗嘱在美国没有引起什么议论。索诺玛州立大学的林翰笙教授指出，虽然学者们对这文件的真伪仍有争论，他却“找不出任何正当理由把应看作是伪造的”，而且他发现这文件的写作风格“显然是汪所独有的”。（参看他所著《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 13—14 页。）

在准备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次中日合作运动的主要参加人的口头及书面的回忆。我认为今井武夫将军提供了这方面的最有用而且最可靠的资料。虽然今井直接而且全面地介入了各次合作运动，但他的著作却没有什么偏见。他不但态度磊落，而且在写作中就象专业历史学家那样注意细节问题和史实根据。在堀场一雄大佐的巨著（共有七百八十页，外加一卷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他也同样地注意到内容的精确性。不过，堀场却不象今井那样直接参预过合作运动的策划，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后。此外，他常常总想显示他自己以及他在陆军参谋本部的某些同僚们是如何不断地力图为中日危机找出“道义上”的解决办法。倒不是说人们对他有什么怀疑，而是人们从来也弄不清所谓“道义上”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

影佐祯昭将军的《漫谈》是提供汪精卫运动发展情况的另一主要来源。

---

* 如果拿鹤见俊助研究经典著作时所用的术语来说，“道义上”一词看来是“起护身符作用的”字眼。就象人们使用护身符那样，这个词除了能起保护作用才被选用之外，别无其他意义。（鹤见的著作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思想之科学》杂志第一期）。该文的英译文发表于《东方及非洲研究所学报》（一九五六年第十八期，第 514—533 页）。

《漫谈》是影佐在一九四三年驻防于拉布尔岛时写的，它使我们对汪记运动中日方领导人的动机和受到的挫折一目了然。影佐一开始写《漫谈》一文时就碰上了一个影响到该文质量的因素：他无法接触记录资料，从而不得不靠记忆来进行口述。结果这篇著作中有大量不准确的地方，主要是日期方面的错误。但总的说来，这些错误并没有减低这篇长文的价值。《漫谈》的部分内容已包括在影佐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供词中，但他小心翼翼地删掉了对帝国陆军不利的部分。例如，他在《漫谈》中曾以很长的篇幅来详细叙述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前往东京时，同日本政府各领导人举行的会谈，其中包括板垣陆相扼要说明“分治合作”政策究竟为何适用于中国的谈话。在战后审讯中，影佐却巧妙地略去了诸如此类的内容。（请比较一下《漫谈》第 37 页及影佐供词的第 15 页。）遗憾的是：尽管《漫谈》大大胜过审讯供词所提供的文献，它不过也只是一篇缩写了的文章。据接近这位将军家属的人士告诉我，他们坚持要删掉部分原稿，非等到将来某个时候才答应将全文出版。可惜《近代史资料》的版本甚至连删节之处也没有指出来。

西义显和犬养健的回忆录虽然很有价值，但由于大量引用了一九三八年举行的三方和四方长时间会谈的内容，而有所减色。由于会谈时既无录音机又无速记员在场，人们准得怀疑这两位作者大概已对其内容作过某些篡改了。例如，高宗武不但否认了西义显说他讲过的一些话，而且斩钉截铁似地指出，所有这些会谈都是西义显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九六九年同高宗武的谈话。）但是，着来西义显和犬养健两人都保存着日记本。凡是可以同日记互相核对的地方，他们的叙述都彼此一致。西义显的叙述尤其详细，连香港浅水湾饭店的房间号码都记下来了，而这家饭店是一九三八年时“第三种力量”人物经常聚会之处。（该饭店管理处不会想到这个第十号房间竟有历史意义，早已改变了房间的编号办法，这样一来，至少使一个历史学家再也无法享受体验这段历史的乐趣了。）

犬养在参加汪记运动之前就已是一个有修养的、受尊敬的作家了。他所著《扬子江仍在奔流》一书的行文优雅的散文体裁说明，他在写作方面是个老手。没有一个参预汪记运动的人能象既有世界主义思想而又富于东方色彩的犬养那样，把那次运动描述得那样有声有色。这里要先打个招呼，《扬子江仍在奔流》的读者一开始看这本书时就应该知道，犬养“由于怕令”当事人“难堪”，所以对他所写的两个主要人物始终用假名字来称呼。（见《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5 页。）我不相信我现在马上指出，高宗武就是犬养所说的康少武而陶希圣也就是他所说的庄之真，就等于违反了我的职业道德。为什么犬养会想去隐瞒这两人的真名字，确实令人费解，因为大

养把他们两人的动机捧得相当高。（顺便提醒一下读者，这两个人都支持过汪叛离重庆，然后于一九四〇年又抛弃了汪的对日合作运动。）而且据说康（即高宗武）曾说过，只有犬养和松本重治两人了解他参预和平运动的真相，并要求犬养在高宗武去世之前“把事实真象给写出来”，那么这就更加令人不解了。（见《扬子江仍在奔流》第 18 页。）

在那些参加对日合作运动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我认为陶希圣所著《乱流》及金雄白所著总共五卷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最为有用。《乱流》（书名源出于古代诗歌，讲一个寡妇悼念她丈夫因渡激流而死的哀歌）内容简明扼要。比较起来，金的著作则长达一千页而且内容松散。他这本书之所以令人感到有兴趣主要是由于作者同他所提到的许多事件和人物，特别是周佛海，有直接关系。同所有中国人关于汪记运动的著作一样，金的书也缺少文献资料。在台湾国民党政权把有关战时对日合作这一微妙问题的档案资料公布之前，这个缺陷是无法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弥补的。不过，金还是尽力把可能找到的文献资料都找出来了，并在追忆往事的同时，还同当时仍活着的那些合作运动参加者会晤过，力图弥补这个缺陷。最后写成一部描述各种动人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第一手文章集锦，把重点放在揭露阴谋、个人倾轧和耸人听闻的丑闻方面。金对他所写的人物的动机敢于作出评价。应该参考金的著作来对照犬养对高、陶两人推崇备至的描绘，因为金对这两个人是极为藐视的。

此外，还应该提一下周佛海的日记。虽然我所引用的是日文译本，而中文原本《周佛海日记》一书则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香港出版了。周写日记极为认真，但令人遗憾的是，只出版了一九四〇年的那一部分。在战争将近尾声时，他把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所写的七部日记寄存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这些日记本都被国民党谍报机关所没收。肯定是由于他们害怕这些日记本会泄露国民党官员同汪政府人员之间的秘密接触的真相，所以才拒绝把这些日记交还给周的遗孀。有一个名叫邓宝光的国民党“敌产管理局”主管官员，后来倒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据信，他同泄漏这本一九四〇年的日记有关。（见布尔曼编《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 409 页。）

从回忆录及第一手叙述资料转而谈到文献资料之前，我要先说明一下：六十年代日本发表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这就使研究中日战争史的学者们省去了消耗在看外务省及战史馆档案方面的大量工作时间。由于要看到这些资料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需要有一定的资格和“门路”才能看到），所以这大批资料的出版就更加令人高兴了。特别是青年学者，要想拉上一个合适的社会关系，其困难程度不下于设法改造日本的社会习俗，而且也许还

得花掉一年研究期限中的十一个月，才能找到适当的门路。

在过去十年中出版的文献资料中最有用的是三□书房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中的《日中战争》（共五卷，三千六百页），原书房出版的《外务省一百年》（共两卷，二千七百页），《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丛书的文件附录（第八卷，六百页）以及三□及原两家出版公司所出版的包括石原莞尔、宇垣一成、杉山元和冈村宁次等人的日记及文件的七卷资料（四千页以上）。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足够西方学者多年之用。但可惜得很，没有一本资料是编了索引的。

我称之为《矢野文件》的一套文件汇编是关于中日战时合作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这些文件是新近才被发现，还没有出版。是一个名叫矢野征记的外务省官员所收集的许多笔记和会谈纪要，大部分是关于一九四〇年年中谈判《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材料。这批资料现收藏在外务省在东京的一个半官方机构国民外交会馆中。

目前还没有人以任何一种文字写过全面探讨中日战时合作的书。臼井胜美及秦郁彦二人为《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丛书第四卷提供的材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两个人的研究把一九四一年作为截止阶段。至于要研究一九四一年以后的情况，学者们就得完全依靠自己了，但明石祐治的研究成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把这个空白点给弥补上。林翰笙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合作的资料，但其主要注意力也是放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的年代里。

要想进一步得到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应该首先参考弗雷德里克·W·莫特所著《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华所扶植的政府》一书。虽然这本书已出版将近二十年了，但是该书搜集的参考资料非常完备，这种做法对我们总是有用处的。它的编排完善而且还有大量的注释。关于中国方面的材料，包括对汪精卫、陈公博及周佛海等人的著作的讨论，读者可参看林翰笙的论文的第一章。最后，何炳贤所编的关于汪精卫著作的目录，现存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罗·亨利·胡佛图书馆的档案中。

附：参考书目一览表。

阿本德，哈利特：《1926—1941 年我在中国的侨居生活》，1943 年，纽约版。

阿勒斯，约翰：《一个日本制造的“成吉思汗”》，《密勒氏评论报》，1939 年 2 月 4 日，第 302—303 页。

明石祐治：《日本对重庆政府的和平攻势》（未发表的手稿）。

同上：《193—1941 年南洋华侨救国运动》，东亚丛书，研究刊物第五号，1970 年，堪萨斯州，劳伦斯版。

美国新闻委员会（出版物），1938—1940 年，上海版。特别是第五号，《中国开发（无限）公司：对日本经济合作的第一手研究》（1939 年 8 月）和第八号，《在中国舞台上的日本傀儡》1940 年 1 月）。

青木得三：《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背景》共六卷，1953 年，东京版。

巴莫：《缅甸的突破：1939—1946 年的革命回忆录》，1968 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版。

马场章：（设置兴亚院的一些问题》，《外务省调查月报》，第七期（1966 年），第 46—83 页。

巴杰，H·H：《吴佩孚元帅》，（上海）《中国杂志》，第三十期（1939 年），第 133—138 页。

巴勒特，戴维：《迪克西使团：1944 年美国陆军驻延安观察小组》，研究中国问题专著，第六号，1970 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版。

贝尔登，杰克：《中国震撼了全世界》，1949 年，纽约版。

本达，哈里·J：《新月与旭日》，1958 年，海牙版。

同上、詹姆斯·K·入仓、岸宏一：《日本在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文件选辑》，1965 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版。

比森，T·A：《日本在中国》，1938 年，纽约版。

布尔曼，霍华德·L 编：《中华民国人名词典》，共四卷，1967、1971 年，纽约版。

同上：《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见于薛君度编《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第 295—319 页，1971 年，纽约版。

布格，多萝西：《美国与 1933—1938 年的远东危机》，1964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

博斯，苏巴斯·钱德拉：《1935—1942 年印度的斗争》，1952 年，加尔各答版。

博伊尔，约翰·亨特：《一桩事件发展成一场战争：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日本翻译家》（东京），第六期（1970），第 309—325 页。

同上：《1937—1941 年日本在华的傀儡政权》，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68 年。

同上：《通往中日合作之路：汪精卫叛变的背景》，《日本大事纪》，第二十五期（1970 年），第 267—301 页。

布里埃，奥：《1898—1948年五十年中的中国哲学》，1965年，纽约版。

布托，罗伯特：《东条与战争的到来》，1961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版。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1958年北京版。

陈，杰罗姆：《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学报》，第二十八期（1965年）。

同上：《国民党左派的定义》，《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学报》，第二十五期（1962年），第557—573页。

陈公博：《中日合作的基础》，见于唐良礼编：《救国之根本》，1942年，上海版。

同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由马丁·威尔伯编并加序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丛书第七号，1960年9月。（原书是1924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修订缩写本。1965年，纽约版。

金雄白［朱子家］：《共存之实质》，由池田笃则译自中文。它是下列各书经过修订并略加删节后的版本。

同上：《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共五卷，1959—1964年，香港版。

同上：《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香港）《春秋》，第一五九——一六〇期（1964年2—3月），第2—15页及第2—4页。

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1939年，上海版。特别是第二号：第l—7页，汪精卫：《中日关系：我的概念和目标》；第二号：第8—13页，汪精卫：《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三号：第l—13页，《（正统）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三号：第21—35页，汪精卫：《和平运动之目标》；以及第四号：第l—20页，周佛海：《回顾与展望》。

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汪精卫与日本之间的协定》，1943年，重庆版。

中国（国民党）宣传部编：《1937—1943年中国手册》，1943年，纽约版。

同上：《1937—1945年蒋委员长战时书信集》，共两卷，1946年，纽约版。

周佛海：《回顾与展望》，见于上列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条中。

同上；《周佛海日记》，由吉田东雄从中文编译。1953年，东京版。朱子家（笔名）：见金雄白条。

克利福德，尼古拉斯：《从中国撤退：1937—1941 年英国的远东政策》，1967 年，华盛顿州，西雅图版。

克拉布，埃德蒙：《二十世纪的中国》，1964 年，纽约版。

科恩，沃伦：《谁在湖南抗日？一对中国为战争所作努力的几点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七期（1967 年），第 111—115 页。

康罗伊，希拉里：《日本在华的战争：是越南战争的历史先例吗？》，《太平洋事务》，第四十三期（1970 年），第 61—72 页。

同上：《日本在华的战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二十一期（1952 年），第 367—379 页。

库克斯，阿尔文：《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1937—1938 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军务杂志》，第三十二期（1968 年）。

同上：《虎年》，1964 年，东京。

克雷吉，罗伯特爵士：《在日本假面具的背后》，1946 年，伦敦版。

克劳利，詹姆斯：《三十年代初期日本陆军中的派系斗争》，载。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一期（1962 年），第 309—326 页。

同上：《1931—1938 年日本对华政策》，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60 年。

同上：《日本谋求自治》，1966 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版。

同上：《为日本和亚洲制订的一项新政策：通往珍珠港他一条道路》，见于詹姆斯·克劳利编：《说明现代东亚的论文集》，1970 年，纽约版。

防卫厅，防卫研究署编：《大本营陆军部》，共两卷，1967—1968 年，东京版。

《1918—1945 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D 集共九卷，1949—1956 年，华盛顿版。

土肥原贤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中央公论》，第六一四期（1938 年 11 月）。

端纳，W •H：《蒋介石总部通讯》，（纽约）《亚细亚》，第三十九期（1939 年）：第 193—196 页。

达尔，保罗及迈克尔·梅村高有：《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使用索引》，1962 年，密执安州，安阿堡版。

德基，特拉弗斯·A：《汪精卫与日本》，斯坦福大学硕士论文，1949 年。

杜斯，彼得：《永井柳太郎；革新所遇到的策略上的窘境》，见于艾伯特·克雷格及唐纳德·夏夫利合编：《日本历史上的人物性格》，第 339—424 页。1970 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版。

同上：《永井柳太郎和“白人之祸”，1905—1944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三十一期（1971 年），第 41—48 页。

江口朴郎等人：《太平洋战争史》，共六卷，1952 年，东京版。

江藤信吉：《台湾历史梗概》，见于马克·曼柯编：《今日的台湾》，第 43—58 页，1964 年，纽约版。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二版，1958 年，纽约版。

费正清及万野政高：《日本人对现代中国的研究》，1958 年，东京版。

菲斯，赫伯特：《通往珍珠港的道路》，1950 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版。

菲谢尔，韦斯利：《日本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和平攻势》，《远东季刊》，第十三期（1949 年），第 387—397 页。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见美国，国务院条。

弗兰德，西奥多：《介于两个帝国之间：1929—1946 年菲律宾所经受的严峻考验》，1965 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版。

藤原明：《军事史》，1961 年，东京版。

外务省：《1840—1945 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共两卷，1955 年，东京版。

《外务省百年史》，共两卷，1969 年，东京版。

加斯特，迈克尔：《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1968 年，华盛顿州，西雅图版。

同上：《中国政治革新过程中的改革与革命》，见于玛丽·赖特编：《在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 67—96 页，1968 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版。

《现代史资料》，三□书房编，共四十三卷，1962—1970 年，东京版。特别是第一——三卷《索尔格事件》；第八——十卷、十二——十三卷《中日战争》，以及三十七卷《大本营》。

德国，外交部，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条。

吉林，唐纳德：《军阀：1911—1949 年山西省的阎锡山》，1967 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版。

吉尼格，亨利：《凡尔登时代与维希时代的贝当》，《纽约时报杂志》，1964 年，11 月 16 日，第 96—99 页。

戈特，约翰：《日本为亚洲而战》，1943 年，纽约版。

英国，外交部：《1919—1939 年英国外交政策文献》，第二集，第八——九卷。1960—1965 年，伦敦版。

格鲁，约瑟：《在日本的十年》，1944 年，纽约版。

根室，约翰：《亚洲内幕》，1939 年，纽约版。

哈克特，罗杰：《军人》，见于罗伯特·沃德及丹克沃特·吕斯托合编：《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革新》，第 328—388 页，1964 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版。

哈恩，埃米莉：《我所知道的中国》，1949 年，纽约版。

同上：《宋氏姐妹》，1941 年，纽约版。

韩素音：《没有鸟儿的夏天》，1968 年，纽约版。

同上：《死亡之花》1966 年，纽约版。

汗金，高姆包扎布（约翰·高·汗金）：《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向亚洲研究协会于 1971 年 3 月 29 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一篇未出版的论文手稿。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共九卷，1952—1956 年，东京版。

晴气庆胤：《上海阴谋》，1951 年，东京版。

秦郁彦《中日战争之军事进展》，见于下列《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3—110 页。

同上：《日中战争史》，1961 年，东京版。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第四版（一卷），1966 年，东京版。

林□雄等人：《为什么要重新估价大东亚战争？》，《潮》，1964 年 2 月号。

林三郎（与阿尔文·库克斯合作）：《皇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陆军》，1959 年，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版。

休因斯，拉尔夫：《吉斯林：不光采的预言家》，1965 年，伦敦版。

希兰姆，雷：《反暴乱：从中国与日本早年对付共产党人的经验中得来的教训》，（宾夕法尼亚大学）《环球》，第十二期（1968 年），第 226—246 页。

《昭和时代秘史》，《智性》编特刊，1956 年 12 月。

平野礼次：《满洲阴谋家：河本大作的灾难性的足迹》。

何炳贤：1969—1971 年间与作者的通信。

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共两卷，1962 年，东京版。

胡兰成：1970 年与作者的通信。

赫尔，科德尔：《回忆录》，共两卷，1948 年，纽约版。

池信高：《日本决定进行战争》，1967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今井武夫：《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1966 年，东京版。

同上：《支那事变回忆录》，1964 年，东京版。

同上：《昭和阴谋》，1967 年，东京版。

同上：《对华和平攻势》，见于上列《昭和时代秘史》。

今井武夫及清水董三：《对汪兆铭运动的回忆》，见于东京电视第十二频道新闻室编：《目击者所述的昭和史》。

今村均：《今村均将军回忆录》，共四卷，1960 年，东京版。

稻场正夫编：《冈村宁次大将》，1970 年，东京版。

1946—1949 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明文件的分析资料、文件、物证及《审讯记录》。

犬养健：《扬子江仍在奔流》，1961 年，东京版。

入江明：《横跨太平洋：美国与东方关系内幕史》，1967 年，纽约版。

同上：《热衷于帝国主义：1921—1931 年在远东谋求建立新秩序》，1965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

同上：《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行为的重新估价》，（评论文章），《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二期（1963 年），第 103—113 页。

同上：《两次大战间日本外交政策的源由及其解释》，（评论文章），《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六期（1967 年），第 677—682 页。

艾萨克斯，哈罗德：《中国革命的悲剧》，第二版，1961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石田武：《越出了不同文化对和平的传统概念》，（奥斯陆）《和平研究杂志》，1969 年 2 月，第 133—145 页。

石射猪太郎：《外交家的一生》，1960 年，东京版。

同上：《意见书》，见于上列《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意见书》的正式标题为：《关于处理目前局势的若干意见》。

维新政府概史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概史》，1940 年，东京版，（“只供不公开的散发之用”）。

石原莞尔，见角田顺编各条。

以色列，约翰：《1927—1937 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1966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伊藤金次郎：《德王近况及新蒙古》，《中央公论》，第 627 期（1939 年 11 月）。

詹森，马里阿斯：《日本人和孙中山》，1954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

同上：《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见于艾伯特·费尔韦克尔等人合编：《探讨中国现代史的途径》，1967 年功利福尼亚州，伯克莱版。

同上：《明治时代日本的维新及对外政策》，见于罗伯特·E·沃德编：《现代日本在政治上的演变》，第 149—188 页。1968 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版。

日本，外务省，见《外务省》条。

约翰逊，查默斯：《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同上：《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1962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琼斯，F • C：《1937—1945 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1954 年，纽约版。

条野广：《山西独立战争记》，见青地信编：《大陆梦》，1969 年，东京版。

影佐祯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护文件第 1282 号（影佐供词）。

同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 CE2721 号（“1947 年 5 月 22—23 日在日本东京第一国民医院听取影佐祯昭供词的委员会活动记录”）。

同上：《漫谈》，见于上列《现代史资料》。

卡欣，乔治：《印度尼西亚》，见于卡欣编：《亚洲主要国家的政府》，1963 年，纽约州，伊萨卡版。

鹿地亘编：《反战资料》，1964 年，东京版。

镰田泽一郎；《松籁政谈》，1951 年，东京版。

神尾茂：《汪精卫与和平运动》，《近代日本》，第八期（1939）。

同上《汪精卫与重庆》，《近代日本》，第九期（1940）。

高宗武：1967—1971 年间与作者的通信。

加濑俊一：《密苏里号军舰之行》，1950 年，康涅狄克州，纽黑文版。

河边虎四郎：《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见于《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会晤是 1940 年进行的）。

河上，K • K：《日本谈论中日危机》，1932 年纽约版。

风见章：《近卫内阁》，1951 年东京版。

基恩，唐纳德：《日本的作家和大东亚战争》，《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三期（1964 年）。

同上：《1874—1895 年中日战争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见于唐纳德 • 夏夫利编：《日本文化的传统及其革新》，1971 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版。

克尔，乔治：《福摩萨被出卖了》，1965 年，波士顿版。

康贾兰宁格拉特：《印度尼西亚心目中的日本》，（日本国际大厦〕《简报》1969 年 12 月号，（摘自 1969 年 11 月 4 日的一次讲演）。

近卫文麿：《近卫公爵回忆录》，见美国第七十九届国会调查偷袭珍珠港事件联合委员会编：《偷袭珍珠港，调查偷袭珍珠港事件联合委员会的听

证记录》。

同上：《一项失败了的政治事业：近卫文麿公爵的笔记》。有人认为近卫私人秘书牛场友彦是本书的作者。

顾，T • K：《日本所扶植的华北政权在经济方面的文件》，《远东季刊》，第六期（1946 年）。

库布林，海曼：《日本殖民主义的演变》，《对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二期（1959 年）。

龚德柏：《汪兆铭除敌叛国秘史》，1963 年，台湾版。

栗原健：《日本的满蒙政策面面观》，1966 年，东京版。

拉铁摩尔，欧文：《对边疆史的研究》，1962 年，东京版。

劳雷尔，何塞；《何塞 • 劳雷尔博士战时回忆录》，1962 年，马尼拉版。

雷勃拉，乔伊斯：《日本的政策和印度国民军》，《亚洲研究》（马尼拉），第七期（1969 年）。

利文森，约瑟夫：《信奉儒家的中国及其在现代的命运：帝政衰败的问题》，1964 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版。

李恩国：《汪精卫的晚年经历——特别是有关 1938—1945 年间他的国民政府对日合作的问题》，1966 年，香港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

林翰笙：《中国人对敌合作方面的专题研究：1940—1945 年的南京政府》，未经发表的手稿。

同上：《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1967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

林柏生：《中国和平运动》，《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1939 年）。

林，W • Y：《中日货币战》，《美亚杂志》，第三期（1939 年）。

莱因巴格，保罗：《蒋介石的中国》，1941 年，波士顿版。

刘，F • F：《现代中国军事史》，1956 年，普林斯顿版。

刘，詹姆士：《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停》，《亚洲研究杂志》，第八期（1949 年）。

罗，皮雄：《对蒋介石的策略的新估价》，《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五期（1966 年）。

陆大维：《从芦沟桥到珍珠港》，1961 年，华盛顿版。

梅基，约翰：《1894—1960 年间在远东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文件》，1961 年，西雅图版。

曼阿，马克：《死心绝望的海岛——台湾》，尼曼柯编：《今日台湾》。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共四卷，（1961—1965 年北京版）

丸山真男：《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由伊凡 • 莫里斯编译，1963

年，伦敦版。

丸山静雄；《已遗失的记录》，1950 年，东京版。

松谷尚三：《国民党政府在作战》，1944 年，东京版。

松本三之助：《民族主义在现代日本人思想中的重要性：某些理论上的问题》，《亚洲研究杂志》，第三十一期（1971 年）。

同上;《福泽谕吉对文明的观念及其对亚洲的看法》,《在发展中的经济》（东京），第五期（1967 年）。

松本宗吉：《中国人民的倾向》，《外交时报》，第八四六期（1940 年 3 月 1 日）。

貌貌编：《缅甸的昂山》，1962 年，海牙版。

马克森，耶尔；《谁控制着日本的对外政策？》，1957 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版。

梅奥，马林：《对亚洲的态度及日本帝国的兴起》，见于格兰特·古德曼编：《日本帝国及亚洲》，1967 年纽约版。

梅思平：《举棋不定的代价》，《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1939 年）。

孟，C·Y·W：《日本在华北的机构——治安维持会》，《密勒氏评论报》，1938 年 1 月 1 日号第 125—126 页。

梁斌：《武德论》，1935 年。

迈克尔，弗兰兹：《傀儡政府的重要性》，《太平洋事务》，第十二期（1939 年）。

同上：《什么叫做“傀儡”》，《太平洋事务》，第十二期（1939 年）。

三木清：《支那事务及日本的想法》，《现代日本》，第六期（1938 年）。

梅乐斯，米尔顿；《一种不同的战争》，1967 年，纽约版。

三轮君忠：《汪精卫政权和日本谋求结束在华战争的努力》，见于约瑟夫·罗根道夫编：《对日本文化的传统和实践的研究》，1963 年，东京版。

宫川彻和井桁武：《德富苏峰》，《发展中的经济》（东京），第五期（1967 年）。

森恭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的目录及索引》，1953 年，东京版。

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和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录》，1946 年，东京版。

莫利，詹姆士：《国家档案馆所存被没收的日本资料清单》，《远东季刊》，第九期（1950 年）。

莫里斯，伊凡《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右派》，1960 年。伦敦版。

莫斯利，伦纳德：《日本天皇裕仁》，1966 年，纽约版。

莫特，弗雷德里克：《元代儒家的遁世主义》，见于亚瑟·赖特编：《儒

家信念》，1960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同上：《1937—1945 年日本在华所扶植的政府》，1954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中村丰一：《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见于上列《昭和秘史》。

梨本祐平：《在中国的日本人》，1958 年，东京版。

西义显：《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1962 年，东京印刷（只供不公开散发之用）。

仁科五郎：《满洲国的建立者石原莞尔和浅原健三》，见于下列《转向》条，第三卷，第 160—200 页。

西谷省三：《在战争中的国民政府》，1944 年，东京版。

诺曼，赫伯特：《日本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崛起》，1940 年，纽约版。

吴努：《日本人统治下的缅甸》，1954 年，伦敦版。

绪方昇：《兴亚院联络部及其四长官》，《改造》，1939 年 4 月号。

绪方定子：《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1931—1932 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1964 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版。

大仓公望：《东亚的重建和苏联》，《现代日本》杂志，1939 年，第八期。

奥诺，K：《1937—1945 年间日本试图进行和平谈判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1960—1961 年，牛津大学的一篇学士论文。

冈吉武：《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理智》，见于《对现代日本思想史的研究》，第八期，1961 年，东京版。

冈村宁次：见稻场正夫条。

冈野增次郎：《吴佩孚》，1939 年，东京印刷（只供不公开散发之用）。

《在华北的鸦片贸易利润》，《亚细亚》杂志（纽约），第四十期（1940 年）。《东方年鉴》1942 年，东京版。

尾崎秀实：《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客观基础》，见于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1963 年，东京版。

佩恩，罗伯特：《蒋介石传》，1969 年，纽约版。

佩克，格雷厄姆：《两种时代》，1950 年，波士顿版。

皮奥维萨纳，吉诺：《代表痛苦一代的思想家三木清》，见于约瑟夫·罗根道夫编：《对日本文化的传统和实践的研究》，1963 年，东京版。

鲍威尔，约翰：《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1945 年，纽约版。

普雷塞森，欧内斯特：《德国和日本：对 1933—1941 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1958 年海牙版。

傅仪，爱新觉罗：《我的前半生》，共两卷，1964 年，北京版。

派尔，肯尼思：《1885—1895 年明治时代的日本的一代新人；在文化上的同一性的问题》，1969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雷克托，克拉罗：《菲律宾三年沦陷时期》，1946 年，马尼拉版。

赖肖尔，埃德温：《美国和日本》，1965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第三版。

罗辛格，劳伦斯：《汪精卫——一个卖国贼的伎俩》，《美亚杂志》，第四期（1940 年）。

罗伊，朱尔斯：《贝当元帅受审记》，1966 年，纽约版。

腊山正道：《1914—1939 年日本的外交政策》，1941 年，东京版。

西乡耕作：《石原莞尔》，1937 年，东京版。

西园寺公一：《贵族的退场》，见于今井政一编：《昭和时代的动乱》，1969 年，东京版。

泽田健：《汪兆铭传》，1939 年，东京版。

斯卡拉皮诺，罗伯特及乔治·俞合著：《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1961 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版。

施瓦茨，本杰明：《中国人在过去和现在对世界秩序的观念》，见于费正清编：《中国式的世界秩序》，1968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

西登斯蒂卡，爱德华：《作家永井荷风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1879—1959 年》，1965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关宏治；《亚洲危机的序幕》，见于《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一卷，第 287—440 页。

塞尔登，马克：《中国革命中的延安方式》，1971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

沙曼，莱昂：《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1934 年，纽约版。

谢然泽，米尔顿：《关于国民党的历史文献选编》，1970 年，纽约州，牙买加版。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1953 年，东京版。

同上：《昭和时代的动乱》，共两卷，1952 年，东京版。它的英译缩写本，《日本和她的命运》，1958 年，纽约版。

岛田俊彦：《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载于《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三卷第 3—224 页。

盐田正平：《被蹂躏的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朝鲜人》，见于《朝日杂志》编：《昭和时代历史片断》，我为本文所译的文章见于《日本翻译家》杂志第七期（1971 年）。

白彦一郎：《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实的日本资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丛书第二号，1953 年 11 月。

白乌俊夫：《日本的大陆政策对文化史的重要意义》，《改造》，第十九卷，第十一期，（1937 年 11 月）。

雪利，詹姆士：《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1932 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1962 年，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

史沫特莱，艾格尼丝：《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56 年，纽约版。

斯诺，埃德加：《为亚洲而战》，1941 年，纽约版。

同上；《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1961 年，纽约版。

索特，保罗·理查德：《吴佩孚：对一个中国军阀的专题研究》，1958 年，哈佛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

斯波尔丁，小罗伯特：《1932—1945 年日本的新官僚》见于乔治·威尔逊编：《战前日本的危机政治》，1970 年，东京版。

施泰格尔，奈：《日本无法结束僵局》，《时事报》第七期（1940 年）。

斯坦因，根室：《经济札记》，《美亚杂志》，第三期（1939 年）。

斯坦堡，大卫：《何塞·劳雷尔："被误解的对敌合作者"》，《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四期（1965 年）第 651—665 页。

同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菲律宾的对敌合作》，1967 年，密执安州，安阿堡版。

斯托里，G·R：《加倍爱国者：对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1957 年，波士顿版。

同上：《藤原家族的末代子孙近卫文麿》，《圣安东尼文件集》第七期，1960 年，伦敦版。

同上、迪金：《理查德·索尔格案件》，1966 年，纽约版。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1954 年，纽约版。

须田定一：《从事中日问题研究的一生》，载《世界》杂志第二〇七期（1963 年 5 月），第 264—272 页。

杉山元：《杉山回忆录》（杉山文件集），共两卷，1967 年，东京版。

杉山平助：《宇垣新外相》，《改造》，第二十二期（1938 年）。

苏加诺：《苏加诺自传》（对辛迪·亚当斯的口述），1965 年，纽约版。

孙中山：《中国与日本：天生之友而非天生之敌》，唐良礼编，1941 年，上海版。

《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共八卷，1962—1963 年，东京版。尤其是其中的第一卷《满洲事变前夜》；第三卷《日中战争：第一部分》；第四卷《日中战争：第二部分》；以及第八卷《附录：文件汇编》。

高口满俊：《鼓吹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佐野学与锅山贞亲》，见下条。

高木陆郎：《汪精卫的和平建议》，《近代日本》，第八期（1939 年）。

竹内好：《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和实况》，1963 年 12 月。

田中鼎；《国民党与共产党》，《近代日本》，第十期（1939 年）。

田中隆吉：《日本战败的原因大白：军国主义者飞扬跋扈的真相》，1956 年，东京版。

同上：《日本军方的派系斗争史》，1947 年，东京版。

唐良礼：《中国、现实与幻想》，1936 年，上海版。

同上；《伪“满洲国”》，1935 年，上海版。

同上：《汪精卫：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1931 年，北平版。

同上编：《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1942 年，上海版。

陶希圣：《乱流》，见于《传记文学》第二期，1964 年，台北版。

同上：《中日经济关系》，《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1939 年）。

泰勒，乔治：《对华北的争夺》，1940 年，纽约版。

《转向》：思想之科学研究会编，共三卷，1959—1962 年，东京版。

东亚问题调查会编：《最近支那要人传》，1941 年，大阪版。

东乡茂则：《时代的一个方面》，1952 年，东京版。其英译缩写本，名为《日本的事业》，1956 年，纽约版。

董显光：《蒋介石传》，1953 年，台北版。

辻政信：《大东亚的两个领导人：石原莞尔和汪兆铭》，见于《昭和时代秘史》。

角田顺：《解题》，《书目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418—426 页。

同上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1967 年，东京版。

同上编：《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1968 年，东京版。

同上编：《宇垣一成日记》，共两卷，1968—1970 年，东京版。

都留茂人：《日本经济论文集》，1958 年，东京版。

鹤见和子：《社会变迁与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后的日本》，1970 年，普林斯顿版。

鹤见俊助：《大政翼赞运动的策划者》，见于上列《转向》，第二期。

塔奇曼，巴巴拉：《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71 年，纽约版。

宇垣一成：《宇垣日记》，1954 年，东京版。亦列于角田顺编条中。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37 年的第三、四卷；1938

年的第三、四卷；1939 年的第三、四卷；1940 年的第四卷；1941 年的第四卷；1942 年、1943 年、1944 年的中国部分；1944 年的第六卷】；945 年的第七卷。1949—1969 年，华盛顿版。

同上：《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1931—1941 年》，共两卷，1943 年，华盛顿版。

同上：《美中关系》（中国白皮书），1949 年，华盛顿版。

美国战略情报局编：《中国傀儡人物传记》（根据 1941—1945 年间对东京电台的短波侦听材料编纂），1945 年，火努鲁鲁（檀香山）油印版。

同上：《日本对华政策纲领》，共三卷，1945 年，檀香山版。

同上，《华北沦陷区的傀儡政府机构》，1945 年，油印版。

臼井胜美：《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见于《朝日杂志》社编：《昭和时代历史片断》第一卷第 285—293 页。我为本文所译的文章见于《日本翻译家》杂志，第六期（1970）。

同上：《日中战争》，1967 年，东京版。

同上：《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见于上列《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 113—256 页。

同上：《资料解说》，上列《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的序言。

上原，塞西尔编：《1949—1951 年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以缩微胶片拍摄的 1868—1945 年的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单》。1954 年，华盛顿版。

范斯莱克，莱曼：《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1967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同上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的一篇报告》，1968 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版。

汪精卫；《和平运动之目标》，见于上列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条。

同上：《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1934 年，上海版。

同上；《孔子及中国的道德重建》，见唐良礼编：《救国之根本》，1942 年，上海版。

同上：《欧战与中国前途》，《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1939 年）。

同上：《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1939 年）。

同上：《在新秩序中的自由平等》，见于唐良礼编：《救国之根本》，（即汪于 1941 年 1 月 1 日发表的元旦贺词）。

同上：《在焦土上的游击战》，《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一期（1938 年）。

同上：《悼念曾仲鸣博士》，见于唐良礼编：《救国之根本》，1942 年，上海版，（该文于 1939 年 4 月 6 日在河内发表）。

同上：《临终遗嘱》，见上列金雄白条。

同上：《依靠日本——中国与东亚》，《中央公论》，第六二五期，1939年10月号）。

同上：《汪主席献给日本天皇的纪念文章》，（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东亚图书馆，#2991.5/3138）。

同上，《1938年12月29日提出的和平建议》，《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1939年）。（汪精卫于河内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艳电》）。

同上：《汪精卫诗集》，1938年。伦敦版（舒雪元译为英文）。

同上：《中日关系》，见于上述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条。

同上：《走向实现体面和平》，见于上列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条。

同上：《抗战的真相》，《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1939年）。

同上；《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1939年），（汪从河内于1938年12月28日写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的信）。

汪，Y・C：《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1966年，北卡罗莱纳州，查帕尔希尔版。

同上：《杜月笙（1885—1951）：政治人物传记试稿》，《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六期（1967年）。

沃纳，杰弗里：《赖伐尔的没落与垮台》，《今日历史》杂志，第十一期（1961年）。

魏勒，戴维：《附有条件的华北独立》，《美亚杂志》，第四期（1940年）。

怀特，西奥多编：《史迪威文件》，1948年，纽约版。

怀特，西奥多与安娜莉・雅各比合写：《来自中国的雷声》，1961年，纽约版。

威尔伯，马丁：《陈公博的复杂经历》，见于薛君度编：《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1971年，纽约版。

伍德海编：《中国年鉴》，1930—1940年间的各个版本，上海版。

赖特，戈登：《现代法国：1760年到现在》，1966年，纽约版。

吴天威：《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发动的政变》，《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七期（1968年）。

伍尔费尔，戴维：《菲律宾》，见于卡欣编：《东南亚各国的政府和政治》，1964年，纽约州，伊萨卡版。

矢部贞治：《近卫文麿传》，共两卷，1952年，东京版。

山崎重三郎；《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干部学校记事》，1963年2—4月，第一一三——一一五期，共三部分。（根据山崎于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

学校的几篇讲演写成。）

柳贺千年：《自佩里时代以来的日本》，1949 年，纽约版。

杨益周：《太平洋战争的前夜》，1970 年，东京版。

杨连升：《关于中国式的世界秩序的历史札记》，见于费正清编：《中国式的世界秩序》，1968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

矢野征记：《矢野文件》（日文）。

读卖新闻编：《昭和史中的天皇》，共十四卷，1967—1971 年，东京版。尤其是其中第十四卷关于陈公博部分。

吉田东雄：《两国之间的桥梁》，1958 年，东京版。

杨，亚瑟：《1937—1945 年的中国及外援》，1963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

杨，约翰：《1868—1945 年精选日本陆海军及其他政府机关档案的缩微摄影复制品清单》，1959 年，华盛顿版。

同上：《1907—1945 年南满铁路公司的研究活动》，1966 年，纽约版。

杨，胜：《诺蒙坎事件：日本帝国与苏联》，《日本大事记》，第二十二期（1967）。

作者曾同以下有关人在下述时间地点进行过会晤：

张嘉璈 1967 年 10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

陈中辉 1970 年 3 月在香港。

金雄白 1970 年 3—4 月间先后在香港、东京。

方君碧（曾仲鸣夫人）1970 年 7 月在波士顿。

何炳贤 1970 年 3 月在香港。

今井武夫 1970 年 1 月在东京。

高宗武 1969 年 12 月在华盛顿。

李圣五 1970 年 3 月在香港。

卢博士 同上。

松方吉三郎（三郎） 1970 年 2 月在东京。

松本重治 1969 年 10 月在东京。

冈田洋次 1970 年 5 月在横滨。

清水董三 1970 年 2 月在东京。

陶希圣 1971 年 3 月在台北。

角田顺 1970 年 l—6 月间在东京。

牛场友彦 1970 年 5 月在东京。

山崎重三郎 1970 年 l—4 月间在东京。